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兩岸對話： 兩府還是兩黨？

爲文革造反派翻案
北京人眼中的六四（下）
周恩來的骨灰撒在何處？
中國大陸最惠國待遇風波
榮毅仁豈敢步許家屯後塵
捷克：東歐最成功的大選
東德：民主對共產黨也公平
越南經濟改革：驚險的一躍
二李相爭：亞運會後見分曉
我所知道的中共間諜金元
動搖公有制根基的盲流大軍
公費吃喝：天下真有不散的席
留學生回國考察團調查報告

1990.8

87

權利宣言

一九九〇年六月三日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民主中國陣線

——「六四」北京屠殺一週年之際，宣讀於美國首都華盛頓國會山前所舉行之衆紀念大會，有待於未來中國人民制憲會議審議——

我們中國人民，今天正在進行一場劃時代的鬪爭，去擺脫束縛我們達數代之久的鎖鏈。

極權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實驗已告徹底破產。它使本應豐衣足食的家園遍佈飢饉。本應政治清明的國家腐敗橫行。它強行奴役，扼殺自由，堅持暴政，踐踏民主。

在幅員遼闊，文化悠久中國，所有人本應生而平等，享有不可剝奪之人權。極權主義無視每一個人的尊嚴，不把人當人。

極權主義制度使我們民族歷盡浩劫。它不斷挑起仇殺，使數以千萬計的無辜生靈慘遭塗炭。使本應充滿和平、寧靜與和諧的國家冤魂糾結，天怒人怨。

極權主義制度奉行道德、精神和文化的滅種政策，致使中國人民生活於蒙昧主義的陰影之下。

極權主義把人民對苦難的嘆息和不平的抗議，一概視為叛亂，不惜一再將中華民族陷於血泊之中。它將物產豐碩的國土變成一個巨大恐怖的監獄，使被囚禁的人民不是顛沛流離，逃亡異國，就是鋌而走險，奮起反抗。

種種災禍，應予結束。中國人民渴望自由。一個建立在尊重人權和自由基礎上的共和國，必需在我們世代生息的土地上建立起來。

因此，我們中國人民，在此向全世界宣告我們為自由而鬪爭的原則。

1. 真理不言自明，人人生而平等，享有不可剝奪之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和通過自己的創造性勞動而獲得幸福的權利。尊重他人的同等權利是每一個人行使權利的唯一限制。

2. 每一個中國人享有免受因種族、宗教信仰、家庭背景、文化背景和政治意見而起之恐懼的自由。

3. 每一個中國人享有充分的人身保護。濫施死刑、草菅人命的現象必須根除。酷刑、示衆、非法監禁、秘密處決、凌辱死刑犯屍體和其他非人道的折磨，必受追究。

4. 在刑事案件中，人民享有接受公開和公正之獨立法庭審判的權利。無罪推定、大陪審團裁決和獨立的辯護人辯護等諸訴訟權利，應予保障。

5. 人民的隱私、住宅、家庭和通訊等各項權利，不受侵凌。人民遷徙自由得切實保障之，一切導致各階層人民之間的壓迫和歧視的「戶口制度」和人身依附關係，應予永遠廢止。

6. 每一個中國人得享有良知和宗教信仰的自由。為此，一切形式的宗教迫害應永遠消除。

7. 政府不得通過任何立法損抑人民參與、分享和傳播信息的權利。

8. 人民行使言論、出版、集會、遊行、抗議、罷工，以及參與包括自由及直接選舉當地或全國國會代表的自由權，政府不得損抑。

9. 當統治者違反其尊重人權之義務時，任何中國人均有權利和義務，以自己的行為或不行為進行反抗。一經和平手段用盡，而獨裁者以武力鎮壓人民時，人民以自由的名義所進行的反抗，均為合法。

10. 在嚴重侵犯人權的案件中，責任人員的個人民事和刑事責任不得以服從命令或執行政府職務為借口而有所豁免。

11. 人民的權利和自由並非受自政府，而是與生俱來。人民享有本宣言中未及列明的權利和自由，不得因為未及載明於本宣言而受損抑。

12. 人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就其本身來說，不受任何減損。政府也不得以國家利益或公眾福利為借口對人民實際行使這些權利加以限制。除非政府承諾義務，在當事人向憲法法院起訴時，負有據證責任。

我們認為，消除對於人類本性和良知的壓迫，使人從奴役狀態中獲得解放，是一切政治革命和社會改革的根本目的。而唯有拋棄極權主義制度和政治文化，通過普遍社會契約的方式建立民主和法制，這一目標才得以實現。

因此，我們在此宣告，中國人民今天正處於自由的前夜，我們渴望加入自由人類的行列。為了建設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全世界的中國人，聯合起來！



致中共領導人的公開信

中共中央領導人：

你們好。

最近，國內的形勢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變化。一方面，廣大民眾正在逐步地克服恐懼心理，恢復信心和勇氣；另一方面，當局自身也採取了某些緩和性的措施。當然，由六四屠殺所激化的全面危機遠遠沒有結束。但是，上述微妙的變化却揭示出一個深刻的趨勢。那就是，伴隨着民間力量的再起以及共產黨內溫和力量的回升，中國的和平民主改革還是有希望的。

我一向認為，要使一個國家和平地走向自由民主，首先有賴於民間力量的不斷努力，其次，執政當局的明智抉擇也屬必不可少。八九民運所一度開創的朝野對話，本來是為這種轉變提供了可貴的契機，六四屠殺却粗暴地中斷了這一嘗試而把整個中國拖至黑暗的深淵。因此，毫不奇怪，它造成了上層的嚴重分裂和朝野間的尖銳對抗，以及全社會的深刻危機。面對此一形勢，每一個關心人的尊嚴與自由、民族的前途與命運的人，無不為之深感痛心、憤慨和憂慮。正是出於這樣的心情，我們才對民間力量的逐漸復甦感到鼓舞以及對你們的些微改進表示歡迎，並決心以堅韌不拔的努力，把每一步良性的變化推進到更為廣闊的航道之中。

不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穩定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們必須看到，現在多數人的心理其實包含着兩個意願：一是求變；二是怕亂。在這裡，「求變」才是關鍵性的。假如大家都對現狀很滿意而不求改變，他們就根本用不着擔心亂。你們總是強調穩定、穩定。可是，這種強調本身却正好表明了你們對穩定沒有信心，你們感到了亂的巨大可能性。

實際上，今日中國面臨的困境是：不變必以致亂；只有變才可以防亂；但是變本身又確有可能引發亂。

造成上述困境的原因很簡單。目前中國的這種「穩定」，乃是一種虛假的穩定。因為它不是立足於人民的真心支持和上層的真正團結，而只是在強弩之末下的暫時沉默和在強人將去之際的脆弱平衡。除非否定六四屠殺，實行最基本的民主與法治，否則大亂無可避免。然而，由於在高壓之下民間力量很難獲得成熟的發展，整個社會缺乏自主的組織性和凝聚力，這就可能在決口沖開之後，出現誰也控制不住的大爆炸。

解決這一困境的辦法只有一個：一方面，民間力量必須迅速地發展自己，壯大自己，培養堅定明確的共識，具備整體行動的能力；另一方面，當局則必須順應形勢，及時地放棄高壓恐怖手段，重新採取並進一步擴大實行開放

與對話的方針。今天，你們或許會為在中國尚沒有成熟的民間組織而暗自慶幸；明天，你們必將會為想達成妥協却找不到真正有代表性的談判對象而苦惱不堪。

經驗是一名嚴厲的教師。他總是先考試，後講解。六四事件導致了朝野雙方誰都不情願見到的嚴峻後果。它使得中國的和平民主改革之路變得更加狹窄艱難。但是，如果人們能從此一經驗中充分汲取教訓，調整行為，則新局面的出現仍是可能的。聰明人不是不犯錯誤，聰明人只是不犯重複性的錯誤。歷史表明一個民族實現自由民主的過程，也就是這個民族積累政治經驗和增進政治智慧的過程。那些拒絕改進和調整自己行為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勢力，必將遭到歷史無情的淘汰。

中國民聯以促進中國民主化為己任。我們歷來認為，對話要比對抗好。這就要求我們民間力量和共產黨內的開明力量共同努力，推動中國政治走上真正良性互動的軌道。

敬禮！

此致

中國民聯主席 胡平
一九九〇年七月七日



熱 點 追 踪

方勵之的獲釋意味着什麼？

- 中共當局終於不得不在外部的壓力下低頭？
- 美國用最惠國待遇的價碼甩出了手中的負牌？
- 王丹、劉曉波、陳子明、王軍濤、楊巍等人的命運是否要等到下一年延長最惠國待遇的復核之日？
- 爲海外民主運動帶來一個精神領袖還是一個整合的契機？

特稿

73 大陸留學生回國考查團調查報告

仙人掌

84 特務論

留學生

87 有功記功，有過記過——使館反正人物備忘錄之一

88 怎樣申請H-1簽證

90 中共不倒，沒法回家

爭鳴

91 民運人士要有容人雅量

92 我不再訂中國之春

93 從河殤公案看中國人的民主意識

讀史偶拾

95 朱執信：民主革命的宣傳家

封底：六四紀念繪畫北美巡迴展

封面·圖版·插畫



董事長：徐邦泰
 社長：胡平
 主編：丁楚言
 執編：何言洋
 美編：蘇漫克
 記者：楊漫克
 發行：薛偉

桂榮庭·蘇蘇

樂偉

陳雪

丹澤

J-I 學生

劉名

孫申

路識

何鳴

張郎郎

張欣等

兩岸對話：兩府還是兩黨？

共產黨的策略在於宣而不戰，國民黨的對策應該談而不判。台灣若取守勢則堅持兩府對話，內綫作戰，若取攻勢，則主張兩黨對話，外綫作戰。

丁楚

對話是當今的時髦

自八十年代末，世界進入了一個對話的時代。蘇聯和美國在對話，東德和西德在對話，伊拉克和伊朗在對話，阿拉伯和以色列在對話……，現在，台灣海峽兩岸也要對話了。

海峽兩岸對峙了四十年，現在終於出現了談判的曙光，這對於中華民族來說無疑是個福音。歷史的悲劇一次又一次地教訓了人們，於是，他們今天寧願把和平建立在談判桌上，而不願再把它建立在廢墟上。畢竟，「用戰爭消滅戰爭」的思路在當代的世界上已經過時，今天的時髦是對話，是談判。可是問題是，怎麼談？

共產黨：宣而不戰

共產黨一貫相信，談判必須要有實力作為後盾。談判是「革命的兩手」之一。另外一手自然是武力解決。所以鄧小平對於「放棄武力解決」的承諾絕不鬆口，其意圖正在於保持壓力和威懾力。共產黨永遠可以舉着那只打人的手，哪怕不比你，這只手也不放下來。這一招叫作：宣而不戰。俗語曰：引而不發，躍如也。

人們都在議論，共產黨會不會真動武。其

實這樣不設任何前提條件的討論沒有任何意義。從共產黨的歷史來看，只要力所能及，沒有什麼事情它不敢幹。只要共產黨認為有必要（如台灣宣佈獨立）有可能，它當然不會留着台灣。當前有意義的討論應該是：共產黨在什麼時候，什麼條件下會動武。

今天的共產黨在戰略上顯然是取守勢的，這與它毛澤東時代要解放全人類的咄咄攻勢不可同日而語。這一戰略態度的轉變並不能完全用客觀環境的變化來解釋，今天中共的經濟再危機，也比不上六十年代初的大飢荒，政治再危機，也沒達到文革初期政府癱瘓的地步。應當看到，今天的共產黨人已經失去了心理上的優勢。黨還是同樣的黨，人還是同樣的人，可是有必勝信念還是沒有必勝的信念就大不一樣。鄧小平最近給江澤民制定的對外方針是六個字：井水不犯河水。而這一方針恰是首先對港台提出的，然後推及到西方國家。由此可以看出，中共現在的心態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己的事都搞不好，哪有心思去解救台灣同胞。六四之後的一年，大陸的政局正在動蕩中趨於平穩，此時中共當局不會節外生枝去葬送這種來自不易的安穩日子。

國民黨：談而不判

在海峽兩岸的對峙中，台灣的地位顯然是上升。不過台灣最擔心的是中共動武。所以談判也好，統一也好，台灣總是把中共不武力犯台的承諾作為首要先決條件。然而有一點需要清醒的是，大陸不是法制社會，中共本身的決策也沒有程序化，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作出的任何承諾都沒有意義。就算鄧小平保證不動武，而且假設他說話算數。可是鄧小平死了，後任很可能不認他欠的帳。中共歷史上從來就是後任不認前前任的帳，只要宣佈前任是錯誤路線，前任所做的一切承諾都可以作廢。在六四前，中共也曾許諾過解放軍不會殺人，也曾許諾過秋後不會算帳。可是到後來要殺一樣殺，要抓一樣抓，只要宣佈趙紫陽是錯誤路線，他所作的一切承諾都可以推翻。因此，除非大陸建成法制社會，或出現足以制衡共產黨的力量，使其不能為所欲為，否則和共產黨談判達成的任何協議都不足以為信。

然而，說共產黨的任何承諾沒有意義並不等於說談判沒有意義。在很多情況下，談判本身比談判的結果還重要。對於國民黨人來說，談判的過程比任何協議都有實質性的意義。海峽兩岸分離四十年，由於共產黨的醜化宣傳，大陸人民對國民黨的主張並不瞭解。老一代人印象中還是四十多年前腐化獨裁的國民黨，新一代儘管沒有成見，但聽的都是一面的宣傳，

也不知道國民黨到底如何。可是，談判對於國民黨人來說是一個宣傳自己主張的絕好時機。這樣一來，國民黨提出的任何前提條件都絕不是沒有意義的。例如，國民黨可以提出以放棄四項基本原則、開放黨禁報禁、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保障私有產權等作為談判的先決條件。哪怕共產黨對以上條件的承諾並不可靠，但實際上這些條件不僅僅是講給中共聽的，更重要的是講給大陸人民聽的。民眾聽了雙方談判的立場之後就會想：看來國民黨並不像共產黨說得那樣可怕，人家的主張確實有道理。

大陸目前還是專制體制，而台灣已經邁向民主體制，只要世界的大潮流是對話不是對抗，是民主不是專制，時間終會對台灣有利。談判在短期內沒有結果沒關係，談判本身會隨着時間變化改變兩岸的優劣對比。

兩黨對話為攻，兩府對話為守

兩岸的對話是以兩黨名義談還是以兩府名義談，目前還是個頗有爭議的問題。

共產黨的立場是不能接受兩邊政府平等對話的，在它眼裡，承認一國兩府就意味着承認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其實在大陸，黨和政府是一回事，共產黨自知無人敢於對此提出異議，所以它寧願以兩黨的名義談判，給國民黨出難題。

在國民黨面臨的兩種選擇中，兩府對話取守勢，兩黨對話則取攻勢。

主張兩府談判，有利於保住台灣本身的實際偏安地位，同時可以防備反對黨的攻擊，在兩岸對話過程中相對穩定島內政局。但以兩府名義談判的一個最大的弱點是名不正言不順。根據目前官方的理論，台北政府仍是中央政府，那麼兩府談，台北如何為自己定位呢？說到底，除非國府承認自己是地方政府，或者宣佈台灣獨立，否則它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再在對話中為自己的地位自圓其說。要麼，台北從一開始

就打算讓北京方面拒絕談判。但這樣一來，國民黨反而處於一個十分被動的局面，談不談的主動權就到了中共手裡，而且萬一談起來，只能內線作戰，談台灣的地位問題，談不到大陸的地位問題，不但挨共產黨的打，同時更容易挨反對黨的打。

相反，主張兩黨談判會使國民黨主動得多。首先，兩黨對話名正言順、地位平等，同時又繞開了敏感的法統問題。既使台灣的反對黨攻擊，也只能在「有權談什麼」的問題上作文章，而無法在談判本身和談判雙方地位的合法性上作文章。其次兩黨對話，國民黨可以以外線作戰，共產黨可以和國民黨談台灣地位問題，國民黨也可以主動出擊去和共產黨談大陸法統問題。從法統淵源來講，共產黨曾經承認過國民政府的法統（抗戰時期），而國民黨從未承認過共產黨政權的法統。也就是說，中共是用非法的手段（暴力）顛覆了它自己曾經承認的合法政府。這樣一來，大陸政權的法統問題就有很多文章可作了。如果國民黨取攻勢，和共產黨談大陸的問題，有利於避開島內反對黨對它的攻擊。

談談判：外線作戰

當然，無論中共取得政權的程序多麼不合法，但它畢竟會被大多數大陸人民承認過，同時至今還被國際上大多數國家所承認。這個法統的既成事實是繞不開的，那麼在這個基礎上國民黨怎樣外線作戰呢？

只要國民黨不在乎有沒有談判結果，同時有把握提出得民心的主張，就可以用談判談判的手段發起外線作戰。在這裡，第一個「談判」是動詞，第二個「談判」是名詞。也就是說，在雙方進入談判統一問題之前提出一系列談判的前提條件，比如說：

國民黨可以對共產黨與它談判的誠意提出質疑：「你之所以和我談判，不過是因為對我

無可奈何，我有幾十萬軍隊，有兩千萬人的地盤，你吃不掉我。可是，我怎麼可以相信統一之後，當你有條件吃掉我時還對我這麼客氣？如果想取信於人，你不妨去和民聯陣先談談，否則，你連那些手裡一桿槍都沒有的留學生都不能容，我怎麼相信今後你能永遠容我？」這實際就是讓共產黨允許它自己的反對黨存在，作為雙方談判的前提條件。國民黨提出這個前提條件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因為當前談判雙方所處的條件不對等，國民黨在台灣已有了反對黨，不能一家說了算，可是共產黨在大陸仍可以一家說了算。談判的雙方一邊有人扯後腿，另一邊沒有，本身就不對等。

從另一個角度說，中共主張「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以後如果國共兩黨再一次合作，這豈不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合作？所以作為談判的前提條件之一，共產黨必須取消四項基本原則，作出願意和其它政黨平等相處的姿態。除了容忍民聯陣之類的反對派之外，還要允許八個花瓶民主黨派獨立。共產黨只有證明了它願意平等地對待小的民主黨派，才能有效地證明它今後願意平等地對待自己的宿敵國民黨。不是嗎？

有了反對黨的牽制，共產黨就無法為所欲為了。不過單憑這一點，還不能令共產黨做出任何許諾取信於人。共產黨之所以做任何事情有恃無恐，根本原因在於它擁有一支黨家軍。因此，軍隊國家化就成為雙方談判的另一個必要的前提條件了。只要解放軍還是共軍，中共作出的任何不武力犯台的承諾都沒有意義。而只要解放軍不再是共軍，即使中共沒有作出任何承諾，懸在台灣頭頂的斯巴達克之劍也會不解自消。不是嗎？

總之，關於統一和談的前提條件，可以有無窮盡的文章可作。在和共產黨對話之前，國民黨還可以先和花瓶民主黨派對話。對話談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只是談談。就算增進瞭解，你共產黨總不能反對吧？既然共產黨可

以邀請民進黨訪問大陸，國民黨為什麼不能邀請大陸民主黨訪台。在大陸八個民主黨派中，國民黨首先應當接觸的就是民革。民革和國民黨在分家前原是一家人，現在看來從前兩者分裂的原因現在早已不成為理由，在談談兩岸統一之前，為什麼不能談談兩兄弟的整合？既然國共兩黨之間都沒有永遠解不開的結，兩個國民黨之間還有什麼了不起的仇怨嗎？相逢一笑泯恩仇，好詩。

在近半個世紀的歷史上，國民黨失去的太多了，它失去了大陸，失去了聯合國的地位，失去了海外盟友，今後，它還有可能失去台灣。現在，除了台灣的政權，它再也無可所失了。一個人到了無可失去的地步，難道還不該瀟灑一點嗎？

北京和台北的優劣轉化

在一般人眼裡，兩岸的對話是中共佔優勢，國民黨佔劣勢。中共的優勢除了表現在它塊頭大之外，還在於它的專制，有統一的意識形態，有統一的口徑和統一的行動。但是，它的這一優勢未必會永遠保持，它的優勢的喪失，將會發生在大陸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削弱之後。

正如蔣經國是台灣的最後一位政治強人一樣，鄧小平也將是大陸最後一個政治強人。強人政治往往是革命的產物，因此它也會隨著革命元老的逝去而逝去。鄧小平去世之後，中國的強人時代將會結尾。除非發生動亂，其最可能的具體表現將是北京中央政府控制力喪失，各地諸侯自治力加強。各地方政府並沒有統一的意識形態，它們關心的只是當地經濟的繁榮。管他什麼主義，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個靠它們供養的北京當局遠不如一個財大氣粗的台灣對它們更有誘惑力。只要北京中央政府勒不住，就會發生各地方政府爭相和台灣拉關係的場面。北京和台北對於各地方政府的影響力將會出現此消彼長的變化。

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



老兵探親，是台灣第一次採取外綫作戰的主動攻勢。

如果台北面對的不再是擁有統一意識形態的北京，而是一個受二十九個自拉自唱的地方政府牽制的北京，它將會處於一個非常主動的地位。那時，拒絕談判的恐怕就不是國民黨，而是共產黨了。因此，國民黨宜在現在就開始談談判問題，在共產黨還認為自己強大的時候套住它。

當然，國民黨在島內也有很多麻煩，不過海峽兩岸相比，共產黨的麻煩要大得多。兩個對手在較力的時候，如果你總是想着自己很累，那八成是要輸的，可是如果你總是想，對方一定比自己累，到反而有很大的可能贏。如前所述，現在的共產黨已遠不是當年的共產黨了，它已經喪失了心理上的優勢，它現在在兩岸關係中咄咄逼人的氣勢，其實是建立在國民黨

的心理劣勢上。

第三勢力的選擇

海峽兩岸的對話，是整個中華民族整合的機會。自然也會引起海外華人社團和流亡團體的關注。相信全世界的華人大都都希望有一個統一繁榮的中國。是主張兩黨對話還是兩府對話在海外也引起了一些爭議。主張兩府對話的人多着眼於台灣內部的事務。不過有一點是值得海外的朋友考慮的，華僑社團也好，其它政治組織也好，都可以視為游離於北京和台北控制之外的「第三勢力」，兩黨對話，第三勢力還有可能插上嘴，可是如果兩府對話，第三勢力就只有富觀眾的份了。▲

實地採訪：

北京人眼中的六四

本文的上半部曾在《中國之春》第八十五期登出。每一個接受採訪的人都有着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立場。他們用不同的語言，評論着一年前發生的同一件事情。這才是真正的歷史，它生動，真實，同時又色彩繽紛。

任逸夫

訪談之十一：北京某大學著名教授，七十八歲，民盟中央委員

「六四」之後，我講了四個少見：一屆政府昏庸無能到這個程度，少見；一代學子忘我獻身到這個程度，少見；一個政黨專橫殘忍到這個程度，少見；一種制度誤國誤民到這個程度，少見。五月中，我的學生都去絕食了。我自己根本吃不下飯，睡不着覺。我要去天安門看我的學生，家人不讓去。但我非去不可。四十年了，中國讀書人吃盡了苦頭。前三十年是睡面自干，自我羞辱。後十年開始做出點人樣子，給斯文掙回面子。現在是官逼民反。我活不了幾年了，再不能任人家拎着脖子要來要去。季羨林先生，中國大學問家，世界知名學者，可怎麼樣？一輩子沒離開過書齋的人，五月間也去天安門廣場看他學生了。在廣場上老淚縱橫。我在校園裡碰見他，真是神色悽惶，痛心疾首。知識份子聯名上書，要求釋放政治犯。我的學生拿來找我，我當仁不讓，簽名。我已是老朽之人，不能做驚天動地的大事，但憑良心，又有許多事情可做。學運期間，多少老知識份子都出面勸政府，差不多全國學術精英異口同聲。錢鍾書先生從來不問政治，這次也親自出面呼籲政府。但只因鄧小平一人的面子，共產黨一黨的私利，硬是罔顧民意。這是

真正冒天下之大不韙呀！從前知道共產黨獨裁專制，今天更知道它視天下人心、人命如草芥。

從前我在北大作學生時，有一次見到蔡元培先生。他見我正在讀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學基礎」，蔡先生便問我，康德哲學的精華是什麼？我答是「批判精神」，蔡先生說，批判精神只是康德哲學的工具，而康德哲學的中心是「人是目的」。蔡先生說，評判一個國家、政府好不好，就要看它是否把人當作目的。凡信奉基本人權，宏揚人性的政府，即便有錯誤，也可以挽救，而凡是無視人權，挑動人的仇恨，殘害人的精神活力的政府，即便它做了一兩件留名歷史的大事，也仍是壞政府。依這個標準，共產黨政府就不是一個好政府。我讀書教書做學問幾十年，心中常存一點疑問：為什麼共產黨建國以後，一而再，再而三地批判人道主義。文革結束後，鄧小平又搞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其中心議題還是反人道主義。六二年，學術界批人道主義，我還出來說話。我說，人道主義是反神道的，有進步意義。一個政府講人道主義，可以提高它的國際地位。而且，人道主義同中國傳統也不矛盾。孔夫子一部「論語」，其中僅「仁」一字而已。現在想想，真是太天真了。共產黨政權的實質是政教合一，其中心意識是神道，而神道離獸道又僅

一步之遙。學運前，我正讀「布魯諾傳」，學運之後似乎更解其中深意。宗教裁判所就是由神道轉入獸道的樣板。共產黨正是一個大的宗教裁判所。它的意識形態中有自己的聖經，有最高解釋權，有異端審判。只是共產黨的聖經和教會不一樣。教會只有一部聖經，共產黨的聖經却總和最高統治者的名字聯在一起。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現在是鄧小平。而且共產黨的聖經是不要原本的。比如，如果鄧小平的思想和馬克思的思想發生衝突，權威解釋一定是援引鄧小平，馬克思究竟說了什麼並不重要。這就叫「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我認為，馬克思是講人道的，真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應該堅持人道主義原則吧？可相反，現在共產黨的官方意識形態恰恰是反人道主義的。這說明共產黨的理論並無原則，只以當代教宗的信念為轉移。不變的只有一點，權力一定要在自己手裡。有權在手，才有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六四之後，我讀報上的文章，實在想不出個詞來形容它們。那天，聽我的小孫子說他的朋友「你不講理」。我心頭一驚，覺得共產黨的理論可以用「不講理」三個字盡括。

你問民主黨派的情況，我可以說，在這次學潮中，民主黨派的表现已經很不錯了。幾乎所有的民主黨派領袖都公開肯定了學生的民主愛國行動。都呼籲共產黨和學生平等對話。這

是建國以來破天荒的事。民主黨派政和共產黨唱反調。結果怎麼樣，你也知道了。六四之後，我知道農工民主黨裡有人被抓，關了幾天又放了。在公安局裡主要問他農工黨在學運中的情況。民盟前幾天開會，讓大家擁護共產黨的屠殺，但在會上唱高調的人不多。有幾個人唱高調，但他們不是真正民盟的人，是共產黨派駐民盟的，有雙重身份。民主黨派中共派了不少負責搜集情況的假黨員。這些人統統歸公安局領導。北京市公安一處就有專門機構，負責監視民主黨派的活動。這種監視是公開的。所以外面有人罵民主黨派骨頭軟，其實他們不知內情。誰敢當着公安局的面給共產黨提意見？我是經歷過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的。對知識份子的監控共產黨做的最仔細，國民黨差遠了。學生們想讓政府能增加教育經費，可你想想，國家這麼窮，又要花這麼多錢用來監視異端，哪有錢用來辦教育？我常和朋友們開玩笑，中國的民主黨派是世界上最成熟的政黨，它可以有不是自己政綱的政綱，可以在最嚴密的監視下自由活動，可以永遠不執政但永遠為政權效力。反自由化那陣子，鄧小平表揚了費孝通。開會傳達文件那天，我和費孝通坐在一起，聽統戰部的人傳達鄧的講話。我和費孝通開玩笑說，祝賀你，小平同志不輕易表揚人的。費老面無喜色，尷尬得很。果然，費孝通事後升了官。這是做給民主黨派看的，只要聽共產黨的話，你就能升官。共產黨做的一點也不掩飾，真像綠林中的山大王。

四十年前，共產黨入城，當時我在燕京任教。看到老百姓「箪食壺漿」，「以迎王師」的熱情，心想中國可能得救了。五十年代洗腦，誠心誠意批判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把自己多年的學術成果罵得一錢不值。文革十年，大半時間住牛棚，反而心平氣和，也開始想共產黨是不是也會犯錯誤。改革十年可謂大夢初醒，覺得四十年前我並無大錯，是共產黨錯了。想想這些，真有一種解放的感覺。六四之後，

我們徹底明白了共產黨四十年來真是禍國殃民。戒嚴令頒佈之後，青龍橋一帶農民帶頭堵軍車，我跑去看看，覺得是中華民族不死的象徵。這些工人、農民沒受過什麼高等教育，只因覺得事情不公就以肉身阻擋坦克。真是驚天地，泣鬼神。讓我吃驚的是，那麼多普通老百姓給軍人做工作，講道理明白淺顯又意味深長。比我們學校哲學系的教員要強得多。我晚上會親眼看見市民自動組織起來，輪流值班。我問他們為什麼這麼熱情，一位青年工人對我說，軍隊要真進城殺了學生，這個國家就完了。你看他多有遠見。六四之後，我倒比從前更有信心了。中華民族是優秀民族，它肯定會復興的。今天共產黨已走到最後關頭，因為它全憑暴力支持。古往今來，單憑暴力支持的政府沒有長久的。何況信奉暴力的人已都是風燭殘年。我想多活幾年，看到給這次學運平反，我希望平反和懲罰同時進行。不能讓那些幫兇心安理得地繼續混日子。我很欣賞以色列人不屈不撓地捕納粹戰犯的精神。只有讓當罰的受罰才有正義。這是一條公理，但大家多不注意，以為寬恕才是人道。其實，寬恕和指認罪行並不矛盾。寬恕的前提是犯罪者已經用良心的刑罰代替了肉體的刑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歷史是最後的仲裁者。

訪談之十一：北京某單位知識份子，三十六歲，目前正取保候審

我是×月×日被捕的。那天我去上班，有人叫我，說辦公室有事找我。一進門，見兩個陌生人，身着便服。他們態度很客氣，說想找我瞭解幾件事，希望我跟他們走一趟。我立刻明白他們是公安局的。我說今天下午我要去幼兒園接孩子，四點以前必須回家，否則要打電話通知我愛人。他們說這辦不到，我必須跟他們走，而且要去一段時間，家人可由單位通知。我問他們，這是否意味着要抓人，如果是，請出示證件和拘捕證。他們笑着說我們只是請

你去幫助工作。我心裡雖然明白，却不知道該怎麼辦。只好跟他們下樓。就這樣，在一無說明，二無法律手續，三不通知家屬的情況下，我被拘捕了。樓下一輛二一二吉普在等着，一上車發現車裡坐着四名全副武裝的士兵，是戒嚴部隊的。六四之後，戒嚴部隊隨便抓人，抓住之後痛打。後來實行軍警聯手辦案，由公安局牽頭，借助戒嚴部隊的武裝抓人。我就是用這種方法被拘捕的。

這兩名便衣態度一直很客氣，我看見他們衣服裡面有手槍和手銬，但他們一直沒有銬過我。北京正是大熱天，吉普車裡悶得很。戒嚴部隊的士兵還戴着鋼盔，汗直往下淌。他們面色嚴肅，目光呆滯，雙手緊握着衝鋒槍。顯得極緊張。吉普車繞來繞去，走了兩個多小時，下車的地方挺像一座賓館或高級招待所。院子裡花草掩映，挺幽靜。我抬頭看看藍天白雲，心想不知今後還能看見嗎？兩個便衣過來，叫我跟他們走。在院子裡拐了好幾個彎進了一座樓房。樓裡有幾個人身穿警服，有兩個警官很年輕，看模樣超不過二十五、六歲。挺像警官大學去遊行的學生。進屋後有人喊×××到了。不一會兒，從裡屋走出一個中年人，看樣子是個領導。他走到我面前看了看我，指着牆邊的沙發說：「請坐吧」，客氣得讓我吃驚。他和我談話的大意是，這次動亂期間，我的一些朋友陪得很深。對他們的問題，中央很重視。所以要我來談談這些人的情況，從四月到六月，他們都幹了什麼。如果我自己有問題，也要交待清楚。我問他，我在這裡算什麼，是逮捕，是拘留？他說，根據中央精神，這次可根據情況收容審查一部份同動亂有牽連的人。我問他這樣做有什麼法律根據。他說你不要管這些，我們既然能抓你，就有根據。隨後，他就開始詢問我一些事情。從他的問話中我感到，有許多多年來就在公安部門的監控之下。他們對許多情況很熟悉，只是把正常活動當作了陰謀。我的原則是凡可能給人家構成罪名的

話一概不說，凡自己沒親身參加的事一概說不知道。就這樣開始了我的「收容」生活。

對我們這些人，說實話待遇不錯。我住的屋子有兩張床，除我之外，還有一個看守。房間裡有衛生間，能洗澡。伙食質量也不錯，基本細糧，有菜有肉。每天還給烟抽。公安局派來和我們打交道的人似乎都有一定文化，說話挺客氣，時常流露出抓我們這些人並非他們的責任，而是「奉命行事」。我不知這情緒是真是假，所以不敢和他們接近。每天無非是被提去審問，能感覺出來，審問者的目的是抓後台。我想這和共產黨的幾個首腦人物的疑心有關係。他們無論如何不相信這麼大規模的一場運動會是幾個學生發動，而且是全民自覺參加。公安人員主要追問三個問題，一是持不同政見者有沒有秘密的地下組織，誰是幕後人；二是知識份子中的改革派同趙紫陽的智囊班子是什麼關係；三是外國人在北京文化圈內的活動情況。他們特別注意問美國大使洛德同夫人包柏綺的活動。美國大使夫人是個作家，同北京的許多文化人關係密切。經常在家裡開些和藝術有關的小型討論會。她那裡是北京最著名的文化沙龍之一。顯然，美國大使和夫人的活動早在中共嚴密監視之下，因為公安局的人問我的幾次活動，他們早已充分掌握了情報。只是通過我來核實細節。有幾次審問，能明顯感到中共首腦懷疑這次學運是美國大使館通過中國一些著名知識份子策劃挑起的。布什訪華邀請方勵之出席宴會被看作是有意挑起動亂，給鄧小平難看。特別有趣的是，中共似乎已經編造好一幅美國中央情報局插手動亂的圖畫，想讓我們提供材料來證明。所以公安局的問題有些就是誘供。例如，他們幾次問我包柏綺同知識份子們談過沒談過紀念法國大革命的事？談過沒談過美國學生的示威活動？

在這座「賓館」裡舒舒服服住了一個月，一天半夜裡來了幾個警察，讓我起床，說要換地方。糊裡糊塗穿上衣服出門，外面停着七、

八輛汽車，我坐的車裡有兩個武警，司機旁邊有一個便衣，手拿步話機，似乎和其他車輛保持聯繫。車行踪詭秘，走走停停，忽快忽慢，到了目的地，天色已微亮。下車才知道到了秦城監獄。秦城的日子可不好過了。好幾個人同囚一室，睡鋪板，伙食也很差，經常吃粗糧。秦城看起來好長時間不用了，院子裡蒿草很高，牢房的牆上都長了青苔。文化革命中這裡的使用率最高，共產黨關共產黨。等把四人幫關進來，大家好像鬆了口氣，可現在又用上了。

我想，共產制度下經濟生產效率最低，可監獄使用率最高。身為中國人，又有點自由思想，不坐坐監獄似乎不算活了一場。我的同牢難友都是大學生，好幾個人是六四後跑外地宣傳鼓動被抓的。他們都挨過打，有一位學生不過十九歲，身上的背心全是血跡，後背上用軍用皮帶的扣頭抽爛了。這些學生生機勃勃，每天在牢房裡嘻嘻哈哈，或者讀書討論問題，或者砸門和看守吵架。他們之中最大的才二十一歲，最小的才十八歲。我想共產黨這下子造出了一批職業革命家。你就是判他們二十年徒刑，出獄也不過三十多歲，正是壯年，可真夠共產黨頭痛的。有一次，菜湯裡有蒼蠅，幾個學生砸門抗議，說是虐待。而且他們都挺熟悉中國的法律，隨口背出刑法第××條，說虐待犯人是犯罪行為。門口的看守是個年輕武警，一個樸實的鄉下人，他打開風門，隔着鐵欄，誠懇地對學生們說，別鬧了，再開拉出去打一頓，白受苦。你們都是有文化的人，將來出去了都是大人物，不像我，今兒在這兒看你們，三年復員後回大山裡種地，一輩子勞累命。你們年輕，現在應該知道多保重。別看今天我看着你們，今後恐怕想見你們都難呢！學生們挺感動，不再砸門了。後來這個看守和同學關係挺好，還教他們挨打時應該如何保護自己。比如，兩腿夾緊生殖器，兩手護住後腦勺，這兩個地方最不經打，打壞了不是絕戶就是傻子。在秦城住了一個多月，又要我換地。這次去的地方

很像剛抓我時住的那個招待所。這次看我的警察似乎對我更好。他和我住一起，自稱是大學畢業生，喜歡理論問題。我們每天都要花很長時間討論民主理論。我開始很警惕，和他說話都站在共產黨官方的立場，後來警惕性漸漸淡了。一天早晨，我朦朧瞞瞞聽見他問我，你認識××嗎？他現在在哪兒？我一下子差點隨口回答他，但猛然醒悟，這小子套我話呢！立刻說不知道。從那以後，我說話特別警惕。又關了一個多月，材料寫了一大堆，多半是廢話。終於，我進來時見過的那個官員又出現了。聽人叫他×處長。這次他竟然和我談起放我出去的事。條件是取保候審。選得填一張悔過書。我堅決拒絕了，要求結案，無罪釋放，否則我寧願關在裡面。這位處長和言悅色地勸我，關了好幾個月了，出去看看家人吧，何必這麼認真，我們是例行公事，總得給個台階下。中央對如何處理和動亂有牽連的人至今沒有統一意見，我們也不願意老關着你。彼此照顧一下，大家都方便。唉！明知公安機關違法抓人，但也真想出去自由自由。而且這位處長真有辦法給你吃軟的，弄得你不好意思不去。就這樣，糊裡糊塗被抓，關了好幾個月，又不明白被放了，還留着個尾巴。中國的法律如此混亂，社會又怎麼能有秩序？

訪談之十三：北京某中央大報某部主任，中共黨員，四十三歲，大學文化

「六四」之後，在一次總結會上，楊尚昆的兒子破口大罵新聞界，說這場學潮是「筆桿子出賣槍桿子」。平心而論，他這話並不全錯。共產黨的新聞界有史以來第一次以獨立的姿態站了出來。可以說在這次學潮中，筆桿子基本上站到了人民一邊。今後中國新聞史上會專門記上這一筆的。現在，我一起五月份新聞界的勇敢行動，就特別激動。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幾個記者曾經現場採訪北京市民對學運的看法，而且他們在午間節目現場直播了這次採

訪。幾乎每一個被採訪者都高度讚揚學生，批評政府。這是第一次人民的真正呼聲出現在大陸傳播媒體中。共產黨四十年來幾乎沒說過真話。封鎖消息，大欺天下是他們統治的第一工具。而軍隊是藏在後面的。但這次，欺騙的一套失靈了，只好把軍隊推上前台。我在共產黨新聞界幹了二十年，太熟悉他們的輿論宣傳手法了。他們把新聞、思想、文化領域當作「陣地」，這就是說，他們把新聞宣傳當作戰爭。既然是戰爭，當然就是你死我活了。在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口號中，最常用的一句叫作「讓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佔領宣傳陣地。」佔領陣地當然只能靠武力，所以共產黨的宣傳實際上也是暴力。第一，它靠武力支持；第二，它靠語言的暴力。說這種暴力是強奸民意並不準確，其實它是製造民意。新聞界這幾年進來大批新人，他們較少意識形態框子，還比較有良心。所以在共產黨的宣傳部門天天憋着一肚子火。人都想作正派人，可是如果你的工作就是專門編造謊言，時間長了，人會發瘋。所以，這次新聞界打出的口號是「不要逼我們撒謊了。」

「我們想說真話。」一個人想說真話都不行，要上街遊行來爭取不騙人的權利，仔細想想，有多可怕。在這次民運中，各家報紙都出了不少好文章，真是用盡了春秋筆法。熟悉內情的人都知道這些文章都是血淚凝成。人民日報有關六四的那條報導肯定會成爲歷史文獻。它無一字寫屠殺，但字字血淚。我一直收藏着它，有時拿出來一讀，真想哭一頓。

六四之後，我們新聞界的朋友見面，無不痛心疾首。人民日報換領導之後，又開始騙人。我知道，有一天，一位年輕的女編輯拿着總編室簽發的稿件痛哭流涕。人民日報許多人明白這是爲什麼。十月份，人民日報社在大禮堂放映「最後的貴族」，這是根據白先勇的小說改編的電影，有幾個外景是在美國拍的，其中有自由女神像的鏡頭。當時禮堂裡突然響起一片掌聲。我當時在場，彷彿受感染，也拚命鼓掌。我身邊有不少上年紀的老編輯、老記者也拚命鼓掌。大家在黑暗中好像心心相印。當時禮堂前面坐着上百名駐守人民日報的武警，大家似乎全沒看見。這件事當天就報到政治局，李鵬大怒，說人民日報爛透了，非全換人不可。這次共產黨整宣傳口的方法和過去不一樣，過去主要是搞運動，讓自己檢討、認錯、心悅誠服。可這次，他們知道無效，就用換人的方法，主要從外地調入。而且先調來試用，覺得可靠了，再調戶口、檔案、家屬。

六四之後，李鵬政府集中全力打了一場宣傳戰，我常拿它同希特勒上台前後，戈培爾親自操縱的宣傳戰相比，其無恥程度恐怕要超過戈培爾。有一天，我上初中的女兒回家，悄悄對我說，爸爸，今天上語文課，講指鹿爲馬這個成語，老師說「指鹿爲馬的意思就是硬說假的是真的，真的是假的。比如有關六四的新聞報導……」，我真佩服這位老師。我們報社還流傳着一個字謎「指黑爲白——打一人物」，謎底是袁木。應該說袁木這個人是共產黨宣傳工具的象徵，厚顏無恥，道德敗壞到極點。他從前真幹過記者，報導過大躍進。李鵬找到這個人當代言人，也真算是物以類聚，同氣相求了。六四宣傳戰的主要工作是編造歷史，反復辯白自己沒殺人。顛倒因果，比如那些電視片，把六月四、五日的鏡頭放到六月二、三日，好像是群眾燒坦克、燒軍車、殺軍人，而軍人並沒有殺人。北京人因爲親眼所見，自然不相信，可外地人就極有可能受騙。我會說過，只要有一張自由報紙，共產黨的統治就危險了。這絕非誇大。只要有一張報紙報導真實消息，人民就會明白自己以往所知道的東西都是假的。比如，共產黨最愛說他們的江山是兩千多萬人的生命換來的，可建國以來，他們自己又害死了多少人？大躍進全國至少餓死二千六百萬，歷次政治運動迫害無辜逼死人命少說五千萬。要說該選共產黨的血債，也早還清了。文化革命中，有一個曾在中央檔案館裡查看過資

料的人對我說，若把中央檔案館的材料公佈出來，老百姓非嚇死不可。共產黨幾十年，活生生造了一部假歷史。

六四之後，當局最着急的是重新控制新聞界。但新聞界絕大部份人對共產黨是絕望了。高壓之下，不得不沉默，這種沉默隱藏着憤恨。據我們所知，中國新聞界裡有許多勇敢份子，避開官方渠道，自己搜集，錄製了許多八九民運的真實資料，妥善保存。他們相信，終有一天，這些材料會公之於世。這些資料對李鵬政權說來都是炸彈。我們部裡有一位年輕的記者，在部隊屠殺時冒着槍林彈雨撿子彈壳，收集了好幾種彈壳，機關槍、自動步槍、手槍、催淚彈。都可以證明當時的鎮壓用了多殘酷的手段。

一個政府如果公開編造謊言、封鎖消息，那它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最佩服胡績偉，他提出人民性高於黨性，這是一個偉大的口號。李鵬之流對他的批判也集中在這個口號上。胡績偉是中國新聞界的英雄。他主持人民日報時爲鄧的改革路線吶喊，爲真理標準討論衝鋒陷陣，這次，身爲人大常委，要求召開常委會有什麼錯？鄧小平忘恩負義，在共產黨裡找不到道德標準。

共產黨的新聞理論最荒謬的是，人民能知道什麼，不能知道什麼，統統要由共產黨規定。這實際上是剝奪了知情權這種基本人權。袁木說中國沒有新聞檢查制度，真是睜着眼睛說瞎話。中國把新聞從屬於黨，叫作「黨的新聞事業」。這就明確着不可能有真實的新聞。報紙要依從政治需要，撒謊就成了必然。我們自己辦的報紙連自己都不願意看，看到一些報紙主編撒謊成了習慣，心裡真害怕。人不能老在謊言下生活，更不能爲製造謊言生活。六四之後，新聞界好像更墮落了。但人民知道，新聞工作者是有良心的。

訪談之十四：北京某法院工作人員，獲律師資格，女，三十九歲，中共黨員，大學文化

昨天報上來的材料已經抓了五千三百六十一人。拘留所原來住十個人的房子現在住三十多人，正是大熱天，昨天我們去看看守所提人，一進大門臭氣薰天。這次抓的知識份子和市民分着關。對知識份子還比較客氣，不過也有倒霉的。中宣部理論局在六部口，大門正對北新華街。坦克碾人就在那裏，一下子衝上去，當場倒了七個。中宣部有幾個人看見了，實在忍不住，向當兵的喊了幾聲「打倒法西斯」。後來戒嚴部隊把人抓了，打得慘透了。問「你看見坦克碾人了？」答：「看見了」就打，一直打得你說沒看見，是自己造謠才住手。這幾個人裡有畢業的博士，打了個半死。中宣部去了個領導，好說歹說才要出人來。還不知往下怎麼處理。上邊發指示，讓重證據，又發指示，讓從重從快。讓法院怎麼執行？處理案子最後要報黨委，讓黨組織定刑期。所謂政法委就是黨介入干涉司法的專門機構。六四之後，人抓了不少，有的根本沒經法律手續。有人乘機報私仇，隨便檢舉。最要命的是那個舉報電話。李錫銘還挺得意，說舉報電話最管用，簡直混蛋。憑舉報電話抓人，最不符合法律，舉報電話十個有八個是胡打，可現在北京市委瘋了，看全北京都是敵人，自己編個大神話騙自己，不抓幾千幾萬人沒法交待。

共產黨這幾年沒少喊加強法制，可他們心目中的法制就是讓老百姓服服貼貼的，誰也別鬧事。所以憲法中的各項基本權利全是一紙空文。比如，這次鄧小平給學運定性，市委對學生情況的匯報，全是直接違憲。若是法制國家，有人遊行，受法律保護，若有違憲行為，也應由公安局處理。可在中國，上來就是政治解決。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上報中央政治局，然後再由他們告訴行政、公安、司法部門應該怎麼辦。上來就說成動亂，又抓黑手，全是違法

行為。我在法院裡，知道一開始法院就有許多人有意見。這次司法系統的情況同以往不同。據我估計，完全站在學生一邊的，認為政府錯了的大約佔百分之五十，有百分之三十說雙方都有錯，但司法系統應該聽黨指揮。真正的政府派大約有百分之十左右。學生絕食期間，法院、檢察院都有人上街支持學生。市局也有人想去，但硬被阻攔了。司法系統的人大部份願意司法獨立，討厭黨組織干涉。所以只要有可能，他們就援引法律，沖淡處理案子時的政治色彩。我們心裡都知道，在混亂時期，誰辦案誰倒霉，判輕了，說你是立場問題；判重了，將來在司法界遭人嘲笑。比如肖斌，不過就是傳聞話，本來不犯法。他是個採購員，幹這行的就說能吹，可這次讓人家逮住了。肖斌的圖象是從美國電視新聞中錄下來的，美國人想不到他們的報導坑害了肖斌。一下子判了十年。這事兒將來不好交待。法院裡辦案的人不願意讓人家說是共產黨的奴才，從業務、良心兩方面都對這種辦案方式不滿。在司法界，你能覺出那種暗中的抵制。上海一下子槍斃了三個，本來是一場騷亂，可說殺就殺。北京法院裡有人說上海法院拿人命鬧着玩。可北京不是一樣嗎？槍斃了七個，第八個是法院力保下來的，說是精神不正常。昨天我看了一個卷宗，一個十七歲的孩子，揀了頂鋼盔戴着玩，罪名定成搶劫軍械。最少判三年。我的意見是教育釋放。其實我們廳長也同意。但又不說，只好把案子放下，等等看。可關着一個人，多少人揪心？

咱們國家的法制混亂，根子出在憲法上。一國根本大法前後矛盾處多得很。說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構，又說由共產黨領導。共產黨領導最高權力機構，共產黨當然就是超級權力機構。把四項基本原則寫進憲法大綱，更容易造成法律混亂。因為在政治生活中的口號不明確，可以隨意解釋，把它變成法律，法律就成了橡皮圖章。在憲法中規定一個黨派居於

領導地位也成問題，這等於說黨派執政的合法性不需要人民認可，它幹得不好也不能有其它力量來取代。這就迫使合法的權力角逐變成革命。非鬧成你死我活不可。共產黨這樣不給自己留退路，活得多累得慌。再說，咱們國家的法學理論始終不承認「無罪推定」。這就麻煩了。只要公安局抓你，就非整出罪名不可。否則說我抓錯了人，面子往哪放？只要抓了，就得整點罪名，這樣，律師的地位就挺可笑了。我進法院前曾在律師事務所幹過。律師讓法院整治的事多了，還有法院院長下令把律師抓起來的事，整個亂成一團。前幾天法院傳達市委關於暴亂份子的處理意見，說這次公檢法要團結協作。特別是律師也應該「配合辦案」。有個案子開庭前指定好律師，然後公、檢、法一起開會商量定罪，最後叫律師來，告訴他應該怎麼辯護。純粹是演戲。背後的導演是黨組織。這次學潮中抓起來的人至今無法處理，就因為不能依據法律，只能等中央的統一意見。這次司法界裡有許多人都有良心。只要你說要「依法懲處」，「重事實，重證據」，好，我就依據證據學的要求，搞細緻的調查取證。本來有些人已認定了證據不足，應該放人。但市委說先不能放人，現在應該造成威懾力。結果這些人還關在裡面受罪。在這種情況下又怎麼可能真正按法律辦案？法制建設喊了好幾年，還是人治。

訪談之十五：北京某醫院外科主治醫生，中共黨員，四十五歲，大學文化

這次學潮，醫務界捲得很深。倒不是因為醫務界的人腦後有反骨，而是因為當局一步步把事挑大了，要鬧出人命了。從絕食開始，醫務界就像上滿了發條的鬧鐘，走個不停。那陣子，白天上班，晚上去廣場值班，好多醫生都是自覺參加。看着年輕的孩子一個個生命垂危，醫生們沒有不罵政府的，等到開槍了，醫生

個個都驚呆了，一面搶救，一面罵李鵬。這次屠殺對醫務界震動最大，因為他們是救人的，而政府是殺人的。我的老師是北京外科界的權威。許多共產黨首腦的手術就是他親自掌刀。醫術高明，人也正直。六四屠殺時，他聽見槍聲，自己從家裡趕到醫院幫助搶救。人家告我，那天夜裡，他看到醫院急診室走廊裡停了那麼多屍體，人都有點神經了。一邊搶救一邊落淚。到了早晨，有人看見他躲在休息室裡痛哭。這次死傷人數我估計統計不全。有些受傷的又不敢在醫院治傷，怕遭報復。我就知道一個從美國回來的博士，六三晚上好好在街上走着，就被開車過來的當兵的一槍打傷了腿。在醫院住了兩天，怕遭人陷害，自己回了家。結果得了壞疽症，整條腿都爛了。看這麼個生龍活虎的小伙子，在外面念了這麼多年書，回國才一年，就落這麼個下場，心裡真難過。你說這政府是不是自掘墳墓？

六月三日晚上，本來不是我值班，但十一點鐘聽見外面槍響，心想壞了，這麼密集的槍聲，少不了死人傷人，就準備上醫院去。可當時外面那麼亂，我愛人怕當兵的亂開槍，不許我出去，我說我穿上白大褂兒，拿着紅十字旗，當兵的不至於打。其實後來才知道，當兵的根本不管你是不是醫護人員，他們毫無紀律、規矩，真正是亂打。我們醫院一個護士在長安街上救人，被打傷了胳膊。最慘的是一個醫學院的學生，在現場搶救，正彎腰給一個傷員包扎傷口，一個當兵的從背後就是一刺刀，挑開一個大口子，一直傷到肺。搶救了好長時間，才算把命保住。我是坐救護車趕到醫院的。自己做夢也沒想到會親眼見到這麼慘的情況。急診室裡裡外外都擺滿了傷員，斷了氣的有七、八個。家屬哭成一片。所有的人大都罵共產黨，什麼髒話都用上了。我們醫院離殺人最多的地方不算近，可也運來傷員百十號。最後一共死了十二個。別處什麼情況可想而知了。我估計死人最多的醫院是復興醫院，它正在木樨地

，那打得最熱鬧。這次外國記者犯了個錯誤。他們都等在天安門，其實打得最激烈的地方是木樨地，南禮士路、六部口一綫。復興醫院搶救組的人白大褂兒都讓血浸透了。現在你從木樨地過，抬頭就能看見二十二樓，國家計算中心的樓上有好多彈孔。這次老百姓真英勇，先是堵着，講道理，不讓過，當兵的就用木棍亂打。老百姓急了，有性子暴躁的就開始還手，一打開就收不住。當兵的早準備好開槍，可市民不知道啊，還圍着講理呢。人家是正規軍，上邊一聲令下就開槍。槍響了，老百姓都不信是真子彈。一看血出來了，老百姓就紅了眼。但衝上去的大部份人不是和當兵的對打，而是搶救人。而且不光救市民，士兵有受傷的也一樣救。有死了親人朋友的，紅了眼，拉着不讓救，說不能救殺人的。可也有頭腦冷靜的，說當兵的是聽命令的人，沒罪，受傷了一樣該救。我那天在醫院裡就碰上這麼一檔子事。推進手術室一個當兵的，是槍傷，我當時要給他取子彈，可心裡奇怪，老百姓沒槍啊？這當兵的說是亂打走了火。當兵的痛得直叫喚，護士故意動作慢不給上麻藥，一邊給他處理傷口一邊問他，「誰讓你開槍的，你是人不是，你也知道痛？」我親眼看見這個戰士直掉眼淚，說：「大姐，我要是開槍打老百姓，我不是爹娘養的。」那些死了親人的家屬聽說手術室裡有當兵的，非要砸門進來，好像伙，這不明擺着要這個當兵的命嗎？結果，門口有幾個大學生，硬拉着、勸着，聽說還有人挨了打。這些學生真不錯，自己受了傷，已死了同學，可不記恨，還救當兵的。後來醫院週圍的老百姓把醫院圍上了。非要找當兵的算帳。我們只好用救護車把當兵的從後門送走了。其實，當兵的和老百姓無冤無仇，可不就因為李鵬和那幾個老東西的利益，讓軍隊和老百姓結了血仇。我跟同事開玩笑說，這會兒要是日本人打來，老百姓非幫日本人不可。這就叫喪失人心。六四之後，有幾天，我們醫院候診室裡用擴音器播放

美國之音。醫生、護士、病員全聽，聽完了就討論。今後共產黨的日子不好過。老百姓要是不喜歡你，變着法子給你找麻煩，讓你下不來台，老百姓鬼主意多了。你看，從六四到現在，五個月了，一天也沒平靜下來。你總不能把全北京人都關大獄裡吧？和天下為敵，總不是長遠之計。我入黨十幾年了，剛入黨那會兒，還覺得挺光榮，也真是事事處處為黨着想。後來，我發現這個黨和普通黨員關係不大。這次學運，全黨絕大多數黨員和中央意見不一致。該聽誰的？要真是注意黨心民心，早就不這樣幹了。可就是為了少數人，最多加上他們的子女，完全不顧民意、黨意。你想想，絕食七、八天，從早到晚救護車把人心都叫碎了。老百姓明白了，這共產黨真沒人性，幾千口子女都快死了，硬是看不見。李鵬那傢伙，天生一副喪門神的模樣，老百姓怎麼會喜歡他，聽他領導？我想他是注定不得好死的。

訪談之十六：人大常委會某副委員長之子，四十歲，中共黨員，某局級公司總經理

在我看，對學生的態度首先不是個政治觀念問題，而是個良心問題。學生不為名不為利，把命都賠上了，究竟為什麼？說到底是為了國家好。他們對共產黨的看法比起大多數黨內幹部子女，要天真的多。據我所知，共產黨的高幹子女，不論在這次學運中態度如何，不論是政府派還是人民派，全都對共產主義嗤之以鼻。但為什麼會態度不同？全是因為利益。我最看不上那幾位左派，自己從生活到思想全都西方化了，可口口聲聲說別人是資產階級，不堅持馬列主義，真虛偽透頂。群眾恨那些胡作非為的高幹子女，情有可原。但其實問題很複雜，高幹子女是個極不清楚的概念，照我說至少可以分成五類。第一類，現在當權的人的子女，第二類，雖不當權，但有相當影響力的元老子女；第三類，在共產黨權力分配中被排擠、貶斥的倒臺派子女；第四類，游離於權力圈

子之外的離休幹部子女；第五類已經去世的老共產黨及烈士子女。這五類人對中國政治都有一定的影響力，而且這裡的第一、二、五三類子女有許多是身居要津，直接干政的。鄧小平、楊尚昆等黨內元老的女兒在這次學運中可謂態度一致，都是清一色的政府派。但其實也有區別。比如鄧的子女一開始態度比較溫和，但當鄧講了話之後，他們就只能跟着老爹了。鄧樸方這個人我說選不錯，思想開明，工作認真，生活也樸素。外邊傳說他在國外有存款，說實話，我不信。鄧樸方一直力主推動改革，在他身邊有一批改革派。比如當初成立華夏出版社，就是想開闢一塊自由化園地。由他掛名主編的二十世紀文庫，大力介紹西方思想，編委會中多是自由化幹將。實際主事的李盛平，六四之後就被捕了，但鄧樸方這次對學生意見極大，後期力主鎮壓，這主要因為他和老鄧站在一起一個立場上了。鄧楠楠在一次會上流着眼淚說，這些學生忘恩負義，要不是她老爹，那有今天。這話也不錯，但誰讓老鄧一下子站在學生對立面上了呢。學生的矛頭本來還真不是衝着鄧的。楊尚昆的孩子和鄧的孩子就不太一樣。比如說楊紹明，人稱楊老二，就是個權力欲極強的人。這個人很能幹，但從思想到立場都比較僵化。在他腦子裡，這個國家就是他們幾個人的私產，不容他人染指。六四之後，他大罵趙紫陽反馬克思主義，主要因為趙和鄧楊的關係鬧翻了。楊紹明和鄧小平關係極密切，鄧小平畫冊就是他搞的。那裡收的許多相片都是他親自拍的。據說當時鄧並不同意搞，但楊紹明自己搞了個計劃送胡啟立，胡批了。楊就搞了個樣本送鄧，鄧再沒說反對。鄧楊兩家關係極好，外面傳鄧楊之爭，純屬胡扯。楊是靠鄧上來的，現在是大權在握，他沒有必要和鄧爭高低。鄧八五年後在黨內的日子不好過，所以越發倚重楊家。現在楊家已經完全控制了軍隊，楊家人活動力強，將來中國大半得握在楊家手裡。鄧家人都是知識份子，今後難有大作為。

陳雲的兒子陳元很像他爹。不說話，心裡有主意，人也用功。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讀經濟學，成績也不錯。後來在北京市西城區當區長，又當市委書記。本指望在北京市主管經濟，可選舉時市委幹部不投票，落了選。他好窩囊了一陣子。現在調中國銀行當副行長了。反正經濟這塊地盤是陳雲的，他來正是子承父業了。在這次學潮中沒聽見陳元說什麼話。我想他是有話不說。

薄一波的孩子在這次運動中態度就很激烈。在北京市當旅遊局長的薄熙成就是政府派。其實薄熙成這個人思想相當解放，是個實用型的人。但這次他表現的太過了點，組織人上街賣北京日報，讓所有大賓館都掛大標語擁護共產黨，惹老百姓反感，丟了分。我想他是怕學潮鬧得影響了他的生意。可他不想，真要鎮壓了，旅遊還不全吹了。果然，六四後受打擊最重的就是薄熙成。大飯店開房率不足百分之十，我看小薄也有點慘，事與願違，白折騰半天。宋任窮好幾個孩子在國外，像宋彬彬，在外頭呆了快十年了，也沒打算回國。李先念這幾年受楊尚昆排擠，但這次看船快要翻了，還是站出來幫鄧一把。他女兒跟我說，這次學生要贏了，大家都得吊死。這是這批子女的一種心態。主要是從前他們父輩整人都是這麼個法子，所以自然想到人家會反過來整他們。但也有人態度不一樣。像統戰部的陶斯亮、馬文瑞的女兒馬瑞莉都不主張鎮壓，後來全受批評。我知道有些大軍區，部委一級的實權派人物的子女，反對鎮壓態度十分堅決。你和他們聊天，就聽他們數落共產黨。這批人有文化，接受西方民主價值觀，離權力核心又遠一點，所以看問題比較客觀。這個級別的幹部子女百分之六十以上是激進改革派。比如白介夫的兩個兒子就是體改所系統的，六四之後全被捕，吳學謙的兒子吳曉鏞，這次就是英雄。幹部子弟情況相當複雜，不好一概而論。這次學生搞得那張裙帶關係圖就有問題，錯誤多，也不說明問

題。比如萬潤南，是李昌的女婿，但萬又是共產黨的敵人。再有，這幾年許多高級幹部的子女都外放，在地方上當市長、縣長，有自己的小塊地盤。這麼幹的人心裡多少都有點抱負，想從基層作起，積累從政經驗。將來這批人是不可低估的力量。

照我看，共產黨子弟中最不爭氣的是現在這批當權派。什麼李鵬、李鐵映之流。這是共產黨第一代子弟，思想僵化又無能。全憑關係一步登天。現在共產黨是任人唯親，陳雲、鄧小平都說過，要把權交在自己子弟手中，因為他們對共產黨有感情、聽話。可你看歷史，搞家族統治的沒有不垮台的。這批子弟怎麼能治國？據說葉選平、趙家華兩人給人印象不錯。但這兩個人是寧願偏安一隅，不願問鼎中原的。只剩下一個李鵬，整個一個低能兒。丟中國人臉。總之，高幹子弟中也有開明派、頑固派、自由派、保守派、逍遙派，和老百姓一樣。只因為他們地位有點特殊，人們挺關注他們。六四之後，這些人也開始有變化。有人也想退路了。中國會變，但也許要等十年。到時候幹部子女可能發揮特殊作用呢。

訪談之十七：國務院計委官員，四十歲 中共黨員，大學文化水平

「六四」之後，鄧小平反復對李鵬強調，經濟不要滑坡。但這話等於白說。六四之後，中國經濟形勢一塌糊塗，這就是政治領先的後果。如果真為中國社會發展着想，一定不會出此下策，在首都戒嚴。你想想，戒嚴意味着戰爭、暴亂，這些都是經濟生活的大敵。只有在經濟生活停頓，國家面臨崩潰時才會使用戒嚴這種非常手段。可北京怎麼了？學生上街，若處理得當，根本不會出什麼大事。可是，政府一上來就定性成動亂，開大會，要鎮壓，搞得人心惶惶，也激怒學生，跟着就戒嚴。鄧這個人經濟不內行，熟悉的是劉鄧大軍打仗的那套方法。可社會經濟問題從來不能靠武力解決，

只要動刀動槍，肯定是兩敗俱傷，而且後遺症嚴重。六四之後，國家的經濟生活一下子停滯了，接着就是大滑坡。我們計委乾着急沒辦法。因為說到底，活兒是要人去幹的。人心惶惶，對國家絕望，對共產黨憤怒，怎麼能安心工作？可李鵬來勁了，搬出陳雲那套「鳥籠經濟」方法，以為國家憑計劃經濟就能發展，真是作夢。你看哪個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經濟發達？明明破產了的一套方法，可就是閉目不見，或者裝看不見。因為計劃經濟適合極權統治。共產黨有什麼經濟學？它的全套經濟政策都是為政治服務的。隨政治需要而改變。這哪能靠得住？經濟發展要以長期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為前提。但建國四十年了，共產黨沒讓中國消停過一天。剛見點好，他就給你找事。毛澤東講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的生命綫；鄧小平講改革為了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都是把主義、意識形態放在經濟活動之上。只要這套方法不變，中國經濟斷無希望。

前不久，有人討論什麼東亞模式，說在專制制度下也能發展經濟。但他們忘了，台灣、新加坡、南朝鮮是奉行自由經濟的，不管政治上怎麼專制，政府不隨便干涉經濟生活，經濟生活有自己一個穩定的環境。可在咱們這兒全不一樣。政治專制的一個主要方面就是干涉經濟生活，今天一個政策，明天一個政策，亂七八糟。我在計委工作快十年了，每年都得注意中央精神。中國沒有獨立的經濟活動領域。這幾年，趙紫陽放權，開始有自主的經濟活動了，但還沒走上正軌，出了不少毛病。其實，下一步的任務是繼續放，放到底。可這會直接影響共產黨的專制權力。所以黨內對趙紫陽的意見大了。我們計委是陳雲的老窩，權放多了，計委這個衙門就清靜多了。得，許多人就難受了。從前計委多威風，財權物權一手抓，說給誰就給誰。大家爭着給計委叩頭。這幾年指令計劃少了，各地自主權多了，計委就不那麼風光了。照我看，計劃經濟明明是個火坑，可因為

它對共產黨有好處，對大批官僚有好處，所以共產黨就非逼着人往火坑裡跳。

現在經濟形勢壞透了。如果說開槍前的經濟是感冒，開槍後就成了肺炎。昨天我看了統計局公佈的數字。去年同期相比，工業生產七月份增長百分之九點六，八月份增長百分之六點一，九月份僅增長百分之零點九，十月份成負增長百分之二點一，真是逐月下滑。李鵬竟然說這是治理整頓政策的必然結果，是經濟良性發展的好勢頭，簡直太可笑了。最要命的是工業經濟的主體，就是李鵬最喜歡說的骨幹企業十一月份是負增長。真是給了李鵬一記耳光。你記得吧？六四之後，李鵬的寶全押在全民所有制企業上了。又是提高地位，又是大力扶持。這些企業却不爭氣，一個勁往下跌。這裡其實反映出工人對「六四」的態度。工人雖然沒上街，但全國範圍普遍怠工，結果是今年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僅僅僅百分之二點一。而且這幾年勢頭最好的輕工業一厥不振。老百姓也絕了，真不買東西。六四前為了弄一台彩电得走後門，六四後，返本銷售都沒人買。本來當前正面臨還債高峰，六四之後西方聯合制裁，這可是中共沒想到的。原來他們估計可能是口頭譴責，至多是有幾個國家制裁，可有些國家不會行動，還有餘地。可現在是普遍制裁。最清頭的是日本，口口聲聲說不要孤立中國，但說大話更小錢。到現在第三期日圓貸款一點沒鬆動。日本人是會和你講什麼友誼的，他是不見兔子不撒鷹。投出去的钱不保險他才不會幹。國內公開攤派國債，不買不行，直接扣工資，怨聲載道。國際上又借不來錢，還債成了大問題。六四把共產黨坑死了，真是自作自受。東歐最近的變化給中共雪上加霜。許外國際游資原來有到中國投資的意向，但六四之後，立刻改變主意，一是往東南亞，一是瞄準了東歐。上面對這個趨向提心吊膽，讓我們搞個有關這個問題的報告。五中全會討論經濟問題，大家一籌莫展。除了讓老百姓勒緊褲腰帶

之外，什麼招也沒有。我斷定治理整頓非失敗不可。銀根縮得太緊，資金短缺，工廠開不了工，一放鬆又會引起新一輪爭貸款，爭投資的鬭爭。地方勢力這幾年大膨脹，現在和中央談判態度都很硬。李鵬要各地用黨紀擔保，回去清理在建項目，支持中央的緊縮政策。五中全會後，我和我們計委的一個副主任去看南方一個省的省長，他根本不把李鵬的話放在心上，說起李總理，他直撇嘴。他說中央要我拿黨紀擔保服從中央，可我回到省裡，省裡老百姓又要我拿黨紀擔保為他們謀利益，你說我該聽誰的？中央自己的事處理不好，就找地方救駕，我不是不想救駕，我是沒這個力量。我明顯覺出地方幹部對趙紫陽相當有好感。對處理趙紫陽很不滿意。趙在中央工作，其實代表着地方利益。他在台上就一個招，放權。中央有人對他放權不滿，可地方高興壞了。這幾年地方上真肥了。所以百分之九十的地方幹部擁護趙不擁護李。趙紫陽如果不讓李鵬殺了，今後還是不可忽視的力量。你仔細看看就明白，趙紫陽下去了，只有鮑彤一人陪綁，趙系人馬基本沒動。趙紫陽經營了十年，這十年地方上差不多全換上他的人。你李鵬有多大本事？江澤民上來根本不敢動趙的人馬。他自己就是趙紫陽提名到上海去的。他在電子工業部當部長時，曾給趙提交過一個改革計劃，很大膽，趙很欣賞他。你說他能對趙怎麼樣？他對趙的態度和李鵬就完全不一樣。李鵬又壞又愚，江澤民可比他滑頭多了。現在凡事李鵬都爭先，江則順水推舟，反正目前經濟這個爛攤子，非要了李鵬的命不可，你等着瞧吧。

訪談之十八：北京某中學學生，十六歲

六月三日晚上，我父母不讓我出門。但我們班不少同學都出去了。我們學校離木樨地近，開槍最激烈的時候，二十二號樓有人往下扔瓶子，那就是我們同學幹的。二十二號樓裡有人坐在家裡給打死了。樓裡當時有人喊：「打

死人了，打死人了。」一下子大家都急了。說實話，學潮期間，大學生遊行，我們中學生並不關心。也不明白他們為什麼上街。後來絕食好幾天，政府沒人管，我們學校老師急了，領着同學去聲援。我也去了，當時是想去熱鬧，但到了長安街上，見人山人海，旗幟飄揚，心裡不由自主激動起來。好像也傳上了點政治熱情。說實話，這幾年，中學生最不關心政治。學校裡兩件大事，談戀愛、考大學。誰要講馬列主義準沒人聽。政治課考試是公開抄卷子，你抄我，我抄你，老師在一邊裝看不見。因為升學率高就能當重點中學。重點學校好處不少，第一是能拉來不少贊助，第二是老師地位高。甭管你是不是當官的，只要你孩子想升大學，就得巴結重點中學的老師。請客送禮，歪門邪道多了。我是個「中游生」，功課在班裡總是第十名上下。我有時候也想過人為什麼活着，但想不明白，反正活着就應該輕鬆愉快。

共產黨是怎麼回事，我也搞不清楚，就知道它厲害，愛整人，別惹它。但這幾年共產黨好像也不太整人了，或者是想整也整不動了。學校老師提起共產黨不是諷刺就是嘲笑，好像不拿它當回事。我們沒經歷過共產黨最厲害的時候。上了中學主要是學霹靂舞、看瓊瑤的小說。中學生真不關心政治，可不知怎麼搞的，一升上大學，人好像立刻就變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話整天掛在嘴邊上。本來我想國家的事有共產黨管，咱們自己管自己得了。可這次我明白了，人家非管你不可。你不想讓人家管，那人家四千萬黨員吃乾飯呀！這個國家說到底，是人家共產黨的，人家想幹嗎就幹嗎。大學生要是明白這點，準不鬧事了。他們老覺得這個國家有他們一份。其實，他們是太愛國，太想幫共產黨的忙了。可惜人家不領情。

你問我們關心不關心國家的發展？關心有什麼用？你起不了多大作用啊。你提意見沒人聽，弄不好人家還整你，鬧大發了，人家動軍隊，殺你白殺。你怎麼有辦法對抗共產黨？我

也知道這事不對，可總覺得沒辦法，索性別打聽。所以我看大學生遊行，老覺得跟看戲似的，自己不是這舞台上的人物。五月二十八日那天，不少人去天安門遊行，我正好騎車從天安門過。看見一個老太太，模樣有七十多歲了，頭髮全白了，還是個小腳。自己推輛竹子做的兒童車，車上放一個水桶。她跟着遊行隊伍，誰喊口號，她就給誰送水。我挺奇怪，這老太太哪來那麼大熱情。好像，她硬是跟着隊伍從天安門走到北京市委。天挺熱，老太太衣服全濕透了。我看她也不像有文化的樣子，她真是為民主自由才這麼拼命？我想不明白。

六四之後，北京人最討厭的就是又搞什麼思想教育。電視裡全演過時電影。什麼「上甘嶺」、「紅孩子」、「南征北戰」，惡心透了。這幾天頭上有什麼文件，說政治思想工作需從兒童抓起，中學生是關鍵。說不能往大學送反對派。可我想這肯定是瞎耽誤功夫。哪個大學生不是從中學升上来的？誰沒在中學上過政治課？可怎麼一上大學就成了反對派？我琢磨着，可能根本就沒有什麼反動不反動這回事。在我們學校，誰最顯得一「革命」，誰準是功課不行，考不上大學。沒能耐沒本事的人才去搞什麼政治思想工作。咱們國家有個怪現象，不知你注意到沒有，越聰明的人活得越費勁。就是傻子活得好。李鵬傻不傻，可他當總理。最近有個笑話，不知你聽說沒有。有一個人遊行喊口號，打倒傻總理李鵬，給公安局抓走了，判了十五年徒刑。他不服，上訴了，說喊了一句口號就判十五年，太重了。人家駁回了，說你的罪名是洩露黨和國家核心機密。在我們學校裡，最聰明，最受學生愛戴的老師準是牢騷最多。有時候我也覺得奇怪，好像這個國家裡人人都不滿意。可報紙上永遠是形勢大好。

我最近怕看咱們那些領導了。沒一個像樣的，不是老糊塗，就是擺官架，打官腔。有時候看電視，咱們國家的頭兒和外國人見面。人家盡是年輕、有風度的，咱們的頭兒又老又蠢

，都覺得不好意思。這次戈爾巴喬夫到中國來，我們同學都覺得他也變得呆頭呆腦了。本來他是個多瀟灑，有風度的人，可見了中國領導人之後，好像也變木了。我們有個同學說他有重大科學發現，就是痢疾症也傳染。現在，大人在政治問題上都不重視中學生，覺得他們不關心政治。其實他們心裡清楚得很。共產主義在學校裡根本沒市場，可考試時都說共產主義好。家長在家裡教我們不許說謊，可政治課上全是謊話。老師明知道騙我們，我們也知道他在騙人，可還全得照着說。比如，一說台灣就是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可前幾天，我們同學的大伯從台灣來看他爺爺。他對我們同學說，沒想到你們在大陸生活得這麼苦，真對不起你們了。後來給我們同學家留了不少錢。可見台灣人比大陸生活得好。咱們領導人嘴裡說沒真話。李鵬說王丹沒搞動亂，可後來又通緝人家。你說孩子還能不能學會撒謊？

訪談之十九：解放軍某部班長，二十二歲，初中文化程度

唉，最近我心裡總覺得別扭。人家看我們當兵的像看土匪，眼神都不對。平暴之後，駐扎在城裡，一開始不許上街，後來三人以上可以上街，我第一次在北京坐公共汽車，就有好幾個小伙子堵着門故意不讓我們上。他們倒沒說什麼，但你能覺出來人家心裡恨你。其實我在那支部隊根本沒開槍。我是山東蓬萊人，在瀋陽當兵。十九歲入伍，現在也算個老兵了。五月上旬，部隊就開始動員，說要去執行重要任務。可沒告訴時間地點。出發的時候都沒說。坐在悶罐子車裡，下車才知道到了北京。然後是戰地動員，說北京有壞人，要推翻政府。十九日上午，我們部隊到了北苑。晚上十點開始運動，一開始軍車走得挺順當，後來就停停走走，後來乾脆就不動了。這時外面一片人聲，仔細聽是喊不許鎮壓學生，人民子弟兵不打老百姓。我掀開車篷一看，嚇了一跳。軍

車給數不清的老百姓團團圍住。當時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好多上了年紀的人，老頭兒老太太，個個紅着臉，使勁喊讓我們回去。我們一點也不明白出了什麼事。一會兒，見我們連長從人群中擠過來，有人兩邊護着，他帽子也沒了，衣服扣子全扯開了。一個中年人非要他保證不對老百姓開槍。連長說，上級要我們來保衛首都，我們軍隊怎麼會向老百姓開槍。好像伙，群眾揪住他不放，非讓他向車上喊話，讓大家把槍放下。我們連長急了，對一位老大爺說，大爺，您比我爹歲數都大，我能向您開槍嗎？群眾就鼓掌，這才放連長上車。他一上車就說，把槍都放腳下，坐好別動。這是他媽怎麼了，和老百姓對上了。我們從來沒見過這陣勢，當時真有點害怕，有個剛入伍的小兵臉都嚇白了。我擔保這是解放軍歷史上頭一遭，老百姓攔着不讓執行任務。在車上一坐就是好幾個鐘頭。周圍老百姓開始給我們作工作，讓我們看報紙。我們這才知道是鬧學潮，政府收拾不了，才要戒嚴。聽市民講，我也覺得學生挺有道理。這幾年，在部隊也知道不少腐敗的事。當官的吃小灶，搞不正收入，拿士兵不當人的事挺多。戰士鬧情緒，不聽話的也不少。這時，好像是上邊又發命令了，讓前進。有的車開始發動，馬達一響，群眾就又圍上來了，有的騎地上，有的上了駕駛樓，真是水洩不通。結果車是一步也沒挪動地方。後來來了幾個學生，頭上纏着布條，給我們講學潮的起因和目的。我聽着也覺得他們不像反革命。也奇怪，老百姓都聽學生的，學生讓大家閃開一條路，讓車上戰士下來上廁所。我們這些當兵的就像當了俘虜，走到那兒都有人跟着。我們當時又悶又累，連長讓大家下車休息，道旁邊住家的老百姓還給我們送飯，戰士們就坐那兒和老百姓聊上了。一聊不得了，不是老鄉就是同學，部隊一點鬪志都沒有了。天快亮了，上邊傳話，說士兵不許和市民說話，不許聽市民宣傳。到了早晨才來命令說撤退。往回走的時候，可

真熱鬧，到處是路障，坦克上都貼了標語。等部隊在駐地安頓下來，馬上就上政治課。說這次學潮是國內外敵人挑動的，要推翻政府。我們聽着將信將疑，總覺得有什麼事沒搞清楚。私下裡大家都議論，說真正是反革命挑動，怎麼這麼多工人、農民全來了，有老頭兒老太太，還有婦女兒童。我們班一個戰士問我，「班長，這全北京人怎麼全歸順了反革命了？」我和連長關係不錯，偷偷問他，這是怎麼回事，連長說聽領導命令。我說要真讓咱開槍怎麼辦，真往老百姓身上打。連長說那怎麼行？國際法規定軍隊不能打平民，真要打了，軍隊就變質了。六月二日那天，我們部隊沒入城。那天兄弟部隊便衣入城，有的部隊發了棍子、菜刀，看來是不想動槍。但下午突然全體集合，團長訓話。說上午部隊偷襲沒成功，有人向學生洩漏了情報。現在學潮性質已變，成了反革命。我們部隊是從城北入城的，車到了安貞橋，又走不動了，還是密密麻麻的人群。當時我覺出部隊裡有人對上邊的命令不滿，群眾一攔，我們就不動。氣氛並不緊張。晚上十點左右，安貞橋一帶的群眾齊聲喊「回去，回去」。也不知是誰下的命令，部隊真掉頭往回走了，而且車裡有戰士也伸出兩個手指頭做V字。沒撤多遠，就聽見城裡槍響了，我們部隊又來命令，讓往城裡衝。我們部隊那天晚上是有的團發子彈，有的團沒發。我們團就沒發子彈。所以老百姓圍着我們，我們也沒辦法。十二點左右，我們還在安貞橋沒動。就聽見有人大罵我們是「法西斯」、「畜牲」。老百姓情緒激烈起來。原來是有幾個人用三輪車拉了一具屍體，是個老人，他們說有七十多歲了。這老頭死得太慘，半邊臉都沒了。一看就知道是達姆彈打的。推着屍體的人一邊哭一邊講，所有的老百姓都哭了，我只覺得軍車邊一片哭聲。這幾個人推着屍首一輛車一輛車地過，讓士兵看。有一個人反復喊一句話，「你們當兒子的殺老爹！」我親眼看見有戰士掉了眼淚。我們連

長是個軍校生，他強忍住淚，不說話。我保證我們部隊沒開槍。四日上午我們部隊進城時路上已沒人攔。我們在馬甸橋下扔了三十多輛軍車，等部隊過去了，老百姓就開始放火燒。不是部隊故意扔的？我也不知道。上頭的命令是「棄車前進」。

你別看這幾天又把部隊捧上了天，其實部隊裡情緒很低。我們部隊裡有幾個軍官受了批評，說是不堅決果斷。確實，這次部隊執行命令很被動，你能覺出來完全靠命令，一級壓一級。我沒多少文化，也不知道學生講的那套對中國有用沒用，不過這次亂子鬧大了，學生今後可要小心點了。

訪談之二十：原國務院某部部長，中共顧問委員會委員，七十八歲。

關山富的女婿在二十二樓家裡被打死了。當時他聽見外面槍打得厲害，站起來說去兩門。走到門口就一頭栽那兒了。脖子上挨了一槍。他是冶金部的工程師，一個挺老實的孩子。出事後我去看老喇，老喇情緒壞透了，掉眼淚不說話。那天崔乃夫（民政部長），還有好幾個老部長都去了。站在屋裡誰也沒說話。你想這些人能說什麼？聽說王光美家也飛進子彈了。二十二樓有不少人家玻璃被打碎。大家嚇得趴在地上。唉，當年主席進北京，一槍沒放。傅作義幾十萬守城大軍乖乖接受改編。當年我們入城時，老百姓真歡迎呀。想不到今天解放軍進城竟讓老百姓堵在城外進不來。許多老同志不理解這次事情怎麼搞成這個樣子。學生上街反腐敗，我想他們是為共產黨好。主席從來不說學生是反革命，也不會站到學生的對立面去。要是周總理在，早到學生中去和學生談話了。比起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今天這些學生是講道理多了。他們能想到以憲法為根據，說明他們本心並不想胡鬧。所以他們不搞打砸搶，還幫助維持秩序。我那天坐車回家，在道口碰到交通阻塞。司機下車一說，學生馬上疏

通道路，幾分鐘就過去了。警察去哪了？北京市這幾個亂彈琴，事情越攪越壞。

黨內生活不正常啊！反面意見不能提，提了也沒人聽。我看我們黨就讓這個匯報制度搞壞了。聽匯報就是自己不去瞭解情況，人家說什麼是什麼。而且喜歡聽自己這派人的匯報。主席晚年身體不好，身邊讓四人幫包圍着，聽匯報聽出個天安門事件。鄧小平是讓人家匯報下去的。可這次，鄧小平又是聽匯報了，把趙紫陽聽下去了。現在黨內搞小圈子成風，全是一派一派的。主席當年搞五湖四海，他胸懷大，不搞小圈子。可現在，鄧用二野的人多，又太聽信楊尚昆的。楊這個人黨內從來不是個正派人，搞辦公廳時，主席就怕他搞小動作。楊最喜歡吹吹拍拍這一套，封建味特濃。這幾年他老圍着鄧轉。前年他使手腕讓先念同志下來去了政協，他自己當國家主席。這都是他在鄧耳邊吹風吹出來的，選改組軍委，讓楊白冰當秘書長，還兼着政治部主任。這次評黨內軍事家硬把他算一個，大家心裡都有意見。楊尚昆從來沒打過仗，本來是「二十八個半」裡的人物，跟着王明跑。在黨內，他主要是負責機要工作。鄧出來後慢慢起用他，先在廣東，又回中央，現在是關鍵人物了。鄧不問具體事，全是楊一手遮天。中顧委開會時，有的同志私下悄悄說，現在是家天下，可不是鄧家天下，是楊家天下。

現在說學生不信共產主義了，我說是我們自己沒把事情辦好。建國四十年了，黨內鬭爭也差不多搞了四十年。幹部們離共產主義理想越來越遠，黨員也不像樣。這次批評那些上街的黨員，可我說上街的黨員覺悟高，比那些只圖自己舒服，不問天下事的黨員強。再說人家上街是因為沒有正常途徑表達意見。黨內生活不民主，中央委員會也不起作用。中央委員都不提意見，怕丟官。中顧委是神仙會，大家一起發牢騷。現在的新幹部是先顧自己，再顧親朋好友，然後才顧國家。照這樣下去，人民真

會起來反對共產黨的。道理很簡單，人民擁護的不是共產黨這個名字，是能給人民謀福利的政黨。所以主席當年講，黨和人民有矛盾時，責任在黨，政府和人民有矛盾時，責任在政府。這次動亂還不就是因為人民對黨，對政府有意見嗎？一下子定性成反革命份子背後操縱的動亂，難服人啊！出了問題不先檢討自己，一下子全推到學生身上，矛盾就是這麼激化的。東歐國家變得真快。看來，那裡的老百姓是真不擁護共產黨了。東歐國家的經濟實力比我們強，可怎麼一夜之間就會倒過去了呢？我想是人心不在共產黨這邊了。從前共產黨得天下，全憑人心所向，現在人心丟了，天下靠什麼保？鄧的辦法是靠槍，但靠槍能穩定一時，但難穩住長久。別說老百姓了，中央裡有幾個人對現在的班子滿意？難服人心啊！李鵬，無才無德，是憑關係當的總理，和周總理比比，真是天上地下。我在職時，他還是副總理，和他開過幾次會。這個人傲慢得很，指手劃腳，年紀不大，官氣十足，又特別固執，聽不進別人意見。

現在國家的事是人都管，人人都管。黨心人心渙散，黨員明哲保身。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可先鋒隊裡的人意志消沉，怎麼能領導人民群眾？我到基層去走走就能覺出來，一個單位的領導，最關心他們自己的事，腦子裡想的都是退休、職位、級別、房子、子女。腐化一定是從幹部隊伍開始。現在中央要反腐敗了，可從哪裡入手？我想他們的工作也很難作，黨內情況很複雜。江澤民和我很熟，他基本上是技術幹部，這麼重的擔子壓在身上，夠他一喘。我總懷疑這種點名搭班子，安排接班人的方法究竟行不行。林彪勢力多大？垮台了；華國鋒是毛親自點的將，也垮了。江澤民行不行，只有天知道。最近黨內情緒低沉，不知道社會主義道路今後該怎麼走。我還是相信馬列主義，私有制帶來社會不公正。但是，社會主義有許多種，像現在歐洲社會黨的政策

就是社會主義的。有時也許應該退後一步想，只要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究竟搞什麼樣的社會主義並不要緊。▲

及其他服務

避難材料

翻譯政治

· 全美最大翻譯公司 Berlitz 的首席中文翻譯及編輯。
 · 双语移民法律助理經驗及 17 年工業翻譯經驗。
 · 只收翻譯公司市場價格的 1/3 (為您省去翻譯公司經紀費)。
 · 中文電腦文字處理系統 (繁體及簡體)
 · 英文電腦文字處理系統 (各類軟件和字樣)
 · 激光印刷, 相當出版水平, 常代客翻譯打印履歷表。
 · 電話傳真, 即日報價, 即日接活兒。
 · Fed. Express, 全美各地第二天寄到。
 · 二十四小時電話服務, 二十四小時作業。
 · 中翻英, 英翻中均可 (工業、法律、政治、文學不限)
 · 講職業道德, 翻譯內容絕對保密, 政治避難者放心。
 · 在中國及美國均有譯著出版, 絕對保證質量。
 · 大陸人, 理解大陸國情, 政治背景及政治術語。
 · 您在寫書嗎? 我給您最惠批發價格。

Tel: (415) 322-3968

Fax (415) 322-3968 Ms. Fan

希望在民間

——胡平和張倫巴黎對談

何言整理

海外輿論要避免受中共導向

胡平：

我出國三年，一直強烈地感到，在海外，無論在僑界、在留學生中間，還是在香港、台灣的報刊中間，他們對中國大陸這十年來民主運動真正歷史知道得是非常少的。對長期以來堅持這種鬥爭的人的事情知道得也非常少。實際上海外輿論是受國內導向的，共產黨說什麼，他們就知道什麼，共產黨批評誰，他們才發現誰。除非你的文章登在國內的較有影響的刊物上，海外刊物才去重視。這麼一來，整個情況就是，所有關於中國大陸發生的情況，它的原始材料，都是共產黨所提供的，海外的人無非是作出相反的判斷而已。他們不知道共產黨專制統治的一個最大的罪惡不光是歪曲歷史，給歷史一個錯誤的判斷，更重要的是掩蓋歷史，它使得很多非常有價值的事情，人們都不知道。其實我早就向海外的人談到，你們對大陸的關心不僅僅是對從共產黨那兒得到的材料作出不同的判斷，更重要的是你們要去挖掘歷史事實，被共產黨所刻意掩蓋的歷史事實。實際上談到這個問題，他們根據的材料都是來自官方的材料，談到方勵之，共產黨在沒有點名批判方勵之之前，海外對方勵之也是不關心的。

張倫：

在國內，我們艱難地為一個民主的未來而奮鬥，在既沒有資源支持，又沒有信息渠道的情況下做事是非常艱難的，這是在夾縫中求生。

存。這一點我覺得就像你說的那樣，海外介紹得太少了。出國之後尤其深的一個感覺就是覺得歷史在新聞傳媒裡面被歪曲了。新聞傳播媒介，是完全按照西方文化進行傳播的，缺乏深入探討的態度。今天這個明星出來就關心這個明星，明天那個明星出來就關心那個。我們這些民運人士能不能很好看待這些事，不僅關係到民運能不能健康發展，而且也關係到將來能不能很好看待歷史。如果現在一批人又一批人不斷忘却的話，那麼將來再起來的運動也會忘記我們八九民運的精神，那歷史不就我了一個非常荒誕的東西？

胡平：

當然一般人容易犯這個錯誤，但我們作為當事人應當想辦法克服這種最容易犯的傾向，還它歷史的本來面目，讓那些很艱苦工作的人得到正確的評價，否則會助長人們的一種投機心理，當他看到事情一時沒有很大希望時，就不會投入；而一有好處時，大家都來。而且是考慮怎麼樣弄出名，怎麼樣打知名度。而在國內那種情況之下，確實需要大家做些踏踏實實的事。而現在這樣倒是鼓勵那種華而不實的東西，打擊堅韌不拔地工作的人，這種情況助長下去不但在以前已經造成很多不好的影響；而且今後還繼續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

民運領袖須有強烈的責任感

張倫：

對，就是這樣。不久前我在「爭鳴」五月號訪問記中談到這兩句，有些東西如果我們不



張倫（左）與胡平

加以注意的話，就會敗壞民主的。海外有人可以不惜什麼代價，就靠什麼知名度換來各種各樣的好處。我們是在為一個正常的社會奮鬥的歷史過程當中，更需要的是默默無聞，至少說要一種獻身精神，需要一種奮鬥的精神，一種勇氣。這個東西就要有犧牲，為什麼我一直對西單民主牆的人抱崇高的敬意，就是因為他們認識到中國問題複雜艱難，但同時他們沒喪失他們的信念，他們在奮鬥，他們並沒有因為中國拉不好了我就往後退了。我們現在在海外好像覺得東歐帶來好多希望，事實上中國的問題將來是一個艱難的歷史過程。這當中需要我們許多人，包括我們民運人士，都要有一種精神在裡邊，有一個復興民族的精神在裡邊。沒有這種東西，這個民族肯定是不會有新生的。如果說，過去我對民族抱有一種很悲的看法，那麼八九民運真使我燃起了希望。因為我看到我們這民族這東西沒有死亡，普通民眾都煥發出

胡平：

八九民運最動人的是有那麼多普通民眾以那麼高的熱情作出了最大的犧牲，對這些人來說，絕大多數人不可能留下名字。這種獻身精神是非常可貴的。

張倫：

我出來之後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我談了一個觀點，八九民運真正精神是什麼？不是平時人們常講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而是這種獻身精神，這個和平、理性、非暴力是這種獻身精神在為民族負責的情況下才採取的一種手段、方式。當時學生講話，比如熊炎，他們說，我們知道現在把中國搞亂了沒有任何好處，我們之所以這樣做，就是希望黨做得好一點。並不是我們現在要求你黨承認什麼，歷史會承認我們的。這一點就能解釋我們之所以採取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的一個最根本的原因，大家都知道中國問題複雜，所以民眾學生都抱著對國家民族負責的態度，包括中共的普通黨員，都為此負責。在這一點上，體現出來的中華民族傳統，所具有的獻身精神，責任感、崇高的使命感，這是八九民運的真正的精神。我們將來如果能夠保證我們民運不偏離方向，保證民主能在災難中復興，最根本的是一種通過死亡與復興的歷史過程煥發出來的東西。人們說我們中國人沒有宗教感，中國人宗教感也有，它是體現在對國家、對社會的責任中的。我曾看到一位老人把一萬多元錢一下扔到捐款箱裡。我還看到一個個體戶，站在上頭演講，手裡拿着一疊人民幣十元的，大概有上千多元，說，你們要我去買國庫券，我不買，因為給你們貪官污吏揮霍掉了，但學生為民運，現在我捐掉，說着就扔進捐款箱。

胡平：

海外也有類似情況，在八九民運中，各界人士捐款都很踴躍，有些是打工人士，生活很艱難，而捐錢却是很慷慨的。另外，我也感到，一直到最近，我出去講演，很多人包括留學

生，很熱心，他們也很關注來聽。我跟他們也

講，別人老說我們做這種事情，作出了多大犧牲，其實我們作出的犧牲恐怕還是比較有限的，因為我們畢竟還得到一些名譽；而這一些人，普普通通的留學生，普普通通的僑胞，還有一些認都不認識的外國人他們對這事這麼關注，我覺得他們所作的犧牲恐怕更令人感動。

廣場情緒要調整，廣場精神不能丟

張倫：

對，為什麼我老講在廣場的事，你說我是廣場病也好，我覺得是這樣，為真理而奮鬥的勇氣和獻身精神與在對真理認識上的理性是兩個不同問題，要區分開來，不能攪在一起。我為什麼說我是一「廣場病」，為什麼不能有一點呢？尤其是在海外，就是應該有點廣場病，應該有點夢魂縈繞的東西，有點朝思暮想的東西，有點心中崇高的東西，如果我們不斷忘却，沉浸在鮮花當中，認為我們就是民運領袖了，歷史失敗的責任我們就不說了。

胡平：

這句話我也很同意，我在一篇文章中談到，作為一個在民主運動中比較出頭露面的人，既然得到了更多的榮譽，他們理所當然地就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有更强的責任感。

張倫：

現在人家對你歡呼的時候，你不能把所有的功勞都算自己，而對失敗呢？你承擔不承擔？你要是民運領袖的話，你就應當檢討。要承擔失敗方面的責任。是不是，所以我說八九民運，廣場幾千個學生倒在泥水裡，背靠背，你有什麼樣的感受！毛澤東、共產黨當年還講愚公移山，我們今天如果要做事，沒有一點這種氣的話，怎麼行？我現在擔心海外民運最重要的便是氣沒了，就壞了，那就完了。

精英意味着對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胡平：

順便談談精英的自我意識問題。我覺得（張倫：我起了個名字叫「明星自戀症」）精英，無非就是說，要對自己有個更高的期許，有更强的責任感，而不是比別人高一頭。你的命就比別人更值錢。你只是比別人有更大的責任。當然有些事也很難免，比如大家對六四中受到迫害的人事的呼籲，當然外界只能找些所知的人，不知道的人那就不好提了。但事實上我們知道在整個六四屠殺中，犧牲的也好，被逮捕的也好，大部份人都還是不那麼有名氣的，這種人在歷史上的功勳更值得我們去紀念。

張倫：

八九民運說到底是一場真正民眾自發的運動，我們現在不能因為明星的光芒而把海洋一樣的民眾給忘掉。

胡平：

明星無非是要意識到有更强的責任感，要用更高的標準要求自己，在這方面應該做得比別人更好，而不能倒過來。共產黨就很滑稽，說毛澤東是人不是神。要你服從他的時候，它就把他當作神來看，等到大家知道他幹得很不好時，就說他是人嘛，它叫你用人的角度原諒他的所有錯誤，但又叫你以神的態度去尊重他，這兩重標準全都佔光了，那怎行？所以我說民運比較著名的人也要注意這個問題，要表現出更多的犧牲精神，如果對你的弱點，用人的這個方面去辯解，同時對自己得到的很多榮譽又視為理所當然，這就很不恰當了。精英與廣大民眾脫節，造成的後果不堪設想，是非常重要的。

在黨內改革可以理解 走民間道路更應尊重

張倫：

談到這種精神，這十幾年來，中國的民運確有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在不斷為中國的民主而奮鬥，其代表是魏京生、王軍濤這批人（胡平；還有王希哲）。我現在聽說在監獄裡，因為七九年八〇年西單民主牆被捕的，還有一大批，今天我們承接鮮花時有沒有想到他們為民主所作的事？

胡平：

他們的責任感非常強烈，例如劉青，前不久被放出來的，我跟劉青有一些接觸，這個人的人格上非常崇高。事實上在散發魏京生的「自辯詞」而被捕的，並不是他，是其他去散發這個材料的人，但他因為覺得自己叫這個人去的，應當承擔這個責任，所以找到公安局，要他們把人放出來，公安局本來沒抓他的意思，他不走，自己進了監獄，其他幾個人就放出來了。這個人的責任感是我們每個人都要學的，像王希哲原來由於李一哲大字報名噪一時，後來打倒四人幫後為這個事平了反，名聲也很大，他依然很堅定地走上了民間的道路。他也知道前途有多危險，從理論上說，當時達到他那種理論深度的，我想全國沒幾個人。談到軍濤，也很使人感動，軍濤無論其才華、年齡、背景，完全可以走另一條道路的，這全是自己的選擇。

張倫：

對，我與軍濤聊過多次，青年界在政壇上活躍的幾個人，舉國知名的人，實際上是通過軍濤推荐走上政壇的。軍濤自己却主動放棄了這個機會。

胡平：

在八四還是八五年，我們倆談到像我們這一批參加民主牆的，多多少少有點名氣的人，黨內改革派對我們這些人有一定好感。當時我們就談到當官的問題，軍濤和我態度明顯：不去當官，除非是老百姓選出來的，我們去爭，去當，我們堅定地要走建立民間力量的決心。

其實這幾年進入共產黨內黨內改革派角色的人也未嘗對共產黨沒有看法，但在中國政治環境下，進入共產黨可以得到地位，直接的影響更大，很多人是出於這種考慮進入角色的。（張倫：這叫「曲綫救國」），所以，當時對很多人走黨內改革派道路我們也是很能理解的，他們也確實起了不少積極的作用。不過後來再想一想，不得不承認，軍濤的這種精神更值得尊敬，因為他走直綫。在政治上，他說直綫並不是最短的，但直綫是唯一走得通的，其實這個直綫更漫長，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勞而無功的。現在大家看得很清楚，如果沒有體制外的、民間的力量發展，去靠黨內改革是不行的。但換句話說，當時如果很多人都投入民間道路，豈不是早就成了嗎？如果大家，凡是有捷徑可走的人大家都去走，實在在裡頭呆不下去才出來。這樣民間力量一輩子也起不來。

當時搞民主牆也好，競選也好，我們也並不認為當時共產黨一點也沒改革希望，但是我們看到，你不能改革，我們要在外頭；你能改革得好，我們橫豎也要在外頭，這是既定的。（張倫：這是歷史決定的一定要走的路，問題是誰來走，這是需要犧牲的）因為開拓者，是開闢一條道路，別人是走現成的道路。開闢道路的人，走的距離更近，你是拔荊斬棘，一年半載你都走不出一兩步遠，而走現成路的人，一個月可走出十來步遠，當然，人都走那條路而不去走這條路，這條路永遠走不出。魯迅說，人走多了，就有路，中國民主力量不能起來，就着願意作為民間身份從事這種政治活動的人多還是少。多，中國民間力量才會成長起來，少，這條路就沒有。

張倫：

我們民族的傳統原來取義成仁的東西還是非常好的東西。這種信念、精神境界的東西，還是要繼承的東西。至於你打算怎樣進行轉換，那另當別論。但是如果你沒有精神的東西在裡頭，那就有問題了，完全以功利的目標在裡

頭，一切以現實的判斷，功利的角度出發的話，那這個民族肯定是墮落的。

胡平：

那要看功利怎麼說了，中國人一談功利一般都帶貶義，應該這麼說，大的功利還是要的，是求大功利還是眼前的小功利，我們做的事當然也是為了民族的功利，你要反的是急功近利。

張倫：

對。比如子明、軍濤，接觸過他們的人，對他們的才華、能量都沒有任何懷疑，在中共體制下，在那種環境下，混個很好的前背是決不成任何問題的。當初他們也有許多朋友後來發達起來了，機會很多。

胡平：

如果他們也走黨內改革道路，他們是很佔便宜的。他們後來搞成那麼大一個規模，在共產黨體制之下，在共產黨整個控制的狀態之下，能夠搞到那個程度，是個奇蹟。

在中國，他們創出了一個奇蹟

張倫：

絕對是個奇蹟，這跟這些朋友的韌勁和犧牲精神有很大關係。我們後來這個系統發展到每年研究經費大約有幾十萬，整個出版公司搞了很多錢。但主要領導人的生活水平是一個什麼情況？陳子明愛人工作勞累，兩次流產，陳子明住在他母親單位的房子，跟弟弟住在一起；王軍濤結婚數年，沒有房子住，常常在朋友那兒借住半年，住不下再搬，長期漂泊，四海為家。北京的朋友會傳聞子明這個人很摳，什麼意思呢？指子明在用錢的問題上摳得很，因為錢掙來得非常不容易，他希望能把資源有限用到對我們國家民族有利的地方，他在許多重要事情上，例如搞學術研究、搞叢書、辦調查，從來沒絲毫含糊，我覺得這一點需要不少人

繼續去學習的。再談到這場運動，許多人出我出來後知道我會長期在這個所裡，是重要成員之一，跟子明、軍濤很熟，問我對他們究竟怎麼看？本來順着前面說的渠道走，他們的事情發展到很大規模，後來運動發生了。坦白說，他們從整體上對這場運動要失敗早有清醒的認識，五月二十一晚上，我離開廣場，臨走時跟子明還談過這些問題。最後爲自己是不是進入這場運動，作了一些具體判斷，認爲無論如何，我們爲民衆憂慮多年，盡管這場運動來得突然，但我們不能不站到這場運動中。這關係到民族的光明與黑暗，我們不能不去表態，我們一定要站到第一綫去，幫助學生在這一

上是沒有什麼可以否認的。所以我們作爲「黑手」做了許多事情。可以說，他們做的事，比任何人都做得多。我可以當之無愧在這兒說這話。我們這批朋友說句老實話，對中國現實問題的認識非常清楚，在不希望中國亂這一點上，可以說跟中共是非常一致的，但是中共可以說是出於其統治的角度，我們是出於對民族負責的角度。八八年我們從學術角度探討過中國整體，對中國經濟政治危機，那時就有許多預見。

胡平：

其實可以這麼說，實際上如果軍濤、子明他們真是在運動中起到主導作用，那麼運動恐怕就是另外一種景象了。

我們並不缺乏領袖 而缺乏對領袖的識別

張倫：

對。事實上他們起不了主導作用。

胡平：

一般人對他們確實知道得太少，他們的名聲不大，這也是一個問題，就是因爲他們長期在民間活動，長期從事默默無聞的，他們的名字對大多數參加民運的人來說就不那麼響亮，

如果人們很早，比較早就瞭解他們過去的能力、信念、獻身精神以及政治見解，從而在運動中對他們的意見、主張更尊重，恐怕事情會好一些。現在我們要討論的問題，其實也是這樣，要讓人們對長期以來對運動抱有堅韌不拔的信心的人有個瞭解。（張倫：對他們經過考驗的人格、鬭爭經驗、境界和水平都要有個瞭解）所以我並不認爲運動缺乏領袖，只是領袖還沒有被人們認識，而之所以沒有被人們認識，毛病還在我們自己身上。共產黨當然會千方百計讓這些人不去大家知道，而我們自己也不去注意，包括投入民運的人不去注意。

張倫：

許多學生，許多崩出來的領袖，根本不知道王軍濤是何許人呀，當然也有些人知道，比如北大王丹就知道。歷史僅僅過了幾年，如果我們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忘記，民族就沒希望了。這也是中共成功的一招，它要讓民運歷史割斷。

胡平：

當時有強感召力的人沒出來扮演這種主導的角色，他們如果扮演了這種角色，整個事情就會變得不一樣了。

張倫：

對，因爲這裡面有一個問題，一直到最後，我們還在作努力啊，希望中共不要走到開槍屠殺這一點。正是因爲我們八八年作過研究，作過一個判斷，所以我們認爲中國社會經濟文化危機是非常深刻的，中共如果要殘酷鎮壓，無疑是自殺的行爲，稍微有頭腦的人都不會做這樣的事。而且就學生運動而言，哪怕中共稍微做一點姿態的話，事情就不會發展成這樣，我們這個民族就會走到另一方面去，也就是走上很好的道路去了。但事實上就是因爲這個老人政治和極權結合，包括權力鬭爭，使得結局很壞。

胡平：

到現在，中國的前景就更不確定了，出現

大動亂的可能性就變得更大了。中共六四殺人給中國歷史造成了非常嚴重的、極其惡劣的後果。假如在多少年之後，中國真的天下大亂，根苗就是六四屠殺。

張倫：

四月底時，我曾經去找過中共幹部，希望能去幫助做些工作。我曾對他們講過這番話，說這場運動出來，我現在絕對是堅定地站到學生運動當中去，尤其是四·二七大遊行後，我說我如果不站到學生運動中去，我永遠沒有談民主與自由的資格，因爲我這兩年搞過許多講座什麼的，這個學生運動不完全是什麼學生運動，它是民主運動，民主運動就不能是學生爭得民主咱去享受，學生搞不成了咱就指責，這是不行的，這關係到我們每個人基本的人權與尊嚴。那麼，我跟我講我搞過社會研究我知道中國問題複雜，我說我們都來做一些妥協，我們雙方體面下台，今天我不愛標榜自己怎樣反共產黨，我是說當時我確實是這麼說，也這麼做的。但是我另外又說了一句話，我說你們要記住，如果你們處理這件事不拿出一點真心實意的話，你就低估了改革開放十年成長起來的學生，低估了改革開放十年對中國民衆的影響。這是我當時的原話，我說如果你們想要一點政治手腕，把這個問題解決掉的話，那麼就太低估這一代學生了。

胡平：

那時運動剛剛起來時，我寫的一篇文章也是這樣，說這是中共自身改革的最後一次機會了。

張倫：

對，完全對。我當時在廣場上碰到一些人，在戒嚴令最緊張時，我跟北高聯的常委在談，當時情況很複雜，以爲今天晚上軍隊就要進城了，北高聯一個常委叫邵疆，現在被捕了，沒上通緝令，我爲什麼講他，許許多多人做了許許多多默默無聞的工作，身體却弄垮了，但現在不爲人們所知，包括梁二，還有汪志新他們

幾個，我當時就跟記者講，說這是民族的一個關口，因為如果我們走得好，就會走上了一個好的途徑，搞得不好的話就要出問題。我們也站到第一線來，希望通過我們的努力來改造歷史，但是中共的一小撮黨閥們自己敗壞了我們光明的希望，我覺得一定要把責任算到他們身上，而不是學生。現在反省起來，這個運動發展只有一個關口可能是有不同發展，好像你也說了，就是絕不絕食的問題。五一以後到絕食期間這一段，運動可能會產生不同結果。實際上，八九民運一些問題是它的偶然因素重疊、交織在一起，才造成這樣的結果。比如說，沒有趙紫陽「五四」講話，學生也可能沒有那麼大的希望去絕食，沒有學生的支持，趙紫陽也不可能公開出來講話，這裡面有一個不同的因素一環扣一環扣在一起，因為由於趙紫陽這一番講話，學生覺得也應該有些希望，那麼就採取了這種最哀兵的方式，也就是最溫和的方式來，希望黨能夠作最後的改革。說句老實話，當時大家對中共確實從感情上，包括從責任上都不希望中國亂，還是希望中國走改革的路。今天不能說八九民運一槍打了之後，許多人都覺得自己是反共英雄，我覺得那是錯誤的，與海外許多人認為的反共也是不一樣的。

建立獨立政治力量 開創新的政治格局

胡平：

在六四之後的第二、三天我寫了篇文章，說中國政治極化、兩極化的發展，在六四以前人們更關心的是怎樣推進民主，不是怎麼樣去打倒共產黨，六四以後情況就反過來了。我談了這種情況，因為當時爭取民主和反對中國共產黨這兩件事情，在中共自己改革的可能性存在的情況下，並不是完全等同的。因為你反對的是它的專制。你看蘇聯，就不一定就是要反對整個蘇聯共產黨，因為當時蘇聯共產黨還

存在改革的可能性，反對專制及反對共產黨這兩個概念不一樣，從民主牆開始，我們採取了獨立於共產黨的立場，而不是簡單的反對共產黨的立場，是獨立的立場。

張倫：
就是尋找一條道路，第三條道路。

胡平：

我當時就覺得「體制外」與「體制內」這個概念本身就不清楚，因為他們當時所尋求的既不是變成共產黨中的一個，同是又不是簡單的反對共產黨，他們所尋求的是一種獨立於共產黨的，對你有所制衡，但又並不妨礙與你進行合作。他們採取這種立場，方法和西方的朝野之間關係比較接近，你不能說美國民主黨是專門反對共和黨的，不是那麼簡單的，要不我依附於你，要不就是你的反。這是一種獨立的公民的立場，對政府有支持有反對，支持是獨立的支持，反對也是獨立的反對，要建立這麼一支政治力量，中國政治就會進入新的格局，所以這一點，當時很早就比較明確了，所以就造成了他們的這種情況，既不像有些人那麼激進，比較溫和；而其溫和又是一種獨立的溫和，就像波蘭瓦文薩，他的團結工會是民間的，是獨立於共產黨之外的一個溫和派，而不是黨內溫和派，（張倫：我們將來的道路就是這麼一個道路。）

胡平：

所以我想，反正必須要建立一支，充實一支民間的力量，將來遇到具體的事情，採取更激進的政策，還是採取一個比較溫和的政策，那要取決於許多具體的環節，要激進還是要溫和，先要讓自己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這是一個前提，這既是你激進的本錢又是你妥協的本錢。所以我講在海外都要建立起民間的、獨立於共產黨之外的這麼一個政治力量。這是本錢。激進、妥協都要有本錢，本錢就是獨立的政治力量。我覺得搞民主運動海內外都一樣。

王牌出盡的中南海橋局

江之楓著

由政治家邁向賭徒只需微挪寸步！鄧小平在六·四前後的政治橋局中，陰陽謀的鬼牌出得如何？中共鐵幕後的最高層運作又如何？本書作者將以其身居中南海大內中的親見聞向您展示八九民運期間北京紫禁城內那一幅幅風雲際會、詭秘多變、勾心鬪角的中共最核心機密。各篇章在台港「中央日報」連載後，引起海內外轟動，專家們稱「此乃中共第四次大洩密」；高官們視其為「認識中共高層體制運作的書」。承作者江之楓先生慨允，由「民主中國書林」出版海外中文及英文版。中文版已問世，數量有限，機不可失，欲購者請趁早將支票或美金滙票滙出。

支票（美國以外請用美金滙票）

書價：\$12.89

另加郵費 美國境內：\$0.90

抬頭：CPRA

加拿大：\$3.25 亞洲：\$7.37

地址：76-11 ROOSEVELL AVE BOX 162

歐洲：\$5.50 南美：\$5.50

JACKSON HEIGHTS N. Y. 11372

電話：(718) 507-4739

突發事件：極權社會的變數

由於專制政府嚴禁自由言論和自由結社，從下層開始的活動常帶突發性質。過去如此，將來也會如此，僅在事後批評民運失控無補於事。

曹長青

對於「八九民運」，人們有兩個「想不到」，一是它的爆發，竟有上百萬人民參加；二是中共竟用刺刀、坦克血腥鎮壓。

對於前者，已經有很多人探討這種突發性背後隱藏的因素。譬如，全球共產主義理論與實踐的破產，十年開放改革的作用與影響，經濟惡化與思想啟蒙。不論從哪個層面，人們都會發現，八九民運標誌着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種危機的總爆發。

但是，這場帶有必然性色彩的危機爆發為什麼出現在去年的四月？它與胡耀邦逝世、戈爾巴喬夫訪華等突發事件有哪些內在聯繫？突發事件在中國這樣一個極權社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它在一般民衆心理構成怎樣的反彈？

胡逝世成爲運動的政治信號

很明顯，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的逝世，成爲「八九民運」的觸發點。爲什麼一個前中共總書記的突然病故能引發如此規模的民主運動？

我在大學時的一次經歷給我長久的思考：一九八〇年的冬天，我在黑龍江大學中文系三年級讀書時，一場足球賽釀出大學潮。那天晚上，中央電台實況轉播中國足球隊與沙特阿拉

伯隊足球比賽。上半場，中國隊零比二輸了。

下半場開場踢成二平。臨終場時中國隊奇蹟般連進兩球，從四比二大勝沙隊。結果，黑龍江大學各個宿舍樓都湧出了人潮。同學們將平時節儉使用的煤油（用煤油爐煮夜宵麪條）扣倒在拖把上，然後點燃拖把，敲着洗臉盆，衝出校園，匯成一支一千多人的遊行隊伍。旁邊的哈爾濱科技大學、哈爾濱醫科大學也湧出千人，幾千名大學生匯到一起，在北方零下攝氏三十幾度的寒夜中，呼喊口號、遊行示威。人們要反對什麼，擁護什麼，誰是組織者，都不十分清楚。但看到當官的坐的小轎車駛近時，人們的反應却是一致的：圍上去，用拖把桿敲擊車蓋，嘲笑它，戲謔它，那種譁笑的氣氛像在「過年」。

第二天，人們瞭解到，整個哈爾濱市的十幾所大學幾乎都如此，「鬧」了大半夜。第三天，「中國青年報」報導，北京市的北京大學等十幾所院校也都如此「鬧事」，北大學學生在校園點起了篝火。

一場足球賽，中國隊踢勝了兩個球，何以引發出全國規模的大學潮？對於這樣一個凸現的社會學現象，當時沒有任何一個社會學家進行研究。後來在南方一次思想沙龍討論會時，人們認爲，這與中國人的言論自由、觀念表達渠道不暢通有關。

第一，中國人沒有組織非官方團體的自由。

一切組織都必須是官方的、官辦的，其標誌是該組織中都有（中共）黨支部，黨的書記實際上操縱、控制着這個組織。全國各個層次、大大小小的共青團、工會、婦女聯合會，以及作協、記協、文聯等等各種組織，都是官辦的。堂堂中國作家協會，說了算的不是作協主席，而是作協黨組書記。而且，每個組織的大小、級別高低，也是從這個組織中的黨的書記在黨內的級別而定。如果是黨委書記，那麼這個組織就是「縣團級」，如是黨組書記，那就是「省軍級」。任何人想自己組織一個團體，當局不僅不會承認，還可能把你打成地下非法組織壞頭頭加以逮捕。有人說，我們成立非政治性團體行不行？也不行。即使幾個喜歡狗的人成立一個「愛狗委員會」也不行，因爲這組織中沒有黨支部，沒有黨的領導。但這幾個人加入官方的「保護動物協會」，那是沒問題的。

中國共產黨是靠組織起家的，它也是這個世界上最具排他性的組織。因爲它靠組織起家，它深知組織起來的力量，對極權統治的威脅。在它統治大陸四十年來，它竭盡全力排斥、摧毀、鎮壓一切非官方組織。對於去年民運中誕生的「北高聯」、「北支聯」、「工目聯」等非官方組織，它自始至終都不具承認，冠以「非法組織」討伐批評，並將其主要領導人打

成「非法組織」壞頭頭加以逮捕、監禁。

在這樣的情形下，中國人要產生群體反抗行為是十分困難的，沒有組織功能的運作，有時連一場群體示威遊行都難以進行。

第二，中國人沒有言論表達的自由。一切出版物、電台、電視台等傳播媒體都控制在共產黨手裡。中共幾十年來從理論到實踐上，都把報刊、電台等新聞媒體當做自己的工具與喉舌，並嚴令：黨性原則高於一切。在中共新聞理論中，主張黨性與人民性的統一。但當黨性與人民性相矛盾衝突時，黨性高於人民性。中共的解釋是，黨是無產階級、人民大眾的先鋒隊，是最大公無私、最有遠見、分分鐘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群眾最根本利益的精英群體。因此，黨性不可能發生錯誤，它應高於一切。在這種黨新聞中，報紙成了官辦、官訂、官看的官場讀物。而一切獨立思考、不同意見、不同聲音，都沒有辦法從新聞媒體中傳遞出來。民營報紙被絕對禁止。西方報業中報紙發行人這種概念在中國大陸是不存在的，因為一切都是黨的，黨是所有報紙的總發行人，所有報紙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黨報」。

中國人就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環境中，被剝奪了「結社」自由和言論自由，任何有組織的群體反抗活動，都從根本上被扼殺了。在這樣的背景下，突發事件就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在極權社會起到特殊的作用。

這種特殊作用主要體現為三點：一是突發事件起到通知、告示、大眾傳播、群體溝通串聯的作用，即某個團體要組織一場群體運動，所首先做的通知、串聯、一體周知的工作。而突發事件靠它的突發性、新聞性迅速傳播，在很短時間內實現一種「通知」功能。尤其是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的較大突發事件，實際上變成了一種「政治符號」，變成了號召所有人可以爆發群體行為的通知書；二是它具有有一種「煽情」作用。突發事件的突發性、刺激性都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強烈影響人們情緒的作用，它起

到某種組織發動群眾、促動群體情緒高漲的作用；三是突發事件起到一種「掩飾」作用。人們可以借突發事件傳遞、表述一種與事件毫無關聯的情緒行為。如中、沙足球賽後，黑龍江大學的幾千學生，雖高喊「振興中華」等口號，但却以圍毆中共官員小轎車這種行為，表述他們實際上群體行為的潛藏因素——對現實不滿，尋找機會發洩。



胡耀邦死得恰到好處

一九八九年第一個大的突發事件是胡耀邦逝世。胡的特殊地位使他的逝世成為極具震撼力的新聞事件。這一事件通過官方媒體的傳播，迅速地「一體周知」。而胡的特殊政治背景，使這一事件染上濃濃的政治色彩，人們在一體周知的過程中，更多地把它與當前政治聯繫在一起，從而使胡的逝世輻射了一種類似政治符號的作用，它等於「通知」了所有人，一齊產生群體抗爭行為的機會到了。

其二，胡是中國共產黨權力中心中相對而言較誠實、開明而又廉潔能幹的一位，被稱為改革派首領，人民寄予厚望。然而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他却被一幫政治老人強行轟下台。他的處境早已引起中國人普遍同情。而「八老」不死，他却英年早逝這種結局一下子使中國人難以接受，胡的逝世，馬上「煽情」了所有國人的情緒，人們不僅為胡悲哀，更多的人是對陷害、打擊、排斥胡的老人幫的強烈不滿，對現存社會制度種種弊端的憤怒。

其三，悼胡是最好的「掩飾」。畢竟胡當時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也要開追悼會。因此，群眾性悼念活動在情理法上都講得通。然而，這種悼念活動從一開始就超越了悼念本身，另有內涵。這個內涵就是發洩對現實的不滿，對中共老人幫的不滿，對社會腐敗、貪官污吏的憤怒。

胡的突然病故，集中顯現了突發事件在中國這樣一個極權社會具有的三種功能作用。因此，胡逝世的實際效應是：一個人消失了，一個信號騰空升起，這個信號等於是召集人們群體抗爭暴政的政治信號。

戈訪華招來全世界新聞媒體

對八九民運構成第二個戲劇性促進因素是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訪華。中蘇兩黨關係凍結了三十多年，其解凍偏偏「選」在了八九民運興起的五月。

戈氏訪華對八九民運構成的第一個效應是使鎮壓推遲。為什麼戈氏訪華期間中共不能鎮壓民運？這與鄧小平晚年心態有關。鄧晚年認為有兩件事他甚為得意：一件是他提出「一國兩制」，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香港「船王」包玉剛曾在北戴河問鄧小平「您晚年還有什麼最大的願望？」鄧回答：「一九九七香港回歸後，到香港走一圈。」另一件鄧得意的事情

，是中蘇兩黨關係凍結三十多年，毛都無法打破的僵局，在鄧手中解凍了，而且對方黨總書記還要親自躬身到北京拜見鄧大人。鄧一直視這兩件事為他晚年的政治傑作。在這種心態下，戈氏訪華，在鄧看來是「極美麗的一件事」，是他政治上的一座豐碑，他不可能在這個時候下令鎮壓，鎮壓會衝擊他與戈修好這件大事，同時也會在客人面前丟了「大家長」的面子。

鎮壓推遲的直接結果是運動走向成熟。這種成熟主要體現在人數激增，達到一百多萬人。八九民運的最大特點之一是它的規模巨大。一百萬人，是個相當有份量的數字。人數如此激增，與中國傳統文化也有密切關係：中國人一般個體反抗能力、擇向能力較差；但中國人的群體認同能力很強。我們看到，有時幾個中國學生上街購物，看到一件新奇的物品，人們要互相探詢：你買不買？他買不買？好，你們都買，那我也買一個。特別注意別人的行為，並認同「隨大流」，這是中國人很重要的一個特點。八九民運也是這樣，當有幾千人在廣場後，而且沒有遭到鎮壓，更多的人則採取認同行為。結果是人越來越多。這也是中國民運的一個顯著特點，即人越多時，湧入的人越多；人越少時則更少。

戈氏訪華帶來的第二個效應是「帶」來世界上各大新聞傳播媒體。中蘇兩個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頭子促膝修好，這確是大新聞。美國三大廣播電視公司、日本「讀賣新聞」、加拿大CBC等全世界主要新聞媒體都申請到北京採訪。由於鄧小平如此看重他與戈的會談，結果所有採訪申請均被同意。中共統治大陸四十年來，第一次全世界主要媒體記者雲集北京。這些記者當然不會放過天安門廣場上的好新聞，戈氏離華後，所有攝影鏡頭都對準了廣場上的學生和市民。面對西方記者的攝影鏡頭，中國人情緒大增，認為這事值得鬧，外部世界能知道（如果把一個人單獨關起來，他才不會鬧

）。雲集的記者和攝影鏡頭從某種意義上說，增強了中國人的群體勇氣。而中國傳統文化中「法不責眾」的概念更使人們淡化恐懼。

趙講話導至一百小時新聞自由

對八九民運構成的第三個戲劇性促進因素，是趙紫陽在「五一九」戒嚴令前兩天對新聞界主要負責人的內部指示。指示的大致內容是：「對學生運動可以適當報導一點，新聞可以適當放寬一點。」提出兩個「適當」。早已憋足了勁想報導學運、力爭新聞自由的記者編輯們，拿到了黨總書記的「指示」，正中下懷。馬上，從中共中央機構報「人民日報」到遠在南方邊陲的深圳「蛇口通訊報」，大大小小報紙、電視台，爭相報導天安門廣場上的民運，從圖片到文字，一面倒同情學生、支持學生。從而把總書記說的「適當」達到最大的「當」。

從趙對新聞界內部講話到五月十九日實施戒嚴令，中國大陸新聞界可謂百花齊放，新聞自由了約一百個小時。這一百小時，對八九民運至少有三層輻射意義：

第一，由於中國沒有民營報紙，官方傳媒是唯一媒體，而且覆蓋率極高，它公開報導學運，起了極大的信息傳播和煽情作用。

第二，四十年，中共把傳媒當成自己的工具、喉舌。而億萬中國人也習慣於把報紙看成是黨報，把報上的意見看成是黨的聲音。在這一點上，中國人看報紙與美國人完全不同。美國人不會把「紐約時報」上的文章看成是政府的聲音，只是當新聞、信息來讀。而中國人只能看到「黨報」。當趙紫陽講話後，成百上千的報紙刊載學運消息，在某種程度上引導了一般市民的取向，他們以為黨可能要支持學生。它促使更多人投入廣場。

第三，它成為示威者反駁那些阻攔他們到廣場去的黨書記們的理由和武器。一位逃出來

的工人告訴我，當他們一幫工人走出工廠大門去天安門廣場時，工廠黨委書記攔在門口勸阻他們不要去。結果，工人們拿出「人民日報」說：「你看，黨報都登了學生的事，支持學生，你不去，你都落後（形勢）了！」弄得黨書記無話可說。

新聞自由一百小時對八九民運起到很大作用。嚴家其逃出大陸，在巴黎一次演講中稱，這次民運，學生立了第一功，新聞界立了第二功，工人立了第三功。而吾爾開希在不同場合則說：在八九民運中，學生立了頭功，新聞界立了大功，工人立了苦功。他們不約而同，都給新聞界很高評價。

結束語

現在對八九民運有很多批評，認為失控、領導不力、策略失當等等。但這裡忽視了一個重要前提，這場民運是突發的。雖然人們在理論上、情緒上早已積蓄了很多準備，但沒有組織準備。在中共那種極權控制下，產生嚴密的、有效的組織是極為困難的。而且沒有大家公認的領袖，沒有自己的傳媒系統。一切都是學運爆發後倉促建立的。今天，很多朋友寫了很多文章反思八九民運，對下一次民運給予更多期望和更高要求。但是，一個事件「應該怎麼樣」與「能夠怎麼樣」存在很大距離。當我們提出應該怎麼樣時，實際上只是一種理想化的期待。而「能夠怎麼樣」，實際上是考慮了一種條件因素」。在鄧李楊非理性集團掌握權力的情況下，下次民運，很可能還是從突發事件為引爆而突然發生。這種突發性並非人民樂意去這樣選擇，而是在這種極權控制下，人民沒有結社、組織自由、沒有言論、出版自由的情況下，無可選擇的選擇。因此，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突發事件在中國這種極權暴政中具有重要意義，它是這種超穩定鐵幕世界中一個不可測的「變數」。▲

二李相爭：亞運會後見分曉

李瑞環現在極力要做的就是「理順群眾情緒」，而效果最好的辦法是在公開的場合與李鵬唱對台戲。

許自力

趙李矛盾變成二李矛盾

六四之前，大家都說趙李矛盾。六四之後，趙李矛盾變成了二李矛盾。李瑞環和李鵬的矛盾在北京已成為公開的秘密。在人們的印象中，李鵬無疑是強硬派的代表，於是人們就要找到一個開明派的代表來作為其對立面，李瑞環正逢其時。據說，去年五月十九日，當李瑞環在電視上看到李鵬氣勢洶洶地宣佈戒嚴時，忿憤地罵道：臭棋簞子。從此埋下二李相爭的伏筆。

亞運會後將有人事變動

李鵬背後的靠山自不用說，李瑞環背後的靠山是萬里和鄧小平。沒有鄧小平撐腰，在中央根薄底淺的小木匠絕敵不過相府出身的烈士遺孤。不過鄧小平也不希望兩李之間的矛盾產生大的政局動蕩。在亞運會之前，穩定是頭等大事，中共高層不會發生重大人事變動。李鵬曾經向中央提請辭職，鄧小平批了六字：一動不如一靜。據內部人士估計，亞運會後兩李矛盾有可能激化並公開化，而且高層有可能出現重大人事變動。鄧小平仍想修復其改革開放的形象，對李鵬的經濟政策極不滿意，可能在亞運會後冒險一動，用李瑞環和朱鎔基代替李鵬和姚依林。

三不政策，民氣可用

李瑞環對李鵬死硬派殺的另一個回馬槍是反對「以階級鬥爭為綱」。他在一次宣傳工作會議上說

六四血案對中國政治將會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這是一個巨大的政治包袱，也是一個巨大的政治資本。就看你站在什麼立場來對待它。北京市民還沒有被暴力壓服，他們普遍採取三不政策：不賣人、不反悔、不認錯。政府在調查死亡者時發給家屬一張表，死因一欄有三個選擇：誤傷、圍觀、暴徒。幾乎所有的人都填「暴徒」。由此可以看出人們對此案必翻的信心。反正人也死了，今天的暴徒就是明天的英雄，這個暴徒是不當白不當。李瑞環自然看到了民氣可用，所以在公開場合故意與李鵬唱反調，以便「理順群眾情緒」。

豁出去？講話不嫌牙疼

不久前李鵬視查上海，警告上海搞外貿的官員說：「美國要用最惠國待遇來壓我們讓步，我們絕不會讓步，大不了一自力更生，中國被封鎖了二十多年也沒有垮嘛！現在你們要做好準備，研究一下在沒有最惠國待遇的條件下怎樣搞外貿。」李鵬剛一離開上海，李瑞環就在一個公開場合說：「有些人揚言豁出去了，最惠國待遇不要了。大家知道這一豁出去意味着什麼嗎？意味着一百個億的美元。這種人真是講話不嫌牙疼。」

下台之前我還有權撤你

李瑞環對李鵬死硬派殺的另一個回馬槍是反對「以階級鬥爭為綱」。他在一次宣傳工作會議上說

：「不要門來門去。筷子與碗鬥，碗裡的肉就進不了嘴。扁擔與肩膀鬥，擔子就挑不起來。光鬥爭解決不了問題。」可是《人民日報》社長高狄仗着李鵬死硬派撐腰，不把李木匠放在眼裡，他在發表李瑞環講話時將原話改為：「筷子與碗鬥，肉進了嘴裡，扁擔與肩膀鬥，可以把擔子挑起來。這也是鬥，鬥的結果，矛盾解決了。」

趙紫陽同志不能死

二李相爭，得益者自然是江翁。不過不久前趙紫陽病危倒確實把江澤民嚇了一跳。江澤民親自擔任趙紫陽醫療小組的組長，組織搶救。意外的是李鵬也很緊張，和江澤民一致認為：紫陽同志不能死，定要全力搶救。據知情者透露，江李均不希望趙的運動，火星一旦引爆，將不可收拾。據說中央高層列了一個重點保護的名單，這些人至少在兩年之內「不能死」。有人開玩笑說，只有李瑞環希望趙紫陽死。否則只要趙紫陽活着，六四平了反，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也輪不到他當了。

榮毅仁豈敢步許家屯後塵

榮毅仁與許家屯不同，他是不敢滯留海外不歸的。作為商人，尤其是與政治密切相關的商人，他有太多說不清的東西……

何頻



榮毅仁不敢步許家屯後塵

「皇親國戚」擠破中信公司，榮毅仁可稱為集榮寵於一身，又可喻為「養虎為患」，其前景實難看好。

一如所料，今天（六月二十六日）的報章刊出了一條不引人注意的短消息，說的是「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董事長榮毅仁休假完畢，今天返回大陸。」香港和日本的部份分析家又一次跌了眼鏡，榮毅仁並未如他們預言的那樣成為「許家屯第二」，好戲沒能連演。

但這並不等於榮毅仁的「假期」渡得輕鬆愉快，一方面他不敢不回大陸，另一方面回到大陸的前景未卜，怎麼辦？說他陷入進退維谷的兩難之境，一點也不誇張。看看中信公司的發迹史，榮毅仁與鄧小平及海外的關係，一羣有通天入地之能的皇親國戚，佔據中信公司要位，既可揭開中國最大特權公司的內幕，又可以發現「榮老板」的苦衷何在。

記者對榮的休假為何捕風捉影

七十四歲的榮毅仁，位居廟堂，現任中共「全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全國工商聯」主席、「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董事長」等職，按中共的級別排列和稱呼，當屬「國家領導

人」之列。海外的報刊今年二月盛傳榮毅仁將「榮升」國務院副總理，是否屬實且不論，至少「榮升」兩字用得不妥。無論從名義上抑或實際情況看，榮毅仁在中國大陸的權勢和海外的影響力，並不在現任中共副總理之下。

六月八日，日本經濟新聞發出「榮毅仁滯加不歸」的消息之後，一時輿論嘩然。第二天，榮毅仁的次子榮智健由香港飛抵加拿大，父子會晤，更給整件事罩上了一層神秘色彩。雖然中信公司副董事長金德琴解釋說：「榮毅仁僅僅是去美加渡假，且是經國務院批准的」，又由該公司董事總經理范鴻齡宣佈榮氏的回國日期——六月二十六日，但後來又傳出鄧小平幼子鄧質方突然抵達紐約，與「促駕」榮氏有關的消息，使新聞界對「榮氏事件」的熱度一直加到獲悉榮氏返回大陸後方減退。

據筆者所知，榮毅仁是今年五月赴溫哥華渡假，後來又去了美國，一方面是因為「積勞成疾」，需要「休養」；另一方面順便與他在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留學的孩子和其他宗親團聚。但是否與許家屯有過會晤無從獲悉，許氏是五月十一日抵美的，榮氏仍能出來渡過兩個多月的假期，可見中共高層對他「放心」，同時又有消息說中共希望借榮氏這位政治色彩不太濃的資本家對統戰高手許家屯進行統戰。

新聞界為何對榮氏「休假」如此敏感呢？無疑，這受到許家屯事件的影響。正如日本經濟新聞的「猜測」：「他是否因厭惡現在領導層的保守政策，而出走海外，一如許家屯不滿李鵬政權，而逃到美國一樣。」但更重要的是，榮氏本身的地位、處境，使人難免有這般猜測。

目李鵬實行經濟緊縮、整頓政策之後，中國最大的三家特權公司——中信、光大、康華，命運各有不同。康華雖由皇太子執掌，但樹大實招風，且內部已危機四伏，在社會上是聲名狼藉，「撤散」可以說是它最好的結局，從某種意義上講，此舉還為特權階層塗上了一層保護色。光大集團呢？老板王光英的董事長一職由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邱浬取代，聲威自然銳減。唯有中信公司風光依舊，最近收購「香港電訊」百分之二十股權，因涉及資金高達一百億港元備受各界矚目；近日又向台灣招手，希望與台灣廠商共同集資成立「基金」，在大陸進行廣泛性的投資行動，由中信擔任「引導」的角色。

現在，中信公司總資產超過了兩百億人民幣，擁有員工兩萬，業務已在海外擴張二十三家分公司，達兩百餘家企業單位，不僅成為中共在海外內最大的投資公司，並且其所吸引進的外資、技術與設備，已成為中共經濟「作出

貢獻最大」的機樞。

但正因爲這樣，衆多的中共高幹子弟、「皇親國戚」擠破中信的門檻，現在身居中信要位的，多爲此類人物。「六四事件」後的首次政治局會議公報規定「堅決制止高幹子女經商」，依此規定，中共中央政治局、書記處成員和國務院常務會議組成人員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均屬不得經商的限制範圍，所以中共國家主席楊尚昆之子楊紹京和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之子萬仲翔被迫離開「中信」，因爲楊尚昆和萬里均爲政治局成員。而「無冕之皇」鄧小平幼子鄧質方、國家副主席王震之子王軍，和一大批高層子弟、「皇親國戚」仍居「中信」要津。

這些通天人物良莠不齊，有的依仗權勢任意胡爲，甚至不把「榮老板」看在眼裡。所以，與其說榮氏集「榮寵」於一身，不如說是一「養虎爲患」，真可謂「風光背後，苦水誰人知？」

從麵粉大王，到紅色資本家

一九八七年，美國「財富」雜誌第一期，選出世界五十名最成功企業家，多爲西方國家人士，身居共產國家的榮毅仁赫然名登紅榜，令企業家大爲驚訝。「財富」雜誌甚至稱榮氏「爲中國開放政策的重要執行人」。

榮毅仁出生在長江之濱的江蘇無錫，自小便赴上海當學徒，不久協助父親做麵粉生意，日產八萬袋麵粉，故有「麵粉大王」之稱。後來又創辦紡織廠，亦極爲成功，最高時擁有紗錠六十五萬枚。一九四九年上海由中共執掌後，榮毅仁家族的企業實行公私合營，事無可爲，榮毅仁在父親去世之後，即將企業全部送給「國家」，換得中央「紡織工業部」副部長一職。不過，文革爆發後，他被扣上「復辟資本主義的總基礎」大帽子，還蹲過牛棚。

鄧小平、趙紫陽推行「經濟改革、開放」

政策後，榮毅仁隨即復出。先是任上海市副市長、紡織工業部副部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一九七九年，當時任政協主席的鄧小平贊成榮毅仁以政協副主席身份前往西德、法國、瑞士訪問。出訪一歸來，鄧小平即批准成立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榮毅出任董事長兼總經理，而副董事長一職由總參二部副部長熊向暉出任，所以後來中信傳聞涉嫌做軍火生意並非風穴來風。

榮毅仁之所以得到鄧小平的「賞識」，委以重任，與榮氏在海外有龐大的家族關係密不可分。一九八六年，海外的榮氏家族二百餘人集體回國觀光，轟動一時。榮氏的這些宗親多是在海外有建樹之人，他們的僑居地包括美國、加拿大、澳洲、西德、瑞士、巴西、台灣和香港等地。鄧小平在接見榮氏二百多位家族成員時說：「榮氏家族對發展中國的民族工業做出了很大貢獻，是有功的。」

榮毅仁前景實難看好

也許這是筆者的主觀判斷，尤其是在大陸局勢微妙的異動中，榮氏不至於迅速落台。不過，筆者依然認爲，榮氏的日子過得難以舒暢。八旗子弟在「中信」胡作非爲是他頭痛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資本家一旦與政治關係太近乎，前途常是時好時壞。

雖然，中信的一位鼎力支持者——趙紫陽的落台並未給他帶來太大衝擊，去年「整頓」中也只象徵地罰了五百萬元人民幣。但是，一個個危險的漩渦，就在榮氏的身邊。

據筆者接觸到的「中信」人士說，「中信」內部已有不少人抨擊榮家假公濟私，在公家的生意之外，另有私人生意，這是以國家的資源，來建立榮家的獨立王國。亦有人對榮氏的工作作風噴有煩言。這些攻訐之詞不管是否足信，但畢竟透出了一個信息，那就是榮氏在中信的統合能力正下降。

另一方面，澳門商人馬萬琪的兒子馬有恒娶了榮毅仁之女榮智婉爲妻，而馬萬琪、王軍、榮智健、賀平（鄧小平女婿）等在澳門合辦「興隆行」，大做軍火生意。據說，涉案的軍火槍械，由四川重慶兵工廠製造。傳播媒介一直盯住此事不放，一旦將獲得的「真憑實證」公佈出來，對榮氏的聲譽無疑是個沉痛打擊，責任很難推諉。

榮毅仁曾想過「退爲上策」。去年九月間，中信遭「整頓」時，他以倦動爲由請辭，當然被慰留；今年一月，王光英下台時，他又二度表示倦動，且在北京與記者們公開談到個性無法再擔任這項工作。也就在這時，中共放出風聲，要讓榮出任副總理，似乎以「實權」在誘惑。三月份的人大會上，榮氏並未出任副總理一職，不知是中共變卦，還是榮毅仁不接受。有人說，榮氏有意借這次「休假」作爲資本，再次向中共請辭。坦率地說，榮氏現在「退位」是最優選擇。

但榮氏與許家屯純政治原因不同，他是不敢滯留海外不歸的。因爲作爲商人，尤其是與政治密切相關的商人，有太多說不清的東西，最容易引起人們對其經濟問題的猜測，所謂悠悠之口難杜，即使在海外百般否認，說服力亦不及如期回國。另外，作爲國家領導人及「資本家」，難以提出構成不回國的理由，即使不由中共政府出面，中信公司即有權要其負責人回來交代帳目；而西方國家對於有財務嫌疑者，是難於收容的，因爲企業負責人做出損害股東利益的事，屬刑事犯罪。▲



周恩來的骨灰撒在何處？

末名

周恩來是中國現代史中一個最難下定義的人物，他的儒風和忍辱負重的內在性格，使世人對他有一種莫名的好感。他的死不但贏得了幾億中國人的眼淚，也使聯合國降下半旗一週。這位中國歷史上在位最長的宰相，一生只有一個太太，在國內外沒有私人財產，沒有有朝一日可能敗壞名聲的子女，最令人感嘆的是連墓碑都沒有，「骨灰撒在了祖國的江河大地上」了。

周恩來的骨灰撒了嗎？撒在哪了？似乎從來沒有人對這一點懷疑過，因為無數中國老百姓會眼淚汪汪地從紀錄片電影「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永垂不朽」中，真切看到飛機播撒骨灰的鏡頭，所以中外人士均認為骨灰肯定是像中共報紙和雜誌中所說的，撒遍祖國江河大地了。然而從存在於中共中央檔案館裡的資料顯示的真實情況則是：

當周恩來於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去世後，在中國大陸引起極大反響，特別是當一月十一日火化周的遺體時，幾十萬人佇立長安街頭，為中共統治大陸二十幾年來所僅見，引起中共上層的不安和恐懼。所以在如何處理周恩來骨灰的問題上，中共少壯派「四人幫」和元老派周的老友產生分歧，最後終於達成協議：骨灰按遺囑要求撒，但行動交由王洪文負責處理，過程為絕密行動，沒有留下任何影像紀錄。所以，那個紀錄片中的撒骨灰的鏡頭，完全是糊弄老百姓的偽作。

事實是這樣的：當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一日周恩來的遺體在萬人夾道中被送到北京西郊八寶山火化後，又在眾目睽睽之下送回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的靈堂內，供人祭奠。

一月十五日上午，兩輛紅旗牌轎車駛出中南海西門，轉向長安街向東開去。三十五分鐘後，到達位於通縣張家灣附近的空軍司令部直屬專用機場「三間房」機場。空軍副司令員張××陪同當時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兼八三四一部隊政委的吳忠走下車來，在幾個隨從的簇擁下走進機場招待所的一間高級會議室裡，早已奉命等候多時的空軍某特運團一大隊副隊長胥從煥、二中隊飛行員唐學文立即立正敬禮。張副司令和吳忠耳語幾句後，正言道：「我代表國務院、中央辦公廳向你們直接下達播撒周恩來骨灰的飛行任務，因為任務的機密程度很高，所以從現在起到以後，絕不准有半點情況透露給除此時在這個房間內的人之外的人，這是黨對你們的信任。」接着，由隨來的一個高級參謀把事先畫好的飛行航線圖鋪在桌子上，講解航線和注意事項：起飛地點是通縣三間房機場，經湯河口、密雲水庫東十公里一〇四九的山頭、天津、北鎮，再回通縣機場降落，高度二

千米，密級一級，禁止除飛行業務之外的飛行通話，不保留飛行記錄。執行任務的飛行組成員是，正駕駛：胥從煥，副駕駛：唐學文，領航員：白海坤，通訊員：李永順，空中機械師：陳寶森。使用的飛機是蘇製安—2，是執行

農業飛行任務的專用飛機，裝有整套噴撒農藥的設備，機尾編號「七二二五」。

機組人員聽完命令後，立刻被帶到機場內滑行跑道旁的一座獨立小樓中，不准進出和與外界、包括家屬有任何形式的聯繫。那位剛才交待任務的空司參謀全副武裝在門口站崗，外圍有一個警衛排戒嚴，不准任何人接近。當時，指揮所之間的通報只講，有一個重要的農業任務飛行，起飛時間由張副司令具體確定。

需要交待的是，中國人因為林彪「九·一三」事件，大都知道西郊機場為中共的一個軍用機場。而實際上位於東郊京津公路旁的三間房機場，是中共高層經常光顧的另一處重要軍用機場。當年林彪之子林立果組織小艦隊，練習飛行和到外地串連，常常由這個屬於空軍司令部直屬飛行大隊的機場執行。葉劍英、周恩來、王洪文等去外地巡視，也經常經過這個機場來去。三間房機場又是中共高層檢閱和試看新式飛機演習或試行的專用實驗機場，機場內儲備着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各種型號的機種，是大陸空軍裝備最好的機場之一。另外，離該機場十公里處的郭縣境內，有一處地對空、地對地導彈基地，是中共「五四三」導彈部隊的一個重要基地，加上在附近駐軍的近三萬人的野戰部隊五一二〇部隊，形成強大的地空軍事立體布防，扼守着京東唯一的進京要道——京津公路。所以，這個機場還有一些運輸補給的任務。在中共幾十年的統治中，許多不為人知的秘密飛行都是由這個機場執行的。

當天黃昏，王洪文從釣魚台十一號樓打來電話，通知吳忠照原計劃執行。隨即，全體機組人員和吳、張等人全部守候在「七二二五」號飛機旁，發動機啟動，進入待飛階段。

與此同時，守候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大門口的中外記者和幾千名知悉消息的老百姓，時刻注視着院內的動靜，大批便衣混入人群中，因為大陸公安部獲悉有人要劫持骨灰。六點四十分，只見一輛「奔馳」高級轎車在五輛公安摩托警車的引導下，駛出文化宮大門，經過天安門廣場，沿着長安街向西開去。成群的記者們立刻驅車尾隨而去，無數騎自行車的人也拼命追趕着。當門口的人均追車走遠後，文化宮的

大門再次打開，從裡面又駛出幾輛破舊的「二軍用吉普車」，在沒人注意的情況下，沿着長安街向東駛去，幾輛偽裝的警察車輛尾隨在後。

十九點五十分，這幾輛吉普車駛抵三間房機場，以特別通行證，直接開到「七二二五」號飛機旁。暮色中，從車上走下六個人，匆匆走向飛機，抱着四包長約三十公分，寬二十公分的白布口袋，在眾人注視下送上飛機，扔到農藥槽裡。二十點十五分，飛機在吳忠揮手下起飛向北衝去。

機長胥從煥根據剛剛由送骨灰人帶來的王洪文的手令，在飛經雲水庫上空時，將飛機

下降到五百米高度，拉動農藥播撒把手，四包東西一齊墜入茫茫百里的密雲水庫中，把周恩來的遺願喂魚去了。隨後，飛機按原訂飛行圖，經天津、北鎮，再飛回通縣上空，三十分鐘後降落三間房機場，完成了他們已經習慣了的「特殊使命」。夜八點整，機場招待所小餐廳裡杯盤狼籍，軍人們以軍人的粗獷喝得東西倒西歪，醉成一團。而同一時刻，王洪文正身穿睡袍欣賞着柯湘（京劇「杜鵑山」女主角）的溫柔的清唱，……

這就是有關周恩來骨灰處理的真實內幕，不知周公在天之靈該如何作想。

中國大陸最惠國待遇風波

在美國是否要繼續延長中國大陸最惠國待遇的問題上，海外華人分成了兩大派：取消派和給與派，本文綜述了各種不同立場的人的不同看法。

鄭源

取消派和給與派

最近，布什總統關於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的決定引起海外華人的關注。在這個問題上，各種不同意見產生了激烈的爭論。六四之後，海外華人曾表現出驚人的同仇敵愾，在道義上譴責中共，幾乎沒有人持有異議，可是一牽涉到實質性的問題，他們的態度就產生了極大的分歧。

對於是否繼續給與中國最惠國待遇，海外華人基本上可以分為四種立場：

第一是希望美國無條件取消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作為對中共六四殺人罪惡的懲罰，以及對中共至今拒絕釋放所有政治犯，拒絕改善大陸人權狀況的一個制裁。這一立場的基本着眼點在於借外部的壓力促使大陸經濟走向崩潰，加速中共政權的倒塌和民主運動的進程。

第二是建議美國政府有條件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即在決定取消的基礎上向中共提出最後通牒式的條件，包括釋放所有政治犯，公佈六四期間死亡名單等，只有當中共滿足這些條件後，才能繼續恢復其最惠國待遇。此種立場的着眼點是把最惠國待遇作為一個討價還價的槓桿，迫使中共在高壓下讓步。

第三是建議美國政府有條件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即今年暫時先給與，但附帶改善國內人權狀況的條件，如果中共在今年一年期中未能滿足這些條件，則明年再考慮取消其最惠國待遇。這一立場同樣着眼於將最惠國待遇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但給中共方面留有時間上的餘地和下台的台階，以便促使中共內部的分化，給黨內開明派一個反攻的機會。

第四是無條件繼續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着

眼於讓中國大陸繼續保持對外開放的勢頭，通過市場因素和自由化思潮長期淺移默化的滲透，推動大陸民主化的進程。

也有人把上述四種觀點簡化分為「取消派」和「給與派」，他們認為，中共一向把面子看得很重，絕對不會接受任何城下之盟，所以有條件取消最後的結果將和無條件取消沒什麼差別，同樣，無條件延長的表達並不準確，因為既使沒發生六四屠殺事件，美國給與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也不是毫無條件的，也是帶有某些人權條件的，歸根結底還是有條件給。除了在道義上就支持中共殺人捕人的極少數死硬左派，一般海外華人都反對給延長最惠國待遇附加人權條件，只不過大家在附加條件的鬆緊問題上有所分歧。

不同階層不同傾向

從海外華人的構成來看，大陸留學生大部份傾向於取消派。不久前在國會作證的大陸留學生代表裴敏新稱，據他所做調查統計，反對取消的留學生只佔百分之六，而絕大部份留學生傾向取消。但有的留學生認為，這一比例估計偏高，很多留學生內心希望有條件取消或有條件給與，但他們懷着「漫天要價坐地還錢」的心理，口裡喊的總要依次比心裡想的高一個階次。不過由於學自聯組織的影響，留學生作為一個整體的聲音似乎是偏向反對布什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的。

華僑中知識界的傾向大約和留學生相似，然而商界卻幾乎一邊倒向給與派，這很顯然是和他們的利益所在有關。中國一旦喪失在美國的最惠國待遇，很多涉足大陸貿易的華僑商人都會遭受重大損失，甚至破產。同時，中國失去在美最惠國待遇對香港轉口貿易是一個致命打擊，從而危及整個香港經濟的繁榮。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了在美的香港移民和與香港有貿易關係的華商的態度。毫無疑問，華僑商界中的大部份人內心並不喜歡中共政權，不過道義是一回事，利益又是另一回事，兩者不能混為一談。

除了少數和大陸有經濟和政治利益的留學生外，在留學生中明顯傾向給與派的許多是親身參加過大陸經濟改革的人，相對於那些出國較早或直接走出校門的留學生，他們認為自己能更深刻地了解國際市場因素對大陸經濟政治變革的意義，從而更傾向於長期和漸進演變而非急功近利的激烈手段。

在美國國內，政界和商界傾向給與派，其主要擔心中共會在此壓力下關上國門，同時擔心宿敵日本人會乘虛而入佔領中國市場，而人權組織和勞工團體則傾向於取消派，前者自然是出於道義原則，而後者則採取傳統的立場，維護美國國內的勞工就業不受中國廉價勞力的衝擊。

人權原則和民族前途

最惠國待遇一案之所以引起如此風波是因為它的涉及面錯綜複雜，它涉及美國的對華政策，美國的國內政治，人權的統一標準，僑界的經濟利益，中國大陸的國內政治，和整個世界的貿易格局。

取消的基本出發點是人權和道義。其主要論點如下：

一、美國在最初給與中國最惠國待遇時就是附有人權條件的。六四之後的中共顯然已經嚴重違反了基本的人權標準，如果美國政府仍一如既往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那就無疑等於放棄了自由國家的基本原則。正如封從德在國會做證時呼籲：人權高於商業，希望美國政府不要為商業利益而放棄了人權原則。

二、鄧小平在六四後揚言：「不要怕西方的輿論，他們還會回來找我們的市場。對於中共的這種死硬態度，美國如果仍繼續延長其最惠國待遇，等於向中共專制者發出一個錯誤的信號：他們今後可以為所欲為不受懲罰。」

三、美國也曾經以違反人權標準為理由對蘇聯和南非進行過經濟制裁，如果對於中共今天更為嚴重的踐踏人權行為不予制裁的話，無疑等於承認了世界上存在着雙重人權標準，或中國應該有低一級的人權標準。

四、最惠國待遇的重審，幾乎是西方手中制裁中共的最後一道王牌了，從最近中共表面軟化的態度看，中共當局深知這一優惠待遇對於其面臨崩潰的經濟之意義，這一待遇一旦失去，中國出口美國的平均關稅就會從百分之十五左右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左右。整個外貿的直接和間接損失估計可達七十億到一百億美元的外匯收入。所以中共當前也很緊張地關注美國的舉動。如果這一有利的槓桿不用的話，就再沒有什麼更有利的武器可以使中共就範了。

給與派的基本考慮是民族（當然也包括僑界）長遠利益和中國政局的發展方向。其主要論點為：

一、如果這一來自外部的壓力不足以一舉壓垮專制政權或這個政權中的強硬派的話，就不得不考慮它所造成的副作用是否會阻礙整個社會的前進，哪怕這一步前進的步伐是多麼緩慢。從十年改革的經驗來看，對外開放對中國政治改革的寬鬆環境起了相當大的催化作用。萬一中共在外部的壓力下重新回到閉關鎖國自力更生的道路上去，那麼民主化的進程不但會加速反而會放慢。

二、中國和南非不同，對南非制裁首當其衝的受損者是有錢的白人，他們恰恰是種族壓迫者。而對中國制裁首當其衝的受害者是沿海地方政府和進入世界市場的沿海企業，他們恰恰是今天中國殘存的市場化因素和改革堡壘。像廣東、福建、江蘇、遼寧等沿海地區之所以在不同程度上敢於游離於中

央政府的政令正是因為它們在不同程度上依靠世界市場而不是中央計劃。如果經濟制裁切斷了大陸沿海地區和世界市場的紐帶，使它們失去相對獨立的實力，那它們就不得不重新屈服於強硬派主導的中央政府了。

三、中國大陸現在正處在美國市場的門坎上，它很快就有可能進入這個世界最大的市場，佔領亞洲四小龍產品升級後空出的相當一部份市場份額。可是此時的經濟制裁有可能使中國錯過這個時機，永遠地留在門坎之外。一旦中國被擋在門外，原來屬於它的市場份額將會被一批比中國低一個檔次的國家填滿，如巴基斯坦、孟加拉、馬來西亞、印尼等等，在加上改革後的東歐，其總人口相當於中國的沿海地區。在這些地區，勞動密集產業將長盛不衰，中國大陸等亞洲四小龍的下一班車用了十到二十年，再等這些人口大國的下一班車可能遙遙無期。既使中國在這段時期得到了民主，這個進入世界市場的時機也不可復得了。美國在這個關鍵時刻的制裁，不但打擊了中共當局，同時也有可能損害整個民族的長遠利益。

四、在對中國經濟有影響力的大國中，美國還是對人權比較重視的國家，所以經濟制裁這把劍懸在頭頂還是有威懾力。可是如果美國和中國搞僵而把這一影響力讓給唯利是圖的日本，就等於放棄了能夠制衡中共的潛在槓桿。

不可以此畫綫分左右

鑒於六四之後海外華人基於反對中共專制政權原則上形成的統一戰綫在最惠國待遇的問題上出現裂痕，一些人正在以此畫綫來區分左派和右派。其實，在一個民主社會中，存在不同觀點的爭議並不奇怪。不同的利益結構及不同觀察問題的角度，都會導致人們不同的主張。因此不能簡單地判定給與派都是支持中共踐踏人權，都是在毒化輿論和誤導美國決策。同樣不能武斷地指責取消派頭腦簡單目光短淺，既使中共最終能得到最惠國待遇，也不能毫無阻擋輕而易舉地到手。一個強烈的反對聲音無論如何都是必要的，它告訴中共踐踏人權是要付出代價的。不過歸根結底，美國制定其政策的主要依據還是其國家利益，海外華人所能做到的只是把自己的真實想法和利益說出來，其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美國的決策，並不取決於華人討價還價的手段。◆

能發達，而在中國大陸蹉跎終生也無出頭之日。

我深信金無怠這些話出自真衷。直到後來，他的間諜身份被公之於世後，我也沒有改變這一看法。他並非因信仰共產主義才為中共效命。據我事後回憶他的全部言行，分析此人的個性及經歷，我認為金無怠是為了撈取大筆外快才投靠中共的，而且，這種冒險生涯極大地滿足了其虛榮心，讓他覺得自己並非無足輕重的土豆，而是對美中兩國關係產生重大影響的神秘人物。

我認識金無怠時，他已是個無所事事的閑人。他從不提及當初在政府機構供職的往事，只說自己是一名普通譯員。

金無怠送我一套「五洲美語會話」，並且教我開車，以適應美國生活。考駕照也是他帶我去的，他先指導我在考場附近轉了半天，熟悉路徑，因而順利通過。

我和金無怠的密切往來引起了他太太的醋意。終於有一天，我接到一個陌生女人的電話，她自稱是金太太。她說近幾個月電話帳單上出現我的電話號碼，金無怠幾乎每天都要打一個小時的長途電話，究竟你們之間有什麼事情？

我答說：「沒有什麼事情。」

金太太：「他不是教你學開車？」

我含糊了一下：「唔，沒……」我也覺得有些別扭：考駕照那天，金無怠一直坐在外面等候，沒吃飯也沒喝水。還是我出來後給他買了一客披薩充飢。

金太太冷笑了一聲：「哼，沒有？那為什麼他在車子上加了個坐墊？」

這的確是個破綻——我個子較矮，金無怠為照顧我學車特地加了個坐墊。

我一時無話。

金太太在那邊緩緩嘆了口氣說：「我不希望這是另一個故事的開始。你知道他和×太太（指我舅母）的故事嗎？」

我誠實地答說不知道。

金太太：「你年紀尚輕，不瞭解美國社會……」她沒有把話說完。

事後，金無怠得知這次不愉快的談話時，滿臉苦笑。他依然維持其英國紳士的風度，聳聳肩膀，娓娓訴說其妻的千般不是，透露他早有分居的打算，這一回真正忍無可忍。

不久，金無怠真的與其妻分居，獨自遷往弗吉尼亞的另一個小鎮。那是十幾層的普通公寓裡一個二房一廳的單位。他把一臥房租出去，自住一間小房，與租客合用客廳、廚房、洗手間。總之，這個住所很不舒適。

此後，金無怠每日從這裡打電話給我，暢所欲言。我隨他玩過包括經吉尼亞動物園在內的幾處名勝，也去過他的上述棲身之所。

現在回憶起來，如果說金無怠與電影中的間諜有何相似之處的話，那就是他帶我進入這幢大樓時，顯得有些緊張，急促地低聲道：「快走，別讓人家看到。」不像是僅僅畏懼人言。

我一進屋，金無怠便打開錄相機。全是變態性魔錄影帶，如人與豬、狗、馬、牛、騾性交的慢鏡頭等等。他問我有何感想，我答說無所謂。我問他：「你會不會把這些放給你女兒看？」他淡然一笑：「當然會。」……

過了不久，中國大陸吉林省一個歌舞團訪問華盛頓，我弄了兩張票邀他觀看演出，他以太忙為藉口推掉了，我很不悅。幾天後，我的洋老板扔給我一份報紙：「看看吧，你那位朋友是間諜！」……晴天霹靂！

後來各種中西新聞媒體爭先報導「金無怠事件」，後來他在獄中自殺了。「金無怠熱」也隨之消失。

「H」始終沒有找過我。我想，他們分析了我們的全部談話錄音，認為無此必要吧。

隨着時間的流逝，金無怠在我的記憶中淡化了。偶然想起他，總有一個問號閃在心頭：「金無怠在獄中以垃圾袋自殺之際，會不會想到我呢？……」▲

中國之春 月刊

姓名：英文 _____ 中文 _____

地址：英文 _____

中文 _____

寄上 _____ 幣 _____ 元，訂閱由 _____ 年 _____ 月（總 _____ 期）開始。

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

北美地區：P.O. BOX 701400 FLUSHING NY 11370-9998

歐洲地區：PARISER ST 52 5300 BONN W. GERMANY

港澳及世界其它地區：香港 九龍 廣東道 501號 二樓 4室

訂費（每年）

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區（港、澳地區）

機關：60 美元 200 港幣

普通訂戶：28 美元 96 港幣

學生訂戶：24 美元 84 港幣

除北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另加郵資：航空

加拿大 US\$15

中美洲 US\$25

歐洲、南美洲 US\$35

亞洲、澳洲 US\$45

史良：徒有君子之名

余森

在大陸出版的現代史（「文化大革命」期間除外）中，大部份都提到所謂「七君子事件」，即一九三六年被國府提起公訴的七個文人，如沈鈞儒、史良等。這「七君子」，當時都是親共的，所以被中共出版物渲染為「氣壯山河，與國民黨反動政府堅決鬭爭；義正辭嚴，駁得反動法官體無完膚」等等。這一訴訟，究竟真相如何，我們缺乏歷史資料，只好置而不論。這裡要談的是名列「七君子」之一的史良。

史良親共而反對國民黨，這是個人的政治態度，本來無可厚非。但她是否像中共一度吹噓的那樣，是「一位正直清高的民主人士」，這就頗有可以商榷之處。本文擬舉兩個與她密切有關的實例，供讀者參考。

史良是「中國民主同盟」的創建者之一。一九四七年，「民盟」被國府下令解散，史良等均遭通緝，只得避居香港。但早在「民盟」被解散之前，史良等已組織了一個地下的「華東行動部」，專以編訓地下武裝、策反國府文武官員為務。一九四七年後，這個「行動部」加緊了各方面的活動。當時「行動部」的負責人H，既是國府的高等文官，又因親共而成了地下「民盟」的中央委員，暗中使勁地挖着國府的牆腳。一九四七年底，H策反了駐江蘇高資的國府陸軍團長L。L曾當過H的勤務兵，對老上司一直忠心耿耿。被策反後，經常把部隊裡的好槍報廢，連同H多方張羅來的金錢、藥品等等，偷偷送到由中共領導的太湖游擊隊薛永輝之處。一九四八年底徐州會戰國軍失利後，L的弟弟所部奉令先撤至台灣，L因以前與共軍也交手過，心中多少有點忐忑不安，想隨下一批部隊南遷。H將此報告史良，史良立刻指示：「一定要把L留下。他的部隊將來

可以成為民盟基本武力之一。而且他還可以保護薛永輝使其不致被緝。告訴L：共產黨來了，他只會受到重用，我保證他絕無問題。」就這樣，L拉上他的部隊「起義」了，迎接了「解放」。

中共當然不會讓「民主黨派」擁有自己的武力，L所部很快就被收編，隨後L突然被捕，以「曾在反動軍隊中多年，對人民犯有罪行」為由，判處徒刑七年，家產全部抄沒。L的太太帶了五個兒女跪在H面前求H設法。H只得趕到北平去見史良陳情，以為史良當時是「司法部長」，或許可以向有關方面略述L在一九四九年前為中共出力的情況而爭取到減刑或赦免。那知史良聽了以後說：「人民政府是不冤枉一個好人，不放過一個壞人的。L一定有嚴重的罪行，而且判他七年算是寬大了，一定已經考慮了他以前為黨做的工作。至於減刑赦免，那是絕對不可能的。」H倒也噤若無語，便說L家屬生活無着，自己每月要給他們生活費，希望史良微念前勞，協助解決他們的生計問題。史良說：「我現在是國家幹部，不能接濟反革命家屬。你現在情況還行，就請你包下來算了吧。」H後來對人說：「史良自己不要做人，還搞得我沒面目見人。真沒想到她是這麼個不講信用、無情無義的傢伙。」

反而在一九五二年就因歷史問題遭到了審查。H向辦案人員歷數他為共和民盟所幹的勾當，那知對方說：「我們已向史良瞭解過你。她說你不是民盟中央委員。」這真是個晴天霹靂。H只好出示家藏的民盟秘密會議紀錄，上面赫然寫着：中央委員H。此外，H還保存着史良給他的有關地下工作的秘密指示。這樣，總算勉強過了審查關。

事後，H非常憤慨，又上北平去找史良，問她：「你怎麼對辦案人員說我不是民盟中央委員？」史良說：「我記不清了。」H又問：「四九年前，是你擔保我沒事，我才沒去香港的。如今沒兩年就收拾我了。你的諾言到底還管不管用？」史良竟然回答道：「我真能對你說過那樣的話？好吧，就算我說過。你該明白：馬列主義的原則就是一切都在隨着時間、地點、條件改變着的。我當時擔保你沒事不等於擔保你今後永遠沒事。」H說：「這話你當時幹嗎不說呢？你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攆嗎？」史良倒也無言以對。

H回到家鄉，眼看着政治運動一個個接着搞，而且自己每次都要輪到，覺得時艱方殷，前途茫茫，終於夫婦倆都自殺身死。

有人會說：史良畢竟是個文人，沒有從政經驗，給中共玩弄於股掌之上，被迫說了違心之言，做了違心之事。然而，她是個律師，在國府的法庭上，她可以根據法理，侃侃而談，那麼在中共面前，為什麼就不能據理力爭呢？再說，她對L和H遭受的迫害所作的評論，不僅僅是不負責任，而且也是冷酷無情的。這就不免使人懷疑：她到底是受了中共的蒙蔽呢，還是因為本質關係，樂於接受中共的那一套權術，成爲一個沒有人性，只有黨性(2)的官僚呢？見仁見智，請讀者自己去判斷吧！

中共的報紙曾報導史良晚年加入中共的消息。據說她入黨的確切日期要比報導的早得多，只是礙於她長期擔任民盟主席，不便公開而已。▲

理想主義幼稚病

急於求成，大而化之，自命不凡是理想主義幼稚病的主要症狀，其結果總是回天無力的嘆。

有現實意義的歷史問題

對於中國民運人士而言，九十年代決不是什麼做美夢的十年。艱巨的力量整合任務，困難的國內鬭爭環境以及其他問題都嚴峻地擺在我們的面前，亟待解決。

面對當前國內的混亂局面，海內外民運人士的思路似乎也混亂起來。有人熱衷於搞「兵運」、暴力鬭爭，有人宣稱要「一步到位」，更有人對前途灰心喪氣，不一而足。這種種種思路的出現，從某種意義上說固然也是好事，但它更可能是一件壞事，因為它不僅有礙於民運力量的全面整合和達成共識，也無助於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甚至可能潛伏着某種變異。

毫無疑問，對民運自身隊伍及其策略方針進行省思不失為解決這種思路不清的一個有效辦法。可以說，如果不盡快超越民運的歷史局限，尤其是從種種心理定勢中解脫出來，就無法因應國內的新的鬭爭形勢，也無補於深入檢討過去，尤其是過去十年的經驗教訓。

從這一意義上說，一個很值得重視的問題就是當前民運中的種種急躁、冒進和「想當然」的傾向；無以名之，姑且稱之為「理想主義幼稚病」。在此對這一「病」的「病根」、「病原」、「症狀」等略作分析，以期拋磚引玉之效。

理想主義的歷史根源

在很大程度上，當前中國民運的主導力量是中國知識份子。當前民運中的「理想主義幼稚病」嚴格意義上說也就是中國知識份子的「理想主義幼稚病」。

以文化人作為運動主導力量實質上是近世以來欠發達國家政治革新的基本特點之一。十五至十七世紀間，在當時羽翼未豐的英國，知識份子實際上領導了都鐸王朝、斯圖亞特王朝的君主專制主義的革新及其後立憲君主政治的改造，使不列顛人很快追上了荷蘭、西班牙世界帝國的經濟增長。十八、十九世紀中，德國文化人所發起的「狂飆突進運動」很大意義上促使普魯士走上了政治統一與革新之路，為德意志帝國躍昇為世界列強立下了汗馬功勞。及至十九世紀後期，俄羅斯知識份子所領導的民粹主義運動為沙皇做國晚期的一系列政治改革提供了契機。因此，認識文化人在社會革故鼎新中的角色擔當及其政治使命是富有意義的。

同樣富有意義的是釐清知識份子的社會歷史局限性或者說「幼稚性」。可以說，每一次成功的政治運動（改革抑或革命）無不伴隨着知識份子對社會、尤其是對知識份子自身的深刻甚至痛苦的反省。以列寧為代表的俄國革命

易華

派在十月革命中旗幟鮮明地批判「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知識份子在中國革命中成功地開展了對知識份子自身弱點的不可謂不尖銳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都是例示。

從理論上說，每一次知識份子所領導的政治運動都力圖擺脫和超越這種歷史的局限（運動成功與否確切些說就是這種超越的多寡高下）；但在操作層面上，很多知識人領導的政治改革都因為未能成功地超越自己而歸於失敗了。從歷史的視角來看，知識份子階級在領導政治革新運動方面的最大局限之一便是一「理想主義幼稚病」。他們在同先進國家比較時意識到自己祖國的貧窮落後，而在意識或者潛意識層次上擁抱那些先進國家的物質和精神文明，並視之為自己的理想。他們把力量（如果不是善行的話）同先進國家的各種勢力聯繫在一起，而把虛弱（如果不是邪惡的話）同自己出生的國度相提並論。但他們卻沒有或者不願注意那個理想也同樣不真實，同樣不輝煌盈滿。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知識人用某種「理想主義」的思想去尋找和動員有能力實行變革的社會力量。這也就是知識份子「理想主義幼稚病」的歷史根源。

難解的最優選擇情結



如果說「理想主義幼稚病」導源於知識份子對那個五彩繽紛而又同樣千瘡百孔的理想追求，那麼，中國獨特的社會環境和文化傳統又賦予這種「幼稚病」以「中國特色」。

從文化學角度言，中國文化——心理結構衍生並外化為一個「最優選擇」情結。李澤厚曾論述過「樂」在中國哲學中實際具有的本體論意義，強調中國文化是一種「樂感文化」，頗多精義。事實上，這種對「樂」或「天人合一」的終極關切已在潛意識層面上導致中國人、尤其是文化人以「最高境界」為依歸。在中國歷史上，「大同思想」或「致太平」思想幾乎成了文人學士所普遍追求的一種理想。儒家經典「禮記·禮運」描繪了一幅「大同世界」的藍圖；道家經典「老子」第八十章也勾勒出「一個理想的和諧世界」。由此，中國知識人的哲學、史學、文學諸方面的思考就牢牢地拴在這種「最高境界」及達於這種境界的「最優選擇」上了，至少從審美的角度講是這樣。

基於這種民族文化——心理結構，近世以來的中國知識份子對政治革新的參與表現出一個突出的特徵：對「最優選擇」刻意追求。

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為代表的「洋務派」知識份子於十九世紀中葉發起以小變應大變的「自強運動」，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們滿以為，祇要積極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便可以解決中國的政治、經濟問題，實現其「效法前賢澄清天下之志」。到頭來，他們這一套「最優選擇」却回天乏力，連曾國藩自己也慨嘆其「補救無術，日暮道窮」。

接下來，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在世紀之交力倡維新運動，大力宣傳西學，以補中學之短。他們把西方社會政治與自然科學附會於中國孔孟、王黃及部份佛學經義，構成了一個反對專制、提倡民權的「不中不西」的維新理論，以為這才是中國的「最優選擇」。梁啟超就認為，祇學習「諸國富強之術」並不能救國

，必須就「西洋立國本末兼資」，方可使國家獨立富強。然而，維新派的「濟世良方」又一次被事實證明並不靈驗。維新派大將嚴復不無痛苦地認識到：「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於丁，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着手，庶幾逐漸更新也。」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知識份子也一廂情願地要以西方政治制度（主流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



），通過民主革命改造中國社會，提出「驅逐鞑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主張效法美國和法國。持平而論，孫中山領導的這批革命派文化人進行了相當充分的準備，如政治上宣傳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和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組織上相繼以興中會、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

等動員和整合革命派力量，軍事上則有過聯絡

會黨爭取新軍、策動護國軍起義、組織力量發動護法戰爭及武裝國民革命軍等種種悲壯的努力。不無遺憾的是，革命派知識份子仍未擺脫「最優選擇」的羈絆，幻想以民主共和一勞永逸地解決中國的一切問題，結果他們的種種努力都遭到了失敗。

五四時代倡導封建主義思想徹底決裂、用西方文化再造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知識份子刻意追求「最優選擇」的又一佐證。五四時期中國先進份子滿足於用西方民主主義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來徹底取代中國封建主義的舊思想、舊道德、舊文化，以為這是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社會、政治、經濟諸問題，「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的靈丹妙藥。陳獨秀強調：「國人欲擺脫蒙昧時代，差為賤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魯迅更宣稱：「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而轉為人國。人國既建，乃雄厲無前，屹然獨見於天下。」事實證明，五四時代知識份子的匠心獨具也並沒有使「新文化運動」免於遭受挫折。

固然，他們審視問題的角度、處理問題的途徑不盡相同，甚至判然有別。但有一點却是共同的，即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知識精英都醉心於「最優選擇」而不能自拔，却並不去思考甚至諱言當優化條件無法滿足時的「次優選擇」。這顯然是個思路問題。可以說，中國知識份子傳統上似乎更熱心於在一種「理想」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實踐」各種「最優」的政治設計，而不是針對中國既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的各種「先天不足」做出「次優」的，然而却是更有其現實可能性的選擇。按照新福利經濟學的「次優理論」，在國民經濟的某些部門，由於種種原因，帕累托的最優化三條件往往不能全部地得到滿足，在這種情形下，如果在這些部門中繼續實現其他最優條件是不會對增加社會福利有所裨益的。基於同理，在既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對「最優選擇」的孤詣往往並不能使

自己在一場政治運動（政治革命或革新）中穩操勝券。每一場政治運動都是一個綜合的社會工作，形成爲各種政治力量、內在因素乃至偶發事件的複雜組合；任何「以不變應萬變」的企圖都是不足爲訓的。因此，可取的辦法似乎是審慎應對各種主客觀條件，爭取「最可能的最好」，而不是「最好的可能」。不無諷刺的是，五四運動七十週年紀念時最熱門的話題之一就是：「民主」、「科學」。這些口號七十年前就提出了，可時至今日我們還要爲實現這兩個目標而付出艱辛的努力。如果說這意味着五四時代知識精英的偉大，那它同樣意味着他們的不偉大——他們仍未超越中國知識份子的歷史局限，沒有擺脫「最優選擇」的思維定勢。

見好不收和見收不好

近十年來，國內奉行改革、開放政策，政治環境無疑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言必稱「參與」、「民主」、「透明度」等似乎成了一種時尚。在這種新的形勢下，國內文化人的政治參與熱情也急劇高漲。從魏京生、徐文立、王希哲、胡平等到「北京之春」到八〇年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校的人民代表競選，從八六年底全國範圍的學生運動到震驚中外的「八九民運」，以知識份子（包括準知識份子）爲主導力量的政治運動一浪高過一浪。

平心而論，這些爭取民主的政治運動聲勢不可謂不浩大，影響不可謂不宏遠。然而，無遺憾的是，它們留下的遺產却似乎並不多，甚至可以說，每次運動都有某種浮光掠影的性質，以至每一次新的政治運動都不能不一切從頭做起。

自然，這種「浮光掠影」現象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如中共保守勢力的猖狂反撲，低度的社會動員等。然而，知識份子的「理想主義幼稚病」無疑才是造成這一場接一場運動失利、遺產流失的內在因素。道理很簡單，中共保

守派力量的負隅頑抗及水平有限的社會動員等固然對目標的實現造成一定的妨礙，但知識份子仍可以不失時機地進行一場「有限戰爭」並穩操勝券。如八五年北京高校學生圍繞中日外交中的許多錯誤傾向而進行的「九一八運動」便成功地把握住了「中日邦交」這一有限目標，從而造成了有利的社會反響，並直接導致了一九八六年中國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

可悲的是，在大多數情況下，知識份子的政治運動目標太過籠統、龐雜和不明確，大有通過一場政治運動解決中國一切問題之勢。這就不僅不能根據自己的「兵力」，把握有利「戰機」進行一場乾淨利落的「有限戰爭」，反倒造成自暴其短、坐失良機的被動局面。如「西單民主牆」運動時，知識份子提出的政治目標包括「第五個現代化」（魏京生）、「人權」（任曉町）等，既龐大又籠統，「戰線」過長，不能有效地整合民運的力量。胡平曾有感於「民主牆」策略失當：「大多數參與者對當時形勢的特點缺乏冷靜而周詳的思考，對於我們在現階段的基本目標沒有明確、準確的共同認識」，頗發人深省。其次的歷次民運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暴露出這種目標過大、力量分散的致命性弱點，致使民運不能把握「戰機」，整合力量，進行一場場「重點進攻」，然後相機擴大戰果，而是一味「全面出擊」，幻想民主化可以一蹴而就；即使有了一定的戰果，運動也不是着眼於如何鞏固戰果，而是一味盲目冒進，致使已有的戰果也葬送淨盡。這樣，每一次民運基本上呈現爲一個「見好不見收」——「見收不見好」的怪圈。運動與運動之間很少有某種先後傳承關係，而表現出一個個巨大的歷史斷層，教訓不可謂不深刻。

超越歷史還是被歷史超越

所謂「理想主義幼稚病」在當前民運中的主要表現，舉其要者，可大分爲三：

一、急於求成——基於某種「憂患意識」（這是孔子以降中國文化人的共同特徵之一），知識界往往對國家、對民族表現出一種過於急迫的「介入」。這一方面造成知識人的功能性思維定勢和急功近利的「弱者心理」，另一方面也積澱爲一種急於大見成效的焦灼不寧，導致短期行爲、投機贖營等極端功利主義的氾濫。

二、大而化之——自來中國文化人就有「簡約」的傳統，毋寧更欣賞全局性的整體思維和直觀把握，滿足於「粗線條」的清談、空論，所謂「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時下知識人也未能脫俗，似乎更醉心於尋求一個「一勞永逸」的解決問題的辦法，滿足於「一步到位」式的玄想，不耐於做些切實實實的個案分析和艱苦認真的實證研究，表現爲左傾盲動主義。三、自命不凡——由於中國教育不普及，文化反差極大，加之儒家文化造就的「學歷社會」，知識份子往往難免有某種不健康的自我優越感，沾沾自喜於「爲民請命」，却沒有或很少對自己進行無情的批評和反省。一些呼籲民主者自身亦無民主訓練，反倒對「家長統治」、「宮廷政治」之類無師自通。更有甚者，一些知識人思想大於行動，感性重於理性，「述而不作」，華而不實。

凡此種種「理想主義幼稚病」或可從一個側面表明，目下的民運恐怕尚處在一個轉型階段，無論是民運隊伍的自身建設抑或理論準備均嫌不足，任何盲目的樂觀都是不切實際的。西漢賈誼曾慨嘆：「亡六國者，非秦，乃六國也」。在某種意義上，這個邏輯似乎也適用於當今中國民運；我們的最大敵人或許正是我們自己。祇有我們努力克服自身的弱點，深刻反省自己，才可能在新的運動中贏得一場接一場「有限戰爭」的勝利；否則，重演當年洋務運動或戊戌變法式的歷史悲劇也是不可能的。是我們超越歷史，還是歷史超越我們？這個問題正尖銳地擺在我們的面前。

＊

走出毛澤東的怪圈

正信

中國旅美畫家張宏圖去年在紐約畫展中，曾以十二幅毛澤東的畫像為題材，其中一幅是：將毛的頭面挖空，填入一幅吾爾開希手持話筒高呼口號的圖片。有人看到這幅畫時誤認為「這是吾爾開希所代表的這一代人對毛的反抗。」但畫家本人却不以為然，他告訴人們，這幅畫的原意是，「毛的下一代起來反叛，仍擺脫不了毛的框框，走不出『毛澤東怪圈』。」這句話說得何等深刻！它完全一針見血地道出了中國大陸民主運動屢遭失敗的根本原因。然而，海外眾多民運精英人士在「六四」將近周年之際，反復權衡八九民運的得失，總結其受挫遭敗的經驗教訓之時，却往往忽視了這麼重要的一點。

在此筆者不得不對胡平先生「對八九民運的反思」一文提出質疑。在這篇洋洋數萬言的文章中，胡平以縝密的分析反復論證了他對八九民運的觀點，那就是：民運人士中存在着過度的浪漫主義情調而缺乏強烈的功利意識，不能「見好就收」，因而導致了八九民運的受挫。根據筆者幾個月與海外民運人士的接觸，發現胡的觀點具有相當程度的代表性。可是，我却不敢苟同這一看法，反而認為，八九民運之所以受挫，是因為民運的組織者、推動者和參與者具有太強烈的功利主義的意識。不是嗎？「樹倒猢猻散，牆倒眾人推。」「見好就上，見壞就收」，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具有如此心態，難道不是內心功利主義之便然？這也正是使柴玲深感悲哀，發出「中國人，我不值得為你奮鬥，為你獻身」的抱怨之原因。

我們知道，所謂堅信馬克思唯物主義辯證法的中國共產黨人，實際上就是做頭徹尾的功利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他們除了嗜權如命之外，再沒有什麼可以堅持的原則。對於一個謊言和暴力的政權，除了向它妥協、認同它或者公開地反對它（不一定非要以激進革命的手段），暴露其虛說本質之外，我們還有什麼選擇呢？當中共「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時，為什麼我們不敢旗幟鮮明地反對專制和謊言呢？靠著打著紅旗反紅旗，自欺欺人地在擁護共產黨的旗幟下要求民主，無異於緣木求魚，這樣的民主改革，仍舊是處在向謊言妥協和認同的大前提之下。民運人士一方面羞羞答答地不敢亮出自己的政治主張，另一方面也給了對手名正言順地將其鎮壓下去的藉口，因為你已經首先認同了它的合法性。在這裡，一切所謂的鬪爭藝術、策略與智慧，統統不過是如何以謊言來對抗謊言的手段而已。當赤身露體的皇帝在大街上耀武揚威時，我相信那些最懂得鬪爭藝術的人正在對皇帝的新衣讚不絕口呢！因此，如果說八九民運本身僅僅是一場民主改革運動，那它早就為自己的失敗划上了句號。

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是中共歷來信守不渝的法寶，其在實踐中應用，就是只顧目的而不擇手段。他們有時用胡羅卜，有時用大棒，有時則同時使用，而目的只有一個，即如果維護他們的統治。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以坦克和機槍殘殺平民學生而毫無愧色。

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用共產黨使用的法寶去對付他們呢？「西遊記」中那段「火焰山」的故事，應該對我們有收啟發：孫悟空欲強借芭蕉仙扇，却被鐵扇公主一扇搗到了十萬八千里之外；後唯用妙計賺得芭蕉扇，遇上鐵扇公主來奪時，想效其法煽飛鐵扇公主，却奈何她不得，因為她對自己的法寶瞭如指掌，應對自如。

民運人士反叛毛澤東却走不出「毛澤東怪圈」，反對共產黨却跳不出共產黨的框框，以致於中國民運一直無法逃脫以失敗告終的悲劇命運，其原因在於民運人士自身的先天性局限。我們看到，天安門廣場上的民運人士一方面以大無畏的精神氣概，擺出了似乎要與獨裁專制者決一死戰的姿態，另一方面又表現了極端的功利主義，急功近利，見風使舵，不但從未提出從根本上暴露謊言專制政權的口號，反而畏首畏尾，深怕留給當局者鎮壓的口實，甚至死到臨頭還要引吭高歌認同共產黨的「國際歌」，彷彿自己就是從容就義的共產黨人，這怎不令人扼腕長嘆？上一期「中國之春」少君的「中國知識份子的誤區」對此有很好的概括，他指出：「四十年共產統治下的大陸知識份子，雖然早已看穿了共產主義那套騙人的把戲，却從來不敢對其制度本身提出挑戰。」

另外，從胡文中羅列的種種廣場上的學生之失誤，到六四前後海外民運團體山頭林立，各自為政等現象，都足以讓民運人士好好對自身民主化的局限作一反省。從去年「中國之春

「論民聯內訌的文章中，筆者雖然很佩服其勇於自我曝露的勇氣，却深深感到，這個民運團體領導層中的某些人在排斥異己上，與毛澤東歷來的做法如出一轍，這是值得我們認真思索一番的。」

這一幕幕雖然那是那麼令人痛心疾首，可嘆的是，很少有人願意將犀利的刀鋒對準自己，剖析一下自己的心靈深處。（在這裡，筆者不得不由衷地讚嘆劉曉波先生，因為只有他才配稱為中國的知識份子！）事實上，民運人士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喝共產黨奶水長大的，「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其處世為人的觀點法則，無不深受四十年共產黨灌輸教育的影響，以致於他們在揚棄了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之後，却堅持了其實用主義的方法論。難怪有些國外記者在目睹了當時天安門廣場的情景後評論說，天安門廣場上學生們自己建立的制度，和他們正在反對的那一套十分相像。其實這就是問題癥結之所在。

大陸留學生王左峰在「站起來，中國人，推倒你心中那堵『柏林牆』」那篇文章中寫道：「如果你不敢承認自己是反對中共獨裁統治的，那你就是承認它統治的合法性，只有乖乖地受其宰割，甚至還樂此不疲，從民主專業的發展來看，也只有徹底摧毀這種認同感，才能抽去中共獨裁統治的合法性。事實正是如此，天安門廣場上數百萬之眾的人，僅僅是人海，而不是洪流。隨著蛋壳中的油漆甩向天安門城樓上高懸的老毛畫像，孩子終於喊出了「皇帝並沒有穿衣服呀！」那石破天驚的第一聲，可是，害怕遭到皇帝懲罰的人們，却搗上了孩子的口，將其扭送到公安局了。悲哉，可憐的中國人，何時才能鼓起勇氣從謊言的迷霧中走出來呢？」

胡平先生在文中將民運機械地劃分為「民主改革」和「激進革命」這兩種類型，這是有失偏頗的。民主改革是在認同專制的大前提下進行的，激進革命則相反。然而不認同專制獨

裁則不一定非要用激進革命的手段不可。王左峰文開頭就以這一暴君人民不變真理為引：「……我並不要求你用雙手去推翻它，但只要你不支持它，於是你就會看到，就像一個龐然大物被抽去了支持，它將因自身的重量而跌得粉碎。」「JUST SAY NO TO COMMUNISM」這就足夠了。這也正是東歐多數共產黨的政權在不流血的情形下垮台給我們的啟示。激進革命所帶來的負面效果，當然不應忽視。當民衆一旦被逼上梁山，只能用暴力來摧毀暴力時，如何避免重蹈覆轍，則是民運人士首要關注的。

最後也想談談關於八九民運成敗的問題。誠如胡文開頭所指出的，「從歷史學家的角度總結八九民運，也許為時尚早」。然而，只有從八九民運受挫的結局，我們才真正看到了三年前四五運動的失敗。因為那場運動的失敗不在於當時被慘遭鎮壓，而在於在四人幫垮台、四五運動被平反之後，人們誤以為這場運動是勝利了。

歷史就是這麼無情。時間向前推移了十三年，但中國人又一次在同一個地方倒下了，而這一次倒得更多、更慘。試想想，假如事情真的按照人們意願中那個「鄧死，李傷，楊逃」的謊言那樣發展，或者今天北京在又一場政變中趙紫陽重新上台，平反「六四」慘案，優恤烈士家屬，我們就能說八九民運成功了嗎？焉知若干年後的趙紫陽不會取代鄧小平今天的角色，就像鄧小平今天取代毛澤東當年的角色一樣？

八九民運是成功還是失敗，六四死難烈士的鮮血是否白流，取決我們今天是否從中汲取到正確的教訓。要避免歷史重蹈覆轍，使中國人民不再繼續在謊言的迷霧和專制的鐵幕中兜圈子，我們自己應當首先衝破「毛澤東怪圈」，從思想和行為上徹底摧毀對共產專制本質的認同感，義無反顧地追求真理，以真理來對抗謊言與暴力。▲

「六四」之聲廣播電台

六四之聲從一九八九年九月三十日起一直向中國大陸播音，時間和頻率如下：

北京時間	0:30--2:30	6:15--8:20	10:15--11:40	14:15--16:00	17:15--17:55	18:30--21:00
中波 [千赫]	603; 750 900; 1000	747; 900 1098	900	750; 900 1100	900	603; 750 900; 1100
短波 [千赫]	7150; 7250 11905	7150; 7250 11905	7250	7150; 7250 11905	7150 11905	7150; 7250 11905

從一九九零年二月二十日起，為進一步加強對大陸播音，六四之聲又加設以下定時定頻播音：
每天北京時間清晨5:00-6:00點，短波15280千赫。

六四之聲正在為打破中共新聞封鎖，增強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信心發揮重要作用。

來稿捐款請寄：P.O. BOX 15-7939 CHICAGO, IL 60615 支票抬頭：CHINA CRISIS

電話：(312) 288-6320 電傳：(312) 288-6840

六四省悟：爲文革造反派翻案

我像雨果筆下一八八九年法國大革命和英國大革命的遺孤一樣，我的靈魂永遠屬於文革中的造反派運動。革命死了，革命萬歲。

楊小凱

對文革的評價大有爭議

「六四」大屠殺爲中國人民和全世界的中國問題專家提供了一個極好的重新反省文化革命的機會。但是至今我們沒有看到這方面的好文章。我終於按捺不住寫下此文專門討論「六四」大屠殺與「文革」的關係。

西方中國問題專家對文革的主流看法有過一次大變化。先是有以費正清爲代表的學者對文革的正面評價。有幾位親見和經歷了「一月革命」和造反派運動的西方學者告訴全世界，那段時間，中國人民真的享有政治結社自由，可以自由选择或參加互相敵對派別中的任何一派。一月革命前工人運動中的經濟要求（所謂經濟主義妖風）與西方的工會運動也沒有差別。他們興奮地發現，這是一次真正的造反，是種破壞斯大林式官僚體制的嘗試。

四人幫垮台之後，全世界漢學家開始一邊倒地附和中國官方關於文革的新觀點。「文革是場毫無意義的災難，是極左路線，文革悲劇是毛澤東和造反派的惡意造成的」。中國絕大多數自由派知識份子，像巴金和嚴家其也都附和這種對文革的官方解釋。只有廣州的民主派人士劉國凱和我一直對這種官方觀點持批判態度。一九八六年文革二十週年時，我自己寫了篇文章以習廣（我的原名「曦光」的借音）在

知識份子雜誌上發表，大致批判了官方的文章觀點。我後來有幸讀到阿妮達·陳的幾本書，發覺還有少數西方中國問題專家與我對文革有相同的觀點。像劉國凱一樣，我們對文革中的造反派運動給以相當正面的評價。這一觀點與「六四」大屠殺有關的關鍵先是：文革中的動亂產生的根源並不是毛澤東和造反派的惡意，而是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鎮壓結社自由，迫害不同政見者所激起的民憤。

毛澤東與造反派的關係

我們知道，文革不是農民運動，而是現代市民運動，文革中積極造反的人都是市民中對共產黨不滿的人。這一點與「六四」大屠殺的關係從鄧小平派對六四事件的看法就可看清。官方的宣傳把學生運動與文革相比，儘管八九民運的意識形態與文革時的學生很不一樣，但相同之處是非常明顯的。文革初期批鄧拓時，中國的市民大多數採取隔岸觀火的態度。而真正觸及靈魂的第一件事是毛澤東六月初離開北京後，北京中學裡出現的共產黨之外的非法結社。他們自稱紅衛兵或紅旗小組。劉少奇、鄧小平仿照共產黨的慣例，馬上把這些組織打成非法或反革命組織，加以取締。

而毛澤東做的第一件觸及市民（學生）靈

魂的事，是宣佈學生有結社權，爲被打成反革命的非法結社平了反，並親自戴上了「非法組織」的袖章。這件事是完全違反共產黨體制傳統的。記得此事發生時，各地的黨委書記都一口咬定毛澤東是「受了反革命份子的騙」。

此事奇特之處可能在於，毛澤東直至下決心支持「非法結社」前，用盡了所有傳統的共產黨手法，企圖從他的政敵劉少奇手中奪回實權。但這些手法全不靈，全被劉少奇、鄧小平接過去用來加強了他們的實權。後來毛澤東發覺，支持結社自由可能是共產黨官僚無法接過去的一張政治牌，他這個一貫鎮壓「反革命組織」的人終於冒險走出了支持結社自由這一步。

結社自由成爲既成事實後，全國各種各樣的紅衛兵組織一幟而起。劉少奇派的人也出面或支持其子女、骨幹組織起親共產黨的組織，（但不是共產黨招牌）。他們自稱赤衛隊、紅色政權保衛軍。他們積極從事抄家破四舊的活動，但真正的政治功能卻是鎮壓共產黨的政敵。一些反對各地黨委的學生和工人被這些組織包圍和毆打，有人還被專政機關逮捕。他們的意識形態可以用譚力夫極力鼓吹，鄧小平公開支持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來代表。鄧小平用「高幹子弟要掌權」的許諾來控制新的非共產黨保守政治組織。

毛澤東發現他的結社自由牌又被鄧小平接過去了。在鄧小平的支持下，這些高幹子弟紅衛兵到處迫害出身不好的人，把黑七類活活打死，用開水燙死，不准出身不好的學生串連，不准他們參加紅衛兵。這種法西斯暴行激起市民階層中出身不好和對共產黨不滿的人的極大不滿。毛澤東看準這張民意牌，於是公開支持與保守派紅衛兵對抗的造反派。讓人民日報發社論，譴責充當各級黨委打手的赤衛隊，毛澤東自己公開表態支持造反派，聲稱「造反派是歷年來被當權派壓制的人，對當權派的問題看得清，保守派歷來是當權派的親信，缺乏獨立思考」。

一九六六年十月，毛澤東公開支持非學生的市民自組造反派組織。這些組織已具政黨形態，組織結構與共產黨類似，有宣傳部、政治部、組織部。特別是其跨行業和跨省市特徵，已與政黨沒有差別。以我的故鄉湖南而言，中學的語文教師葉冬初文革初被當權派打成黑鬼受盡侮辱。八月份他支持造反派學生，又被省委打成反革命。於是上北京告狀，在北京與告狀的工人聯合成立了湖南第一個跨行業、跨地區的政黨形組織「湘江風雷」。這個組織以反政治迫害為訴求，成員在兩個月內就超過了本地的共產黨員人數，得到市民的普遍同情和支持。這類政治組織大概是共產黨國家最早的合法非共產黨群眾性政治結社，它包括相當獨立的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

這類組織的訴求有兩方面。政治上，他們要求當權派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抄共產黨的人事檔案材料，甚至抄到省委和軍區的要機關。經濟上，他們提出一般西方工會類似的要求，要當權派調節一九六四年以來凍結的級別、工資、福利待遇。這被毛澤東說成是走資派搞的經濟主義妖風，其實這是真正的獨立的工人運動。

一九六七年二月，周恩來再也按捺不住，提醒毛澤東「全國性組織像政黨一樣出現了」

，並催促毛澤東下決心鎮壓自由結社（當然親共產黨的保守派不在鎮壓之列）。周恩來提醒了毛澤東的共產黨本性，使他終於下決心在全國鎮壓造反派（反革命）。由軍隊出面，每個省的主要造反派組織全被打成反革命組織，全國大約關押了幾百萬人。老人們回憶，比當年鎮壓反革命的行動規模都要大。這次鎮壓像六四事件。我記得湖南抓人時，滿街市民與軍隊對抗，軍車被推翻，廣播中央鎮反命令的廣播台被憤怒的市民砸掉，有個青年還帶領市民對着軍隊的廣播齊聲喊「放屁！」

很多人被軍人打得滿臉是血。不少地方軍隊開了槍。這些血腥事件都沒有報導，只有一個例外，青海開槍殺人事件被江青注意，市民才被告知，青海抓人時數百人被殺。這就是有名的「二月逆流」。一九七八年後，「二月逆流」成了正確路線，開槍殺人也成了正確路線，那些追求結社自由，反抗政治迫害的造反派又成了反革命或「三種人」。

一九七二年林彪垮了台，周恩來和毛澤東搞了個清查五一六運動，其矛頭指向造反派。這個運動中逼死很多人，凡是文革中造過反的人都受到殘酷的肉體摧殘或心靈創傷。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運動中，毛澤東利用周恩來在五一六中過份積極的表現而打民主牌，為清查五一六運動中被迫害的人平反，因此再次贏得造反派支持。很多人都因此捲入一九七四年的平反活動。這些人一九八〇年後都成了「三種人」。文革後，所有政治運動都受到責難，唯獨清查五一六運動例外，其原因很簡單，清查五一六運動是周恩來清造反派，這是正確路線。一些造反派質問清三種人運動為什麼不清殺人最多的聯動份子（高幹子弟保守派紅衛兵），陳雲答得好：「我們不但不清他們，還要重用他們。」這條第三梯隊路線與當年鄧小平的高幹子弟接班路線是一脈相承的。

所有中國的自由派知識份子都在支持或默認官方這種「批極左路線」的立場。鄧小平會

說，「既然你們認為二月逆流時軍隊鎮壓造反派開槍殺人是正確路線，六四事件當然也是正確路線了。」文革後有一本叫「七十六天」的所謂自由派知識份子寫的報告文學，公開支持周恩來二月逆流時支持軍隊殺人鎮壓的立場。用這種「批極左路線」的態度來進行文革的反思，哪有不導致六四悲劇的呢？

不可以極左路線一言蔽之

文化革命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不能用「極左路線」一言以蔽之。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一九六八年中，有兩年時間，毛澤東下令停止軍隊外的共產黨組織活動，允許市民在政府註冊自組政治組織。他利用市民對共產黨體制的不滿，利用劉少奇、鄧小平對市民進行政治迫害激起的民憤發動了造反運動。這是一場真正的造反，共產黨官僚十七年來幹的所有事都受到市民的清算，當時的中國有真正的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市民運動。這場運動的實質是極右的。這場運動與一九六九年後毛澤東與周恩來聯合起來重新鎮壓造反派，推行極左的經濟、文化政策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連當時的蔣介石都清楚這一點，他的告大陸同胞書就號召一切反共人士趁這機會來推翻共產黨。

大部份右派份子文革時都是造反派也顯示了造反派運動在反迫害這一點上的極右實質。回顧這段歷史使我們能進一步追究究竟誰應對文革動亂和六四動亂負責，是那些禁止結社自由，對市民進行政治迫害的人，還是那些被迫害的反抗的人？回答是明白無誤的，正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這些迫害人的人應對文革的動亂負責，也是鄧小平應對六四前後的動亂負責。

沒有他們的政治迫害，毛澤東不可能在一九六六年底贏得市民的支持，真正使中國動蕩起來。我並不是想為毛澤東開脫罪責。但毛澤東是比斯大林和赫魯曉夫高超的政治家，他看到

了共產黨與市民的政治衝突是一張最能號召人心的政治牌。

經過文革，胡耀邦和趙紫陽都學到了經驗。胡耀邦文革倒臺閉居時交了不少造反派的朋友，趙紫陽六四時對學生的態度也與他文革中與造反派打交道的經驗有關。而鄧小平、李鵬沒有學到一點經驗，相反，他們被中國知識份子支持他們批極左路線的立場寵壞了，於是他們在六四時又把文革中鎮壓造反派那一套故技重演，讓全世界人民在螢光屏上見識了他們的拿手好戲。

為造反派翻案意義重大

回顧這段歷史有不少現實意義。第一點意義是，我們要認識到任何對政治迫害默許就是縱容共產黨侵犯自己人權。一方面，目前有很多造反派由於政治原因仍在服刑。以我提到的葉冬初為例，他從未打砸搶，他是個文革初被打成黑鬼的知識份子，自從一九六八年以來一直被關押在監獄裡。江青等人也一直迫害他。但四人幫垮台後，他却成了四人幫份子，被判重刑，至今在獄中。他的真正罪名是組織了一個反黨權派的準政黨組織，履行了他的結社自由權。為文革中的造反行動受歧視的造反派還很多。原發展所的周歧仁、原體改所的陳一諮、趙紫陽曾重用的翁永曦，文革中都是最激進的造反派。他們文革中向現體制挑戰的行為至今是迫害他們的理由。

因此為造反派中的政治犯討個法律面前的公正仍然與我們保護自己的人權有關。但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不對這種政治上不趕時髦的話題感興趣的，他們都在忙着與造反派和三種人劃清界限，趕當局的批左路線時髦。

另一方面，從政治上而言，因文革造反問題至今受政治迫害和歧視的人是當代中國政治中極具能量的政治資源。這些人有不少曾是轟轟烈烈的獨立的工人運動學生運動的領袖。以

政治迫害大串聯之廣，受害程度而言，造反派的政治資源大於一九八〇年北京之春運動和八九民運。鄧小平就深明此理。八九民運後，他馬上要人細查過去的造反派在這次動盪中的活動，要求嚴厲打擊那些此次活躍的造反派份子。「六四」事件後，不少人感嘆中國沒有團結工會式的工人運動。他們忘記了中國文革中的獨立工人結社運動是所有共產黨國家中最早和規模最大的。如果我們能用積極的態度挖掘中國造反派運動中的人權和自由結社訴求，我們會發現中國的造反派運動在民主化過程中的價值。

從造反派在文革中的經驗，我們沒有理由對實現結社自由抱悲觀的態度。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中，大部份造反派的頭頭都被抓進監獄時，毛澤東和周恩來聯手推行鎮壓，看來是大局已定了。但造反派在監外的成員又重整旗鼓，改頭換面，成立新的組織。到一九六七年六月時，毛澤東發現壓不下去，於是反過來而打民意牌，為被打成反革命的組織平反，把抓的人都放了出來。周恩來本來算定三四月結社自由會被那次殘酷的「鎮反」結束，但他却再次失算，不得不接受七八九月的更大規模的市民運動。可見在一定條件下，只要中國人要結社自由，軍隊、監獄都是沒用的。

社會公正帶來長治久安

我像雨果筆下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和英國大革命的遺孤一樣，我的靈魂永遠屬於文革中的造反派運動。我愛那些放蕩不羈，充滿靈感和創造性，敢於向共產黨體制挑戰的中國市民，我雖然政治上越來越保守，但我懂「革命是人民的盛大節日」是什麼意思。記得我在坐共產黨牢時，一位地下政黨領袖（他是個右派份子）在被共產黨判死刑前向我表達他對文革中造反運動的感情時會引用馬克思的話「革命死了，革命萬歲！」八九民運以更明確的目標

，更廣闊的規模造就了新一代的中國人的靈魂，這代人與我們那一代造反派不一樣，與一九八〇年北京之春那一代人也不一樣，我相信他們這代人會比前兩代造反派更有成就更有希望。我相信他們中大多數人的靈魂永遠是屬於八九民運的，他們會驗證「革命死了，革命萬歲！」這句預言的。

儘管我有個造反的靈魂，但我却不得不承認「六四」之前我的理智已完全控制了我的靈魂。我相信上層平等競爭，權力制衡是民主的實質，民主政體無非是看透人性弱點後一種比馬基雅付理稍高超的「霸術」罷了。但「六四」事件喚醒了我的靈魂，我又回過頭去看一些西方的政治書。我開始驚訝西方法治和民主的實質與其說是個人自由不如說是種特別的遊戲規則，它規定人們之間發生衝突時，如何強制解決衝突。每當國會與總統發生衝突；法官之間發生衝突時，自由或自願都毫無意義，因為只有某種能強制的仲裁才能解決衝突。而西方民主中最令人費解的就是這種仲裁的強制是如此有效和不受挑戰。從這種意義上而言，共產黨國家的強制實施仲裁的能力差得多，正因此，才會在六四之前整個社會失序的狀況，當局才會最後求助於殺人。西方人講民主先從合法性講起。合法性是什麼都重要的，它是權力、強制力的來源，有了合法性，強制仲裁就不會受到挑戰，哪怕這仲裁總會損害某些人。而這神奇的合法性却不是能用權術論來解決的，它來源於某種超然的「公正」概念。看到這裡，我那套用來解釋民主的權術概念開始動搖。鄧小平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時，當鄧小平拒絕造反派的結社自由權時，這顯然違反了某種抽象的公正原則，他的強制執行仲裁的權力就沒有了合法性，這才是社會失序和陷於動亂的根源。想到這裡，我開始認為，選舉權、結社自由，這些看似抽象的原則，其實正是保證權力合法性的治亂之本。有了這個根本，強制執行仲裁的權力就不會受到挑戰。由此推之，民

主乃治亂之制度也！用共產黨愛講的話來說，民主乃長治久安之道也！

這是我從六四事件學到的一點東西，我從一個相信「兩個魔鬼平等競爭是民主」的人變成相信某種抽象的社會公正原則與治亂與邦之道有關的人。從這裡我又用此支持文革中的造反派運動。雖然造反派從未提人權口號，但文革的動亂一定與政治迫害違背了某種抽象的社會公正原則有關。消除動亂的辦法應該是明確提出這種社會公正原則，在野和在朝的政治家應該認識到它與建立社會秩序所必須的強制執行仲裁能力有關。如果像鄧小平那樣思考問題，認為用暴力可以恢復強制仲裁的權力來防止動亂，則中國就永遠國無寧日了。

也許我還是中孔夫子的「毒」太深，總要把「合法性」這類超然的概念與治國與邦之術聯起來。西方人可能從來就不關心「治國與邦」，他們關心一些更抽象的東西，也許這是他們高過我這類人的地方。

「六四」也使我對我多次強調的觀點「私有財產制度比民主更重要」進行了反省。我並不完全放棄我的觀點。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肯定是任何權力合法性的基礎，沒有這一條，不可能有任何社會公正可言，不可能有任何合法地強制仲裁的權力。但是社會公正比這更多，比如結社自由、禁止政治迫害和歧視、自由選舉。沒有這些東西配合，單有私有制一，權力的合法性還是有問題，保護私有財產的強制仲裁能力也會受到挑戰，正像美國對黑人歧視的時代，黑人就不會永遠自願接受這種強制仲裁權力一樣。黑人造反帶來了更多社會公正，使權力的合法性更不受挑戰。這正是馬丁路德金之所以受到美國社會高度推崇的原因。也就是說，與歷史唯物論相反，不是經濟決定政治制度而是權力合法性、社會公正決定社會秩序的穩定性，而秩序的穩定性決定經濟發展。對於中國來說，只要三五十年不動亂，經濟就會世界第一了。

與法國大革命後秩序黨的觀點及中國共產黨人關於秩序的觀點相反：不是秩序決定一切，而是權力合法性和社會公正決定秩序能否穩定（長治久安）。中國共產黨治國四十年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共產黨用鎮反，反右，清五一六運動建立起來的秩序從來沒有穩固過，也絕對不可能穩定，倒是西方那些不直接追求秩序而強調權力合法性和社會公正的社會能有幾百年長治久安。但我的想法比六四前的變化是，我今天更強調自由選舉、結社自由（在中國即意味着打破共產黨的政治壟斷），禁止政治迫害這類似乎與秩序有違的原則。當然我仍認

為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是更重要的原則，更重要的人權。沒有這一條，自由選舉和罷工權就可能與侵犯財產區分不開了。正像波蘭和蘇聯的工人罷工時可能就侵犯了財產，但因為這些財產不是私有財產，則侵犯財產的行為與公民自由就無法區分。這大概是蘇聯東歐經濟越來越糟的原因。那裡由於私人財產不發達，所有的人只會向政府伸手要，一旦有了一些自由，侵犯財產的行為也會膨脹。也就是說，沒有私人財產，就會沒有起碼的道德準則，自由選舉和其他類似的自由就可能因為沒有道德基準而使社會失序。▲

新書徵訂

《開拓：北大競選文獻》

黃河等人撰編

本書收錄了一九八零年北京大學生競選運動主要文獻資料，其中包括主要競選人胡平、王軍濤、房志遠、張偉等人的演說紀錄、大字報、競選中的問卷回答和民意測驗結果。

本書還同時介紹了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院，北京鋼鐵學院，民族學院等其他院校的競選運動情況。

香港田園書屋出版。一九九零年一月。

定價：美金八元，另付郵費一元。

購者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

地址：P. O. Box 701400, Flushing, NY 11370-9998

電話：(718)429-6777, (718)507-4739

動搖公有制根基的盲流大軍

當離開土地的農民如潮水一樣湧進各大城市，計劃經濟體制的喪鐘就已經敲響了。下一次天安門廣場的肇事者安知不是他們？

少君

記得十年前，筆者為採訪北京的盲流人口，曾從北京火車站旁的建國門立交橋下的一個入口，鑽到十幾米深的北京供暖地下管道內，目睹了成千上萬個無家可歸之人夜宿地溝的真實情景，並將從建國門橋下走到海淀中關村的「地下之旅」中的所見所聞，寫成報導發表在剛創刊的「北京青年」上，引起社會轟動，該日報紙也被強令收回，消除影響。當時的北京，由於「平反」潮越滾越大，使無數受共產黨多年迫害的老百姓，追隨着成千上萬的「右派」份子大規模進城闖蕩，開始了震撼全國的「上訪」運動。北京做為首都自然成為上訪者聚集的中心，在西單民主牆、月壇公園、北京市政府樓下，乃至中南海新華門前，你都會看到上訪的隊伍。

那一雙雙憤怒中帶着希望的眼睛，那一張張痛苦而疲憊的面孔，那一個個瘦弱裡含着苦難的身形，凝聚着千百萬人民對被中共所摧殘、凌辱和肆意宰割的憤慨和反抗。當一堆堆白骨和一件件血衣擺在中南海門前展覽時，當傅月華牽起幾千人走上天安門廣場為受難者振臂呼冤時，當永定河畔搭起了無數座各式各樣的窩棚小房時，當北京的大街小巷到處流動着衣冠楚楚的上訪人潮時，中共當局終於撤開了臉上虛偽面紗，將所有上訪人員全部定性為「盲流」，以「整頓北京社會秩序」為名，並利用

北京市民狹隘的排外心理，動員全部警察和居委會、駐京部隊的力量，在二個月內將三十萬上訪人員悉數轟出京城，用強硬的手法將上訪風潮壓了下去。

然而，十年之後的北京，不但沒有被「整頓」好社會秩序，反而早已被一百三十萬盲流給佔領了。歷史開了一個很大的玩笑。面對這些與他們前輩人目的不同、頭腦靈活、身腳敏捷的新一代盲流們，具有「六四」大屠殺經驗的北京當局，竟然束手無策，大傷腦筋。

東西南北中，發財只管衝

一九九〇年的春節剛剛過後，空氣中還飄散着鞭炮的硝煙味兒，以往正月十五以前絕少出門的大陸農民，在忙着打點行裝。春節，對於傳統的中國人來說，是生活流動的停止點，是一年中唯一可以什麼都不幹，什麼都不想的日子。但這節日一過，幾億人又開始為生存而奔波掙扎了。此外，河南、湖北、湖南、山東、安徽、四川、浙江等省的數百萬農民，沿着早已負荷沉重的鐵路綫向全國各大城市交叉輻射、蜂湧而去……

據大陸鐵道部官員透露，從九〇年一月下旬到三月中旬的四十天中，大陸陸、海、空各種運輸方式共運送旅客十、四六億人次，相

當於去年全國鐵路年運輸量的總和。僅北京火車站每天到達、發送的旅客總量已達二十三萬，加上滯留遊客每天達三十萬人。而北京站的设计接發量最大為十二萬人次。來往各大城市的火車全部超載百分之五十以上。特別是京廣綫超載達百分之二百以上，還不算沿途扒車的數以千計的準備去廣東掙大錢的「農工」和「撈女」。與此同時，成都站有幾萬民工滯留不歸，等待南下廣州。北京站則有幾萬人露宿站前廣場，恢復六四戒嚴前的舊景觀。

「東西南北中，發財在廣東」，這句流行於四川的傳言，使盆地內的大批農民率先突襲了以廣州為中心的廣東各大城市。緊接着湘、鄂、桂、豫等省民工也相繼南下，使廣州市的外來民工一度超過二百五十萬人。這股被廣東人稱之為「撈潮」的人流使廣東省重載難負，不得不採取封閉政策並開始遣返。但如同去年此時的情況一樣，盡管每日有一萬六千名農民被強行遣離廣東，但每日都有幾千名同樣數量的農民在繼續南下。所不同的只是他們繞開了廣州市緊閉的大門，迂迴分散到了珠江三角洲的其它中小城市。令廣州人擔心的是，當這些人在找不到滿意的工作之後，會回襲廣州城。而此時此刻，在成都站滯留的幾萬民工中，有二萬人持有去廣州的火車票。面對這種危如累卵的態勢，廣東當局如臨大敵，四處扼阻。

而從廣州被遣出的農民百分之九十並沒有如當局之願回到農村，而是揮師北上，並帶起沿途農民，滾起更大的隊伍向北方殺去。

海濱城市大連，一個月內湧入十幾萬民工游民。瀋陽火車站，天天人滿為患，每日露宿廣場的盲流成爲瀋陽一大「奇觀」。鄭州、哈爾濱、天津……紛紛叫苦不迭，大街小巷到處是流動的外省農民，引發一系列生活、治安及社會問題。北京政府則接連告急，三個月內，外來人口猛增到一百三十萬，僅位於豐台區的南苑，每日就有平均二百人以上前來落戶。建國門外「入市」裡，數千人雲集在人行道上，終日不散。北太平莊、虹橋、沙堆子等農貿市場人流如海……

盲流大軍，橫掃大陸南北大地。爲生存？爲發財？還是因爲那一股股不安份的血流在湧……？

青天爲屋，四海爲家

筆者再一次來到北京站廣場。這裡被過境或準備在京「找活兒」的民工佔據着。他們扛着大被卷，背着裝着全部生產生活用具的包袱湧出車站，集合成車站前的小廣場處，三五個一堆，十幾個一伙兒，或躺或立，那沾滿灰塵泥巴的破舊衣裳，那或鋪或蓋的大花被子，在廣場北面豪華的國際飯店大廈的襯托下，顯得那麼不倫不類。

我在擁擠不堪的站前廣場裡，以一家青年報記者的名義，詢問了十幾名來京「找活兒」的青年，結果是：兩人在京有親戚朋友，三人投奔先行到京「工作」的同鄉，其餘則是盲目闖來試試「運氣」。一位二十五歲的青年摸着我的記者證說：「對我來說，這本本比天上的太陽還難得到。」他說他在家種三畝地，最多收成不超過二千公斤糧食，高價賣了也不過一千餘元人民幣，去掉吃喝種子錢，只有二、三百元。而他聽說北京城，如果運氣好找到一個

泥瓦工，一個月就可以掙到這個數，看來這世界太不公平。

「大叔，你們這裡的買工市場在哪兒？」一個操着河南豫劇對白腔的聲音，打斷了我和小伙子的談話。四、五個鄉下姑娘圍住我們。

「在北京叫勞務市場，你們是來找工的？」

「嗯」，她們怯生生一起點頭。「聽俺那兒的人說，北京的飯館雇工，白面饅頭，大米飯管夠，每月還給一百元錢，可我們已來五天了，還沒有找到一家要我們的。」她們看着我，好像我應該是雇主。

她們這簡單的願望已因在她們之前大量湧入城市的勞動力而變得難以實現了。她們說她們口袋裡只剩二十塊錢了。這時，一個西裝革履的男子走過來，介紹她們到不遠處的建國門外人力市場去試試。看着這位結着「金利來」高級領帶，渾身上下又散發着一股掩飾不住的士氣的青年人，我一時無法斷定他用的好壞。

「咱們認識嗎？」「哦，不，我在欣賞你的領帶，挺漂亮……。」

「哈哈，老哥真會開玩笑，一看你就是道兒上的人。」說着，他遞過一支烟，樣子有些滑稽地介紹自己是哈爾濱太陽島服裝經營部經理，現在來北京西城開家分店，正在這兒物色人選。說着往後一指：「這次只看上了這四個妞，幫她們找一條生路。對我來說也是一筆節約，如果找北京城裡小妞，雇不起不說，沒有一個聽話的。像這幾個妞，帶回去保證好使，裡裡外外都可以給你幹。」他神彩飛揚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做出個「拜拜」的姿勢，然後帶着「隊伍」朝公共汽車站走去。天知道明天對那四位姑娘是什麼樣的生活前景，但比起還站在我面前的這幾位河南姑娘來說，她們已經是很幸運了。

「你們不出來不行嗎？在家吃不飽嗎？」我詢問在我們身邊聽熱鬧的一位女孩子。她身



湧向廣東各大城市的農民大軍。

單力薄，很難想像她能幹什麼體力活。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誰不想個好啊！」她操着一口地道的安徽口音，「到外面溜溜，找不到活還開開眼哩！」

「嘿！不掙錢還花掉許多錢？」

「嘿！嘿！」又輪到她笑了，「那才幾個錢呀！」

自從北京「六四」大屠殺之後，大陸經濟全面萎縮，已有一萬四千個基建項目停建緩建，它使已有的龐大的建設大半面臨困境，但從農村湧入城市的大量農村勞動力，却絲毫沒有減少，他們帶着年輕的夢想和對生存環境的不滿，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上僅有的幾個熱點擁擠着，企圖擺脫貧困和無知，使自己溶入都市生活。也難怪他們，八十年代末期的中國農村，許多家庭蓋了新房。彩電、冰箱進入一部份富裕起來的農民家庭，幾十年風吹日晒開皺的嘴角叨上了帶屁股嘴的烟卷。外出的農民在帶回「新鮮貨」的同時也帶回了城市的信息。聽着有出息的年輕人滔滔不絕地「侃」着城裡見的說不完的新鮮事，看着膽大的姑娘從城裡穿回來的時髦衣飾，更多的人開始嚮往到城裡去尋找「活路」。

自從十年前北京「三八」服務公司與安徽某縣婦聯簽訂了「勞務輸入協議」，四千「黃山姑娘」當年進入北京之後，「河北姑娘」、「河南姑娘」、「山東姑娘」以及隨之而來的男人、丈夫、情人和勞工像水一樣湧入北京。廣州、上海、天津、西安也和北京的情況一樣，成為盲流潮席卷的殘處熱點，千千萬萬個四海為家的「打工者」成為這些大城市中的新居民，構成了九十年代的盲流時代。

各自為陣，安營紮寨

幾十萬人、幾百萬農民走進了昔日不屬於他們的城市之中，不同的生活閱歷和差異甚大的文化背景，使他們無法溶於令他們羨慕的都市生活，像中國人到美國一樣，他們終於發現，如果要想在城市中長久生存，就必須建立起屬於自己社會階層的「CHINA TOWN」。但隨之而來的就出了一些無法克服的社會問題，使城市治安發生了嚴重的混亂。

海澱區萬壽路沙窩村，被當地軍隊大院（該地集中着中共各大兵種司令部，俗稱大院）的居民叫做「侃爺村」。一些來自天南地北自稱聯繫業務、洽談合同的「經理」、「董事長」和「業務員」經常聚集在這裡。高峰時可達四千餘家「公司」。他們小皮包一提，三、五個一推，在馬路邊、胡同裡、屋檐下就侃起來。鋼鐵、建材、彩電、冰箱，甚至石油、軍火，無所不賣。拉開公文箱，各類合同介紹信一疊疊，圖章一堆堆的，應有盡有。這些人常常上午選蓬頭垢面地蹲在馬路邊神侃，下午却西服革履地坐出租車到大賓館跟人家簽合同去了。當然，合同的真假，如果不被騙錢，則要看對方的經驗與眼力了。反正海澱區檢察院天天有人來調查案子，一九八九年合同糾紛案光「侃村」的就超過一千宗。這種事在這裡屢見不鮮了。

在這千餘戶人口的村子裡，有個體旅店近百家，實際上幾乎家家出租房屋。屋裡用木頭釘個架子，上面鋪上稻草，十幾個人的大通舖就行了。在這裡失盜、男女混居的現象十分嚴重，被偷、被搶三、四百元的財物，根本請不動當地派出所的警察。做為這裡主要客人的大陸第一騙子是浙江永嘉縣人，幾乎成為騙子的代名詞，但永嘉人並沒有因此減少，反而越來越多，可見他們發財有術。有個四十六歲的延吉人，帶着四個女的，最大的四十一歲，最小的二十歲，說是來北京開飯館的，租了一間三平方公尺的房子，以平均每三個月出售一個嬰兒的「業績」，在「侃村」住了四年之久。

一個二十一歲的江蘇小伙子，領着三、四個十五、六歲的女孩住在一張通舖上，每天都可見到他住的院子裡放着幾十輛各種牌子的自行車，以極便宜的價格售給遠近圖省事的客戶，而車的來源却從未有人問過。

有時，這幫侃爺興起，半夜結伙跑到四季青的菜棚裡，將看菜棚的老頭嚇跑，然後吃光菜棚裡所有能吃的瓜菜……

據「北京晚報」報導，被稱為「浙江村」的南苑地區，四千多名外來服裝加工戶的湧入，使這裡的水、電消耗量大幅度增加，月耗電達二萬餘度。由於電器多，用電超負荷，馬路邊上的大變壓器竟被燒毀。每到夜晚，數以千計的縫紉機、鎖邊機一齊開動，使當地居民家中的電燈昏黃若燭，電視機圖像模糊不清。

「破爛村」，老百姓對朝陽區六里屯新莊村的別稱。這裡是自發形成的廢品交易市場，經常聚集着大批撿破爛的人。撿破爛不分類，見什麼撿什麼，然後他們聚到這裡相互分類交換，有的要瓶子，有的要塑料皮，有的要廢紙，各得其所，再運到收購點去賣。僅河南省駐馬店、周口兩個地區就有一百六十多人在這裡以破爛為生。

老張頭是河南項城縣人，五十一歲獨身。他出來混好幾年了，先後到過東北、包頭等地，都是撿破爛。他說：「撿東西，一個月除吃住開銷外，還剩一、二百塊，比在家種地省心多了。」性的問題，老張頭從沒發愁過，因為在這裡聚集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是女性，他的「相好」連自己也數不清有幾個。由於這種成份結構，小偷小摸十分嚴重，看見是撿，看不見是偷。菜地裡的地膜、地上的建築材料、住戶的用具均屬「破爛」範圍，列為可「撿」之類。從汽車電瓶、大燈到煤氣罐、電話綫均可在破爛堆上看到。偷竊者一旦被發現追趕時，便以女性之優勢撒潑大哭，聲稱追趕者意圖侮辱自己，以博得路人同情。更有甚者，晚上脫光衣服潛入工地，專門偷腳手架的鐵卡子，看守則眼巴巴地看着這些「幽靈」要感風，道不能遠遠地呼喊，不敢向前，怕「說不清，道不白」招一身臊。保定有一個人專門來此坐收鐵卡子，日出貨二卡車，然後進城再賣給施工單位，一本萬利。

據統計，北京人口自然增長率和外來人口增長率以現有人口百分之五的速度在增長，每年在糧、油、副食及日用品上，用以應付這部

份的增長補貼高達五億元人民幣，這無異給北京城的居民日益困惑的生活水平雪上加霜。雖然北京市當局採取各種措施，每年遣送盲流三萬人次，但隨着這批人對城市的留戀加深和安營扎寨，中共當局將無計可施，面臨困境。

治安失控，犯罪之源

今年三月，來自廣州市的一份報告稱，近二年來該市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流竄犯罪和集團犯罪越來越猖獗。「嚴峻的社會治安形勢已令不少市民缺乏安全感。」該報告認為，外來人員的大量流入，是造成廣州及廣東省治安混亂的主要原因。

海南，數十萬盲流的湧入，也使該地賭博、賣淫、嫖娼等醜惡社會現象和重大搶劫、兇殺犯罪活動猖狂。僅在一次例行「圍剿」中被破獲的刑事案件就高達二千五百九十宗，抓捕刑事罪犯五千餘人。以致使所有到過海南的人，都會感到海南治安形勢的混亂與嚴峻。

上海、天津、西安……

然而最嚴重的恐怕要數北京了。據調查，北京市常住人口共一千萬人，而外省各路勞務大軍人致有一百一十萬，加上五十萬游動人口和四十萬過境人口，共有約一千二百萬人口。這一百一十萬外來人口成份為：河北的百分之五十一、四、河南的百分之六十一、四、安徽的百分之四、四川的百分之六、一、江蘇的百分之五、一、浙江的百分之二、五；其它省市的百分之二十。而這些外來人口有百分之八十一、六居住東城、西城、崇文、宣武、朝陽、海淀、豐台、石景山八個區。但大多數屬游動性居民，隨着他們工作的變動而變動。這些人除了擺攤、賣水果、蔬菜、裁剪服裝以及經營日用雜品以外，還有搬運、修皮鞋、打家具、磨菜刀、收破爛等與城鎮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五花八門的勞務，以及醫院、學校、機關等單位

所需要的勤雜工、花木匠、炊事員、看門傳達和守更護衛等。一些年輕女性則多受雇於生意興隆的旅店業、飲食業的個體戶，幹一些擦桌掃地、刷盆洗碗、擇與備料等雜活。當然，還有為數眾多的民工活躍在建築、修路等工地上。在這個「群體」中，欺騙、行詐、巧取豪奪，雇主與雇工間不清不白的性關係，已是公開的秘密。賣淫、嫖宿、賭博、偷盜、搶劫等犯罪行為，也屬司空見慣之事。對於那些在逃和流竄的刑事犯罪份子來說，這個龐大的「群體」，又往往是他們最好的藏匿之地。

農民进城，這是任何一個國家在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結構發生變化時，所不可避免的現象，農村社會的瓦解與收縮是標誌着社會的進步，但這種進程必須有相應的法制和新的管理體制來維護和推進，否則，就會衍出動亂和醜惡。

而今天的大陸，由於制度和社會基礎等方面的原因，正趨步走向後者。在北京的首流隊伍中，多年來早已形成黑社會勢力，他們像魔方一樣，能夠自由組合，像毒液一樣，能夠不停地流動。他們幾個人、幾十人或上百人一伙兒，由老大帶着去掃蕩這個社會。他們有時去幫人「幹活」，有時去帶人打架。「六四」之後他們則自稱為「城市游擊隊」。

在北京城東建國門立交橋下的「入市」裡，一個「磁家」（哥們兒）告訴我，這個勞務市場裡，最少有十支「城市游擊隊」。這個自發形成的集市，最初僅僅是個保姆市場，少時三、四百人，多時一、二千人，在北京市頗有名氣。在這裡你可以雇到各種各樣的人工：飯館、髮廊、木工、搬運，甚至還有黑話稱之為「全活」的女孩子。即除了打掃衛生做保姆外，還管陪睡覺。這種「全活」的交易雖然在這裡是公開談價錢的，但實際操作却由黑社會控制着，賣淫者與嫖客都遵循着一個「公平」的價錢，以免搶了別人的「飯碗」。傍晚，常有



勞動力市場的生力軍

一些年輕人騎着摩托，打「的」（乘出租車）來這兒逛逛，誰都知道他們來這兒的確切目的。而女人們則毫不怯陣地迎着他們淫邪的目光，供他們打量挑選，因為她們知道，這些闊「花匠」出手都很大方。

「四和尚」下面的幾十個「小馬仔」就是專門替這些「花匠」們服務的。

「小馬仔」手裡都握着幾個鄉下新來的漂亮妞，或因各種原因從屋主家出來的有點姿色的鄉下姑娘，有的手裡還握着一、二個城裡妞。「花匠」們一來，他們便圍上去。知底細的「花匠」，他們便直言推荐客人喜歡的女人，不熟的生主，他就介紹他們的姐姐或妹妹如何能「洗」能「做」。介紹費嗎，一張（十元）三張不等。

「四和尚」的隊伍，大部份時間分散行動，各自方便，每天由各「山頭」的櫃頭向「四和尚」交每人頭十元，便可保證相安無事。

「四和尚」見我對「採花」沒興趣，便向我介紹另外一支專門打老外主意的「游擊隊」。他們的頭兒是個三十幾歲的北京人，人稱「小平頭」。但知底細的人都知道他們真正的頭兒是個女的，只是誰也沒見過她，她的指示是由那個「小平頭」來完成執行的。「小平頭」心狠手黑，曾用鉗子拔過一個叫「黃毛」的兩顆大門牙。而「黃毛」是他過去的心腹之一，只是一時翻臉，他便給「黃毛」留下點紀念。更有甚者，他曾親手將一個犯了事的手下的陰莖用電工刀割了下來，示令部下。

「小平頭他媽的平時面善着呢！誰有困難找他，他會讓你到「砂鍋居」白吃兩天，抽煙時保證讓周圍每一個人都手裡有煙。可背心裡面（心）比狼還狠。」「四和尚」憤着吐沫星子說。

「老外的生意好做嗎？」我問。
「一抓一準」。「四和尚」說。用他的話說就是「沒有設計不上的」。設計？就是籌劃、安排讓洋男人上當、入網，然後大大敲他一



清潔工人將大把大把沙塵往「盲流」身上送。

竹杠。小平頭手下都會說幾句外語，常常冒充大學生到外國人多的地方去「套詞」，然後就讓女孩牽着這些大鼻子走進圈套，直到就範為止。至於什麼方式和手段？暫時保密，反正小平頭一月進帳，光外匯券就有十噸（一萬元）左右。他們更絕的是手裡有幾個「洋妞」，專門供應港客和廣州來的倒爺，一夜收費一千塊以上。天知道這些洋妞是怎樣會被他們掌握的。

「還有『張四』那支專為別人報仇的哥們兒；什利海王大炮的『菜刀幫』；哈爾濱來的『東北虎』；八面槽的新疆幫……」，「四和尚」與致勃勃地數着北京的黑社會組織。

「難道公安局不知道？不管嗎？」我疑惑地問。

「四和尚」頭一搖笑道：「管？要管了我們，他們吃什麼？別說平日我們七張八張地給他們進貢不說，過年過節時，上面一紙命令下到派出所，要求節日期間不出事。那些片兒警

有屁本事，還不得大哥長大哥好地求我們這幫人給他們「罩」着。出了大案特案，也都是我們兄弟先抓了人送給他們，讓他們去請功。平時裡，我們都是兄弟一樣地吃喝，只不過他們有身「官衣」而已。就為這個，我每月都送幾個免費妞給他們「打炮」敗火。」
我忽然想起小時候憶苦思甜時最常聽的一句話：天下烏鴉一般黑。

黑社會的壯大，標誌着城市治安的失控。問題嚴重的是，這些「任務」各有側重的大大小小的「游擊隊」，在北京不知有多少？全國又有多少呢？

中國大陸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為農民，隨着經濟的發展，農村人口必然流向城鎮。以目前的人口增長速度，大陸人口大約每六、七年就增加一億人，中國的農民如果有百分之一進城，就會有八百多萬人在流動。面對這勢不可擋的「盲流」人潮，無論將來誰治理大陸政局，都將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社會問題。▲

公費吃喝：天下真有不散的席

一場制止公費吃喝的餐桌大戰，在中國大陸已進行了八年。然而，一年吃掉六百億人民幣的災難並沒得到有效的控制，誰是這場蝗災始作俑者？

趙進

禁止公款吃喝的八年抗戰

魯迅說：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可是在今天的大陸，天下就有不散的筵席，那建立在公費吃喝基礎上連綿不斷的筵席，真是驅之不散，禁之不絕。

一場制止公費吃喝的餐桌大戰，在中國大陸已經進行了八年之久。數遍世界，沒有哪個國家首腦像中國大陸領導人這般苦口婆心地教下級官員該怎麼吃飯。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大陸政府這樣屢屢下發關於餐桌酒菜的具體規定。

一九八二年共產黨前總書記胡耀邦要求宴請官員實行「四菜一湯」，以後這「四一」變成了四大盤菜（每盤十多種名貴菜）或每道為四盤的上菜新方式。一九八六年中共倡議進行食物結構的改革，全國引進了八十三條麩包生產綫，許多城市進行快餐化，可惜也夭折了。一九八七年，中共國務院強硬的告戒官員們：必須堅決反對大吃大喝，「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但這忠告也成了「耳旁風」。

一九八八年七月，中共國務院發出控制減少會議經費的通知，狠刹「借會吃喝」歪風。八月，武漢市率先開征已流產六年的筵席稅。九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通知，規定在內部接

待中，招待客飯時，不上各種白酒、進口酒和易拉罐飲料；不准用公款買烟招待；招待外賓時不擺「茅台酒」。去年七月，「國務院」又作出限制生產易拉罐頭的決定。

各省市關於制止公費吃喝的規定也各有高招，一九八九年六月，江西省關於堅決刹住吃喝風的規定咄咄逼人：幹部接受客飯，一律實行分餐制，即一盤菜一碗湯，盤內的菜不得超過三個品種；一律不准上牛蛙、海參、甲魚、螃蟹、對蝦、魚翅、魚肚以及烟酒、飲料、水果等。需要集中用餐的一律「四菜一湯」。違者誰吃誰掏錢並予罰款，違規四次者，給予撤職或降職處分。對舉報者，給予罰款數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的獎勵。江西省的政令一出，那些大飯店、大賓館頓然冷落，「宴席王子」甲魚也掉了大半價。

自去年七月至今年七月，中共國務院及有關部門發出的制止公費吃喝的通知及法規就達九個。據統計，自一九六〇年至今，政府部門發出的包括公費吃喝在內的控制集團消費的紅頭文件就達一百二十一之多。

然而，面對着公費吃喝的浪費一次次奔湧而來時，紅頭文件築起來的堅固的「行政大壩」，却一層層被沖塌了。

「公費吃喝」幾乎淹沒了神州大地……

宴席上的喜怒哀樂

一九七七年，雲南高原的一位幹部踏進首都一家餐廳，好奇地點了一碗「象鼻湯」。飯後結帳，價值二百元。他嚇傻了，賣了褲子也拿不出錢來，被餐廳經理臭罵了兩個小時後轟了出來。十年過去了，這位當了公司經理的幹部揣着滿袋的公款找到這家餐廳請客，一甩手就是兩千元，首點的是「紅燒象鼻」。服務員介紹說這是來自東埔寨，他回應的却是「以後來吃」象全席。

一九八八年春節，西南高原一座小城市的廠長經理們酒興大發，元旦剛過，來自企業的請柬紛紛飛到市長及政府各部門首腦的辦公室上，許多官員一天要分赴幾個酒宴。工廠經理們紛紛派出小車到黨政機關「搶」市長。最後，一些廠長召開「請客協調會」，排出各廠請客的日期，企業輪流作東，市長書記們一天兩宴，搞得見肉就想嘔吐，見酒就打寒噤。不知是誰的發明，喝酒前將頭痛粉倒在酒盅裡，據說可以抑制酒精的揮發，於是廠長經理和官員們紛紛上醫院開頭痛粉。這場歷時二十五天的「百家宴」把全市的廠長經理和政府官員們吃得東倒西歪，不辨南北。據說這場吃喝花銷公款十四萬元。

某地稅務局成立一個只有三個人的檢察室

，邀請了省市一百八十個部門和單位的三百餘名幹部參加成立大會。會議結束後，由十一輛三輪摩托開路，四十多輛小轎車、麪包車尾隨，一路上，稅警幹部握着衝鋒槍，亮着警燈，鳴着警笛，浩浩蕩蕩通過過大街駛向飯店。這裡，四百四十名幹部圍滿四十四桌酒席，一餐吃掉兩千六百元公款，抽掉一千元香煙。應邀出席會議的市長們看到勢頭不對，也不敢阻攔，只得腳底擦油一溜了之。事後，當地民怨沸騰，記者激憤採訪，省紀委也要「一查到底」。然而，上上下下吃的未吃的，都通過各種關係說清，一個月後處理決定竟是一鑿於維護稅警機關在社會上的威信，對黨事領導不予處分，不公開披露，當事人在「一定範圍」內檢查以消除影響。

去秋，某市團委和水果食品公司舉辦「嗜秋」大賽，從而隆重推出一項嶄新的「吃法」——吃「蘆葦」。面對眾多的現場觀眾和電視台的攝像機鏡頭，有兩名男女，各以十分鐘吃進二點六九公斤和一點八五公斤西瓜，「齒」壓群雄，腆着肚子登上冠軍之寶座。

餐桌上的即席賽就多了。一次宴會上，一位「公關小姐」獨飲三瓶茅台不醉；一次酒席上，一位男士則喝下十八瓶啤酒不跑廁所；有位經理却有另一種自得：本人一餐吃下三千元！

連中國的「泔水桶」裡出的新聞也不少：某餐廳的剩菜湯使一個豬場的「八戒」們吃得拉肚子；某飯店的酒菜醉倒了一群豬，某市的泔水池使一個個禮戶成了萬元戶。

在大陸，生了娃要吃，死了人要吃，蓋了房子要吃，倒了房也要吃，過節吃、開會吃；火燒森林吃、火車翻車吃、哪裡遇災哪裡吃；……小小餐桌，竟容盡了一個東方民族的喜怒哀樂，竟把一個儉樸勤勞的民族弄得神魂顛倒，惶然無措——却不失吃的氣派。

會海酒酒吃在其中

據對北京市七大賓館調查，這些賓館每年接待會議一千零二十一個，接待參會人員二十五萬人次，國務院各部委的招待所五萬張床位，全被會議「承包」了。北京市每月要供給這些會議三十二萬斤豬肉；十六萬斤雞蛋；六萬斤白糖。國務院各部委還有大量會議轉嫁到其它省市開，幾個工業部的一百個會議，就有九十八個是由省市出錢開的。某部去年召開的二百二十九個會議，有一百七十七個的經費由下面承擔。盡管如此，中央財政每年仍要支付五億多元的會議經費。

省級會議開支也是驚人的。某省一個廳級召開二百人的會議，省財政撥出四萬元會議費，下屬和有關單位「資助」五萬元，六天會議就開支九萬元。

雲南陸良縣的兩次「吃喝會」可見一斑：一九八四年春天，縣畜牧站開了一天半的短會，應邀吃喝者一餐比一餐多，連「縣太爺」們也前來共享「八冷八熱一炊鍋」，七十人吃了七頭豬，耗款兩千四百元。去冬至今春，該縣再爆「吃喝新聞」：在一個電站工程竣工前後，來自上下左右的千餘名幹部雲集縣城連吃帶揣，三個會耗費公款十八萬元！

餐桌上的燦爛文明

去年五月，西班牙一名廚師用七千八百公斤豬肉、二百公斤西紅柿、二十公斤大蒜等多種調料，在一口重二千公斤的大鍋裡炖出供四萬人吃一餐的炖豬肉，這一創舉被列入吉尼斯紀錄。

對於餐桌上創造的「世界之最」，中國廚師們却不屑一顧。在餐桌上，中國人是自豪的。

中華民族創造了無數燦爛的文化，許多在歷史的長河中暗淡流失了，而飲食文化依然燦爛奪目，京、粵、川、魯、揚、蘇等八大菜系爭妍鬪艷各踞一方。在海外的華人，「國語可

以不講，國服可以不要，國劇可以不聽，國片可以不看，國食却不可一日或缺」。在國內，坐「洋車」，穿「洋裝」，抽「洋烟」，用「洋貨」，嫁「洋人」成爲時尚，唯餐桌保持着千年傳統的「中國特色」。

在西方，一個人一生中用二十年睡覺，六年吃飯，三年打電話，五年看電視。而中國人一生至少有十二年消耗在餐桌上。

今年初，聯合國糧食理事會官員公佈全世界尚有五點六億飢民，中國飢民不少於六千六百萬左右，佔亞洲飢民總數的百分之十五。在這塊貧脊的國土上，偏偏創造了世界上最燦爛的飲食文化。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在餐桌上發揮得淋漓盡致。而當今中國飲食文化的的光芒，是用老百姓的血汗作爲「燃料」的。公費吃喝創造了燦爛，而這燦爛的光環又將公費吃喝牢牢地蔽護着。

一位日本人在與某科研所洽談業務時，出資三千五百元招待了中方人員。而該所幾位科技人員却把從賓館代開的宴會發票帶回所裡報銷，飽餐一頓還白得三千五百元公款。今春，這個日本人再度來所，有人知曉了此事，但知情人却守口如瓶，科研所裡相安無事。

中央抓吃喝，瞎子打老婆

一九八七年，某省財政廳幹部帶着三十萬元的扶貧資金到邊疆A貧困縣。該縣的縣長們想從餐桌上體現出「貧困」的程度，省裡的幹部皺皺眉頭：「讓我們來吃憶苦飯嘛」。飯後便驅車轉到鄰近的B縣。精明的縣長馬上訴貧困，桌上擺茅台。酒飯之後，三十萬元扶貧款便落實到B縣。A縣有苦不敢講。某市郊區有個鄉鎮企業要蓋房子，涉及到城市規劃，按手續報批。城建規劃處雖同意，但批准未下不能動工，企業爲此每隔一週宴請一次，可批件還是下不來。再請。「不批他們會來請吃，批下去，他們就不來請了。」處理人私下說。企業

只能再請，直請到「菩薩睜眼」。
大陸出現了「舉報電話」熱，而公費吃喝的嚴重現象舉報電話記錄中却很少見。公費吃喝早已是民恨國怨，人們却都只停留在道義上的憤怒譴責，而在行動上往往採取「觀岸觀火」。老百姓戲稱：中央抓吃喝，是「瞎子打老婆」抓住誰打誰。



洶湧而來「吃喝團」。但上級黨政機關，却沒有一個專管吃喝的部門。
「公僕」們其實沒有白吃白喝。幾頓酒席之後，印着權威機關大紅印章的名目新奇的榮譽獎狀便接踵而來。有個軍轉民的無線電廠從山溝裡搬出來不久，廠會議室的一面十米長牆上，錦旗、獎旗、獎狀一件挨着一件，整整排

迭起。商業部第三屆優質白酒啤酒評選出一百餘種名酒的結果公佈不久，全國第五屆白酒評比風波難平，全國二十四個酒廠聯合舉報此屆評比弄虛作假，評的完全是「餐桌功夫」。由中國質量管理協會推出的「全國十佳啤酒」評選還未開場，評審小組一行六人在二十多天裡，僅吃喝一次就花銷受檢啤酒廠一萬一千七百



上行下效，大小通吃

一個只有四百零九名職工的小廠背着銀行二十一萬元貸款，財務已無法支付工人工資，却被莫名其妙地評為地區改革前進單位，「名聲」招來的厄運也隨之降臨了。各級官員們紛紛來調查、總結、關懷，廠長被頻繁的接待壓得喘不過氣來，五個月內，廠裡就付出了二十七萬元吃喝費。廠長跑到上級反映，要求堵住

了六行。僅今年上半年，該廠就接待各種評比檢查人員三十六批，去年以來共獲各種評比獎九十項。廠長指指餐桌苦笑說：每項獎都是從這裡獲得的。滇南一個小廠的一種土特產品竟獲得十三項各部門的獎證。廠長說，為此在餐桌上花銷的錢不下三萬元。

近五年來，全國性的產品評選活動也浪峰元，加上高額補貼，人均佔用公款三千三百五十元。廠長們說，評比大賽就是吃喝大賽。難怪去年全國彩電質量評比，竟評出六十一個一等獎，觀眾每晚看到的彩電廣告無一例外都是：全國評比一等獎。
在處理吃喝中，人們往往找不到法規來依循。貧污公款一千元以上，就可以判處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有行賄受賄上千元，就可以推上法庭問罪，但吃喝公款上千元以上，連個行政警告處分也輪不上，最多就是補一元錢四兩糧票的「吃飯費」。同樣是公款，揣過腰包裡有罪，而吞進「腸胃」裡無事。今年上半年，大陸紀律檢查部門查處了萬餘起數額超千元的重大貪污、賄賂案，但是對耗費了數百億公款的吃喝卻沒有列出一件「吃喝案」。查處部門也說不清這罪與非罪之間的性質差別，至今全國人大沒有頒佈過「吃喝公款」就算貪污公款的條文，無法可依。對「公款吃喝」的查處於是往往雷聲大，雨點小，虎頭蛇尾，不了了之。有的查處部門乾脆層層交待：吃喝現象複雜，不宜列案查處。於是對吃喝的審判只能依賴於道德法庭了。當東方的「蝗蟲群」肆虐國庫時，民辦的「恨之怒霧」也在餐桌上匯聚。

餐桌酒席上的祭品

在中國，民衆改變社會現狀的方式似乎只有兩種：一是巴望朝廷出「清官」整綱振紀；二是揭竿而起「全面否定」。幾千年來，這個民族就是這般艱難地推動着歷史的沉重車輪。當傳統的慣性心理常把某些社會現象制止的責任一古腦兒往當權者身上推，要當權者承擔社會生活中發生的一切過失又無助於問題的解決時，民衆自發起來的「矯枉過正」，往往帶有嚴重的盲目性和違規性，結果大多是事與願違。

某市曾出現了幾位勇敢的舉報者。他們把一些違法製造假酒者與飯店、招待所幹部相勾結，將大批假酒偷渡進國營銷售渠道，致使上萬瓶假酒擺上公費餐桌上的行為密報紀檢部門，並配合紀檢部門一舉查獲了五萬瓶假「五糧液」。然而結案後不幾天，舉報者發現紀檢部門竟又將這數萬瓶假「五糧液」低價賣給黨政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一時間，無論公宴、私宴桌上都能見到這種假名酒，其身價依舊赫赫然，這是舉報者們怎麼也弄不明白的事。

春天，一位記者到某縣採訪，看見招待所小餐廳擺着十桌豐盛的酒席，大餐廳裡擺着三十桌酒席，便好奇地向招待所聘來的病休幹部王會民打聽。王會民訴苦說：小廳是父母官們招待鄰縣來串門的領導的，大廳是開會的，請客的。並說，縣委、縣府一年在招待所花的吃喝費達三、七萬元，都是招待所代支付的。王會民沒有膽量去掀宴席，也沒有勇氣去告官府，他只是對記者說了幾句悄悄話，沒想到就砸了飯碗。招待所長嚴厲地對他說：「現在精簡人員，你被辭退了。」王會民問：「我有啥毛病，爲啥辭退我？」所長說：「我挑不出你的毛病，辭退的原因你自己知道，想不通你去告我吧！」王會民到處申辯，碰到的全是冷面孔，他只得捲着鋪蓋走出招待所。王會民披露吃喝沒有觸動縣太爺的半根毫毛，反惹來滿城議論。二個月後，他又聯繫到一家單位工作，臨報到上班那天，單位領導却說：「原來你是告縣長吃喝的那位啊，對不起，我們也怕你這種愛打小報告的。」王會民木呆呆地轉回身，在街上孤零零地走着。他哭了。

某市醫院一位耿直正派的副院長受命負責一萬平方米的大樓建築，這位一向憑借介紹信辦事的幹部很快發現，莊嚴的紅色大印在「關係網」面前失靈了，許多事必須通過另一種渠道去辦。結果，油嘴一沫，筆下生輝，香烟一送，嘴上念春，請客招待花了幾千元，工程便一路綠燈。望着拔地而起的新大樓，副院長心裡酸楚楚的：大樓建起來，而知識份子的尊嚴，一個正直人的良心却倒了，倒在大樓堅實的地基之下，一位敏感的記者找到了他。這事被披露出來了。辱罵聲便在四週響起：「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那幾千塊有一半爛在他他肚子裡」……院裡的職工們在背後指指戳戳，院領導當面責罵，市裡也找他談話。人們早把對幾千元的公款吃喝怨恨轉爲對副院長「懺悔」的指責。副院長萬般無奈，在重重壓力下只得寫信到報社「狀告記者」，要求「澄清事實」，「還清白名聲」。而記者擺出採訪記錄和經他修改的稿件，不無遺憾地說：採訪對象出爾反爾，狀告記者，這是不正之風造成的人格扭曲現象。現在，這位副院長披露吃喝內情，反弄得「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

常常出現這樣的情形，人們對公費吃喝表現出的情緒是那樣的憤怒，而對身邊的吃喝事實却又泰然置之。人們巴望着「反吃勇氣」的出現，但他們的出現時，人們又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失望感。因爲，揭露吃喝的人往往是餐桌上走出的「酒友」。在大陸，除非你清白無瑕，才有資格去譴責別人。倘若你自己不貞不潔，就不該說東道西。而今，幾乎全大陸的省長、市長、縣長、鄉長、部長、局長、廳長、處長、科長、廠長、經理以及幾乎所有的無職而有實權的幹部，業務員，都記載着「吃公費」的歷史。有的「長」甚至創造過年吃三百餘次「公宴」的紀錄。在「餐食大戰」中，幾乎所有的「長」們都只能保持中立。「國務院發出的「金牌」——自然在餐桌面前失却了昔日的威嚴。

在世界新聞史上恐怕只有中國記者才會創造這樣的紀錄：四五十名記者可以匯聚在一個本無新聞的企業單位「泡」一下午，僅僅爲了等着吃一頓晚宴！記者們頭天被招去赴宴，第二天便登出一篇「新聞」。在國外，一篇好新聞價值萬元，而在中國，震撼社會的新聞與餐桌上寫出的新聞同價。價值觀吸引着記者熱衷寫沒人看的「吃喝新聞」。

一年吃掉六百億財政開支

一九五八年中國曾出現過一次全民大吃大喝運動，到處都開放肚皮吃飽飯。結果，吃了三個月乾飯，又吃了三個月稀飯，接着，全中國人都動員吃包粉拌紅薯藤。那一年的吃飯風，引來了連續三年的全國性飢荒。

三十年後，東方這塊還不足的土地上又

重現了一場大吃喝的浩劫。

分配不公現象使改革之車激烈地晃抖，開始失去了平衡。而對國家幹部的調查更令人難堪，幹部收入不僅不能與財大氣粗的個體戶相比，就是與「同一戰壕的戰友」的企業單位職工相比，也明顯地「落伍」了。據北京市對十六個行業職工調查表明，採掘、建築、飲食、金融、文衛體、郵電、科研職工人均月收入為一三三元。上海市對一千名機關幹部的抽樣調查，去年人均月收入低於全民企業職工十個百分點。今年七月國家統計局再次公佈，職工收入增長率依然高於幹部。

「社會報酬的交換，是大多數人愉快和痛苦的社會根源」。美國社會學家彼得·布勞說

四十年前，共產黨鼓動億萬農民革命，要去爭取一個充滿着「公平」的世界。而現在，這種「公平」在一天天地傾斜。在日益尖銳的社會分配不公現象面前，國家幹部的目擊、自尊以及責任意識在漸漸軟弱。一種強烈的失落感和心理飢餓威脅着幹部隊伍。

一種曲扭的分配現象隨之而產生了：本該屬於自己的無法得到。一九八五年以來國家幹部的兩次調資都引起了全民大增資及物價大上漲。去秋確定為幹部普晉一級工資至今未敢出臺，怕引起漲價之災。而不屬於幹部的垂手可得。許多幹部把增收的視綫轉移到另外的領域，在那裡可以得到一種「變形」的款項收入。人們稱之為「堤內損失堤外補」。無數的辦公桌紛紛從行政大樓挪到豪華餐廳，「酒後辦公」成爲提高機關辦事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大陸財政部長王炳乾當了八年的「赤字」部長。

自一九八二年以來，每年春天，王部長交給全國人大代表的那份財政報告，總擺不脫「赤字」這字眼。在中央財政的帳面上已出現這

樣一組驚人的數據：八年裡，中國大陸公佈的中央財政赤字總計七三〇億元，再加上四〇〇億美元的外債；八二〇億元的內債，實際赤字爲三五〇億元。中央財政背負着沉重的債務包袱，至去年債務餘額仍達七四四億元。從今年起，大陸進入償債高峰。中央財政每年將償還四〇〇億元的債務，佔財政年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今後幾年，只能靠借新債還舊債。儘管大陸年均償債率仍低於百分之十五，距世界確認的百分之二十五的「危險綫」有一定距離，但經濟學家依然擔憂：「吃飯財政」將有陷入「付飯財政」的危險！

財政的困境逼中共挑選兩條路：一是「火上加油」，每年加印百億元鈔票；二是「釜底抽薪」，不惜把集團消費壓下來。去年以來，大陸堅決停緩建樓堂館所。一、八萬個，清理撤並公司一、七萬個，集團消費增長率壓到一、八%。盡管如此，大陸經濟仍未渡過「險灘」，更未擺脫社會心理纏繞的公費消耗的「黑洞」。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今年大陸國營工商企業留利資金高達二〇〇〇億元，加上集體和鄉鎮企業的一〇〇〇億元，全國企業新增的自有資金，相當於中央財政兩年的總收入。只要其中百分之二十轉化爲消費資金（其中大部份用於請客吃喝開銷），全國一年就有六〇〇個億的公款從企業舖向餐桌。有人估算，過去的八年中，全國耗費在吃喝上的公款至少達二〇〇〇個億，相當於修建十個葛州壩。然而在這八年中，大陸沒能再建一個新的「葛州壩」，沒能修出一條「成昆綫」，沒能買回一艘「航空母艦」。

大陸吃喝給歷史描繪出一幅複雜的圖景：千億元的沉重債務經濟陷入重重困境。千億元的公款吃喝給社會帶來虛假繁榮。老百姓菜籃漸漸輕起來。老百姓的心情日益沉下去。請問，這樣的政權還能維持多久？▲

新書徵訂

《在理想和現實之間》

胡平著

本書收錄了“在理想和現實之間”等七篇論文，對共產主義烏托邦思想及其他一系列重大哲學謬誤作出了深入的和批判。

香港田園書屋出版。一九九零年一月。

定價：美金七點五元，另加郵費一元。

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

地址：P. O. Box 701400, Flushing,

New York, NY 11370-9998

電話：(718)429-6777

《改革死了，改革萬歲》

房志遠著

本書收錄了房志遠以丁楚、張鋼、楊天樹等筆名發表的“改革死了，改革萬歲”，“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有形之手，無力回天”等十幾篇文章，從不同的角度論證了中共政權注定要滅亡的命運。

香港田園書屋出版。一九九零年一月。

定價：美金八元，另加郵費一元。

廣告啓示錄：燃起慾望之火

十年前，當廣告的大潮還在地平線湧動的時候，誰也沒有想到它會變出這麼多無窮無盡的花樣，以至成爲很多欺騙、犯罪、腐化的源泉。

程路

地平線上的廣告大潮

中國的廣告起始於一九七九年。當時人們對這種資產階級的玩意還抱有一種恐懼感，報紙和電台由於經費由上面撥款而無需財路，總編們還拿不準「上頭」的意思，這個開放能維持多久？實際上當時中國大陸傳播媒介也實在少得可憐，除了「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兩報一刊（一刊指紅旗雜誌）外，再就是各地直屬黨報，口徑一致，報頭一律以最高指示或中央文件填充，沒有人會預料到今天的廣告泛濫。一九七八年，人民日報社開始創辦，一份四開小報「市場」，主要是爲了順應市場情況，介紹名優產品。由於該報爲自負盈虧的試點，編委會決定所登消息適量收費，但這個主意很快被否決。面對少量的經費，胸懷大幹一場的決心，一位副主編突然查到馬克思的一句話：「在商品生產上，流通和生產本身一樣重要。」並聲稱這是馬克思對廣告的評價，登在報頭處。於是歷來崇拜馬克思的中國社會終於打開了缺口，廣告像開閘了的洪流，洶湧澎湃地湧到五湖四海。廣告成爲中國傳播媒介這個不健全的母腹中的怪胎，開始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生長。

八十年代初，當廣告之風剛剛在中國大地刮起時，廠長經理們剛剛嘗到廣告帶給他們的

好處時，企業是仰着頭巴結能做廣告的單位。電台、報紙的廣告處人滿爲患，人們紛紛希望自己單位的廣告能盡快做出來，甚至不惜請客送禮。那時，能刊登廣告的單位是「皇帝女兒不愁嫁」。而時間延遲到一九八六年以後，賣方市場變成了買方市場，廠長經理們成爲「皇帝女兒」。

大陸廣告的行進是照着一條循序漸進的曲綫發展變遷的。起初的廣告，大都是直截了當地介紹某廠某種產品的功用和質量；接着發展爲既介紹某廠某種產品，又刊登廠長經理的名字；再以後，即刊登廠長的名字又配以廠長的照片。不久，中國公司熱掀起來，廣告界又發明一種以通訊式報告文學形式，介紹某廠某經理的方法，廣告戰愈演愈烈，一發而不可控制。

報告文學和廣告結婚

南京文藝出版社社長，一位八二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的少壯派，具有很高的遠見，他瞑思苦想了一條爲出版社撈錢的路。首先向工商管理局請到廣告號。然後在出版社社務會議上果斷地亮出自己的絕招——出一套中國當代明星企業家傳記叢書，每人收費五千元

這一招果然靈，相當一部份的廠長經理早已對報刊、電台、電視台的宣傳過足了癮，已經有些厭煩。他們巴望着能有一種更新更美更能留芳百世的方式爲他們樹碑立傳。書，無疑是最可傳世最有保留價值的東西了。於是，一份廣告合約反饋回文藝出版社，一張支票匯入原本空空的帳簿。書一集集出版了，錢如潮水般湧來，出版社人人興高彩烈，獎金補貼超過工資。而被寫進書裡的明星企業家們，則沒有一個人掏過一分錢，工廠、公司的公款報銷單用途一項填着：「廣告宣傳費五千元」。這種賺錢的方法別出新裁，全國各地不少出版社紛紛效法，如人民科技、教育、評文、工人、大學、少兒、攝影、美術等出版單位均出版有關明星傳記，一時間明星滿天飛。

由中國出版界引起的這場更大規模更高層次的廣告浪潮，無疑大大衝擊了報刊電台電視台的廣告市場。於是從八六年起，各大報刊廣告提成（或曰介紹）費從百分之四提高到百分之二十，甚至更高。「中國青年報」一度領先首都新聞界，報社內部廣告提成費明確定爲百分之二十五，致使大批新聞記者四處撈錢，連哄帶騙，不惜一切手段拉廣告。由於團中央的機關報作出了榜樣，下面的小報刊也不甘心落後。「遼寧青年雜誌」是共青團遼寧省委主辦的青年月刊，該刊由於發行範圍所致，廣告來

源一直不好。編委會集思廣義，立即想到了「增刊」。因為在大陸雜誌出增刊，手續十分簡單，只需上報宣傳部門批一下，獲得一個准印號即可，不像出書那麼麻煩。於是該刊在取得增刊文號後，四處聯繫廠家，聲稱他們也要出書了。並且許以一系列優惠條件。報告文學的字數可長達六千字，廣告宣傳費只四千五百元（比別的出版社少收五百元），各單位團委書記若做介紹人，可得獎金三百元，並可獲年終省級優秀團幹部提名，介紹廣告額最高者，將在全省共青團代表大會上公開表彰可免費到深圳旅遊七天。三個月後，在各級團組織的「幫助」下，增刊順利出版，扣除稿酬、採訪費用及回扣，盈利達十五萬元。這差不多是該刊一年經費的總數。

接下去的情景可想而知，嗅覺靈敏的同行馬上跟進，「增刊」飄往全國各地，集子一本本送到花錢者的手裡。左一本「傳記」，右一本「報告文學集」……可有那麼一天，精明的廠長經理們忽然發現這些吹噓他們的集子，從來沒在新華書店或報刊門市部以及個體書攤出現過。出了書沒人看，不等於白出？連現代人都不看，還傳什麼世留什麼名？等廠長經理醒悟到時，已經是一九八八年初了。

廣告魔方和變形金剛

廣告新聞、支票傳記伴隨着人們對金錢，對名譽，對虛榮的追求而繁衍成長。你不是要名嗎？搞了「新聞杯大賽」拿錢來，「杯子」給你，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你不是吹牛放海嗎？拿錢來，為你吹幾個牛皮泡泡，不過，給幾個錢，吹幾個泡。你不是要找女人嗎？拿錢來，給你二十字「徵婚」，願者上鈎！於是乎，報紙變成了「大賽」組織委員會：
「北京日報」：白菊杯新聞攝影比賽。
「中國青年報」：白天鵝杯徵文比賽，
龍鳳大獎賽。

「光明日報」：飛龍杯報告文學徵文。
「經濟日報」：白騰湖杯雜誌徵文賽。
「人民日報」：風華杯雜文徵文比賽，
燕舞杯散文獎……
報紙能「柳暗花明又一村」，電視也不能「死路一條」。你報紙能擠版面我電視就能壓屏幕：

- 「神探亨特」：由××實業有限公司獨家特約播出。
 - 贊助「寡婦村」的有：
 - ××市建築公司
 - ××縣勞動服務公司
 - ××縣燈泡廠
 - ××電子集團公司
 - ××市婦聯……
- 電台也並非呆頭呆腦，擠啊，擠時間，擠聲音！

「本節目由××機械廠贊助」。
「本欄電視由××船廠特約播出」。
……
徵婚啟事、尋人啟事、遺失啟事、交友啟事……中國的新聞媒介已經讓廣告的大潮給淹沒，廣告無處不有。像變形金剛一樣，五花八門。

只印給自己看的廣告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日清晨，一輛墨綠色郵車開出北京城，朝北京北郊山區的平谷縣開去。這輛郵車對於平谷縣幾十家鄉鎮企業來說，是很重要的。廠長、經理們以致大隊書記、隊長們幾乎到望眼欲穿的地步。大華絲織廠的廠長們人人換了一套新衣服，準備一旦報紙一到，便挨個分到每個幹部職工手中，因為這是他們這家小工廠第一次上報。
這輛郵車上裝着整整一萬份當日出版的「中國人才報」，該報第四版，以整版篇幅刊出了一組介紹該縣鄉鎮企業的文章，收費二萬元

人民幣。二萬元，對於吃北京市政補貼的貧困地區平谷縣來說，不是一個小的數字，但當「中國人才報」記者和一位副總編在縣政府接待室「大侃」他們報紙的發行量和影響面如何之大時，那些鄉鎮企業的廠長、經理們在縣長微笑的點頭下都同意出這筆錢，他們第一次為一家全國性大報紙所青睞，他們有些誠惶誠恐，憧憬着未來幾天後，訂貨的合同雪片樣從全國各地飄來，大把大把的貨款將通過銀行轉入自己廠的帳戶裡。他們相信那位副總編的話：「中國人才報」是一張全國性大報，有一百萬以上的讀者。

然而，令平谷縣老鄉們感到困惑的是，這一整版廣告性文章刊出後，如泥牛入海，一點動靜也沒有。

半個月後的一天，該縣皮鞋廠一位推銷員帶着有該廠廣告的「中國人才報」到山西太原市某商場推銷，一邊滔滔不絕地大談該廠皮鞋如何物美價廉，一邊拿出報紙讓客戶看介紹他們廠的文章。無巧不成書，該商場業務科正好訂有該報，一位副科長聲稱從沒看過這篇文章，而他因為工作不忙，天天看報從第一個字看到最後一個字，連報紙也不放過，並且過目不忘。該副科長說罷從報夾上抽出該日報紙一核對，上帝！這兩份同日出的版的報紙第四版居然完全不同，正常發行的報紙上，根本沒有平谷縣的廣告文章。一樁中國廣告界特大醜聞發生了。這位鄉下的推銷員差點沒氣暈過去，大罵狗日的「人才報」，立即將情況報告廠裡。當日情況匯報到縣太爺處，縣太爺覺得自己栽在幾個小記者手裡實在窩囊，第二天一狀告到中紀委。此官司打了半年才算清楚。原來「中國人才報」刊有平谷縣文章廣告的報紙只給平谷縣鄉鎮企業印了一萬份，而發行的報紙則刊登其它廣告。該報生財有道，一張報紙登兩種廣告，戲弄老農孤陋寡聞，一千多元的成本，賺了二萬多元，真可謂中國報刊廣告界的「優秀代表」。

兩虎相爭，報界得利

對於大陸傳播媒介的廣告，中國老百姓稱之為「用錢堆的垃圾」。而工礦企業的頭頭們則既恨之又求之。一位天津企業界人士跟筆者講了下面一段真實的故事：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二日晚上七點三十五分，天津市工人文化宮體育館即將舉行一場籃球比賽。這天該體育館熱鬧非凡，各大報刊電台記者頻繁出入，中央各報駐津記者也來了，更令人矚目的是兩輛電視採訪車，一輛電視轉播車也開到體育館外，館外停車場密密麻麻排滿了大小汽車，觀衆人滿爲患。但今天的比賽絕非世界杯大賽，而是天津市兩個工廠之間的「友誼賽」。

離正式比賽還差五分鐘時，被一群記者簇擁着的天津三峰電冰箱廠廠長李偉成，環顧四週，發覺他們邀請的各界人士及全場職工幾乎全部就位，他深深感到錢的力量。對於這場比賽，李廠長花了大量心血，因為他的對手是可耐冰箱廠。在天津市，兩家廠的產品和質量是勢均力敵，難分上下的。面對日益蕭條的冰箱市場，這場籃球賽實際是一場對抗賽，勝負之分關係到在客戶的影響和銷路。於是三峰廠專門成立了比賽籌備辦公室，由李廠長親自出面前往市體委籃球隊隊求援，希望該隊能借一個球隊代表本廠參加比賽。對方一口應允，條件是廣告贊助費一萬五千元，另每進對方一球，加收二百元。廠長二話沒說，當即答應下來。隨後便邀請各報記者捧場，出席費一百元，並與記者代表商量後宣佈。如未該廠贏了這場比賽，記者如能發消息或報導，每字稿費二塊錢，這恐怕是當今中國最高的稿費標準了。同時又通知全廠職工，必須觀看比賽，每人發獎金十元，否則算曠工扣工資一天。

坐在對面看台正中的可耐冰箱廠陳寅華廠長神色傲慢而自信。對於今天的比賽，他同樣充滿必勝的自信心。

陳廠長對這場事關該廠聲譽的比賽極爲重視，同樣以重金邀請各大報刊電台記者觀戰，並以每分鐘一千元的價格請來電視台轉播新聞小組，要求轉播全場比賽，預付定金五萬元。有趣的是，陳廠長也去市體委撤兵，借得同爲市籃球隊的隊員，條件幾乎與三峰廠相同。由於兩廠的借人行動均爲絕密，除了一石二鳥的市籃球隊之外無其他人知道。

比賽開始後，兩軍對峙，撕殺得難分難解，分數顯示牌交替變換數字，比分一次又一次拉平。當全場觀衆開始看出苗頭，爲時已晚，比賽以五十六平結束。兩廠廠長全部看呆了，十幾萬元人民幣如此被騙，有口難言。市籃球隊和各報、台記者興高彩烈，滿載而歸。

目不識丁的廣告記者

也許我不該寫他，因為他的父親是筆者的朋友，也是聞名全國的農民企業家。但他的經歷可以證明中國大陸廣告界的骯髒，所以我也只好冒犯老友了，爲了必要的顧忌，我們稱他爲小K。

小K做夢也沒想到他能得到一本記者證，成爲南方著名晚報的新聞記者，小K只讀過兩年小學。九歲那年因爲父親被打成反革命而關進監獄，他便再未上學而整天在田野地頭打滾，十年改革中，他父親以其特有的聰明和勇氣，從一個小鉤釘廠發展成具有四十一家家電企業的「鴻運電器集團公司」，成爲大陸名人。小K的父親紅了，小K也跟着紅了起來，不少鄉鎮企業爲了能與小K父親的企業發生業務聯繫，不惜高薪千元以上禮聘小K。但小K很少認真過。因爲小K家的存款早已超過七位數字。錢，對於小K已不很重要。

一天，廣州「羊城晚報」一位大牌記者奉中宣部之命來鴻運公司採寫一部以老K辦廠經歷爲綫索的報告文學。該記者下榻小K家豪華洋房裡，時常與小K去餐廳飲茶，看到小K十

分羨慕記者這一行，該記者靈機一動，問道：「你想做記者嗎？」小K聽之一愕，馬上說：「當然，記者證多有面子，又受人尊重。不像我爹他們，只有錢。可是我是做不了記者的。」小K的臉色不無傷感。

大記者疑惑地問：「爲什麼？」

「我不會寫字，目不識丁。」小K坦白說。

「我不見得，如今識字的不一定能辦事，能辦事的也不一定識字。」

「話雖這麼說，可記者不識字怎麼工作？」

「沒問題，我是編委，有權調人，本報最近新成立經濟信息部，我回去就推薦你駐該部記者。」

……

兩星期後，小K被農轉非調入「羊城晚報」經濟信息部。據說該報編委會一致同意。於是寫不出中國字二十個的小K開始對人亮出閃閃的記者證。當然，任何事情都是有條件的。小K的任務是代表報社與鄉鎮企業談廣告業務，每月向晚報提供一萬元廣告費，餘下時間自由支配。區區一萬元廣告費對小K來說輕而易舉。光他老爹的公司一年廣告費就超過二百萬元，還有那數不清的關係企業。於是，一張記者證，爲「羊城晚報」換來了一筆固定收入，以名換錢，以錢買名，這就是大陸廣告業的技巧之一。據說小K基本上沒有在報社露過面。整天全國各地飛，反正他有的是錢，不花報社一分錢，車馬費只需要若干空白介紹信而已。報社自然隨時滿足這位財神爺。所以，最近一位朋友從國內打電話告訴我，小K現在專門採訪青年女性，而且在羊城頗有名氣，因爲已經有八、九位漂亮姑娘挺着肚子來報社認「爸爸」來了。搞得主編、社長上下班要從後門溜。

千金一擲買詩歌大獎

如果說「羊城晚報」要小K是爲了振興報業，廣開財源，因社會風氣所致，不得不如此的話，只能說明大陸新聞界被銅臭所蝕，不可救藥。但素以清高淡泊著稱的中國詩人又怎麼樣呢？請看下文：

杭州，不但是世界聞名的風景旅遊城市，還是中國二十世紀歷史文化名城之一。蘇軾、白居易都曾在此留下過踪跡並以充滿戀情的筆調讚美過杭州。蘇東坡之後，詩歌一直是該市文化的主要傳統項目，歷史悠久，文化薈萃，八九年來，該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決定爲振興詩歌創作，舉辦一個全國性的詩歌大獎賽。對一至五等獎詩作，一律編印成書，留給後世。於是由一名市委書記掛帥，遍邀國內外名詩人、作家做顧問、評委，緊鑼密鼓地開始張羅。最關鍵也是最頭痛的是市政府撥給的一萬元經費遠遠不夠，尋找贊助單位成爲籌委會當務之急。一雙雙手伸向富廠、大公司，一個個不買帳的回答讓籌委會成員恨不得自殺。如今的社會，詩歌是文學殿堂裡最不值錢的玩意，全國三本詩歌雜誌每年賠錢二十幾萬元，最暢銷的詩集也不過五千冊。這年頭，哪有人閑着哼詩？沒有錢，什麼賽也辦不成，更別提獎。正在籌委會萬般無奈之時，「杭州文藝」一編委忽然提起吳鎮服裝廠有位副廠長平日喜歡寫兩句打油詩，一次投稿該雜誌被作填空用了四句，一週後雜誌社稿費還未寄出，却收到作者給責任編輯寄來了五百元編輯費，曾在杭州文化界轟動一時。於是籌委會緊緊抓住了這棵救命草，立即派人趕往這家鄉鎮企業。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向這家廠長說明來意，廠長二話沒說問道：「需要多少錢？」作家副主席咬了咬牙道：「二萬五千塊。」

「二萬五，沒問題，但我弟弟……」面對這兩兄弟的正副廠長，詩人們低三下四地聆聽該廠贊助的條件：一，該廠廠長必須是評委會主任；二，由該廠副廠長寫一首詩，必須評一等獎。

詩人們的自尊心受到打擊，但眼前愧動的票子又令人不捨。幾個星期來，爲了這筆錢，他們幾乎要上吊。現在條件盡管苛刻，但爲了大賽如期舉行，爲了不使人們忘記他們這些詩人的存在，詩人們終於在合同上簽了字。

回到城裡，籌委會主任陷入沉思之中，原來大賽評委會主任早已聘了一位全國作協副主席，連請柬都發出去了。現在如果推翻服裝廠的合同，二萬五到那兒去找？思來想去，只得做出一個兩全之策：本次詩歌大賽設兩名評委會主任。一個罕見的決定。

當大賽消息在各大報刊公佈後，應徵詩作如雲而集，杭州市一時間成爲中國詩壇的中心，大陸文學界爲之震動。

評選工作接近尾聲，一首來自吳鎮服裝廠的「一等獎」詩作，飛到大賽評獎委員會辦公室，第一個拆開信封的評委讀罷呆若木鷄。

「革命形勢好，工廠出現新面貌。兄弟廠長帶頭幹，全廠職工哈哈笑。革命生產形勢好，家家拾得金元寶……」作者，該廠副廠長。

幾十分鐘內，這首打油詩在所有評委手中傳遞了兩輪，有的氣得咬牙切齒，有的看後捧腹大笑。大家一致認爲，如果這首打油詩獲得一等獎，無疑是對中國詩歌的歷史和今天是一場災禍，是對詩壇的沾污。

但是，如果該詩不獲獎，服裝廠將撤回廣告贊助費，一至五等獎的獎金沒有了，已印好贊助者大名的所有紀念品全部作廢，本次詩歌大賽將半途夭折。

錢！錢！！錢!!!，在金錢這個萬能的玩意兒面前，詩人們最後終於無可奈何地低下了曾高舉的頭，中國詩人的良心被拍賣了。

於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九日，「西湖林詩歌大獎賽」隆重揭曉。當晚，在市文化會堂舉辦「獲獎詩人詩歌朗誦會」。當一等獎得主得意洋洋地用洋腔腔朗誦完他的詩作時，整個會場變成一片。神聖的宮殿塌了頂，不少聽衆忽然

退場。

詩人的良心在哭泣，但這個社會，金錢可以主宰良心。

人體增高器的悲喜劇

「你想解除近視眼帶來的苦惱嗎？請選用『BPR』近視眼藥水。該眼藥水選用名貴中藥伏生紫燕製成，榮獲國家銀質獎，經上海眼病中心防治所臨床驗證，對治療青少年近視眼療效高達百分之九十八以上……請向河北獻縣健康商店郵購，每瓶人民幣……」

這種廣告出現在「中國青年報」、「中學生活報」、「中國青年」雜誌上，使無數深受近視眼困擾的青少年，不惜重金踴躍購買。然而當這些「神水」被天天點入那些純真的眼睛裡時，近視不但沒有治好，却變成了其它眼病，甚至失明。

一九八七年下半年，中國有四十餘家報刊刊登了河北滄州、邢台等地企業廣告。廣告異口同聲地聲稱他們發明了「人體電子增高器」並在各地向中國矮人們宣告——「經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院鑑定，男女青年每天使用，半年可增高五至七厘米！」這種神奇的「人體電子增高器」售價二百元左右。

中國的「殘廢人」們狂歡了，許多人以爲科學可以幫助他們從矮人國中解脫出來，半年五至七厘米，一年就是十幾厘米。金錢像潮水般湧進廠家的帳號，幾塊破電極片寄到夢想增高者的手中。

馮平是上海某區機關的工作人員，他的家庭背景、工作環境等都不是很不錯的，但直到三十歲都找不到如意姑娘。原因僅僅是因爲他的身高只有一米五七。一米五七的男人在大上海純屬超級殘廢。馮某整日無精打采，同事好心給他介紹一位郊區縣的售貨員，儘管對方戶口難以進上海，但有女人總比沒有女人強。因此，小馮與那位姑娘正式談戀愛了。不料就在這

兵臨報社

這是作者目睹軍隊進駐報社實行軍管的真實紀錄

個時候，馮平從報紙看到了那條有關「人體電子增高器」的廣告。他立即深信不疑，一面火速將錢匯給河北廠長，一面給郊區的姑娘寫了封絕交信，因為馮某相信，只要他超過一米七，機關裡追他的姑娘會排成隊。

不久「增高器」寄來了，馮某天天用，夜夜用，一天當二天使，恨不得立刻成爲大個子。

但二週後，馮的身體感到異樣，渾身一陣疾痛後，倒地再也爬不起來了，經診斷是脊椎嚴重灼傷，終身癱瘓，馮某後悔已晚，官司至今打不清。

廣告原來只是流通過程的一種特殊手段，但在大陸一切朝錢看的思潮影響下，廣告真假難辨，令人無法相信。翻開大陸雜誌、報紙，

廣告充斥版面。「回春神力丸」、「學習記憶器」、「速敏治癌靈」等等五花八門的廣告令人眼花繚亂，展現出大陸社會的一種無序狀況和情緒，這種混亂何時結束，沒人知曉。

廣告是一面鏡子。通過廣告能透視人與世界，世界與人的錯綜複雜的關係嗎？▲

在民主國度，新聞機構被稱爲「大眾傳媒」，隨時歡迎公眾來訪，提供和交流信息資料。而中國大陸的新聞機構，則被視爲「機密單位」，「無產階級專政的要害部門」，不但對外界群眾是封閉的，對內部員工也實行嚴密的專制統治。本篇記述的是筆者文化大革命中在內蒙古報社工作時的一段經歷。

報社被軍管，出入見槍炮

「內蒙古日報」是家省級大報，雖然發行量祇有十幾萬份，但因使用雙語，分設漢編和蒙編兩個部，各有三四百人，再加上附屬機構人員，編制近千，遠比內地報社陣容強大。（如「甘肅日報」四百人、「四川日報」六百人）。

由於知識份子成堆，民族關係複雜，因此報社是內蒙歷次政治鬭爭的重點單位，右派多，黑幫多，神經病多，自殺和勞改的也多。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拂曉，北京軍區奉毛澤東和林彪指令，派遣滕海青和六十九軍以

突襲方式接管內蒙古自治區。數萬名裝備精良，胸掛毛澤東像章的內地士兵閃電般開入呼和浩特，迅速佔領建築制高點和所謂要害部門，包括鐵路局、發電廠、電報大樓、廣播電台和內蒙報社等。

那時我剛到報社，在理論組作見習評論員，每天都得從東院宿舍騎自行車到西院辦公樓上班。那天一早來到西院門口，霍然看到兩個持槍的士兵在門口站崗，連忙跨下自行車詢問究竟，原來報社已被軍管，出入都要憑工作證了！

當天下午，全社職工開大會，由靠邊站的原社長主編介紹新來的軍方領導。內蒙軍區政治部宣傳處長石克任軍管會主任，解放軍報社駐內蒙記者站站長金鋒任副主任。二人同爲軍中文官，又是辦報的同行，雖爲蒙族，但蒙漢兼通，能寫一手好文章，因此人們對他倆還不算反感。

接着宣佈軍管紀律，限制人們的種種行動自由，引起人們很大意見。尤其早上跑步出操，對於熬夜爬格子的文人們實在不堪消受。後

來實行起來矛盾百出，爲了保證按時交稿，祇得允許「因公請假」。久而久之，請假的人越來越多，出操這一項也就不了了之。

不久，報社換發新證件，記者證、電報憑照、邊境通行證等等，一律加蓋了「八一」軍用公章。報社門口的大牌子，也改成「中國人民解放軍內蒙古日報社管委會」。接着有一個連士兵開來進駐，而且四門高射砲架在院子當中，時常有射手門圍着大砲搞訓練。

報社門口有個閱報評報專欄，以前總有人擠在那裡看，如今冷冷清清，老百姓對槍砲砲的避之唯恐不及。幾位老報人背地裡竊笑：「唉，成了兵管倒也不錯，清清靜靜的，少了許多干擾。」「乾脆，給咱哥幾個也發軍裝算了，吃軍餉比咱們的工資多十幾塊呢！」

我曾爲「軍管報社有沒有必要」這個問題煞費苦心。派兵守門莫非怕人搶劫？不通。報社不是銀行或商店，幾張破紙一堆鉛字，一大群光吃飯不生產的窮文人。我實在看不出，在政經合一而且高度集中的中國大陸，除了政府之外，還有誰想或者誰能覬覦這塊「肥肉」。

彭惠

既然一直都是「官營」和「官管」的，何必還要畫蛇添足，搞什麼「軍管」？

架設高砲防空襲？更屬笑話。一旦戰爭打響或空襲發生，正常郵政交通會首先中斷，有報紙也發不出去。那時唯一有效的通訊手段大概祇有無線電廣播，因此電台防空還有道理，而報社防空則實屬不智。……

社論聽領導，消息可編造

後來，我被調到總編夜班室，當第三版責任編輯，開始接觸到報社運作的核心部份，也逐漸洞悉到軍管會的某些用意。

剛進報社時，我曾和大多數門外漢一樣天真地認為，報社的中樞部份是它的主編辦公室，即主樓那間備有豪華皮沙發和紅色電話（直通黨政軍要人住宅）的大房間。其實錯了，那祇是外表，是搞交際應酬的地方。真正的核心是它的夜班室，位於印刷廠一個不被人注目的小角落裡。

內蒙報和其它日報一樣，每天凌晨出報，七點準時裝車送郵。就出報過程看，所有的記者、編輯、通訊員，都不過為編報搞前期服務，提供稿件原料，而站在第一綫把它們烹調成食品，擺上讀者餐桌的，則是它的一幫夜班工作人員，包括傳真接收台、總編夜班室等。

我們編輯室很大，放八張寫字檯還寬寬綽綽，每兩人負責一個版面。我和資深老報人夏祥分管第三版，即地方新聞版。編輯室東頭連接主編室，是夜班總決策人的所在，照例由報社的主編和三位副主編輪流座莊。我時的負責人是軍方新任副主編李夢奎，此君原為石克手下一個營級科長，編過軍區小報「邊疆戰士」，現在一躍而為省報副主編，正所謂躊躇滿志，春風得意。

我們每晚十點上班，先到主編室開一個小時「定稿會」，由李夢奎把總編室簽發的稿件題目和字數向大家說一下；再由接收台台長老

蔡把當日新華社電訊稿做個概況介紹，然後按版面和字數要求劃分一下稿件，分頭開始工作。

從我們劃好版面送交車間，到收到大樣開始一校，這中間有兩個小時空閑，編輯們常常聚到小餐廳裡，一邊宵夜，一邊神聊。大家喝着特供的奶茶，吃着免收糧票的月餅，燒麥，或者牧區食品酪蛋子，述說各自知道的奇聞軼事，其中最多的，還是軍管會以來報社出現的「新風尚」。

如果說，以前共產黨對新聞工作的控制，主要通過方針政策，一般並不干涉到技術運作的層面，起碼表面上還尊重它的職業特點，那麼軍管會以後，黨軍官僚完全把報紙置於自己的直接操縱之下，連形式上也不再顧忌什麼新聞事業的獨立性和真實性了。

老報人們稱軍管會的政策為「大緊大鬆」，緊的是社論，鬆的是消息。

社論一向都比較「緊」，多數需要總編室把關，重要的甚至要經自治區黨委大員審閱。但不論多「緊」，仍是本社之論，應由本社來寫。然而軍管會以後，一切社論都由滕海青的辦公室（簡稱「滕辦」）包辦代替。有時是「滕辦」的內部文件摘要，有時是滕本人的講話記錄稿。總之，凡是「滕辦」要告諭小民們一體周知的事項，皆以社論名義見報。

偶爾「滕辦」人手不夠，也讓報社派人寫些次要的社論，但提綱「滕辦」擬，稿件要送審，修改定稿以後，必須有「滕辦」簽字，才准見報。因此評論組的人常常被譏笑為「滕辦」的「復寫紙」和「傳聲筒」。

然而，對於消息和通訊的撰寫，軍管會的態度又「鬆」得離譜。

當時辦報有兩條不成文的規矩：一是國際和全國新聞全以新華社電稿為準，不許地方報刊發表任何意見；二是祇報喜不報憂。即使報喜的新聞，其措詞用語，也要與新華社統一口徑，不許標新立異。

如此一來，記者們祇有編造一途。譬如，毛澤東發表了某條「最新最高指示」，新華社馬上報導，首都和全國軍民如何「意氣風發，鬪志昂揚」。內蒙報也得立即反映，當地各族人民如何「意氣風發，鬪志昂揚」。有次我當面問一位駐站記者，「你們稿子上經常老牧民道爾吉說什麼，老貧農李大爺又說什麼，這個工廠抓革命促生產搞的好，那個大隊學大寨有成績等等，你們真採訪過這些人和地方嗎？」他嘿嘿一笑說，那都是胡編亂造的，不但造人名地名，而且造產量數字。「既然大家都編，你那麼認真幹什麼？」

誰要想當官，爭取寫內參

局外人一般不知道，大陸報社的產品，除了一張日報，還有發行範圍不等的各種「內部參考材料」，簡稱「內參」。報紙的目的主要為了愚民，而「內參」則為特權官僚提供比較真實的資訊和情報，否則維持統治是困難的。

「內參」在新聞業中佔有特殊的地位。據說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皆有一批專門寫「內參」的「無冕皇帝」，有時為老百姓伸冤，更多的是為內部爭權效力。內蒙報社表面上要求所有的記者都「兼寫內參」。實際上祇有被重用和信任的人，才有更多寫內參的機會。就連印刷內參的工人，也必須是黨員和積極份子。

由於「路綫重於事實」，所以連寫內參也講階級鬥爭，與其說從事實出發，不如說從官僚們的政治需要出發。

筆者被派駐巴盟期間，有一次專訪河套地區的農業學大寨會議，恰好趕上五原臨河兩縣天津知青和當地農民的大規模武鬥。報社電令我立即把事件寫成內參寄回。本來武鬥的起因是知青偷殺老鄉的鴿，搞「百鴿宴」，雙方各有數百人參加，而且互有傷殘。可是「滕辦」想借這個事件壓制農民對知青政策的不滿，所以到內參發表時，變成了農民欺侮知青，幾百

名農民打幾十名學生，農民沒人受傷。從那次教訓以後，我再也沒寫過任何內參。

不過，因為內參有較多機會表現個人的政治敏感度和接近上層決策圈子，易被掌權人物賞識和提拔等等，所以一班有官癖的文人還是趨之若鶩，甚至把主要精力放在寫「內參」上。

根據老夏的分析，寫內參成功的訣竅有兩條，一是看「風頭」；二是走「門子」。看風頭就是預測政治風向，爭取在節骨眼上一舉成名。石拐煤礦鬧罷工時，大多數人都認為那是送禮者有之，美人計者有之。一位駐呼盟記者，多次呈遞內參稿沒人理，急中生智跑到鄂倫春旗買了二兩上等鹿茸，連稿件包裹起來，一併寄給一位需要壯陽的常委。結果也很靈驗，不但內參發表，而且很快被任命為呼盟宣傳部副部長。

其他因內參而升官的人還有不少。比如，有的因揭發烏蘭夫餘黨有功而調升到新華分社，有的因批判「民族分裂」而被任命為各盟市黨政要員。在大規模「挖肅內人黨」的民族迫害高潮中，用內參染紅頂子的人更是多得不可勝數。由於寫內參等於告黑狀，可以加油添醋，無中生有，不負責任，而裁判官祇是少數偏聽偏信的權貴，被告人不僅無權辯解，甚至根本不知道有人在整你。因而有人估計，大陸冤假錯案的大部份，和內參有某種關係。

然而，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個別因寫內參而倒霉的例子也有。蒙編部有位老兄，對於他的家鄉哲里木盟從內蒙劃歸吉林省管轄表示義憤，因而在回家探親時搜集了不少牧民們的怨言。但回到報社一直壓在抽屜裡，沒有膽量上書建言。七〇年底中央民委有個調查組到內蒙來開座談會，他在會上聽到一位常委跟他的觀點相同，由此估計政治氣候要變，趕緊遞上他寫的內參。豈料風向沒有變，中央和「滕辦」仍然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歪風」。他的內參成了一篇「反面教材」，那位常委被調離內

蒙，他也失去記者資格，被貶到夜班室當校對員。

檢字出差錯，差點人頭落

總編夜班室的內幕新聞多如牛毛，但堪稱離奇和驚心動魄者，還是筆者親身經歷的一個事件。

那時候中共剛剛開完「九大」，劉少奇正式倒台，毛林及四人幫文革左派與周恩來調和派之間的聯合陣綫剛剛建立，新聞媒介每天充斥著對劉少奇的謾罵和對毛澤東的吹捧。

熟悉報社字盤的人都知道，它的字模排列注重一套宣傳邏輯，就是把經常使用的詞組和語匯排列在一起，為的是快速便當。多年以來，中共主要領導人的名字，如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鄧小平、陳雲等，都是緊挨在一起的。文革以來，他們之間雖已分裂和敵對，但字盤的格局並沒變。事件也便由此而產生。

出事這天晚上，鉛字房裡先熱鬧了好一陣。原來是檢字工周智理剛從北京歡度新婚蜜月歸來，照習慣要給同事們散發喜糖。

人們一邊吃「大白兔」奶糖，一邊開新郎的玩笑。小周是呼市本地人，在後山下鄉插隊期間結識了北京知青馮小蘭。當時北京知青大都不願意嫁給內蒙人，怕將來斷了回北京的路子，因此小周很費了一番心血才把小蘭的心拴住。這次旅行結婚專程到北京拜見岳父母，深得二位老丈的好評。

熱鬧完畢開始幹活，小周還是老工作，為頭一版檢字。但今天他檢的很慢，是休假休得手生了？還是因為老走思，想着在空幃中等待着他的新娘娘子？

「不行，得加速，不能讓大伙兒恥笑。」他提醒著自己，拼命往快檢。

一篇三千多字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終於檢完了。他略喘口氣，把四盒鉛字併到一

起，到滾樣機上打出小樣，也不及細看，就送到校對員李玉林的寫字台上，忙著又去檢另一篇文章。

事有湊巧，李玉林年輕沒經驗，是個砲筒子性格，不久前又和小周吵過一架，至今耿耿於懷。他拿起小周的小樣開始校對，越看越皺眉頭，接着一拍桌子，大喊：「好你周智理一樁子頭指向劉少奇和烏蘭夫的普通造反行為，而記者伍青雲則嗅出了不同味道，他估計中央要鎮壓，因此在他寫的內參中極力誇大罷工造成的損失和破壞。果然，不但「滕辦」大加賞識，而且由周恩來批准轉發全國。此君一砲走紅，平步青雲，被提拔為「滕辦」寫作組組長。

走門子就是千方百計找到關係，把稿件送到權貴人物家中或辦公桌上，祇要大員們高興，就可以簽字印刷，做內參發行。這個權限全在「滕辦」和幾個常委手中，因此打通滕海青和常委們的關節就成了官迷記者的目標。請客，吃了豹子膽，敢出這樣的大錯！」

他的本意不過想鎮小周一下，讓他當面向自己服個軟而已，沒想到這一喊小周一點也沒聽見，却驚動了東頭夜班室的人們，大夥圍過去看那個小樣，一個個都嚇得變了臉色。

原來稿件中有四個地方提到「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他把劉少奇三個字統統檢成了「毛澤東」。問題的嚴重性，是不言自明的。

「我的媽呀！」女校對劉玉芬倒吸了一口冷氣，急忙躲得遠遠地。

還是老夏反應快，他用手一推李玉林：「還不快給小周送去重檢？這麼馬虎，太不像話！」

小李這才省悟過來，馬上拿起小樣和字盒就走。

「慢着」，穿軍裝紅領章的李夢奎已經站在他身後，兩隻警惕的眼睛正盯在小樣上，「給我看看」。

李玉林祇得無可奈何遞給他。李夢奎看完勃然大怒：「這不是一般的馬虎大意，而是反動透頂！」

他抓起電話，通知警衛班派兩個士兵先把小周看管起來。然後，又召集夜班科室負責人會議研究處理辦法。雖然會議一致認為這次事故很嚴重，但處理意見很不統一。老報人都認為小周是無意的，過了時的字盤也是事故的客觀原因。再說剛併成小樣，一校都沒過，難發表見報還差得很遠，理應對他批評教育為主。而軍方則認為，周智理富農家庭出身，有犯罪的階級根源，必須移送法辦。

到底胳膊不過大腿，還是軍方說了算。李夢奎先請示過石克和金鋒，接着向公安廳報案。半小時以後警車趕到，兩個法警記錄取證，又對小樣和字盤反復拍照，然後集合全體職工。當場宣佈對周智理「拘留審查」。可憐的小周被戴上手銬，推入警車，駛向牢房。

周智理被補以後，他的新婚妻子茶飯不思，整日哭得淚人般，到處找領導求情伸冤，但誰也不敢為這樣的案子出頭說話。最後她終於病倒了，被娘家人接回北京去治療。

周的案子在公安廳拖了半年多，查來查去實在找不出他有什麼反動思想和行爲。雖說家庭出身不好，但一向工作積極肯幹，連任過好幾屆團支部書記。最後公安廳定性為嚴重責任事故，建議報社軍管會具保釋放，仍回報社監督勞動，改作裁紙工，不再接觸鉛字。

不過，事件的餘波久久揮之不去。李玉林覺得對不起小周夫婦，長時間在報社的朋友中間挨人指點，抬不起頭來。老夏則悄悄告誡小青年們多長心眼，提防着那些「四個兜兒」的（軍官）。

眼前的活教訓使人心寒，加上一打三反的風聲日緊，文字獄大行其道，泛濫成災。據說在內蒙一些小報社和印刷廠，不僅有人因檢錯字而鐐鐺入獄，甚至還有的丟了性命。檢字工們一下子聰明和謹慎起來，他們私下商定了很

多保護自己的辦法。譬如：把一些容易弄混而又非常敏感的人名和詞句改變位置，在字盤上遠距離分隔開來。要好的朋友之間還達成協變，叫做：「一校自己幹，二校互相看，沒有錯誤才給校對員，見了當兵的遠遠站。」

即使有了以上自保和互保的措施，檢字工們拿起稿子時還是不免雙手發抖。其速度和效率自然可想而知了。李夢奎和其他軍官曾想扭轉這種趨勢，鼓勵工人們加快速度，但他們反駁說：「出了政治事故你們負責？」以其人之

新書徵訂

·丁楚《民主運動的孫子兵法》

民主中國書林將在“六、四”前推出丁楚的《民主運動的孫子兵法》（定價六美元一冊，郵購包括稅費六美元半）。

丁楚先生任《中國之春》主編，下筆犀利，立論精闢，其大作近年傳遍海內外。為配合“六、四”週年紀念活動，民主中國書林特將丁楚先生的專集付梓印出。欲購者支票抬頭請寫：Democratic China Books
勿忘地址為：870 Market St. 914,
San Francisco, CA 94102
電話：(415)291-9951

捷克：東歐最成功的大選

在東歐的劇變中，捷克民主力量的成就首屈一指。在這場歷史的大轉彎中，以哈維爾為首的民主派是怎樣走過來的？

馬怡陽

布拉格春天終於來臨

一九九〇年六月九日，經過五十二年沒有選擇的苦難歷程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節慶般的喜悅中，完成了革命後第一個自由大選。以臨時總統哈維爾為首的「公民論壇」和「公眾反暴力」組織，以百分之五十二的優勢，取代了共產黨四十二年的統治，正式組成由捷克人民自己選擇的民主政府。

九日下午，以酷愛音樂和富有幽默感著稱的捷克人民，在首都布拉格老城廣場，舉行大型露天音樂會，慶祝捷克的民主選舉。當樂團奏起著名音樂家斯梅塔那的交響樂「我的祖國」時，許多人激動得熱淚盈眶，伏爾塔瓦河畔響起一陣陣歡呼聲。布拉格的春天終於來臨。哈維爾總統亦出席了當天的慶祝並發表演說。

自從去年十一月捷克的「天鵝絨革命」後，一千五百萬捷克人民便在「戲劇家總統」的領導下，成功地使捷克由專制獨裁變成民主的舞臺。二十二個政黨參與了今次的大選。三千五百多候選人，角逐國會兩院三百個議員席位；一千七百多候選人角逐捷克國民大會代表二百席；一千一百人角逐斯洛伐克國民大會代表一百一十五席。全國約一千一百萬選民參加了投票，每個選民在投票站獲得參、眾議員和國大代表共三張選票。

在參選的政黨中，選票走向主要集中在三種政治力量上面：

(一) 公民論壇和公眾反暴力組織，分別代表捷克與斯洛伐克的民主反對勢力。在去年十一月革命中推翻共產黨統治以來，組織臨時政府實際領導着國家。公民論壇在捷克獲百分之六十選票，公眾反暴力在斯洛伐克獲百分之三十二選票。兩團體聯盟在全國總計獲得百分之五十二的選票，構成執政的基礎。

(二) 共產黨時代的「民主黨派」——基督教民主聯盟，由以前合法存在的花瓶黨「人民黨」轉變而成。由於該黨在六八年和八九年最起而反對共產黨專制，故獲得了信譽，成為僅次於公民論壇的第二大政治勢力。該黨在捷克獲得百分之七點五、在斯洛伐克獲百分之二十二點五的選票。全國總計約百分之十五。該黨大選前預測可望獲得百分之三十選票。由於前不久「人民黨」領袖巴通尼克被揭發目七一年來一直為秘密警察做事授薪，使該黨聲望大損，成為大選中最大的輸家。現任副總統的「基督教民主黨」諾果斯基原可望由哈維爾總統提名為正式總理，也因巴通尼克事件而失掉了機會。

(三) 共產黨，執政四十多年於去年十一月被人民示威所推翻，在大選中僅獲得百分之十的選票。一般認為捷共聲名狼藉，獲此結果已算

不惡。

其它政黨入選者有，最極端的斯洛伐克民族主義政黨「國民黨」，以自治為政治訴求，獲得全國總數的百分之十二選票。其餘政黨如「綠黨」、「民主論壇」、「啤酒之友黨」、「農民聯盟」等，雖在「公民論壇」和「基督教民主黨」之間分享了部份選票，但按照百分之五的選票始能成為議會政黨的規定，皆未能獲得議會席位。

哈維爾不愧是政治高手

雖然捷克地下反抗運動歷史悠久，人才濟濟，「公民論壇」與其領袖哈維爾的獲勝並非理所當然。被人稱為「理想主義者」、「業餘政治家」和「戲劇家總統」的哈維爾，除了個體不羈的非政治化的個性外，還具有非常圓熟老到和剛毅果斷的政治家秉性。畢竟，五十三歲的哈維爾，在其一生中一半的時間內從事反抗專制的鬭爭。此次大選之役，使哈維爾的政治歷練終得伸顯。

按照捷克政治傳統，總統在位時，不應支持任何政治派別，以示元首地位的公正和超然。這樣，「公民論壇」奪取政權後，曾一度宣佈無意參與大選。今年三月筆者前往捷克訪問時，「公民論壇」總部的人士還如是說。故當



政治強人哈維爾

時最大的政黨為「人民黨」，後轉成「基督教民主黨」。

由於哈維爾總統的寬容政策，共產黨系統的幹部基本上保持原狀，只是中央政府各部作了更換。由於過去共產黨對捷克煉鋼企業——奧斯特拉瓦礦工進行高薪收買，革命後亦保持了相當的基礎。

因此，大選之前民意調查「公民論壇」、「人民黨」和共產黨，基本處在卅、廿、十的比例中。到大選前十天（五月一日）最後一次民意測驗，已宣佈參選的「公民論壇」也只達到百分之四十，不足以構成執政的多數。

針對這樣的局面，哈維爾在大選前果斷採取了兩項政治打擊措施，終使「人民黨」和「共產黨」形成敗勢，「公民論壇」威信大增。六月五日，離選舉只有三天時，哈維爾的總統顧問之一電影製作家克里贊突然在總統府召集記者會，公佈了，「基督教民主黨」主席巴通尼克與秘密警察合作的證據，他自七一年來一直接受秘密警察的黑錢。從而使他所領導的黨聲望大跌，與公民論壇的差距大為增加。

幾乎同時，公民論壇在布拉格市中心舉辦「共產黨歷史展覽」，公佈大批共產黨的歷史文獻，震驚了社會，使共產黨遭到一次沉重的打擊。共產黨競選發言人約瑟夫·哈拉稱，哈維爾此舉，「致使共產黨前途暗淡，失去希望。」

哈維爾當機立斷，連珠炮般的兩項措施，使兩大競選對手未戰而屈，確保了公民論壇在大選中壓倒性的勝利。而在此之前，無人看得出哈維爾具有這種政治鐵腕，而只知他擁有異見人士柔韌的道德勇氣。

捷克反對派是東歐最大贏家

迄今為止，東歐六國相繼完成了自由選舉和重建政治秩序的歷史性步驟。可以說，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反對派力量是唯一的獨立取得大選勝利的國家，具有很多值得書寫的經驗與特色。讓我們先來回顧一下東歐其它國家的大選概況：

——東德三月十九日舉行大選，過去與共產黨合作的「民主黨派」——基督教民主聯盟取得政權，它的成功主要還是仰賴西德同源政黨的鼎力支持。而起而反抗專制，衝開柏林牆的真正的民主力量「新論壇」，成了主要的輸家，只獲得百分之四選票，尚不如共產黨，護百分之十七。

——波蘭去年七月舉行國會大選，今年五月底進行地方大選，至今總統仍為共產黨首腦雅魯澤爾斯基。國防、內政兩政府部門還在共產黨手裡。是故「團結工會」與共產黨聯合執政。

——匈牙利今年三月二十六日完成大選，「民主論壇」當選議會多數黨，該黨類同於西歐的左翼社會民主黨型態。匈牙利共產黨讓步動作很快，反對派未及行動時，已放棄一黨專制。故反對派的角色並不突出。

——羅馬尼亞五月二十日完成大選，由前共產黨組成的「救國陣綫」，以百分之六十六的絕對優勢當選，反對派領袖都是去國四十年的流亡者，未能形成足夠的挑戰力量。

——保加利亞六月十日完成初選，由前共產黨更名的「社會黨」以百分之四十一的選票擊敗反對黨「民主聯盟」，與羅馬尼亞一樣，

成為多黨參政下的前共產黨執政。

由此可見，東歐六國中，民主反對派真正獲勝的僅匈牙利和捷克兩國，而匈牙利的「民主論壇」並非長期反對專制的民主力量。那麼，捷克的民主人士是怎樣獲得成功的？

反專制的歷史一步一個腳印

在四十多年間，捷克人民歷經了三次頗具規模的自由民主運動。第一次為一九六八年著名的「布拉格之春」，共產黨改革派扮演了主要角色；第二次是一九七七年的人權運動——「七七憲章」運動，由科學家、藝術家等知識份子為主的和平抗議；第三次是八九年的十一月革命，青年學生是運動的肇始者和主力軍。

「布拉格之春」自由化運動，始於六四年的「卡夫卡文學座談會」。歷史上，捷克自二十年代起便處於歐洲的文化前沿。當時無論超現實主義還是左派新文化都很發達，如詩意主義；如布拉格圈學派；如中國人熟悉的詩人伏契克（著有「絞刑架下的報告」，為世界共運所推崇），如使世界側目的怪傑卡夫卡。

這個自由多元的文化傳統很難被專政扼殺，地下文學名將瓦楚雷克五十年代便寫了諷刺共產黨摧殘固有文化的書「斧頭」，自稱為「斯大林主義者」的昆德拉，也開始嘲弄共產黨文化。在六四年卡夫卡文學座談會上，知識份子們便開始反對黨的干預，黨內已出現了以杜布切克為首的自由派。

一九六六年，經濟學家奧達·謝克提出了放鬆中央對經濟的控制，調動市場因素的經濟改革計劃。六七年，杜布切克也提出「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開始政治改革。

六八年，布拉格召開文藝工作者大會，自由之風扶搖直上。瓦楚雷克公開發表了「兩千字宣言」，指出人民的基本權利應得到保障，並且要自己爭取，而不能靠當權者賜予。這篇宣言，以及杜布切克的全面改革政策，引起克

里姆林宮的憤怒。是年八月，華約國家全體出兵，摧毀了布拉格的春天。

此後，捷克的反抗運動並沒有停此，在「勃列日涅夫紀律」(即任何國家一旦建立共產黨政權，便不允許改變)的淫威下，五十萬人被整肅，從總理、外交部長、布拉格市長，到藝術家、作家、科學家，許多優秀的知識份子逃往國外。

然而，隨着哈維爾等一代民間政治力量的興起，新一輪聲勢浩大的反抗運動又興起了。

七五年，歐洲三十五國召開「歐洲合作與安全會議」，蘇聯、捷克共產黨均與會並在保障人權的宣言上簽字。然而七六年，捷克又採取了一次針對社會不滿情緒的鎮壓行動。捷克的知識份子遂組成保護政治犯委員會(VONS)，這是一個里程碑。因為過去共產黨抓人別人不知道，但現在委員會把消息告訴大家，造成社會的道義聲援。

到了一九七七年元旦，由於捷克和東歐其它國家均未按赫爾辛基宣言保障人權，捷克知識份子發動了一場影響了整個歐洲的「七七憲章運動」(CHARTER 77)，第一批在宣言上簽字的高級知識份子一共二四〇人。捷共爲了嚇退知識份子，立即下令將所有簽署人逮捕或拘留。然而人民沒有被嚇退。一月八日，第二份公開的宣言問世，又有三百人站出來簽字。人們以不示弱，不合作的和平、非暴力方式反抗強權，終於使共產黨黔驢技窮。

到了七九年，國際冷戰局勢更形惡化，捷共乘機反撲，一下子逮捕了五百一十三人。八一年波蘭發生格但斯克血案，全國軍管，捷共又乘機逮捕三十六人。然而，經過多次較量，捷克人民已經不再恐懼。在七七憲章人士的領導下，人民建立了與專制政府平行的地下文化報，與共產黨政府共存，只要國際環境一有機會，地下文化報會立刻摧毀共產黨政權。七七憲章人士說，我們實際上統治了國家，只是在

蘇聯的保護下，共產黨政府還維持着。

八九年十一月，時機終於成熟，由學生開始，不到十天的時間，共產黨政權便在人民的和平壓力下瓦解。這場革命十分出色，學生紀念反法西斯國殤日，遭到警察鎮壓，他們沒有蠻幹，而是化整爲零，到全國各地發動工人和農民，結果三天後的全國兩小時總罷工，迫使當局讓步，同哈維爾領導的公民論壇對話，組成臨時聯合政府。

勝利在握但前程仍有艱險

大選相繼完成後，東歐各國的政局仍然不同程度地充滿變數，撲朔迷離。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情形十分混亂，由於前共產黨人仍在台上，人民對選舉結果不滿，繼續示威抗議，杯葛當選執政黨。索非亞大選後三萬人和平示威，布加勒斯特六月十三日發生嚴重警民衝突，四名示威者被打死，暴力衝突仍有可能繼續和擴大。

在東德，統一和貨幣問題懸而未決。波蘭自工會政府成立以來，經濟惡化不見好轉，惟捷克和匈牙利新政府頗爲穩定。一位捷克教授告訴筆者，他因抗議華約軍隊入侵而停職停薪二十年，但由於哈維爾的新政府頗多困難，他根本不算國家賠其二十年的工資。

然而，捷克在大選後，亦面臨諸多前所未有的新問題。

——公民論壇的領導人們均是各行各業的專材，但却不是政府行政工作的長材。哈維爾是戲劇家，克里實是電影家，馮德拉是地理學家，內政部長過去是牧師，外交部長過去是鍋爐工，駐美大使克里莫娃過去是經濟學講師……持不同政見者現在要成爲職業政治家，這不啻是一次新的考驗。「畢竟，革命太快，臨時政府時間太短，大選也進行得太早」。公民論壇人士有此感發。

——地方分離勢力日盛。捷克和斯洛伐克

聯邦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建立的，只有七十年歷史。雖然不存在不平等，但斯洛伐克民族主義者一直進行着獨立運動。在此次大選中獲得百分之十四的選票。按照既成傳統，捷克人作總統，斯洛伐克人一定要做總理。現總理卡爾，現副總理卡諾夫斯基均爲斯洛伐克人。

——捷克共產黨仍然在頑強抵抗，此次大選共產黨打出的口號是「要民主一定要多元，而沒有共產黨就不成其爲多元」。他們在大選中雖然只獲得百分之十二選票，但仍然是黨員人數最多，地方實力最強，報紙宣傳機構最大的派別。而捷共明面上尊重多黨政治，暗地裡仍然在抵抗現政權。今年四月筆者二度訪捷，正逢電視節目揭露共產黨給一位支持「公民論壇」的藝術家寫的匿名信，內容稱「我們當初應該像中國共產黨那樣，把你們統統殺掉才對」。

——政治極端主義抬頭。共產黨政權瓦解後，過去的花瓶黨「人民黨」所組成的「基督教民主黨」反而比由長期反共的異見人士所組成的公民論壇更爲激進，指稱哈維爾袒護共產黨人士，例如，副總理卡諾夫斯基原來也屬於「公民論壇」，但由於反對總理卡爾法，遂另組「基督教民主黨」。卡爾法原來是共產黨官僚，革命後與哈維爾合作已退出共產黨。民主黨派的死灰復燃，在東德，匈牙利皆有，已成爲一種普遍現象。

以理想主義重建國際形象

哈維爾已經宣佈，「公民論壇」將組織一個有最廣泛基礎的多黨政府。本屆選舉產生的議會將任期兩年。議員就任後將選舉產生捷克民主後第一位正式總統，哈維爾肯定地將轉爲正式總統，因爲現時根本沒有一個可與他匹敵的總統人選。

此後，總統將提名新的總理人選，預計將在卡爾法和卡諾夫斯基兩位斯洛伐克人中決出

東德：民主對共產黨也公平

共產黨有沒有資格，有沒有能力在民主制下生存？東歐的現實正在告訴共產黨人：政治生活再也不能為共產黨獨霸了，要盡早學會在多元社會中與別人共存，學會如何當在野黨。

楊漫克

一位。在送舊迎新之際，捷克人民與國際社會對哈維爾臨時政府半年來的政績皆表滿意。「戲劇家能否做一名好總統」的疑問顯已烟消雲散。哈維爾的政績一般人認為在如下三個方面：

十分傳奇性的捷克總統為榮。

(一)在革命後新舊交接之際保持了國家政局和社會的穩定，這一點，與其它東歐國家比較十分顯著。

(二)在國際社會重新確立了捷克獨立的、前途看好的形象。哈維爾自己不僅頻頻出訪包括美、蘇、法，甚至以色列等重要國家；世界各國政府首腦、著名人士也紛紛訪問捷克，以交

結十分傳奇性的捷克總統為榮。

安全統一體。捷克還多次參與區域衝突的政治協調角色，如蘇聯與立陶宛之間、東西德之間、匈牙利與羅馬尼亞之間。這一切，哈維爾本人的崇高威望和個性，起了重要作用。

值得提起的是，捷克新政府對中共現政權的態度十分強硬，曾多次邀請中國異見人士前往，如達賴喇嘛。總統外交顧問馮德拉在接受筆者訪問時曾表示：「捷克的外交原則是理想主義的，對於中國這樣的專制國家，我們更重視與反對派的交往。對我們來說，方勵之比鄧小平更重要些。」▲

在東歐各國劇烈的社會民主轉型中，過去作為執政黨的共產黨，在喪失了權力後將作何政治取向？將如何完成從一黨專政到忠誠反對黨的角色轉換？將怎樣在新型民主社會環境中繼續生存、適應、尋找合適的出路？

這些問題，顯然是東歐社會重建過程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一個保障社會穩定和健全發展的必要條件，一個新時代向我們提出的全新課題。

帶着這些問題，筆者於九〇年四月二十三日，前往東柏林「東德民主社會主義黨」（前東德共產黨）總部，訪問了該黨「中央競選辦公室」負責人阿列夫·澤爾曼先生。他向我介

紹了東德共產黨如何面對這些問題，迅速調整自身以適應新的社會，並在自由選舉中，獲得百分之十五的議會席位的可觀成績。

在面臨困局的東歐各國共產黨中，人們一般認為，匈牙利共產黨的結局會較好，而東德共產黨的結局會很糟。因為過去匈牙利共產黨曾通力改革，多年不竭，並以最平穩的方式完成了權力轉讓；而東德共產黨則是保守派的中堅，在動蕩中被迫讓步。但是，兩國在今年三月下旬一先一後的大選中，却出現相反的結果！匈牙利共產黨僅獲得百分之十選票，名列第五，而東德共產黨却緊隨兩大主流反對黨之後，成為第一大在野黨。顯然，德國共產黨在大

選前數月裡，自身發生了急劇的變化。

德國共產黨全稱為「社會主義統一工人黨」，革命後改名為「民主社會主義黨」。它的總部，位於議會與國務院之間，大樓上有一塊明顯的「傷疤」，那是過去的黨徽被挖掉所致。經東德議會朋友的介紹，我徑直來到「民社黨」中央競選辦公室，見到了負責人澤爾曼先生。該黨的競選辦公室在上月的大選中，已如同黨的神經中樞，發揮了重要作用。

澤爾曼先生首先向我介紹了該黨在大選前數月的急劇演變。他說：

「首先最重要的是，我們在短期內把黨變成了一個民主社會的新型政黨。這種變化始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更名後的第一次代表大會

，通過了新的黨章。我們總結了歷史的教訓，改變了政治路線和方針。黨發生了本質的演變，從最高領導層到基層黨員，都換了血。」

「貴黨現在還是社會主義政黨嗎？」

「我黨的性質還是左翼的社會主義政黨，但已經拋棄了過去那種僵硬的馬列路線，而吸納了各種左翼思潮。例如，基督教左派、青年人的左派、工人運動的左派，以及社會公平與福利保障的左派等等。他們在黨內都可以獲得一席地位和表現的機會。」

我問澤爾曼，他的中央競選辦公室在大選中採取了什麼樣的政見和競選對策。他回答有三個要點：

「第一，我們在競選中以『社會公正性』為政治訴求，很符合普通人民的實際利益要求。社會公正性涉及到統一所帶來的問題，貨幣統一，以及工農藍領階層、婦女利益等極為現實的問題，故獲得了人民的支持；

「第二，我們大量吸收，錄用青年積極份子，強調開放性和政治多元化，不論資排輩，青年人一參加我黨，就感覺能發揮所長，因此，我們的成功主要靠青年的參加與支持；

「第三，東德人民長期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存，人民中的很大比例，仍然認同社會主義，故他們願意把票投給我們。」

「為什麼青年人會支持你們而原諒了你們前身的過錯？」

澤爾曼認為：「青年的特點是喜歡創造。他們發現，基督教民主聯盟等大黨派的政治主張，全是從西德引進的、拿來的。他們不願意簡單地學西德，因為西德成功的經驗，未必能適用於現下的東德。」

「再者，青年人都是理想主義者，別的黨太多地考慮了西德的實惠利益，而我們黨還是理想主義的。老年人等不及，希望快些過好日子，故把票投給親西德的政黨。青年人看重這些，他們不急，還有理想色彩。」

「還有，我們也採取了一些吸引青年的作

法，如過去黨的領導層都換了，讓出許多位置給青年才俊去幹，發揮他們的能力。我本人也是這樣進入中央競選辦公室的。」

澤爾曼隨即舉出很多數字。革命後該黨人數從兩百萬下降到六十萬，但有希望的是，黨員平均年齡却在三十至三十五歲之間，新入黨的青年成份佔很大比例。以往，黨員入黨是為了獲得好處，現在是出於理想，因為現在加入該黨不僅沒有好處，還有負面影響。

澤爾曼特別驕傲的是，該黨現在破了一項世界紀錄，即黨員中的女性比例超過百分之五十。為什麼婦女這麼支持民社黨呢？澤爾曼分析其間的緣故說：「首先是歷史原因，東德的婦女百分之九十五就業，社會參與感強。她們選擇民主社會主義黨不是因為同情心，而是因為本身的利益所致。東德的社會轉型首先使社會的弱者婦女受到衝擊，工廠減員先減婦女，削減福利首先影響婦女，如幼兒園經費的減少。這樣，婦女為保障利益，就支持民社黨，因為我們的政策關注社會福利事業。」

接着，我們談到從執政黨到在野黨的變化。澤爾曼講述了他們的心路歷程：「我們的感受是深刻的，也是矛盾的，我們一方面要把黨徹底改變，重新定位，同時又不得不對前身為黨的歷史責任負責。我們努力創塑黨的新形象。現在，我們正忙於五月份的地方選舉，我們力爭多拿下幾個城市，以試驗我們的政策。即使完全處於在野地位，我們也要發揮作用，共同為東德的民主出力。」

我問他，共產黨過去有許多黨營事業和財產，現在是否還保留着，他們競選的經費是怎麼籌集的？

「原政黨的各種財產、企事業，都同其它的國營企業一樣，轉交給新政府管理。革命後，我們交出十五家報館，向國家移交了三十億東德馬克的資金，許多辦公大樓、建築物也移交了。目前我們的工作人員只有過去的百分之十左右，經費來源主要是黨員繳納的黨費，許

多工作人員都是義工。

「現在仍屬於我黨的資產，都是被證明靠黨費營建的，我們也鼓勵黨員幹部做生意開源，例如我們出租辦公樓給議會議員等。」

對於現政府的德國統一和自由經濟政策，澤爾曼表示：「我黨的立場是，東西德統一要在雙方完全平等的原則下達成，我們主張逐步統一，這樣對社會的衝擊會少些、平穩些。我們反對被西德吞併的政策。」

「在經濟政策方面，我們提出貨幣統一要以一比一的方式算，至少不能使東德人民的生計水平劇烈下降。當然，我黨提倡的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強調社會的公正、穩定，防止大批失業、貧富差距擴大等病態情況的出現。

在對外關係方面，民社黨的主張亦有很多獨到之處。「民社黨首先提出在東、西兩德廢除義務兵役制，變德國為中立國，而非西方軍事集團的一員。只有把德國變成和平區，才能打消鄰國對德國統一的顧慮。」

澤爾曼還指出：「民社黨認為，德國統一還應該考慮歐洲整體穩定的因素，如蘇聯的利益和西方的利益，均不可偏廢。」

最後，我請澤爾曼介紹一下過去共產黨領袖的近況，如昂納克、克倫茲、莫卓等。

「昂納克、克倫茲都已被開除出黨。昂納克已經退休，靠養老金生活；克倫茲則仍然活躍，他把推翻柏林牆前後的經歷寫成了一本書，送到西德一家報紙上發表，拿到很多稿費。」

「至於莫卓，他對本黨的新生做出很大貢獻，成了當然的黨領袖，莫卓的開明和政治素質，使他在大選中，成為最受選民歡迎的人，現任國會參議員。另外，由於莫卓的知名度高，聲望也高，對本黨在大選中的成績，起到相當正面的作用。」

我祝願「民社黨」未來有成，結束了這次印象深刻的談話，我感到民主政治的一個優秀之處，便在於給每個人以平等的機會，包括那些過去曾經是魔鬼的。▲

越南改革：驚險的一躍

中國經濟改革中的雙軌制，是企圖用跳躍兩次的辦法跨過一道溝，結果一頭栽進溝底，可是以此同時，身置死地的越南人卻驚險地一躍……

鄭源

一次斬斷狗尾巴

僅僅在五年前，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還令全世界的共產黨國家矚目，可是今天，它已成為社會主義陣營最後的堡壘了。當後來居上的蘇聯人開始着手規劃它的價格和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時，他們研究的不是中國的經驗，而是把越南當作他們效法的楷模。越南經濟改革的起步整整比中國晚了八年，可是在市場化進程上，它今天已經把中國甩在身後了。

兩年前，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旗手佛里德曼曾警告中國領導人「不要憑兩次跳躍跨過一道溝」。顯然，他是針對中國的雙軌制而言的。他建議中國的物價改革要一次到位，用他的例子來說，就是「一刀斬斷狗尾巴」，要疼只疼一次。然而不幸的是，中國恰恰出現了佛里德曼所擔心的局面，計劃經濟的「狗尾巴」在市場經濟的案板上被剝了無數個回合，始終血肉相連，整個社會在痛苦呻吟中爆發了八九民運。

就在中國一步踏空，墜入壑底之際，越南進行了驚險的一躍，僅用了三年時間，越過了中國十年沒有跨過的那道橫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的鴻溝。

兩步併作一步走

越南的經濟改革起始於一九八六年底，當時中國的經濟改革正進入相持階段。在當年十一月召開的第六屆一中全會上，越共中央通過了一個全面改革的歷史性文件。這個文件類似於一九八四年十月中共通過的關於城市改革決議，只不過越南把中國先農村後城市的兩步改革併為一步走了。越共中央的這個決議的主要內容包括：停止南方的集體化運動，把土地選給農民，在北方農村則實行土地承包制，同時在城鄉鼓勵多種經濟成份和計劃外商品生產，允許以市場價格交易，實行對外開放，建立經濟特區，以各種優惠吸引外來投資。

一九八七年的好年成使越南的糧食產量大幅度增長，農村改革的良好開端又帶動了城鄉多種經濟成份的迅速發展。農村出現了專業個體戶，取消了雇工限制。城市也出現了個體、集體及公私合營等各種非公有制經濟成份。到一九八八年底，越南已有兩百萬勞動力在這種非公有制的經濟實體中工作，其產值已佔全國的百分之四十。國家把一些虧損的小型國營企業出售給私人經營。同時還出現了一些小型私人銀行，它們甚至可以自己決定存貸利息。

頻臨崩潰的經濟

在改革的初始階段，越南基本上是步中國的後塵，只不過其推展速度要快得多。因此，中國在改革相持階段所出現的險況在越南都重現了。非計劃經濟的迅速膨脹必然帶來雙軌價格，從而引發了高達四位數的通貨膨脹率以及貪污腐敗的社會現象。一九八七到一九八八年，是越南改革中生死攸關的時期，在這段時期中，一方面經濟改革在各個領域出現重大突破，另一方面，改革帶來的副產品也把國民經濟帶到了一個頻臨崩潰的邊緣。

平心而論，越南此時所面臨的局面比中國要險峻得多。在整個十年改革中，中國通貨膨脹率按最高估計沒有超過百分之七十，而據法新社估計，越南在一九八六年的通脹率為百分之七百，八七年上升為百分之一千，一九八八年有所回降，但仍仍在三位數上。在中國，計劃價和市場價的平均差沒有超過五倍，而在越南，雙軌價格之間的落差高達十倍以上。這樣一對比，即使中國險象環生的一九八八年，在越南人眼裡應該算寬鬆環境了。

置於死地而後生

也許中國的領導人在危機時刻的猶豫不決是因為覺得他們還有退路，然而越南領導人明白，他們除了加速改革之外別無出路。中國成語曰：置於死地而後生，這恐怕在越南人身上得到了靈驗。一九八八年七月越南社會科學院和越中友協在河內召開了一個研究中國改革經驗教訓的討論會，八月，越南總理親自在越共機關報上發表了長達四萬字的報告，主張加速改革，其中包括全面開放物價，甚至國營企業也可以以讓價交易生產資料。這意味著一步到位進入市場經濟。為了有效地配合價格改革，貨幣政策於一九八八年底也進行了大幅調整。銀行利率被大幅度提高，有效地抑制了通貨膨脹，當然也產生了不小的副作用，例如失業人員增加、企業流動資金短缺。不過一些自由派經濟學家認為，這些負作用是控制通脹不可避免的代價。

在越南改革這驚險一躍中，最扣人心弦的是外匯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匯率的調整。一九八八年十月，越南政府公佈了一個極大膽的外匯管理新規定，允許企業和個人開設外匯帳戶，並以競爭價格向銀行買賣外匯。十一月將越盾對美元的匯率從三百六十八比一猛地貶為兩千八百比一，十二月再貶為三千比一，半年之後，官價匯率 and 市價匯率基本重合。同時，胡志明市大幅度地將外貿權下放到集體甚至個體企業。這一步實際要達到的目的是要國內市場價格向國際市場看齊。

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專家們一九八九年三月視查越南時，他們被告知，除電力、運輸、通訊和燃料外，越南所有產品，包括糧食，已經全部實行市場價格了。不但非國營企業完全進入市場競爭，國營企業之間也全部用讓價交易了。法新社的一份報告估計，一九八九年第一季度的通脹率約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第二季度降到百分之五十，第三季度則降到百分之十以下。儘管不同渠道的估計有很大差別，但通脹率下降的趨勢是無人異議的。

懸念留下一團謎

不過，越南的改革還有不少像迷一樣的地方。越南是唯一沒有列入貨幣基金組織統計月的成員國，所以它的資料很難得到，對其經濟狀況的分析往往不得不在官方公佈的資料基礎上進行。越南領導層決策的透明度甚至遠遠低於中國，因此很難保證對於其改革的觀察是是否存在偏差。

例如有有人注意到，儘管越南市場化的進程速度快於中國，可是所有制的改革却落後於中國。越南是怎樣解決公有制和市場化的矛盾的，公有企業以什麼行為方式進入市場競爭，這都是中國人想瞭解的問題。可是這些至今仍鮮為人知。另外，很少有人懷疑在沒有工資制度改革方案的方案，於是有些人懷疑在沒有工資配套的情況下怎麼可能進行如此大幅度的價格改革，越南勞動力如何在高達四位數的通脹率下生存？

無疑，越南人在改革過程中是以中國的改革作為主要借鑒的。可是中國人却很少對越南的改革投以關注。到目前為止，人們還很難找到有關越南改革的中文文件，可見一斑。

政治改革縮回頭

另外，將越南和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作一番對比也是頗有興趣的。六四之前，越共在意識形態上一直比中共保守，也就是處於中共的左翼。在一九八九年以前，越共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毫無建樹。直到八九年三月才提出黨政分家的改革方案，後來顯然因天安門事件的影響而擱淺。不過，越共在處理人事問題和權力交接上似乎顯得比中共程序化，從而改革受人事變動的影響不大。

一九八六年底召開的六次黨代會，其歷史地位相當於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奠定了改

革基本方針。這次會議上，老一代主要領導人，因為年齡和健康的理由而被免去職務，如七十九歲的國家主席和黨總書記長征、八十歲的總理范文同、七十六歲的政治局常委黎德壽和七十七歲的武元甲大將。同時有十名書記處書記、五十四名中央委員、十七名部長離職。被認為是改革派的阮文靈接任總書記。這樣的人事變動都是按程序進行的，也沒有出現顧問委員會這類權宜性的機構。這次會議也被認為是一次政治改革，為經濟改革奠定了組織基礎。

天安門事件對越南當局產生了相當大的震動。越共中央曾在一九八九年八月召開專門討論中國和東歐局勢的會議。會上總書記阮文靈表現了極其強硬的態度，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政治多元化，不許黨內存在反對派，並堅持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民主。同時，在這個會上，一反與美國修好的姿態，點名批評了「美帝國主義」。九月，河內舉行一場「群眾」集會，嚴厲批判波蘭的反社會主義勢力。與此同時，黨對於新聞出版界的控制也大大加強。六四之後，中越兩國的關係迅速恢復。早已退休的武元甲在六四事件後立即會見中國大使，表示不計前嫌，堅決支持中共的鎮壓措施。越南的宣傳機器竟然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聲稱中越兩國從來沒有成爲過敵人，與此同時，越南副外長陳瀧忠訪華，提出了二十億美元的貸款要求。

外界觀察者認爲，阮文靈看來從反面吸取了中共的教訓，決心採取一條退走路的改革方針，一手搞經濟改革，引進資本主義繁榮；另一手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曾經準備出籠的政治體制改革看來也要流產了。



北歐式社會主義的沒落

會馳遼

瑞典式福利國家，多少年來一直是令人羨慕的社會主義楷模。但是最近一段時間裡那裡發生的勞工抗爭、通貨膨脹、工資糾紛，導致了社會民主黨總理辭職。新的聯合內閣正面臨着福利國家模式解體的現實。

當全世界各處的社會主義者疲憊地應付着體制的危機時，他們曾不約而同地注視着瑞典，尋求某種安慰。瑞典曾經不折不扣地是一個社會主義經濟成功的楷模。

這裡一直是個福利社會，也有一些最令人羨慕的多國公司（MULTINATIONAL FIRMS）。它的稅收在基督教國家裡排列第一，政府耗費百分之六十四的國民收入，每天有四分之一的上班族告病休假。但是瑞典的工人仍然能買得起豪華的汽車和時髦的電器，讓全世界的消費者自嘆弗如。無怪乎各國共產黨的改革派總是把瑞典模式掛在嘴上，視之為現實的烏托邦。

在過去五十八年裡，「社會民主工黨」一直是瑞典模式的監護人。然而，瑞典總理英格華·卡爾森（INGVAR CARLSSON），一個出色的工黨人士，最近却突然警告人們，模式正在崩潰。他甚至把目前的困境同七九年「不滿的冬天」相提並論，似乎有意在危言聳聽。「不滿的冬天」是指可怕的瑪格麗特·余切爾入主英國政壇。

現在是看看卡爾森預言是否真確的時候了。九〇年二月十五日，瑞典的五個反對黨：從左翼的共產黨到右翼的保守黨，在議會結盟，猛攻社會民主黨的統治。左右黨派的大結盟，

是由瑞典全國勞工聯盟促成的。「工聯」原是社會民主黨聯盟的支柱，現在却因為工黨在工資問題方面的強硬政策反戈相向。年初，銀行業主們拒絕員工提高工資百分之二十的要求，關門以對，使得生意人和購買者因短缺現金而奄奄一息。跟着，巴士和地鐵司機們，在通動高降停車罷工，使得健康服務和兒童事業陷於癱瘓。

卡爾森對此無法忍受。他召集議會，要求授權他制止罷工，凍結工資和物價。否則，因為缺乏足夠的票數作上述立法，社會民主黨將會退位，而無力處理經濟危局。卡爾森的主張，被人們稱為「經濟戒嚴法」，無論是資產階級利益團體（它一般總是與執政黨立場一致），還是環境訴求的綠黨，或者激進的共產黨，沒有人支持卡爾森的計劃。

為不失承諾，卡爾森果然辭職了。現在，為難他的人正在爭論到底應該怎麼辦？一個方案是社會黨與共產黨聯合再組閣，另一個方案是讓三個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再來一次。他們在一九七六至八二年時，曾在社會黨的長期統治中間，造成一段間空，結果一敗塗地。這兩個方案行不通，議會便只好將九二年的大選提前一年，今春就展開。

對於上一次沒有社會黨掌舵的混亂情形，瑞典人至今記憶猶新。資產階級政黨在那六年裡曾試圖像余切爾夫人那樣，鏟除國營企業（如造船業）和集體補貼。結果八二年社會黨捲土重來，恢復市場決定企業生存的作用，降低赤字，最後恢復了預算公積金，用以支持低收

入者和對抗失業。

即使這一次危機不意味着社會黨天空的日蝕永久存在，它畢竟是一次對該黨長期單調的企業政策的沉重打擊。斯德哥爾摩經濟學家蘭傑倫說：「盡人皆知的『瑞典模式』，實際上早已結束了。這次危機不過是另一個證明。」瑞典模式的大部份內容，以一九三八年年的勞資和平協定為開始的標誌。但其根源，可追溯到十九世紀國王與議會間的政爭。在社會民主黨主政期間，瑞典的政治終於在聯盟式的妥協中獲得成熟。社會黨政府實際上是政黨領袖、工會領袖和大資本利益的大雜燴。

瑞典模式的主旨，乃是全國範圍的工資談判，「瑞典雇主聯盟」和「瑞典貿易工會聯盟」是兩個主要的角色，前者代表雇主，後者代表大部份藍領工人。他們談判所達成的協議，按照所能影響的範圍，通過每個公司與工會，廣施於全國。



在這樣的交易中，商人的克制態度對國際貿易至關重要。因為瑞典工業產品百分之四十是用來出口的。他們必須將勞力價值保持在與競爭對手相當的水準，以免失掉市場。而代表着工人總數百分之九十的工會方面，却在傳統上保持着「工資的團結」(WAGE SOLIDARITY)，不管其能力的市場性如何，大家都獲取相同的工資。

因此，社會民主黨總是徘徊在這一處境之中，盡力維持勞資利益的和諧。該黨向其盟友工會提出建議，什麼樣的工資要求可以與健康的經濟保持一致。它用稅收手段影響收入品質，再將工人付稅的一半回饋出來。最重要的是，它追求保障百分之百就業的政策，使得勞工領袖們對工業的變化保持溫和的態度。

社會黨達成上述目標的方法，是將工人納入國家餉金名額。從七十年代後期開始，政府雇傭勞力，從勞工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一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五。另一辦法是通過再教育，使工人順利從日落工業轉移到日出工業。到八十年代，已有百分之十的工人接受了工業變遷的再教育。

這種勞工市場社會化的作法，使瑞典的失業率保持在發達國家中最低的，工資差別也最小。工資平等，投資刺激和集體低稅率，充分表明了瑞典工業的特質。

對只有八百四十萬人口的瑞典而言，這個國家奇跡般地佔有世界高科技產品生產的不相稱的比例：從SAAB牌汽車到ERICSSON電話集團系統。這種成功是由於瑞典模式尤為適於資本集中工業以及小而高技術的勞工品質。

但所有這一切是需要代價的——通貨膨脹。瑞典特色的「每個人都贏」的政治，最終必然導致工資的無休止的提升，而生產力相應地降低。現在該國的通貨膨脹率已達百分之九，三倍於它的貿易伙伴國家。

權威的經濟學家幾年以前已經為瑞典模式

寫訃告了。八十年代初，社會黨政府曾使克朗(瑞典貨幣)貶值百分之二十八。有效地降低了該國勞力價值，使之接近於其它工業國家。但是工資增長的穩定趨勢在八十年代繼續挺進，遂使得目前的通貨膨脹又達到威脅出口工業的程度。斯德哥爾摩大學經濟學家林貝克預言：「一旦世界經濟出現衰退，瑞典將首先受到沉重打擊。」

今年初發生的工潮，已經宣佈了瑞典模式的末路窮途。實質上勞工騷動與政府控制工資增幅十年來一直困擾着瑞典的政治。國營企業部份的勞工比例的增長是目前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們不在乎國家在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另一個原因是社會民主黨半個世紀的執政，總是將工資標準維持在普遍的高水準上。林貝克批評說：「瑞典人已不能忍受這樣的事實：我的鄰居工錢高過我百分之五。」「人性的平均化要求已成爲制度。」

然而瑞典的選民們另有主張，這個福利國家的人民指責社會黨政府在「開倒車」。該黨八二年以來制訂了一系列政策：貶值貨幣，轉移資本，控制換匯，改革稅收，同時也提高了集體福利，保證高領工資。但國營部門的工資却被調低，以維持預算平衡。一個有趣的新聞却在國家雇員中引起憤怒：一個二十二歲的股票交易者上報說，他所賺的錢比財政部都多。因爲此，他被要求向失業福利部門義捐。

瑞典社會研究所專家科比(KORPI)認爲，社會民主黨的威望目前已降至最低點。人們普遍認爲財富的分配沒有以往那麼公平了。但反對黨並未因此得分。誰也拿不出好主意來。指責社會黨的人不知道用誰來取而代之，這才是更糟糕的。

這也許是一種心理上的傳染病。當共產主義在世界範圍大退潮時，社會主義的唯一幸運兒——瑞典，也顯得不再幸運了。

本文譯自「INSIGHT ON THE NEWS」一九〇年三月五日刊。作者HOLMAN JENKIS

我願幫中國人獲得自由

專辦 政治庇護

美國名律師
中國民聯法律顧問
中國民聯盟員
挑樂絲·哈潑

工作許可 遞解出境 H-1簽證
三年早經辦 經驗豐富 成功率高
收費合理 \$1500 華人助理陳先生
DOROTHY A. HARPER
HARVARD LAW BUILDING

691 S. HARVARD BLVD., SUITE B
LOS ANGELES, CA 90005

TEL: (213) 381-0187 381-1011 FAX: (213) 381-1601

詳情請問民聯洛杉磯支部 (213) 343-0896, (818) 458-1020



回國考察團調查報告

中國留美同學經濟學會回國考察組四位成員的報告，向我們描繪了副近期大陸經濟，政治，社會等各方面的完整圖畫。本刊發表時略有刪節。

張欣等

張欣報告：經濟形勢和留學政策



這次觀察小組一行四人，受理事會委託，由福特基金會資助，回國內觀察會員關心的有關事項。任務大致是考察國內繼續改革開放的前景，留學生為改革做貢獻，推動國內外學術交流，普及經濟學教育的可行方式，以及留學生回國的政治安全，學術自由環境及生活待遇。此外，我們隨身帶了一些學術交流及普及教育的項目意向書，準備和國內有關單位協商合作的可能。除了在北京外，組員們分頭跑了天津、杭州、上海、合肥、南京等地，與各階層的人進行了廣泛接觸。現在，四名組員均已回到美國。

經濟形勢

國內經濟的形勢情況，一般來說，反映了十年改革，最近的宏觀緊縮政策，「六四」之後國內外政治社會環境變化三方面交織的影響。

我去了上海、北京、杭州。一般看上去，市場供應相當豐富。城鎮農貿市場活躍，魚蝦肉蔬上市充足。物價比八八年低，但比八六年仍然貴很多。豬肉要五至六元一斤；草頭零點五元一斤。活魚很多，不貴，平均三元一斤。我的同學是作家，有些稿費，每月家庭收入五百多元，吃掉三百元。效益不好的工廠裡的工人，每月收入僅一百多元，生活就會相當艱苦。輕工業品，如自行車、彩電都琳瑯滿目，一年前緊俏的許多商品現在都賣不出去。主要是銀根收縮，需求疲軟，出口銳減，許多項目停止。市場上供求缺口減少，從而物質供應好轉。據說連華東這樣一向缺電的地方，現在電也用不掉了。通貨膨脹，據說也從一年前第一季度的百分之三十降到今年一季度的百分之三。

但是，這個市場豐富的現象主要是由於需求下降而非供應增加所致。大部份工廠不足，上海有百分之八十的工廠開工不足，其他地方更是可想而知。「六四」之後，工人勞動積極性銳減。在還在開工的廠裡，工人們幹活和文革末期一樣，盡量磨。各行業的經濟效益直線下降。全國三分之一國營工廠虧損。一向是上海利潤主要來源的上海紡織、電子行業，都面臨大量虧損的危險境地。

個體經營，鄉鎮企業在改革十年中有了很大發展，對國民經濟發展起了關鍵作用。特別是在稅收、就業、搞活市場方面。但是，「六四」後意識形態一度干擾經濟改革。個體戶遭到歧視。理論刊物上又批判「資產階級剝削」，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一些改革的理論也遭到批判，如光明日報批判「公有制是無人所有制」的講法。李錫銘說要禁止個體戶入黨，江澤民說對逃稅漏稅的個體戶要「罰他個傾家蕩產」。一片風聲中，個體戶的反應是：(1)縮小經營；(2)轉移資金；(3)減少再生產投資，增加消費，或者乾脆揮霍浪費。鄉鎮企業面臨的情況也差不多。銀根緊縮後，缺乏資金週轉，銀行縮小信貸，第一個對象就是鄉鎮企業，即使你效益再好也罷。而國營企業，即使效益不好，遭受的壓力則小得多。歧視非常明顯。但是，這幾年來，鄉鎮企業、個體經營解決了一億人的就業。鄉鎮企業產值佔全部工業產值的百分之四十。對這個經濟成份的打擊，必然會目食惡果。

本來制訂這個緊縮政策的那些人（一說是姚依林等），打算通過以上一系列政策包括緊縮開支，加強稅收，整頓經濟成份來改善經濟及財政預算，結果引起了相反的結果。虧損擴

大得比調整還快，稅收下降得比能追繳得還快，從而不得不重新調整對鄉鎮企業的經濟政策。最近，特別是我們在國內的時候，報刊上對非公有制經濟成份的嚴厲語調已經大有改變，政策又重新放鬆。

由於緊縮，「六四」後外資減少，及對非國營成份的歧視這三方面的因素，就業形勢嚴峻。一是直接失業。許多工廠停工，項目下馬。國營工廠工人沒活幹，還能發到基本工資。集體企業只得乾脆關門。現在已經從城市裡遣返了一千萬民工回農村，計劃還要再遣返八百萬。農村本來勞力過剩，現在鄉鎮企業不景氣，勞力加速沉淀，再加上這些遣返回農村的，潛在失業的狀況更加嚴重。高中畢業生今年分配，要人的單位很少，「待業」（失業的中國式名稱）時間當然延長。大學生工作分配，除了經濟因素外還有政治因素。政策是「計劃分配，雙向選擇」。但是，一是用人單位需求減少，二是計劃分配強調下基層。專業不對口，如學經濟的下工廠車間勞動，學藝術的分到三綫山溝工廠。如果不去，就是失業。盡管大學畢業就業如此困難，學生們還是不願考研究生，也不願留在學校教書，原因是教師的經濟和政治待遇太差。現在已擔任教職的中青年教師，出國的出國，沒出國的在準備出國。北大、復旦、杭州大學經濟系都師資缺乏到開不出課來。今年聯繫出國的人比「六四」前猛增三倍以上。在和國內某單位的座談會上，人們公開地說：「爲什麼大家想出去，是政治上太壓抑，太黑暗，沒希望。」而目前出國政策又收緊，政治上還要審查過關，使學生們憤恨之極。

產制度的優越性，農民一聽，知道上頭喜歡合作社的人又得了勢，趕緊把包山到戶時種的樹砍了。據說這些樹只種了沒幾年，都已經成材了。農民說：「我原來選的樹就是三四年能成材的，因爲共產黨政策長不了三年。」不過，據說農村大部份幹部群眾都對政策方向轉移採取積極抵制的態度。因此，意識形態的左轉造成的並不是直接的衝擊，如改變十年改革確定下來的包產到戶體制，而是人們對共產黨農村改革政策信心的崩潰。

和農村發展，就業緊密相關的是人口問題。現在超計劃生育厲害，人口實際增長速度比公佈的統計數字要高很多。許多「黑孩子」沒有算入。本來，要改善就業及勞動力過剩的狀況，每年非農業至少是提供三千萬個就業機會。最近幾年就業機會大部份是由鄉鎮企業和個體經營提供的（共計有一億個機會）。現在政策逆轉，解決的前景更加暗淡。

緊縮雖然壓制了老百姓的消費，官方的浪費及錯誤決策在繼續，特別出於政治需要的開支。傳說今年軍備支出增加了許多。另外一個例子是亞運會工程。現在北京三十萬民工在加班加點幹，全靠超額獎金來刺激。現在已經投下了五十億，看來還要大大超過，而認捐的僅五億，國家財政的負擔自可想見。而亞運會工程的經濟效益奇差。一是北京根本沒有足夠的水源來支持這個工程；二是這些建築一旦亞運會結束就閑擱着。這次人大會議上，許多代表對此意見很大，但執政者聽不進去。過去批評洋躍進時還讓人民代表質詢，現在連這點勇氣都沒有了。這次人大只強調「穩定」，不讓人提意見。一方面緊縮，讓老百姓束緊褲子，一方面維護錯誤經濟決策，幾十億、幾百億的浪費，這和毛澤東時代一方面幾千萬人餓死，一方面大量出錢支援「亞非拉」何其相似。亞運會，本來是個民族的驕傲，可以把民族感情聯系在一起。但現在北京人把亞運會看成是政府的事，甚至恨亞運會。過去看到國家隊勝利的事，甚至恨亞運會。過去看到國家隊勝利的

興奮激情都沒有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調查與回聲」曾就亞運會消息徵求大家的意見，一個北京人寄來一張明信片，上面公開寫着他們的評語：「亞運會是瘦驢拉屎」。

「六四」之後，外商投資和遊客人數一下銳減。外經貿部門大受衝擊。目前投資有些回升，但總結起來主要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一些外商已經投下一大半，收也收不回去，只能硬着頭皮投完。上海大肆宣揚了日本華僑孫尚利先生在虹橋地區投資建築。實際上孫尚利在「六四」前已高價買下那塊地皮，他只能繼續投下去。解放日報上登的孫先生說話也承認，孫尚利已不期望在這筆投資上賺錢。許多搞外經的朋友告訴我，原來一些外商和他們已基本商定項目了，但「六四」後認爲中國不可靠，轉向東南亞，甚至到東歐蘇聯，特別是蘇聯東歐已立法承認私有產權後。有個研究所的人告訴我，一個原來要他們做中國投資可行性報告的台灣商人，現在在中國不要了，轉而請他們做蘇聯及波蘭投資可行性報告。他認爲至少中國大陸人對這種制度還比較熟悉吧。另一方向是來自台灣的投資。但是台灣的投資地域性很強，主要集中在福建省。目前看來，外商投資，特別是歐美商人短期內不可能恢復。這不但是他們政府的政策，更主要的是：一，他們對中國大陸將來的局勢穩定不抱有希望；二，中國的國際債信「六四」後迅速下降。

「六四」後旅遊業大受影響。去年下半年絕大部份旅館空關着。據說北京飯店一天維持支出就是五萬元。北京這麼多旅館，有出無進，損失自可想見。盡管政府用了種種降價刺激措施，但回升很慢。我在國內機構注意了一下，現有的旅客大部份是台灣遊客，其他國家來的很少。不過，現在遊客人數正在回升，據和我同機的一個美國導遊告訴我，從他們旅行社看，今年夏季後遊客將迅速增多。

旅遊、外經部門受損，外匯收入當然減少。但由於進口減少，據說順差增加了。但是現

在外債積累已近四百億美元，今年起還本付息每年將逼近一百億美元。本來可以靠像旅遊那樣非貿易外匯收入和借新債過關，現在則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地方及外經部門經濟官員對政府六四的做法及倒退的經濟政策很不滿意。爲了緩和矛盾，目前的政府政策是拚命製造一個安定形象，可以使外國政府、外商及遊客放心。但又自知民心不穩，而要加强防範。北京天安門廣場一會派軍隊，一會撤軍隊，一會派武警，一會又放人參觀，就反映了這個心態。

改革前景

前幾年需求過熱，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經濟一度陷入危機狀態。本來，爲了抑制通貨膨脹和總需求過旺，宏觀緊縮政策也是必要的。宏觀緊縮，經濟暫時萎縮也是難免的。但是，問題在於，一，是盡量減少緊縮引起的副作用，還是加劇這種副作用；二，是把緊縮作爲長期經濟改革戰略的一個積極步驟，還是僅僅是爲了消極應付通貨膨脹的一個臨時措施，而事實上在爲下一個週期的惡性循環創造條件？很遺憾，目前的宏觀緊縮政策，恰恰在兩方面都是響應了壞的方面。本來，前個時期需求過旺，供應全面短缺，使價格改革，結構調整難以進行。所有制改革也由於市場不完善而無法順利進行。現在宏觀緊縮，使短缺矛盾緩和，給價格改革和結構調整創造了一個較好的條件。但是，政府並沒有一個經濟改革的戰略考慮，或者根本沒有繼續改革的意圖，當然也談不到具體措施。價格、結構、所有制，不但什麼也沒動，反而實際上在向反方向運動，價格要取消雙軌制，不是朝市場調節的方向靠，而是朝中央計劃價格的方向靠。所有制則向公有化方向靠。宏觀緊縮抑制了總物價，但結構不平衡的現象毫無解決，反而更趨嚴重。在宏觀壓縮的條件下，雖然就業與生產會下降，但是本來可以趁此改進就業結構從而提高生產效益。

現在則由於所有制改革施行逆轉政策，導致就業結構繼續惡化，生產效益不但沒好轉而且還下降。這樣，整個經濟環境更壞，而爲下個週期的更大幅度的惡性循環創造了條件。我在國內的時候，聽說政府已經感到這樣生產下降已難以承受而開始放鬆銀根。鄭家華到上海一下撥了五十億資金。人民銀行也準備下降利率，增加資金投放。但是，等到這個宏觀放鬆政策最後能夠刺激生產時，由於經濟結構仍然畸形，通貨膨脹勢必以更大壓力捲土重來，經濟將走入另一更惡性週期。

這種盲目的經濟政策，和現在的經濟理論界的形勢當然不無關係。現在改革的討論實際已經癱瘓。學潮前理論界還活躍，世界經濟導報也發了楊小凱、黃光對公有制的直接批評。現在這些文章都遭到了批判。當然所有制改革也成了禁區。導報已在宣傳會議上宣佈解散，一些體改機構，如體改所等也在談論如何解散的問題。許多著名改革經濟學家，如上海亞洲研究所長、華東師大經濟系副主任陳奇璋都還關在監獄裡。不少學術刊物也遭取消。政治環境惡化，討論的允許範圍縮小，結果學術界也乾脆懶得討論。到大學、研究所都有這個感覺，體改委現在也是無事可幹。搞學術的人，即使從未上過街遊行的，現在也都是有一股怨氣，抱怨現在執政的對改革沒興趣：那些執政的想的還是回到五十年代計劃經濟那一套去，即便他們力不從心。

留學生關心的一些問題

一、政治安全

我們這次回國的總的感覺是，「外鬆內緊」，平靜與緊張交叉。

我們在國內行動時，表面上沒遇到什麼麻煩，也未感覺到有人跟踪。但從內部知道，安全部密切監視我們的行動。怎麼監視法，我也

不知道。反正我們的大致行程，預先告訴了使館，本來就是公開的。北京表面上（在我們在京幾天）看上去很平靜。人們衣着入時，走頭行走談笑風生。但在公共場合都很謹慎，不談政治，更不提「六四」。每個人都會告訴你，絕不要在天安門廣場或北京飯店裡說話，那兒便衣警察及監視聽系統特別完備。但是，只要幾個人湊在一起，不管是家裡、餐館、宿舍或學習小組會議，就會破口大罵。和文革時顯著不同的是，人們似乎怕的是便衣警察，而不再怕打小報告的人，那種文革時的人人自危，連父母孩子都互相防範的情況已不復存在。歷史在這上面很有點進步。

不過，一些受壓力比較重的人處境還不一樣。比如，在五八一八軍管後簽過字發表過聲明反對軍管的人，或者是處級以上參加過遊行的人，受到的壓力很大。他們許多人還在遭審查。新的術語叫做「未解脫」。他們的住宅電話等都遭到竊聽，來往郵件也遭受檢查。如上海的欽本立、孫恒志等，他們出門，見過什麼人還得報告。如天津開發區主任張緯的自由活動範圍現被限制在房子周圍一百米。由於他們不能自由地和外界接觸，心理上當然更受壓抑。

所有大學生都被要求與「小結」，檢查認識在「六四」中的行動言論。北京的黨員是重新登記，特別是像體改所那些活躍的地方。人民日報大整肅，僅部以上的幹部就撤換了四十多人。現在清理還在進行。法制仍然被執政執法者藐視。大部份在押的人，都屬拘留審查性質，已有半年多，早就超過了「刑法」規定的期間。許多人還不讓家屬探監，甚至家屬不知道他們關在什麼地方。我們這次回國，想就被關押的經濟學家們向司法部門提出要求：一，按司法程序處理，拘留審查超過刑法規定期限的，而又不能進一步處理的；二，審判應該公開，允許各界人士旁聽；三，對在押的人給予人道待遇，允許家屬探監，禁止體罰。我曾打

電話找人民代表大會法制委員會，最高法院，他們連電話也不肯接。後來在和國家教委，上海教委辦的會談中再次提出，要求教委向有關方面轉達此要求。執法者無視制訂的法律，又該如何處理？上海教辦接待的人也說，他們的意見在這點上和我一樣，也認為應該按司法程序辦。上海抓了不少人，僅復旦張才（音）一個人是屬於逮捕性質，其他全是拘留審查，而時間早就超過了期限。我提出的一些在押經濟學家有體改所楊冠山等、北京經濟研究所陳子明等，上海陳奇璋、楊魯軍、許小薇、張偉國。（導報原來被關的還有孫樂波，但我在上海時聽說他已經回到家裡，保外候審）。不過，據陳樂波說，他知道的幾個政治犯都還未被刑囚（體罰）。我們在北京時，社科院剛有一個人從監獄裡放出來。據說獄卒待他們不錯。獄卒也怕將來有一天這事要翻案。

大家很關心：短期回國探親的安全系統如何？

我覺得風險總是有的。但怎樣的風險，因人因時也因國內各地而異。兩個留學生考慮的問題，一是會不會因我們在海外抗議活動而被逮捕；二是即便不遭逮捕，會不會卡住不讓返美。我們和教委的會談中，王盛水（教委官員）說（原話）「留學生在海外的抗議活動不追究。」但是他又說：「對於那些製造事端，比如說到美國國會去作證的少數人，我們是不歡迎的。」當時我們追問：一，「少數人」，這是一個含糊的概念。幾十年來的這個「少數人」的定義，而遭到政治迫害的人不計其數。希望教委拿出法律的定義來而非定義不清的「少數人」的概念；二，「不歡迎」是指什麼？是關押還是槍斃？還是驅逐出境？希望教委明確。對第一個問題，王表示記下來再研究；對第二個問題，王說：「這要問司法機關了，不是教委的事。」對會不會遭逮捕的問題，我個人看法是，得綜合考慮這幾個方面的情況：一，現在比毛澤東時代進步的是，你有不開口的

權利，不會由於保持緘默而遭迫害；二，罰不治案；三，看形勢。當當局注意改善國際形象時，安全系統大些；四，看各地各單位具體掌握程度。如果單位負責人思想開放，則要好得多。我們聽說過許多遭安全部追查但被單位領導保下來的例子；五，本人的具體情況。如海外參加活動的積極程度，簽證情況等等；六，也要認識到風險總是存在，因為中國的法律並未被執法者認真執行過。官方的承諾並不擔保安全。

還有個問題是能不能順利返回美國。現在出境都要有出境卡。拿中國護照的，出境卡要到公安局辦。出境時，邊防站有兩個人，仔仔細細把你的名字和一個名單對照。發現問題，有可能就不讓你出境。我出境時，覺得那個檢查人員對我很有異樣表情。大概是我是「內控」對象吧。對大部份留學生說，不讓出境的危險比遭逮捕的風險要大。不過我們直接認識的人有回去的都順利拿到了出境卡。

對長期回國的。教委說是在出國上提供方便。據說半年內本單位可以批，半年以上則要重新申請。但「六四」後，許多人的護照都被收回去了。我認識的不少同學朋友的護照都被追交上去。出國受到限制。我們的老會員林毅夫，是迄今為止唯一在美國完成經濟博士回國工作的，由於參加了「三所一會」的簽名而不讓出國。我們在和教委的會談中反映了這個問題並且說明這樣影響很壞，怎麼能使留學生信服教委的出國方便的承諾呢？這個反映倒是很有效，會談後第三天教委就通知林毅夫，允許他出國開會了。這件事說明我們的旅行至少還能為會員辦些實事。

二、學術環境

現在的學術自由度，比學潮前當然要小得多。主要是受意識形態的干擾和政治壓力。另外，改革派經濟學家受打擊很大，精神壓抑，

學術研究積極性受挫，因此討論氣氛也不熱烈。刊物出版也受影響。當然，許多事情還是可以做的，如一些政治相對不敏感的領域，純經濟理論，或實證的項目。如社科院的實證調查項目，研究軟約束條件的，調查廠長們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就很有意思。

普及現代經濟學教育則是國內急需。大學裡師資貧乏。對高中生的普及經濟學教育可以說沒有。我們這次回國，和北大、復旦口頭達成協議，徵求會員中自願者到那裡短期執教。另外，也和上海、浙江達成搞電視普及教育的意向。今後我們學會在這方面還有相當多的事可幹。

三、生活待遇

國內一般的生活條件，大家都知道，毋須重復。有三個大家關心的：職稱、工資、房子。職稱等，教委有文件，提拔放慢，看各單位掌握了。工資較死，總之教師的工資不如公司職員的工資高。回去搞實業的可以期待高得多的工資，但教師的工作自由得多。房子是最大的問題，但各地不一樣。北大顯然比復旦要緊張得多。留學生回國，我覺得要注意的是處理好和國內同事的關係。海外回來的人想，我放棄了國外的優裕條件回國，理所應當照顧點；留在國內的人想，你出國時留下的教學任務都是我們承擔下來的，搞學術研究都受到了影響，作了這麼大的犧牲，國家也需要考慮照顧。大家都有道理。還有一點是，回去前要多考慮國內的麻煩，要談好具體落實單位承諾的條件，包括細節部份。不然到時單位不兌現承諾的條件，鬧出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來。

目前，打算長期回國的留學生很少。考慮短期回國講學工作研究的人有一些（大概也不少）。我們學會和社科院，一些大學達成了一些項目意向。詳細情況見附錄一。希望有興趣的同學積極參加。

閻炎報告：市場供應和民衆心態

正面印象：物價有所降低

從我走的幾個地方和城市來看，物價與八年前相比，有較大的降低。市場供應應該說是相當豐富。不僅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是如此，即使南京、合肥，以致安慶，市場供應都應該是相當不錯。記得三月十七日我們到上海，因時差倒不過來，便一大早跑到市場去轉了一圈，各種蔬菜、肉類基本都有，價格也不太貴（基本是官方價格），水產類價格稍貴，但也有得供應。生活耐用消費品（如彩電、電冰箱、洗衣機之類）價格比八年前有較大幅度降低。只要有錢，各大商店均能買到。

人民的衣着，較之兩年前有較顯著的改變。原因大概是幾年前引進的國外服裝生產線開始投入生產。各城市，除北京外，從外在看生活均已正常。一般來說，一般老百姓並無太明顯的恐懼感。二年前經濟過熱時所呈現在一般民衆生活中的那種紊亂感或不穩定感似已消失。去海南，去特區，辦公司已不成爲一般生活中的熱點。從某種意義上說，一般的中國百姓似乎更適合目前的這種經濟狀況。

大概由於緊縮銀根和整頓官倒，交通不是特別擁擠，飛機票、火車票均不難購買。即使連曾經最頭痛的出租車也比較好要。（尤其在上海）

負面印象：社會重重問題

(一) 民衆心態的變遷

如果有人問我此次回國感受最深的變化是什麼，那我一定會回答：是一般民衆心態的變化。一九八八年我回國，似乎每一個碰到的人都在抱怨漲價，抱怨自己在經濟改革中所得到的

利益不如別人，彷彿每一個人都成爲了改革的受害者。而這次回去，似乎每一個碰到的人都在罵政府、罵李鵬。「六四」成爲人們共同的痛點。如果說，八八年人們抱怨的是經濟方面的問題，而現在人們譴責的則是政治方面的問題。一般說來，政府機關的幹部在公眾場合下，多會說一些和中央保持一致的話。尤其在南京，表現得更明顯。但在私下的場合，基本上都會非常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政治傾向。我的印象是：現政府的權威性已大大降低，共產黨的控制能力在「六四」之後，實質上已經大大削弱了。

(二) 關於政治壓力和控制

在北京，可以明顯感到一種壓力和緊張，越接近權力高層，這種壓力感越強。這可以從政府機關對待我們觀察小組的態度略窺一斑。在北京，有些重要人物原定要見我們，但都臨時找通詞推托了。同樣的情況在安徽和江蘇省均有發生。我原有朋友幫助安排，準備同安徽、江蘇省省長分別一晤，但最後均被他們拒絕，而替之以下屬具體辦公人員相見。有朋友告知，「六四」後國內對美國來人憤而又憤，且目前特別強調幹部政治可靠性，要讓權力「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裡」。在目前這種形勢下見我們，不會在可見的將來帶給他們什麼好處，倒是極有可能會爲他們造些麻煩，因此不如不見。我相信此種解釋。

除北京之外，這種政治壓力就小得多，甚至連上海都很少。政治壓力隨城市的規模遞減。在合肥、南京，壓力甚小，在安慶則幾乎難以查覺，……如果你不去和政府機關接觸的話。在各地我們去了大學走走、座談。在北大，政治壓力顯然最大。我原來所在的系中，有兩位朋友仍在被專案審查，尚未通過。一般學生

在公眾場合講話，非常注意。原來心臟地帶「三角地」前的大字報專欄，已被鏟平，公眾活動似乎銳減。此次北大之行，對我這個老北大的人來說，有一種深深的酸楚感。但在學生宿舍裡，則是另一個世界，學生仍然自由地表達着他們的政治見解。

在其它各地的大學，類似北大的政治壓力很小。我在安徽大學、科技大學和南京大學的座談中，學生基本是無所畏懼，認爲現政府該倒，越快越好。在一次和某級官方的座談時，一位幹部在會上講：「這個政府這樣搞，離垮台不遠了。」一語既出，連我都吃驚。

一般的民衆更無所謂了。在火車上、在汽車上、大街上，隨處可聽到老百姓罵政府，罵李鵬，罵鄧小平，如同幾年前的中國一樣。

(三) 關於對「六四」的反應

北京的民衆幾乎無人相信政府的解釋，一出租車司機告訴我，我們怎麼會忘記天安門死的那麼多人呢？要忘記了，那人不就變成畜牲了嗎！

外地的民衆都說政府在撒謊，不相信政府的解釋。但我也碰到二個人認爲學生運動是動亂，破壞了交通，擾亂了正常生活。一是北京的工人，一是離休幹部，這種想法我以爲還是代表了一部份人的看法。

知識份子對「六四」多有反思。有人認爲若適可而止會更好些，有人認爲組織不好便只有失敗；有人認爲鄧小平還在，無論怎樣都會失敗。

(四) 關於知識份子的現狀

知識份子絕大多數都感到壓抑、苦悶。很少有人再寫什麼，能出國的想盡辦法出國；不能出國的或者讀書，或者什麼都不幹。相互揭發者，如何新之流，甚少。此點甚不同於「文革」。

(五) 關於國內經濟現狀

目前的物價平抑，一是行政手段的強行控制，二是政府由國庫中的大量補貼。國內所謂

「總需求大於總供給」的基本矛盾仍沒有解決。因此，物價的平抑只可能是短期的現象。

國內目前經濟上的嚴重問題是：由於市場疲軟導致的開工不足，再加之原有的過份冗員，目前的所謂「在職失業」現象非常嚴重。在北京時我們被告知，北京地區的「在職失業」率大概在百分之三十左右。國家自去年四月以後，經濟實際為負增長。由於控制、緊縮貨幣、市場疲軟，去年下半年經濟下跌更為厲害。去年第四季度，政府意識到市場疲軟，經濟下跌，增加投放了三百億人民幣，企圖刺激經濟的反彈，但結果是：市場依舊疲軟，所有投放的貨幣都轉化為產品進入倉庫積壓。

我以為造成目前市場疲軟的原因並不僅在於政府緊縮了銀根，更重要的原因在於民眾對未來的經濟前景期望不同。一般民眾都認為緊縮貨幣的政策在短期內（二、三年）不太會有太大的改變，持幣待物的心態比較嚴重。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經過前、去年的搶購風後，消費品市場的相對飽和。（相對於有購買能力的人來說）

經濟上存在的另一問題是：外資流入的停止。在安徽省經貿委座談時我被告知，自去年「六四」之後，安徽全省無一筆新的外資進入。有些「六四」前簽好意向書的外商如今音訊杳然。類似的情況在江蘇皆存在，只是比安徽稍好些。

我個人認為，現政權仍然是強大到足以維持社會的穩定和至少表面上的政治和諧，但是它最沒有辦法解決的是經濟增長滯緩和社會風氣低下、社會道德淪喪的問題。與五十、六十年代相比，如今的中國已經沒有一種主義和倫理能夠重新振奮人心了，超越的東西不存在了，於是，當今的中國便是一個世俗化的，實用主義，功利主義橫行的社會。是所慮也。

有關留學生的問題

(一) 回國的安全性問題

我回國之前，曾有很多朋友擔心，是否有人盯梢、監視、能否回得來。我個人認為，不至於如此。理由並不是因為我相信政府的宣傳，而是因為如今の政府領導人，被堆積如山的經濟問題、民族問題弄得焦頭爛額，哪有精神來管我們這些螻蛄小民？如今の共產黨已非五、六十年代，組織、控制能力已大不如前。如果連我們這些人都能受到他們的嚴格控制，則共產黨幸甚。

我持F-1簽證，拿出境證僅用二十分鐘，無任何麻煩，倒是離境辦免投卡、健康證麻煩事大。抽一管子血不算，還交了一百五十元錢。最後離境這些玩意看都沒看。等於花一百多塊錢買張廢紙，外帶貢獻一管子血。

(二) 國內在最近的將來是否可能有如同去年的大規模行動出現。
我個人認為可能性極小。儘管目前的政府已喪失民心，但老百姓罵歸罵，真正要組織起

孫澆報告·論及改革一片悲觀



來鬧事，則是另一碼事。民主之於一般中國的民眾，我以為是奢侈品。時下的中國，百分之八十的人所關心的仍是溫飽問題，哪得幾多關心去為民主而奮鬥，而捐軀？這裡的關鍵是組織的出現。而在目前的政治，安全嚴控下，政治組織的出現，實在是太難了！

目前一句話大概可以較恰當地描述中國目前的狀態：全國人民在等待一個人的死亡。鄧不死，中國恐怕難有實質性變化。鄧一死，中國大約一定是要大變的。

(三) 國外的研究生、留學生能做些什麼？

當我問及國內人士，國外留學生能為國內政策做些什麼：：如果國內改革繼續進行的話，他們幾乎異口同聲說：回國來教書。至於其它，他們說不知道，也不感興趣。比如我講到辦電視講座之事，似乎無人感興趣（國內部門幾乎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江蘇教委座談時，有人會下告訴我，能在國外呆着就先呆着吧，回來也沒事幹，再出去還麻煩。

抵滬次日就和復旦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及經濟研究中心的教授和研究員座談幾乎一整天，他們表示上海研究工作在「六四」後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除了發表大刀闊斧的改革新見解較困難之外，原有的研究項目仍在繼續，他們較集中地談到已進行了二年多的中心課題，如何通過生產組織的創新來建立社會主義的壟斷競爭市場，試圖在企業改革和價格改革之外闢出第三條思路。他們鑒於新舊體制（規範的完全競爭市場和非規範的完全競爭市場）並存的格局下宏調調控政策及它的無所適從，因而主張推進壟斷性競爭市場的成長。較具體的想法是把一九八八—一九九五年分三個階段進行。第

一階段旨在使企業部份也成為投資主體，讓承包企業橫向聯合形成集團，中央和省市實行財政大包干，削弱行政管理機構；第二階段，旨在擴大企業競爭，發揮市場作用，在優勝劣汰中形成價格和新的管理組織；第三階段讓企業財團、股份公司取代企業承包形成真正獨立的經濟法人。健全法規和市場秩序，全面開放價格。中央和地方實現分權等等。思路的特色在於承認市場經濟的優越，但在目前計劃經濟運作多年的包袱重壓下直接過渡到市場經濟不可行，需加以妥協，故有在國家保護下讓國有大企業先佔有市場，並在行政控制逐步放鬆的條件下使它們逐步過渡到獨立的經濟法人。問題仍在動力機制。首先，行政管理為何要自我萎縮；其次，大企業在分割市場並且沒有外來挑戰時為何要主動競爭；第三，大企業怎樣去響應競爭。即便前兩個均無問題，第三個困難在目前仍不可逾越。談到大陸所謂「治理整頓」的四大環節中提高生產效益和使產業結構合理化時，必以企業解僱冗員或企業倒閉為主要手段，捨此即成空言。現在中央政府再三強調「穩定」，懼怕社會後果和政治後果，把失業和破產視為不容考慮的代價。在這種約束之下，改革的可行解集即為空，遑論最優觀。在此後的多次座談中，我都提出這一徵結，得到的答覆均屬悲觀。許多實例證明，即使企業要解僱個別的三流子也不可行。社會上各種組織如街道、公安局都會要求企業要包容教育，不要把包袱推向社會，使企業不得不欲做還休。外無競爭壓力，內不願忍受競爭的結果，要更大企業主動承擔市場風險，過渡到承擔經濟責任的獨立法人，難矣！

目前各省市都在努力擴張自己的勢力，以增強各自經濟實力為主要目標。雖有人認為是「諸侯經濟」，損害規模經濟效益，但這却為削弱中央集權，走向多元社會開闢道路。其實以中國省份之大，經濟規模原本不成問題，若無價格扭曲，強行管制，省際合作也能走向正

常化，本不足慮。目前上海的官員和學者都熱切盼望中央能給上海與廣東福建同等的優惠，在浦東開闢特區。他們認為上海挾地傑人靈之長，如中央政策略微「傾斜」到上海一點，發展勢頭應該能超過廣東。

在多次座談中，包括和學會顧問多人的接觸中，我感到他們都懇切希望海外留學生能和國內繼續保持接觸和學術交流，為國內改革多做促進。他們指出僅從宣傳文字上瞭解大陸實情是不夠的。而正式文件常是片面文章，和實際運作相去甚遠，不能據以作研究的基礎，惟有實地考察，和人際的接觸，才能有真切的瞭解。以目前的格局，他們希望留學生能短期返回大陸合作研究或講課，以各種方式保持交流渠道的暢通。要從長計宜，不要因為突發事件而中絕聯繫。我們也表示了留美學生的行動是對六四前後一系列變化的理性的反應，由此對交流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應由大陸政府負主要責任的看法。經濟學會一直致力於海內外交流，只要條件許可，我們將力所能及立即擴展一些交流合作項目，諸如經濟知識電視普及教育節目的製作等。我們的感覺是國內一談到具體項目，顧慮就很明顯，惟恐遭到上級的猜疑干擾，有多一事不若少一事的顧忌。原則上他們（包括大學和社科院等）對經濟學會會員回大陸合作研究課目，哪怕是短期的，均很歡迎並願提供方便，他們希望這種心願能由我們周知學會會員。

增加交流不但能把外界研究動態帶回國內，普及經濟知識，也有助於澄清國內一些因歪曲報導而造成的民衆的誤解。例如不少人對學自聯的性質活動的認識很片面。我即以我本人曾代表緬因大學參加芝加哥大會，親歷其成立過程為例，說明學自聯的組織程序是充分民主並代表絕大多數留美同學的不為官方操縱的團體。大陸宣傳其為一小撮人的活動是罔顧事實的。而布什當局的對大陸留美學生簽證的行政命令也是在全美朝野普遍壓力下造成的，其關

鍵因素是對六四鎮壓的強烈抗議。學自聯到國會遊說活動至多不過是個次要的促進因素。通過面對面的接觸，諸如此類的誤解可望減少，更重要的是，迴避交流的本身是與開放改革相抵觸的。

在和外貿、銀行、法律、企業管理的專業人士座談時，我得出的印象是在官方鼓吹的條文之下（如見諸一月十七日海外版人民日報的治理整頓三十九條之類）實際運作中有很多生動事實都和官樣條令衝突，值得我們去瞭解。去夏以來，大陸的外貿和外資利用都受到影響至巨。大半已在洽談的，或洽談完畢正待上馬的項目，生意都被外商取消。大筆的貸款尚在繼續，均和已在進行的大項目的設備供應有關。如上海的地鐵工程能從西德、美、日融資和其官方進出口銀行支持銷售各自廠商製造的設備分不開。就上海而言，所受的損失很大。國際銀團自去年來把大陸風險等級提高，令投資者裹足，並且增加貸款成本。例如上海獲中央授權可向海外舉債三十億（！）美元，以發展地區基礎建設，就將付出更高的貸款利率。進出口所受損害更明顯。去年因履行以前的合同尚可維持，今春起情況就大為不妙。我曾參觀了一些上海的基建項目如隧道、黃埔江大橋等，並乘艇在黃埔港巡檢，但見許多港口都很冷清，陪同人員指出這些在昔日都是黃金地段，等裝卸的巨輪排隊等候的泊位，如今有許多空閑着。江中的浮筒也不見貨船下碇。碼頭工人有不少賦閒，工資打折，獎金更無着落，相當蕭條。人們指出這種情況自七十年代末死前以來還未曾有過。從上海北京出租汽車的情況也可略見一斑，現在出租車用電話或在街上招之即來。司機多半抱怨生意大不如前，月收入從以往四、五百減至三百左右，主要是做買賣的外商顧客銳減的緣故。飯店的空房率亦高，如北京最高級之王府飯店減半價待租，仍有不少空房。

在上海時我還曾花了一天時間訪問了金山

的石化總廠。石化總廠有六萬職工，連同家屬達九萬餘人，並有自己各種系統甚至檢察院法院，儼然是座小城（如果在美國可算中型城市）。這些大企業的社會職能已是不勝重負，但李鵬認為還需要加強。石化總廠的績效常在全國十名之內，但據介紹它已連年虧損，欲維持簡單再生產也感困難。主要的是稅負太重：年產值四十多億，實現利稅十二億，但本廠留成作為福利和技術改造基金僅為利稅的百分之六，即七千萬而已。折舊提存也不敷出，因更新的設備更貴，加上通貨膨脹，折舊不足以維持原有規模的生產。有人抱怨這是因為以往政策傾斜犧牲了大企業，使其表現不佳。第一個因素是人事權，即不能革汰冗員，也無法獎勵先進，故配備一百二十人到一百個崗位，實際上班的往往不及八十人。這些企業也設有統計、企劃等部門，但因歷年培養經濟、管理人才不夠，故主持其事者大抵為工程技術人員。我到職工家中轉了轉，覺得居住條件相當不錯，遠比上海市的要強。問到李鵬政府現行政策是否有「傾斜」回到國營大企業那邊，答曰沒有。只是增加了一些流動資金以供周轉，全國也不過二十億。而中央對這些企業的利稅上交和承擔社會職能的預期却同時增加了。

總之，我總的印象是經濟越來越走向困境，但頃刻崩潰的跡象不明顯。中央在對政局的控制逐漸穩固下來之後正把注意力移向經濟事務上來，但至今未有良策。以短程言，它以放鬆銀根、信貸希圖刺激生產和消費。去年第四季度破天荒地增加投入一百二十億人民幣，尚未見效果。市場雖呈供應充沛表象，但何時觸發搶購、擠兌存款，誰也難說準。當局對此可能性，以及對大規模的失業都深懷戒懼，因為它深知目前經濟的脆弱，正如政局的脆弱一樣。

我們（張欣、閻炎和我三人）在教委和人大司座談了近兩小時，一開始我們就表明了自己來的目的，就留美學生感興趣的問題和教委

交換意見，並瞭解現行政策做法。我們強調來前曾做了些準備，但僅代表我們個人進行座談。我們敦促對方注意語匯，看來為對方接受了。比如他們只用了一次「反革命暴亂」，其餘場合都用「六四風波」稱之。我們也以「六四」稱。我們幾次要求對方說明有無政策來劃分海外留學生，都未獲直接答覆。他們僅含糊地辯稱留學生中專門從事破壞和反政府的是一小撮。我們指出這種含混的指控很容易被擴大和濫用；中國在這方面的教訓實在是不勝枚舉的。

當我們要求一份國家教委有關留學生自費留學的新規定（九一〇第十四號）時，他們不肯。理由是和目前在美學生沒有直接關係。我們指出受限制的學生是未來的留學生，理當引起我們關注。而且新規定很自然的會被留學生看作將來回國服務時所受到待遇的一個先兆。況且，受到這規定限制的大陸學生也沒能看到文件原文和細節規定，我們已在和復旦、北大和人大等學生那裡得到證實。於是教委人士就稱該規定尚處試行階段，有待在實施中逐步充實。我們反駁道如果受到限制者都無法知道具體的規定，修正它的反饋和依據又從何而來呢？克服政策制定的任意性和錯誤政策的最基本的一點是政策須先讓受其約束的人瞭解和同意。

我們接着對該規定提出批評。我們認為政府在學生入學時從來沒有說明學習的成本、學生欠了政府多少錢，以及歸還的方式時間；其實學生的家長早已通過工作把子女教育費用預付了。而且規定所需付的錢是和憲法對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力的規定相抵觸。至於具體需付的金額更是隨意強加的，和大陸的勞力成本相比高得未免太離譜。再者，把學生按家庭背景和血親關係劃成各種不同的人而有截然不同的待遇，造成了明顯的歧視，也是和新規定設限收費的埋由完全抵觸的。在這種情況下，要想取得多數畢業生或海外留學生對新規定的贊同和支

持恐怕是很難的。

我們希望當局能迅即把新規定公諸於眾，並廣泛進行討論並聽取學生意見，做相應的改正。否則，海外留學生有理由懷疑該規定為對學生參加六四事件的懲戒。

當我們談及政治的安全問題時，他們強調教委不能提供任何保證，這是公安司法部門的事，只要守法，沒有安全問題。我們舉例說明壞法者往往在政府方面，反右文革乃至目前許多學生被逮捕監禁至今尚未依法法律程序起訴，也是硬對法律保護失去信心的原因。

自去夏以來，政府有新的出國限制：除了有效的簽證護照以外，尚需要所謂的出國證。自費出國的要向發護照的當地公安部門申請，公費出國的要徵得原工作單位同意後再向教委申請，其難易可能因人而異。（這次返國的幾個人並沒有在這方面遇到什麼困難）

當我們問到那些目前在北美的學生組織是大陸政府所接受的，他們表示學自聯是政府承認的，而經濟學會是被接受的幾個組織之一。回國兩週中我們設法和各種背景持各種觀點的人交談以瞭解他們對現狀和前景的看法。我得到的總的印象是人們對於去年的鎮壓是普遍不滿的，對六四事件的肇因則認識不一，對整個事件反應的程度有明顯不同，例如北京比上海強烈得多。民間捲土重來的跡象不明顯，大家似乎都在等待更新換代，顯然大都認為非更新換代無法解決目前深化的矛盾。政府目前是能控制局面的，即其稱為的「穩定」，至少在短期內是個事實。經濟遠不是在「健康」地發展，但大滑坡在近期內也不甚可能。人們顯而易見還生活在壓抑之中。在公開場合常常欲言又止。但使人感到欣慰的是，人們已經不情願講假話堵塞了。這和文革時有很大的差別，其實人們的真意，往往要從他們的話的反面來理解。

海聞報告：經濟學界沉悶壓抑



我回國的第一站和最後一站都是上海。第一次時間較短，只是與張欣交換了一下情況，辦好了回美簽證後即與張欣一起匆匆赴杭。第二次住了兩夜，有機會拜訪了原「世界經濟導報」的人，（我用「原」字是因為就在我與他們談的前一天，「世經導報」被正式宣佈解散）。此外，我還去了上海電視大學商談普及經濟學教育的項目。

在上海停留的時間太短，我對上海的印象只能是表面的，熙熙攘攘的街道，擁擠的交通，美領館前及外灘滙豐商店門口不散的人群；……這與我八七年去上海時無甚不同，感覺較深的是，上海的服務業又有發展，只要有錢，很多事辦起來方便了。譬如我去美領館辦簽證，要兩張半身照，我一時不知如何是好，經人指點去附近一家照相館，花十元人民幣拍四張無底片二寸彩色「標準像」，立刻可取，省了我一天時間。另外，坐出租車很方便，招手就停，哪裡都去。儘管不少司機牢騷滿腹，作為消費者，我對上海出租汽車現在的管理頗為滿意。現在車上都裝有計程器（個體戶除外），掛着帶有照片、姓名的司機證件和監督電話

號碼。乘客一上車，司機便在一式幾份的收據上寫下乘車地點、時間及里程讀數，到達後再寫幾時幾分到達何地及新的里程讀數和車費的金額數，作為乘客，我很放心滿意。對於上海出租汽車的整頓，據說還是由於溫元凱在上海遭敲詐，朱鎔基親自處理後才整出現在這個樣子。當然，這已是「六四」以前的事，但對我來說，仍有一個良好的、新鮮的感覺。在上海期間，我瞭解了一下「世界經濟導報」情況。這份曾經深受大家歡迎的報紙現在已經被關閉了。「世經導報」駐海外的記者也都被召回，包括前駐華盛頓記者潘慕平。潘慕平曾參加並報導過學會第四屆年會（伯克利），也是本學會會員，去年九月回國。「導報」工作人員前段時間整天學習文件，現在各人都在自找門路。至於這批人工作前景如何，目前尚無法得知。

在杭州的主要任務是聯繫普及經濟知識的項目。四月二十九日上午與張欣一起去了省政府、省電大、杭州大學，受到了熱情接待。經過一系列會談後，確定與杭州大學經濟系進一步討論合作問題。張欣遂回上海，我負責繼續落實項目。此後，我還與浙江大學經濟系、浙大軟科學研究所的教授學生進行了座談。

與八七年相比，杭州多了一些高檔次的旅館，「六四」後旅遊業受到打擊，即更到了春意盎然，桃紅柳綠的季節，生意仍是冷冷清清。一天晚上我路過黃龍飯店，一方面對它雄偉壯麗的外觀驚嘆不已，另一方面又為其稀疏的客房燈火惋惜不止。浙江的外向經濟成份很大，這次受的打擊也大。前幾天發展速度一直是全國前幾位，目前是負增長。去年年底浙江省經濟界曾討論向蘇聯東歐開闢市場的問題，企

圖為其出口產品尋找新的出路。

我這次回去住得時間最長的是北京。四月三日，我在一場雨雪後仍有寒意的晨風中到達北京。開始對這個中國最敏感最重要的城市進行觀察訪問。在北京的六日五夜中，我馬不停蹄，拜訪和約談了體改委、體改所、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所，北京大學經濟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以及國家教委等單位的著名經濟學家、青年學者、教師、研究生以及領導幹部等二十餘人。瞭解國內經濟研究機構的情況，經濟學家的狀況和觀點。這裡我主要報告一下情況，至於國內同行對目前經濟形勢、政策的一些觀點看法在下面再綜合地談。

首先談一下體改所和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所的情況。這兩個所是六四以來變動比較大的經濟研究機構。除了走的以外，兩所九人被捕（已放出兩人）。據說被抓的人待遇還可以，住單間，有書讀，春節時還讓回家看看。由於不准抽煙，不讓熬夜，一些人還長胖了，但何時能有自由，無人知曉。其餘的人在工作組領導下學習文件，「搞好清查，端正思想」。整個過程為三部份（或三階段）：(1)對每個人進行清查，清查各人在六四前後的行動；(2)對副處長以上幹部審查處理；(3)對黨員重新登記。到現在為止，第一步「清查」工作已經結束，正在進行第二步、第三步，但進展緩慢。研究人員基本上處於「三不」（不搞業務、不出差、不出國）狀態。清查結束後不少人悶着。而另一方面，不少與國外的研究項目現在都拖着，有些項目不得不轉，可又難找到合適的單位。這兩個單位原則上都將被解散，農研中心已成立了善後小組安置原有研究人員。這些人的分配去向包括新成立的中央政策研究室，袁木的國務院研究室、馬洪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業部以及體改委。但是機構好撤，功能難替。很多以前農研中心負責的事，以上任一機構都難以單獨承擔，而且各省的農研中心不撤，上面由誰協調？

體改所的情況更嚴重一些。「六四」後有人稱體改所為「類似林立果的小艦隊」。大有狼狽整肅一番之勢。曾有人想通過「三所一會」的聲明挖出與趙紫陽的聯繫與「陰謀」。結果至今未能遂願。據說去體改所的工作組還比較實事求是，主要是執行公務，並不乘機亂整。目前體改所的研究人員與發展所的一樣，一方面繼續「學習」，一方面也在「自尋出路」。

北京大學是去年「動亂」的另一個「重災區」。經濟學院不少學生教師積極參與了學潮受到處分。原紐約州大經濟系訪問學者，本學會會員，青年教師朱善利目前仍在審查之中，等候處理，不能講課。其它待遇也在懸掛之中。經濟學研究生白某因當場質問袁木受到黨內處分。不少教師學生情緒低落，研究工作中斷或轉向。厲以寧教授目前仍擔任他的系主任工作，也參加了最近召開的人大會談，不過他目前研究的主要課題不是經濟體制改革而是國際金融。當然，經濟學院不會像體改所那樣被解散，這些教師暫時不會有「目找出路」的問題。

目前，北京經濟學界總的來說比較沉悶，有關產權和市場的討論很少。在政治高壓下，很多很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不願講話，不願發表文章。他們表示，現在不說話是保持將來說話的權力。更有意思的是，去冬今春以來對蘇聯東歐經濟的研究也遇到了麻煩。據研究蘇聯東歐經濟的學者講，內部文件已將東歐定為資本主義復辟，並宣稱戈爾巴喬夫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叛徒。這一政治定性，使得這些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的人也不得不小心翼翼。當然，經濟學界並非所有的人都感到壓抑，有些人就覺得有點揚眉吐氣，認為前段時間風氣不正，這些人主要是五十年代的知識份子。去年下半年，北京經濟學總會王一夫（不知是真名還是筆名）曾在「理論信息報」上撰文列舉經濟學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十大表現，大有「撥亂

反正，正本清源」的架式。

在北京期間，我雖然主要想瞭解經濟學界的情況，但同時耳聞目睹了許多北京各界目前的政治思想情況。雖然「六四」已過去快一年，人們談起來還是記憶猶新，耿耿於懷。對國外的情況，國內也知道不少，有關部門發的「敵情通報」上有「民主船」和「天安門散步」的消息。我在北京的幾天，正是政治上敏感的時候。「四五」那天，除了廣場關閉只讓有組織的少先隊和共青团活動以外，街上不時有戴着鋼盔的武警巡邏隊。據說，中央對北京的「穩定」特別重視，至少在亞運會結束以前，任何「不安定」的苗頭頭會被毫不留情地鏟除。國內不少親朋好友也勸我行動要小心，四五前後從海外歸來，又四出活動，難免有嫌。不過總的來說，我的採訪沒有遇到任何麻煩。在北京公安局領取出境卡也很順利。

另外，我在北京期間，也正好在召開人大七屆三次全會。有幸拜會了一些人大代表，聽到一些未經報導的「人大花絮」。據說，這次人大總的氣氛比較沉悶，不少「炮筒子」事先都被朋友告知少放炮為妙。但仍有人忍不住提幾個令政府難堪的問題，例如，討論中有人提出：本屆政府執政以來，第一年通貨膨脹，第二年「反革命暴亂」，第三年經濟衰退，今後兩年再出問題，不知如何向人民交代？關於趙紫陽未出席人大，也有代表質詢原因。胡啟立出席了人大，坐在台下，乘台上人還未到，不少代表擁到胡啟立座位上請他簽名。當然，也有一些人大代表聽了李鵬的報告後表示「很受教育」，要「認真學習」，殊不知自己是來審議這一報告的。

關於亞運會，目前是北京市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北京市有關負責人專門在電視上講了一次亞運會對北京市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不過從我接觸面來看，人們的情緒並不很高，尤其捐款過程中一些單位領導的半強迫作法引起反感，這一點在火車上與外地旅客談起也有同感。

由於在北京的時間短，忙於見人談話，對面上的東西反而關心不夠。印象較深的一點是，北京的個體服務業很興旺。八七年去北京，個體戶不常見，現在去看，比比皆是。髮屋、餐館、小雜貨店等等，到處可見，門面裝潢的檔次也很高。

在北京期間，我去了天津。找了有關負責人士瞭解了天津的經濟情況。

從外商投資的項目數量上看，除六、七月份外，去年並沒減少多少，比八八年還增加了三個項目，真正撤走的也只有一家澳大利亞公司。但從投資總額來看，一九八九年減少七百萬（下降百分之八）。投資來源也有變化，一是歐美投資減少，二是大公司、大項目寥寥無幾。究其原因，一是政治原因，二是國內經濟緊縮政策的結果。緊縮後中方資金緊張，貸款受限，不少項目不得不取消或推遲。對目前的外商投資狀況，一名在天津的經濟學家評論為「投資的政策沒變，但投資的環境變了。」的確，從政策上來說，這次人大通過的關於修改中外合資企業法的決定比以前更加寬鬆和優惠，但由於國內目前的緊縮政策，國內對企業對人材控制的加強，以及政治上的緊張氣氛和宣傳上不斷出現的對資本主義和西方大國的批評報導，外商投資的信心並沒有因政策不變或放寬而增強。不過，「六四」後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歐美投資下降或裹足不前的同時，台資在大陸迅速增長，不僅在份額上，而且在實際投資量上。

關於天津的經濟，目前很不景氣。雖然全國都受緊縮政策影響，但天津更為嚴重一些。天津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這與前段時期天津市的經濟政策不無關係。李瑞環是五十年代培養出來的幹部，好的一面是比較注重關心群眾生活，不足的一面是缺乏現代市場經濟的知識和經驗，八八年通貨膨脹時，天津的物價仍壓得很低，結果天津工商界沒撈到漲價的好處，還吸引了不少外地人來天津搶購。改革最活躍時

，別的城市面對市場化錢改造企業，更新技術，而天津則花了不少錢搞城建、食品街、給老百姓一片一片地安裝管道煤氣。現在資金一緊縮，市場一疲軟，建築業受影響最大，許多老的和非必需的產品又滯銷，天津的經濟自然受衝擊。不過，盡管天津的經濟學家對前段時間的經濟政策有看法，火車上遇到的天津老百姓倒挺懷念李瑞環時期，一是物價低，二是有裝煤氣的希望。「現在李瑞環一走，裝煤氣也停了」。

訪問座談意見綜合

(一)對目前治理整頓的評介

一部份人認為整頓有一部份的成效，但貨膨脹，淘汰了一部份效率低的企業。雖有經濟衰退的代價，但在放鬆銀根促進發展時給政府一個調整結構的機會，有人指出，盡管治理整頓是「計劃」派極力主張的，但不能否定其中一定的合理性。八八年趨的過度放權，造成宏觀失控，這不能不認為是改革派的過失。

大部份人則對目前的治理整頓持否定態度。大家並不否認有時需要有些緊縮政策來調節經濟，但目前所進行的「治理整頓」不可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只能是「鬆—熱—緊—停」的一次簡單循環。認為目前這種「治理整頓」必然失敗的理由是：

(1)治理整頓的手段陳舊，用的是六〇年代初和七〇年代後計劃調控的老一套，但中國的經濟結構在十年改革之後已大大改變，整個經濟已分成計劃指令和市場指導兩大部份，成了一种既非計劃又非市場的經濟，用單一的計劃調控手段來調整產業結構肯定不能奏效。要調整結構，必須要在企業所有制、市場價格體制、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等方面深入改革。而這次治理整頓的政治背景決定其不可能與深入改革相結合。沒有相應的企業破產，勞動力流動等，結構調整是不可能的。

(2)即使手段有效，目前國際國內的政治經

濟形勢也將使治理整頓不得不在達到調整結構的目標前收場。尤其「六四」以後，民心不穩，李鵬政府已不可能在巨大的政治衝擊後再承受財政崩潰、工廠停工、工人失業的壓力。去年經濟嚴重衰退以後，政府已不得不在結構無實質性變化的情況下增加貸款，降低利率，實際是宣告了治理整頓的失敗。

(二)關於改革開放的前途

多數人認為「六四」後中國的政治經濟出現大倒退，但同時也認為要退到以前的計劃經濟模式也不可能。理由是：

(1)十年改革後新的利益結構已經形成，要重新退回老路，必然產生新的利益衝突；

(2)絕大多數老百姓都在改革中受益，雖對前幾年的通貨膨脹和官倒不滿，但更不願過去的日子，去年以來的衰退，在某種意義上給人們展示了倒退的惡景；

(3)即使在黨政領導層，尤其是地方領導，要回到老路上去的也是少數。

因此，即使李鵬政府想退，事實上也很難退回，但是，多數人認為近期內也不會有多大發展，改革處於進退維谷的境地。

(三)關於西方經濟制裁

經濟制裁對雙方都沒有好處，這是毫無疑問的。因此，經濟制裁的實質是政治。目前西方大國的經濟制裁對沿海地區打擊比較大，因此地方上多數反對（至少我在上海、浙江聽到的情況）。他們關注區域經濟發展，政治上有點淡漠。

我接觸到的北京學者學生中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中國不是完全市場經濟，與國際經濟的聯繫還沒發展到對中國社會有舉足輕重的地步，因此西方的經濟制裁不會有多大用處。可能還會讓李鵬政府利用國民中的民族主義情緒來轉嫁矛盾。另一種意見認為前段時期的制裁已經起到一定效果，李鵬一再表示不怕正是怕的表現。制裁需要堅持，如果一兩年內李鵬不能走出困境，黨內矛盾會加劇而導致李鵬下台。

(四)與海外經濟學界的交流

幾乎所有我接觸到的人都對我們這次回去支持態度，國內經濟學界對我們學會也很關心，不少人看到國內關於我們年會的報導很高興。不少人還特別注意到報導中提到了「國內著名青年經濟學家周其仁」。

關於學會今年夏季的討論會，北京一些經濟學者主張多做些過度性政策的研究。在中國目前的條件下，追求理論的徹底性很難，在討論產權、市場等問題時多研究些「橋」和「船」的問題，少發些口號性的文章，叫人抓把柄又不解決問題。有人表示，國內經濟學家對產權、市場的認識並不亞於國外學經濟的，只不過他們更多地考慮現實的過度問題。

兩周訪問印象概括

兩週的時間瞬間就過去了，怎樣來概括對國內的印象呢？簡單地說，既非「鶯歌燕舞」，也非「水深火熱」。如果說，去年「六四」以後中國的政治經濟出現大倒退的話，現在基本上退得差不多了。但另一方面，形勢也不會馬上好起來，尤其在政治上，至少在亞運會前很難有任何鬆動。經濟上，銀根正在放鬆，估計生產會逐漸回升，由於體制改革的停頓，通貨膨脹和官倒的根本原因沒有解決，經濟發展仍潛伏着危機。

國內大多數人情緒不高，各有各的牢騷。但近期內發生大亂的可能性似乎也不大。矛盾是錯綜複雜的，不滿也不是同方向的。有不滿現政府的，也有不滿改革的。不同的年齡，不同的社會地位，具有不同的觀點看法。「六四」以後青年人尤其是青年學生和青年知識份子精神上受到的打擊較大，對國家的前途比較灰心，而年齡大一點的人則希望比較穩定，與八七年相比，更多的年輕人想出國。但也有一大批中青年知識份子和幹部仍在執著地探索中國的出路，考慮着未來改革的方向和步驟。▲

特務論

張郎郎

抓特務的鑼鼓緊着敲，觀眾們伸長了脖子等着瞧。可惜，只見呼聲步步高，半個獵物也逮不着。原來都是有罪推論，疑人偷斧。

去冬今春，中外齊演「抓特務」驚險故事，越演越紅火。廣大觀眾拭目以待，「急急風」響了八遍，就等抓出一兩個貨真價實的特務。可惜，只聽見雙方呼聲「步步高」，却全沒有亮出一個「獵獲物」。雙方才漸漸有所收斂，均是苦於「沒有證據」。獵人們的成績之善可陳。

原來，也還都是「假設有罪」，然後再蒐集「罪證」。這和文革期間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有什麼區別？我黨又走上這條老路，並不奇怪。只是「恢復我黨的光輝傳統」而已。而我們在海外，又不是黨員，為什麼會熱衷於同一類型的思維模式？這的確需要認真地反省。也許在我們「靈魂深處」，已打上「MADE IN CHINA」的永恒烙印。

袁木等我黨當代最智慧的理論家，還在學生運動早期，就「天才」地預言了勢必導致「暴亂」，就事先發現有「國外反動勢力」介入，也「掌握」了國際特務的蛛絲馬跡。在「平暴」勝利之後，關於「外國特務」故事講了幾個版本：

例如：「索羅斯勾結趙紫陽……」，又例如：「CIA派遣包柏漪……」再如：「林培瑞和方勵之策劃陽謀……」云云。有些做為「重要講話」印發，有些做為「內部精神」傳述。使全民、全黨再繃緊那根鬆懈了多年的老弦。

可惜，沒有在全世界範圍發佈上述新聞。使我們身居海外的中間小民，始終難以明白事實的真相。我黨向來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更不會隱瞞事實。這次為什麼如此扭捏，如此顧慮？當年槍斃「美特」李安東遊街示眾，其勢何其壯也。而如今只在內部傳達，不能打擊「敵人」，只能嚇唬百姓。或許，這樣安排是新的歷史時期的特殊安排。

毛主席說（引自伏爾泰）：「如果需要，沒有一個上帝，也要造一個上帝。」換言之：「缺少一個魔鬼，也得造一個。沒有魔鬼，要上帝幹嘛？」毛主席又說：「人民就是上帝。」而鄧小平是人民的總代表，所以就是上帝。難怪袁木最近發現了「國際歌」辭已經過時了，不適用於中國的特殊國情。

應該改為：「從來都靠什麼救世主，也得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靠小平不靠

自己……。」

沒有小平就沒有信仰，就沒有了生存的方向。海外流亡者惶惑的心理，在於失去了生存哲學的重心。

有了小平還不夠。還要有一個對應的頭號敵人。蘇修如今已經對小平的改革開放五體投地，打着白旗臣服於北京。那必須再度啟用美帝為頭號敵人。當年珍寶島事件前後，一片抓蘇修特務的呼聲。現在改調了：假想敵重新確立。改呼抓西方特務。

這「頭號敵人」不可或缺。有了它，國家機器有了新的原則，新的動力，新的強化專制理由，新的預算，新的財政分配。多年來瀕於失業邊緣的大批專業人士：專業抓特務的、專業抓特務的輔助性專業人士、輔助人士的專業助手、助手的外圍人士、思想控制專家、居民跟踪專家等等……如今舊貌換新顏，他們人人有工作，也有飯吃了。不分清敵我友，如何體現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歷史雄辯地證明：每掀起一次抓特務的高潮，必定使全黨全民更加同心同德，思想提高的成果必定會落實到經濟大發展的實效上。

據「人民日報」海外版的準確消息，在人



人舉報，全民抓特務之後，經濟捷報頻傳。我們的祖國大有希望。我們應當感謝黨中央，感謝鄧主席。說真的，也得感謝美帝，如果沒有那些「堅決」的美帝我們沒法圓這個故事。

五

有些幽默，是對應式的。比如：在美國某些「共謀研究權威」人士，發表文章、印發資料：大談共謀如何在顛覆美國，或如何在破壞「海外民主運動」云云。如果把這樣的故事，到北京去講：「美國有人相信：中共還要推翻美國政府，還要解放美國人民。」北京人會笑掉大牙——中共有些人歲數大了，有些人智商有問題，但還不致於笨到這個地步。中共國策的根本，是維護和鞏固自己的政權。如鄧小平說：井水不犯河水。

反之，如果你告訴美國普通老百姓，說：「中國有人相信：美國要推翻中國政權，要去解救中國人民。」美國百姓也會笑掉大牙。可見雙方誤解到什麼程度。

有誤解才有人文科學。才有了葉甫圖申科的名詩：「問一問俄國人，要不要戰爭？」我要夠機靈也可以寫：「問一問美國人，要不要打中國？問一問中國人，要不要打美國？」但誰也不需要這類詩。各國政府，各有其更高原則，他們需要這樣的詩：

「也許在明天，將發生殘酷的戰爭！」

六

在中、美、蘇三國演義中，互相高手過招，玩着「抓特務」的象徵性遊戲。而下面却有「跟着哄」的百姓，唱得有聲有色。

比較有趣的是：國內在一片舉報聲中，居然在社科院，人人舉報縱橫家何新。使他一落再落，落到四面楚歌的境地。

不太有趣的是：在海外各大民運組織，此

起彼伏地掀起「抓共謀」的浪潮。某些「積極份子」，起到了共謀所不能起的效用。真是，有太多的業餘打獵愛好者。

七

當人們言之鑿鑿地肯定，「中共去年派遣共謀到海外，就增加預算六百萬美元。」且不論買春旺是否如此大手筆地派遣。我們至少在打獵之前，先研究一下派來者的任務會如何？

一、刺探軍事、科技情報——不會到民運組織中去。那裡沒有這類工作可做。

二、分裂民運組織——民運組織本來就應該多元化。不分裂照樣百花齊放。

三、暗殺民運領袖——至今沒見着一樁，那也是中共當局所不恥的恐怖行動。如果去做，跑得了麼？

四、打入民運刊物——到刊物幫忙幹活，那是苦差。如果中共派人來幫助辦刊物，那是好事應該歡迎。

五、瞭解民運組織機密——我不知道這些組織有多少密可保。如果共謀是衝着機密而來，也好辦了。把夾子下在那誘餌旁邊就足夠了。犯不着一片亂喊。最好的辦法是盡量減少機密，機密越多特務越多。最後會如何發展，可想而知。

綜上所述，中共派這麼多人出來，他們也是人，也是活人。不可能派出來的全是機器人。他們也有腦子，也會思想。真是在一個運作良好的民運組織內，久而久之，是誰在教育誰？

弓杯蛇影、風聲鶴唳，是缺乏自信者的典型心理狀態。

八

雖然如此，居然還是有人對於狩獵樂此不疲。堅持要當現代打獵小英雄。到底是什麼心

理？

也許，長久以來生活在一個舉報與被舉報的典型環境中，對誰都懷疑。恨不得早日抓着幾個大獸，方解心頭之恨。有些操之過急，「有棗沒棗打三竿，有狼沒狼打三槍。」捨得下孩子，也沒打着狼。

也許，由於被別人追殺過，有過度的機敏。往往採取先發制人，從「受迫害狂」，驟然轉化為「先下手為強」。在天安門前就發生幾次這類故事。

也許，有人是職業活動家。老呆着太悶，就開始在周圍找靶練手，練着練着，越琢磨越像。到處樹靶。像小貓追自己的尾巴一樣，假想敵以假亂真。

也許，有些人是職業革命家，就必需組織起一個標準的機密組織，機密組織就必須先清理隊伍，為清理就必須抓特務。

特務沒抓着，可抓出一片「特嫌」。

九

「特嫌」是安全靶。抓對了，為本方立了大功，一旦證實則立刻成為「當代英雄」。抓錯了，也無所謂。那只是一種懷疑，也沒肯定啊。也只是一種直覺，自己體會去吧。防患於未然，錯了也不用平反——「特嫌」不算罪名。

那「特嫌」是如何引起獵人們的懷疑呢？

「您瞧：他們家是幹什麼的，什麼藤結什麼瓜。」——血統論。

「您瞧：他在哪工作過，那還有跑。」——職業論。

「您瞧：他沒管咱們要錢，他怎麼活着？」——收入不符論。

「您瞧：他蹲過監獄，怎麼沒斃了他？」——不死有罪論。

「您瞧：怎麼抓了別人，他倒逃出來了？」——逃跑有罪論。

「您瞧：他沒名沒利地來圖什麼？準是臥底。」——目的論。
……不勝枚舉，越琢磨越對，越琢磨越多，再仔細想想，這種邏輯多麼熟悉——似曾相識燕歸來。

十

我們在嘲笑某些人思維痴呆，邏輯混亂的同時，是否發現我們在某些問題上，陷入了自身的盲點。簡化了邏輯只有A等於B，或C相似於D。連小心求證的過程都省略了。痛快固然痛快，在快刀斬亂麻中，斬去了我們獨立思考的能力。斬去了我們明晰清楚的判斷力。

十一

無論你是何方神聖，如果你真決心當獵人，為何選從大處落眼，小處入手呢？現有下列特號獵物——
美國現任總統布什，曾經是CIA工作人員。
蘇聯首任總統戈爾巴喬夫，曾經是KGB工作人員。
中國現任國家主席楊尚昆，曾經是……明人不必細說。

我們並不能以此得出如下結論：「這是一個特務統治的世界。」
不，至少不是「斗蓬加七首」式的特務主宰着世界。

如果你有自己的頭腦，試試取消本文運用的思維模式。那也就取消了本文立論的基礎。本文就自動「烟消雲散」了。
那就翻開新的一頁吧！▲

以基督精神宣揚民主

——中國民運基督徒聯誼會

親愛的在世界各地的民運學運團體中的基督徒兄弟姊妹們：

你們好！感謝神的指引和幫助，人類在全球範圍內掀起了追求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滾滾浪潮，曾一度在全球橫行霸道，恣意妄為的「共產惡魔」遭到全世界自由人民的唾棄，面臨徹底崩潰的深淵。蘇聯和東歐人民的今天就是大陸人民的明天。推翻中共法西斯政權並不難，難的是徹底鏟除殘留在中國人心中的封建專制狂妄自大的腐敗觀念——這是中國新的獨裁專制制度復辟的思想根源；也是今後大陸中國出現派閥割據，相互殘殺，造成民生凋敝的根本原因。

中國民主運動的根本目標不僅僅是推翻一個中共王朝，更重要的任務和目標則是通過「民主、法治、人權、自由」的啟蒙教育，尤其是通過福音的傳播，來徹底轉變中國人民，尤其是未來的大陸執政者頭腦中存在的非民主非法治的迂腐觀念和作風，也就是讓神在這些人的心中成為主宰。因為民主的實現也不外乎就是個人的基本人權與政府的道德責任。實現這一根本目標的有效手段是「和平演變」，亦即長期的深入細致的思想啟蒙工作。一言蔽之，民主運動應是「心志的改革」——而不是上朝的更迭，也不是靠佔領天安門廣場所能解決的。身為基督徒的我們在大陸的和平演變進程中是大有作為的。當前在海外民主運動中，我們更應發揮基督徒的作用。例如在促進各民運學運團體的組織大聯合，在消除「內鬩內耗」促進內部團結友愛和睦相處等方面，我們基督徒都應該成為「帶頭羊」。亦神的指引，我們呼籲各民運學運團體中的基督徒姐妹兄弟們率先聯合組成「中國民運基督徒聯誼會」，我們盼望在神的智慧的幫助下，完成以下幾項任務：

第一、通過深入思考討論，確立當前海外及大陸民主運動的長遠與近期目標；明確「和平演變」是轉變中國大陸專制制度的「基本功」，也是未來可能會出現的「宮廷政變」、「軍事政變」後的必不可少的改革手段。「和平演變」是中共最懼怕的策略。

第二、把神的愛和真理傳遍海內外每一位關切大陸民主運動人士的心中，加深我們相互間的信任和瞭解，增進我們之間的友誼。讓那些喜好爭權奪利、狂妄自大、自命不凡的人士逐漸得到悔改，促進海外各民運學運組織的大聯合。

第三、虛心向海外所有基督教或非宗教華人學習請教傾聽他們的批評，接受他們的監督和幫助，以改善民運人士的素質，提高民主運動的水準。

第四、聯合海內外基督教人士統籌安排，做好向大陸人民傳送福音的工作。此項工作將在各地基督教牧師的指導下着手進行。我們將隨時準備進入大陸傳福音。

第五、深刻反省和總結八九民主運動的慘痛教訓，包括六四以來近一年多的民運工作，充分肯定成績，勇於揭露缺點，努力修正錯誤。

第六、在民運組織內外開展「民主與信仰關係」的研究討論活動；借鑒西方成功之經驗，揭棄西方失敗之教訓。

第七、「中國民運基督徒聯誼會」本着不違背所屬組織章程的前提下，獨立自主地開展聯誼活動。凡贊同本倡議書的中國民運基督徒姐妹兄弟們，請盡快與我們聯絡，並提出您的寶貴意見。

本會聯絡地址：P.O. BOX 16313 S.F. CA94116 U.S.A.
聯絡電話：四一五—六六一—五三二一五

有功記功，有過記過！

河 鳴



徐林與作者在猶大

於「六四」北京大屠殺周年之際，中國駐美大使館教育處的三等秘書徐林先生公然叛逃，使美國新聞界一時嘩然，也使廣大留學生，尤其是其原管轄區的留學生們大為驚異與興奮。而他帶出的中共針對留學生的密秘文件更使中共當局十分頭痛。

徐林，一九五七年五月生於甘肅。七七年考入清華大學水利系，八二年畢業留校攻讀在職研究生。八七年獲碩士學位。曾擔任清華大學水利系團委書記及黨委副書記等職。其時備受信任與重用。加上能力較強，後經選拔、培訓及實習，於一九八八年七月被派往駐美華盛頓大使館教育處，管理猶他、內布拉斯加和南、北達考達等四州十所主要學校的一千二百多名中國留學生。去年六月之後，因政中央政策態度不明朗，並與一些民運活躍份子來往甚密而受到懷疑不被重用，甚至下來到各校作定期巡迴時竟由一名一等秘書陪同（實為監視）。今年三月上峰突然宣佈縮短其任期兩年，令他在七月份回國，乃迫使其斷然出走並公然叛逃。他是自去年「六四」事件後叛逃的第七十八名中共外交官員（不含其他商、企業及科研考察團和文化藝術交流團體中的外逃人員）。美國共十四人，其中華盛頓大使館叛逃五人。而加拿大使館人員竟結幫開着使館的麪包車叛逃多人。與其他不同的，徐林叛逃時攜帶了五份中共機密文件，其中有一件是專門針對留學生事務的，把美、加的留學生劃成幾類，並強調了不同的對策，提出口號「要把對留學生工作的鬭爭上升到國際鬭爭、政治鬭爭和外交

鬭爭的高度來進行。」這份文件的洩露在廣大留學生中引起強烈反響，使中共當局十分頭痛，也使大使館內的某些官員忐忑不安。

使館教育處，與中共其它機構一樣，到處可見拉幫結派、認人唯親、明和暗算。特別是李鵬上台後親目從加拿大提拔過來的親信倪孟雄先生，不僅對李鵬政府感激涕淚，忠心耿耿，同時為官有術：他先後又從加拿大調來了自己的黨羽俞肇基、王祖榮、夏顯奇和國仲元等四員虎將，不僅對留學生，也對教育處試行嚴格控制，使得教育處工作人員中流傳着「天大地大不如加拿大」的說法。四位之中的俞肇基（一等秘書）曾主管過肯塔基地區的工作。有趣的是在其轄下，肯塔基的民聯支部非常活躍。後被迫調回大使館內專管對民聯組織及成員的調查及材料整理；想必「六四」之後，又加上了民陣和學自聯等對象。筆者曾有幸與之一會。他自稱：「與國安部系統的人不一樣」，如此「此地無銀」，讓人難信「鄰居小二不會偷」。現在，我們已經掌握，這位俞老不僅在「六四」之前四處密探民聯成員名單及活動，「六四」之後仍很賣力。最近胡平先生在猶他州講演時幫助建立的民聯猶他州公開聯絡站，俞先生就非常關心，想方設法地從各種渠道搞到了所需情報。如果你要對他說：「我知道某某是民聯成員」，你準會在他已昏花了的眼睛裡看到一瞬充滿活力的瑩瑩綠光。俞先生，您老雖早已「不惑」，李鵬政府長不了，您得為自己留條後路，積點陰德。

這裡要提到的另一位，是在「六四」血案中始終堅定地效勞於李、楊政府並有所作為的夏顯奇先生。夏先生在國內大肆封授「抗暴英雄」的同時唯一地晉升成一等秘書，榮耀啊，經過了血與火的考驗。真不知夏先生晉升書上的紅章印是否浸北京人的血，甚至他自己親友的血！眾已周知，夏先生在加拿大得到博士學位後立即棄學從政，成為中國外交官中不說唯

們翹什麼尾巴，我就知道他們拉什麼屎」是他的得意口頭禪。他對打擊民運活動既有興趣也有手段。比如在肯塔基州曾用美金千餘元建立了一個排擠民聯的聯誼會（想必該會已在「六四」後瓦解），他也因此得了個「肯塔基炸雞」的外稱。最近他已正式接管猶他等州的留學生事務。有人分析，他可能從民運呼聲較低的楊伯翰大學下手，重建擁護中共的聯誼會（當然破費不會小），甚至黨小組；爾後擴大影響整個猶他州及其它地區，再立新功。不過也有人注意到，這位年輕的一秘情緒不似從前高漲，其中一定有因。按規定，一秘是要攜帶家眷的。中共敢信任這年青人嗎？但不被信任的家人本身就是不安定因素。真難。

為中共賣命的官員們，我們正在記「變天賬」的。記下一切惡人惡行，並有選擇地公佈於眾，將來我們不會讓這些惡人輕易逃脫。大家都知道，當初東德有些兵警曾靠槍殺企圖翻越柏林牆的同胞而晉級加官，當這些人的名單被收集並公佈後，槍殺越牆叛逃者的事件就陡然減少了。我們記「變天賬」並部份公佈的目的，不僅在於將來的懲處，也在於有地地迫使那些為中共效勞的人士懸崖勒馬，在處理具體事情上得過且過。勸那些已經賬上有名的人士痛思前過，以實際行動為自己留條後路。徐林先生多次保護和幫助過民運人士。因此，在他身處險境時能左右逢源，連護照都沒有的妻子和女兒都被接送出來，可見國內外民運力量之強大。面對這樣令人驚嘆的事實，如果還執迷不悟，那只能是天不滅曹地亦滅曹，咎由自取了。

不過，當望着車外那輪半沉於飛快速去的群山中的落日時，徐林先生默默地说：「我既然不是第一個，當然也就不會是最後一個了……」。

而我們的朋友，希望大家開始記「變天賬」，一筆一筆實實在在，並把它們匯集起來

怎樣申請H-1簽證

路
識



H-1簽證是取得第三優先的資格的基礎，因此是十分重要的一個環節，但不是最重要的環節。它的作用常常被人誇大，似乎某人辦成了H-1，他就快拿到綠卡了，這是一個誤會。和H-1具有同等資歷的簽證是L-1。L-1在許多情況下，比H-1要求還靈活一些，因此當一個人申請H-1或L-1均可以時，申請L-1有更大成功的可能。

H-1的基本要求是專業人材 (PROFESSIONAL)，在所在的領域或專業方面是傑出人材 (OUTSTANDING AND RENOWNED IN THEIR FIELDS)。因為大部份中國學人都獲得了美國碩士以上的學位，只要他們找到的工作與自己的學歷相符 (不能是一個教育學碩士到大酒店當經理)，滿足專業人材這一要求是不難的。(順便提一句，L-1要求被僱者在美國海外公司工作過一年以上)。

H-1的僱主表面上沒有什麼要求，實際上是十分有關係的。一般說來，十人以下的小公司，資本較小的公司 (幾十萬美元至三百萬美元之間的公司)，以及成立時間較短的公司很容易受移民局的懷疑，他們認為這種公司是不大可能僱用專業人材的。一旦被懷疑上，移民局就要對公司歷年的工資、財務進行調查。所以公司的性質、規模及資產是最重要的因素，公司的年齡則是判定其經營是否穩定的一個

因素。一般說來，大學及許多大公司 (如GE、GM、IBM及美國各級政府部門) 已是移民局心目中免檢的單位。所以中國學人在申請工作後，若同時有幾個選擇的話，應首先去大一些的 (至少五十人以上)、資產高的 (至少四百萬美元以上)、公司經營較久 (五年以上) 的公司及單位；另一個重要原則則是公司有幫你辦身份的想法。公司的協助是極其重要的 (遠遠大於律師的作用)。因此，選對了僱主，事情就有了良好的基礎。至於工資也應考慮，主要是要與身份相符。一般來說，一個碩士的工資應至少在二萬五以上，一個博士的工資應在三萬以上。下限可允許波動不超過百分之二十，在生活費用高的地區 (如加州、紐約市等)，低於上述工資是不可想像的，會給辦H-1帶來困難。

有一些中國學人只有中國的單位，沒有美國的單位。尤其是他們僅有B、S的學位，這也會給辦H-1帶來困難。凡是僅有學士學位的人在辦H-1時，一定要強調工作經驗及工作成果，以及工作職稱。雖然H-1的最低要求一般是學士學位以上，但較保險的是碩士以上學位。很多職稱也是十分有關的。如助理研究員或電腦程序員就不大合格，太籠統的職稱都是不行的。應該是某專業助理研究員、律師、講師等才合格，若你的職稱不合格，應和

僱主交涉，給你一個較合適的職稱。

還應該說明的是，辦H-1前不需要找一份永久性工作，臨時性工作也可以。但是在辦勞工卡時，臨時性工作就有問題，所以，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應該找一個永久性工作，這裡的原則是：工作性質可以是永久性的，但只能臨時地僱用一位外國公民。這是美國法律規定的，但法律的口子也在此。正因為如此，許多外國公民才在美國以臨時被僱用的名義佔據了永久工作的位置；然後當他們的臨時工作身份 (如H-1、L-1) 合法化後，他們又用同一工作位置向勞工部申請勞工卡。在申請勞工卡時，他們就明確宣稱，這個位置是永久性工作，並設法證明，沒有美國公民適於做這個工作 (不要誤會，是指無人申請這個工作，或申請了而不合格)。由此可見，找一份永久性工作是比較好的選擇。

當然，你還是可以找一份臨時性工作，因為在你找工作時，可能沒有永久工作，你只好接受一份臨時性工作。以做權宜之計，將來再找一份永久性工作辦身份。筆者也十分清楚，有少數人依靠臨時性工作辦成了勞工卡，也獲得了綠卡。嚴格地講，這是不合法的。但有些僱主不如實申報，配合僱員出示一切信件。如何證實一個工作是永久性的，還是臨時性的，這在三、四年內是很難分辨得清的。比如某科

研項目可能延續三、四年，如果僱主一定宜稱這是永久性工作，移民局及勞工部也未必查得清。幸好是絕大多數美國公司在這方面是守法的。

H-1第一次可最多有效三年，之後可再延長二年。所以總共是五年。原則上在五年期滿後，還可再延一年。但幾乎無獲准的先例，這是因為移民局認為一個人在五年內還沒辦成身份，那麼他就沒有什麼永久居留的打算，再延一年是沒有必要的。但在六四屠殺後，移民局對中國學生破了戒，允許中國大陸學生延這一年。這沒有多少實際意義，無非是顯示美國政府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支持。

H-1持有者最好不要換僱主。因為一旦換了僱主，就要重辦H-1，原H-1即無效。頻繁地換僱主，會使移民局十分反感，認為你個人的目的與原僱主給你辦H-1的目的不相符，會拒絕給你再辦H-1。除了特殊情況下（如原工作是臨時工作，後來找到了永久工作；或原公司破產；或實在在原公司無法處下去了），一般盡量不要轉換僱主。因此在申請工作時，盡量一次選好。若萬不得已要換僱主時，在第二次辦H-1時（這次辦的是EXTENSION表），要附上一封信解釋為什麼換僱主。換僱主最好不要超過一次。有些僱主可能會利用你要求辦身份的機會，壓低工資，不長工資，這種時候你只好怨自己命運不佳。不過也有補救的方法。在你用實習期工作時期，剛開始可不急於轉H-1，可觀察幾個月，用F-1或J-1先工作。若滿意就轉H-1，若不滿意，就換個工作，不過中國人找工作並不容易，何況實習期比較短（J-1十八個月，F-1十二個月），換工作不是那麼方便。所以也許「忍」是最值得提倡的。

中國在美學人在辦H-1時，通常需要下列三個主要表格及信件：

(一) I-119B表，寄往四個移民局大區

(東) ST. ALBANS VT. 區； SAN

YSIDRO CA. 南； DALLAS TX； 北 LINCOLN NB)，請自己查自己應寄的地址，如實在查不出，可來信索取；

(2) 僱主的一封信，同樣寄往上述移民局大區，目的是支持你轉H-1的理由陳述；

(3) 申請轉為其它非移民身份的I-150六表，寄往同處。

現在移民局在辦上述申請時，申請費已漲了很多，I-119B要\$六十元，I-150六表要\$三十五。請在一封信中附二張支票，支票上寫明申請H-1或轉其它身份，分附在不同表格上。千萬不要開一張支票。

這個表第一頁的問題五、七、八在這裡解釋一下，因為很多H-1持有者是在美國境外來申請H-1簽證的，所以在問題五上，他們要說明在一個領館申請簽證。

中國留美學生因人在美國，這欄請填CHANGE STATUS IN THE USA；還可加一句(SEE FORM I-150六)，這樣可免去到國外的旅行。

若你的工作是永久性工作，請在問題七上填上三十六個月，並填上工作的起始日，關於工作起始日，筆者應聲明一下，這是很重要的事情，主要是關係到中國學生在美的合法性問題。

不少中國學人不大注意在美的合法性問題，違法的事情屢見不鮮。有的人論文沒做完，還是學生身份，已在公司做FULL TIME(應該最多只工作二十小時一周)，這樣將來可能有麻煩。

只要你在合法的實習期中間，工作的起始日可設在實習期中，如實習期快滿了，請用布什的行政法先保持你的合法工作身份，然後再辦H-1，總之，請保持你在美身份記錄每天都是合法的。

不宜填小時薪，因為與專業人材不大相稱。一般以年薪、月薪為好。

第二頁注意事項：

一般只填十二A至廿二。

十二A：你的姓請務必大寫。

問題十三可填你在中國的地址，因為請記住H-1僅是臨時性的非移民簽證，它假定你是要回去的；

問題十五請照填CHANGE STATUS IN THE USA，因為你無入境問題..

問題二十、廿一、廿二(第一問)均應是NO，問題廿二的第二問應是YES，若你的答案是相反的，則應請教有名的律師解決。

第三頁注意事項：

卅四A及卅四B請公司(單位)較高級的主管人簽字。並請在第三頁最下欄填上你的姓名、地址及打一個X，說明你早已在美。

公司申請信：請注意的是申請信不是千篇一律的，你完全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及公司的實際情況寫這封信，你可以自己起草信，然後請公司的美國同事或老板檢查文法、用詞。

一般說，信應明確下述問題：信的目的(為你申請H-1)；公司的性質、簡況(收入、僱員)；你的簡歷；你的工作職責、職稱，請扣住專業人材這一點；以及你的工資及要在該公司工作幾年及理由。

因為一般中國學生在轉H-1前，已在該公司以實習的名義工作過一段時間，信中應提及這段歷史，並申請為你改變簽證身份。

信不宜過長，二頁紙即可，語言簡潔，要點明確。

I-150六表：在轉換身份時，表的第一欄可填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說明你願意呆到布什行政保護法失效為止，因為布什行政法已規定中國學生在轉換身份時，即使護照已失效還將視為合法。同時目前中共領事館也適當放寬了對中國學生要求延期護照的限制，所以在可能的情況下，中國留學人員應盡量申請延期

護照，並在問題六上填寫上護照有效日期。

其它問題都是十分直接的，如果你在實習期，在問題十三中，可強調自己的工作重要，一年實習期不夠；而且在問題十九中，將開始為該公司工作的日期、工資、職稱等如實填報。在回答這個問題時，你也可以看出為什麼一個未畢業的外國學生在公司全天的工作是有問題的，因為其不合法性在此就暴露出來。

問題十九是這個表中較容易造成混亂的。如果一個學生過去是TA或RA，在去公司前就開始辦H-1，我認為在問題十九上可寫NO，在問題廿上解釋自己是TA或RA。但有些

人完全是自費，利用平時或假期打工，打工十分零散，何況許多打工是不合法的。如果在問題十九上填寫NO，後，問題廿就應解釋為親友支持或政府資助讀完學位的。不過一貫當TA和RA的學生也可在問題十九上填寫YES。在問題二十上填寫問題十九。兩種填法均可，關鍵在於你是否已在實習期之中。若你申請H-1是先於你去工作時，上述兩種填法均可，但若你已在實習期中，你一定要在問題十九填YES，然後在問題二十對你過去的教育經費來源加以解釋。

最後，在其它一些重要細節上提請大家注意。

中共不倒沒法回家

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用半個多版面刊登一篇文章「匹茲堡歸來的女醫生——苗鳳英」，其中對匹茲堡地區幾百名中國學生進行了無恥的污蔑，引起了我們的憤慨。許多電話打到學生組織，要求向中共當局寫信抗議。

苗鳳英為何遲遲不回家

該文稱，苗在一封信裡寫道：「目前，與我在一起的幾百名中國學生學者尚未提出立即回國，這樣下去會是什麼結果？我決定提前回國，讓美國人看看中國人是有硬骨頭的。」

眼見着中共法西斯當局十分孤立，處於「無人熱愛」的悲慘可憐境地，此時去愛中共，當然是「令人感動」的！可是事實上呢？

去年三月苗女士因違章橫過了馬路，被撞致腦傷，我學生組織派多人前往照料。由於苗為省錢購置大件，沒有買保險，引起了許多麻煩（根本不要想有什麼二十萬美元賠償了！）丟淨了中國人的臉。但是我們還是出於國人的同情心理幫助她度過了難關。這一點苗不應該昧了良心。

而且，正是我們這些不愛共產黨的人，一個勁地勸說苗大夫，建議她立即回國是上策，因為她生活不能自理，我們不可能耽誤太久。而她又「種種原因」遲遲沒走。骨頭實在是一硬」也。

誰請苗證明參加遊行

說到有人請她證明參加過華盛頓遊行，實在是太勉強了——因為只有參加過遊行，才有資格作證明，這件事說出來才能表明苗某「能做而不做」的氣憤；否則，不是無稽之談嗎？

請聽美國人的評論

中共進行大屠殺後，領館有人放出風，一些「有遠見」的人也明白，是回去請李鴻給官帽的時候了，即使是一條只會擺尾不會咬的狗，也可以撈點政治資本。但即使如此，連大部份中共特務也只是在海外「遙表忠心」，並不會去真的。領債都不敢！

我們這附近的外國人也有如下高論：

意。

一、I-1 一、二九B表要寄兩份，第二份表可是COPY件，但簽字一定要是真跡；I-1五〇六只寄一份即可。

二、所有附件如學位證書、公司支持信、成績單等均應寄兩份，若需簽字則每份都應是真跡簽字，一些復印件可請律師簽字，一般是十美元左右他就給簽一份。

三、郵寄應用掛號信件，尤其是因為I-1五〇六表要附加你的I-1九十四表，一定要寄掛號信，以防信件丟失時有憑據，一般說來，H-1批得很快，寄出後三個月內定有結果。

孫申

一個南朝鮮人——過去我在漢城上學時就恨全斗煥，現在已不太恨了。因為我已看到，世界上還有一個政權比他壞百倍，我們南朝鮮人還不最悲慘。」

一個日本人——「日本商人非常聰明，他們的中國顧問說，目前是與中共拉關係的千載難逢之機。」

又一個日本人——「日本的戰略是保持中國落後至少十年以上。現在已經不要擔心這個問題了，因為最省事的方法就是不管政治。讓中共保持社會主義制度，那麼中國再落後五十年都不成問題。這樣在經濟上日本絕對會有更大好處。香港的中間商也會有更大收利，至少與中共官商的錢不會斷，最多回扣上多給些。」

所以，什麼是親者痛，仇者快之事，我們這些健全的人最清楚。而苗女士本人也會有一些良知吧。不知是不是中共要找一個最便宜的裝飾品，拿可憐的苗大夫做猴耍，給她塑造一個「偉大」形象，來欺騙我國內民眾？

對這樣無恥的中共當局，我謹代表匹茲堡廣大同學回答：中共的暴政才是阻撓我們回國的唯一障礙，不倒倒中共，我們沒法回老家。

勸君要有容人雅量 and 遠大目光

與吳方城先生商榷

劉名

民運實幹家吳方城先生之大作「民主、綠卡、人血饅頭」(刊於中春八十五期)，是一篇缺乏民主雅量和遠大目光的文章，筆者實難苟同，謹與吳君商榷之。

波洛西案是全體中國人的空前勝利

吳方城先生認為波洛西案保護了許多未曾介入民運的J-1人士，使他們平白受益(吳君稱之為「搭便車者」)，却又未能保護那些民運積極份子中的J-1人士，且留下諸多後遺症。這是一種見木不見林的觀點。

首先，中國大陸J-1簽證持有者中大多數是中共緊縮留學政策的受害者。許多被指為接受中共政府資助者實際上並沒有拿到一分錢，有些則被強迫接受了小額經濟幫助(如出國服裝、來美機票等)，從此套上了緊箍咒。衆所周知，八四年前來美的J-1持有者還有辦法轉換簽證，而中共發覺這是一個漏洞，遂令許許多多原本應持F-1者改辦J-1簽證。據我所知，很多人是在不持J-1簽證便不得出國的壓力下被迫委屈求全的。對他們而言，豁免回國兩年只不過是把他們早應得到的東西還歸其主罷了。

其次，波洛西案是旅美華人的人權問題引起美國朝野重視的一個里程碑。這些年來，美國政府基於打中共牌牽制蘇俄的政治需要以及大盎格魯撒格遜意識，對於旅美華人的人權問題相當冷漠，對於那些欲掙離中共暴政者相當歧視。

衆目所見，那些來自蘇俄東歐國家的芭蕾舞星、象棋選手、馬戲團馴獸師們下機伊始投奔自由，無一不受到歡迎，並順利得到美國的政治庇護。與此同時，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士却受到多方刁難，有時甚至釀成了人命悲劇。人們還記得吊死在中共駐紐約總領事館的張信工程師，他的驗屍報告中雖然有諸多疑點，美方却眼睜眼閉，搪塞了事。(中美建交十一年，中共使館領館內冤鬼知多少?)

對於那些原本有資格持F-1簽證却被中共硬戴上J-1枷鎖的中國大陸學生，美方近年來亦拒絕保護其正當權益。正因如此，中共駐美官員在威逼大陸學生返國時氣焰十分囂張(請想一想公使銜參贊倪孟雄之流!)這就是六四前美方對待旅美中國大陸人士人權問題的基本態度。

六四大屠殺震驚美國朝野，從而改變了這一情勢。美國參眾兩院一致通過加州民主黨眾議員波洛西的保護中國大陸留學生的緊急法案，標誌着旅美中國大陸人士的人權問題終於引起了美國官方的普遍重視。

其後，布什總統否決了波洛西案又下達了與該案內容相似的行政命令。這一行政命令實際上只是美國對六四後中共政權的組合學中的一個招式而已。這一招式既遷就了參眾兩院的激憤情緒，又為後來塞給中共延長最惠國待遇這一紅蘿卜埋下欲弛先張的伏筆。布什總統的政治手腕，可謂圓熟之至。

這一行政命令還與國際政治的大背景緊緊相關。美俄關係的緩和，使得中國牌的作用變

得不那麼重要了。身為美國總統，布什首先考慮的只能是美國的國家利益。

吳方城先生吃透了這一招式却不見全套組合拳，故有此誤。

波洛西案是全體中國人的空前勝利。天安門廣場上仁人志士的流血犧牲、現代通訊技術的發達、美國政要的明智、國際政治大背景中兩個超級大國緊張關係的緩和以及留學生代表的大力遊說等因素促成了這一勝利。

關於該保護的和該不該保護的

吳方城先生大作中，中國大陸留學學生被清楚地劃分成該保護的和該不該保護的這樣兩個部份。

所謂該保護的，是指那些積極參加民運，却又不能通過自由競爭在美國取得永久居留權的人。所謂不該保護的，是那些從不參加民運，却因總統行政命令受益的人。

筆者不禁喟然長嘆：嗚呼，吳君！堂堂男子，器量何其狹小乃耳？！

先說該保護而未能受到保護的前者。美國猶如東非肯尼亞的天然動物園，鷹擊長空，魚翔淺底，物竟天擇，優勝劣敗。倘若你沒有能力立足於美國社會，那麼不管你是因從事民運或是沉溺酒色，均無法得到一般人的同情。這就是美國大熔爐的殘酷性。

再說那些從未參加民運却得到惠益的後者。筆者認為吳方城先生對於民主運動的理解委實太過狹窄。那些未曾參加有組織的民運活動

，然却以書信、電話甚至舌頭揭露六四慘案真相的人，不應被排斥於民運參加者的行列之外。另外，六四之後中國大陸留美學人是做爲一個群體成爲中共當局的對立面的，至少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任何一個留學生公開站出來爲中共創子手唱頌歌，就像那幾個披着羊皮或者熊皮的美籍華人教授者。筆者認爲這是了不起的偉績。莫忘記，中共是一個先後犯下十年浩劫和一夜屠城的滔天罪行的法西斯黨，這個黨在迫害人民時常常是不分青紅皂白，蠻不講理的。留學美國即可能於日後被打成美國特務，這種例子隨舉隨有。僅此一端，全體留美中國大陸學人得益於總統行政命令便受之無愧。

正如八九民運中雖然也有一些逍遙份子，也有一些不肖之徒，但北京市民仍然不愧是一個偉大的群體一樣，六四之後的中國留美學人也是一個光榮的群體。在這裡，筆者一方面希望吳方城先生放棄在留美學人中劃分兩類不同人士的努力，一方面寄語那些對民運漠不關心的逍遙份子：「美國佬的厚禮足下已收到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值此中華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足下將何以自處?!……」

所謂「後遺症」

吳方城先生認爲，波洛西案在美國議會的通過和布什總統的行政命令的實施，終於使中共統治者最後下了決心：大幅度緊縮、限制中國大陸學生出國留學的規定終於出籠，從而斷送了後來出國深造的機會。

這一看法貌似有理，却經不起仔細推敲。中共的留學生政策乃是其總政策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份。六四大屠殺之後，大陸政局逆轉，中共對民運人士濫捕濫殺，對青年學生採取軍訓、分配邊疆等整肅手段，在這個大背景下，不大幅緊縮、限制大陸學生出國豈非咄咄怪事？從時間表來說，中共先安內（對付國內學生）而後攘外（對內海外留學生），一切惡劣手段均勢在必行。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若無布什

總統的行政命令中共便不會推出〇一四號文件。

關於「搭便車者」

吳方城先生憤然質問：「那些搭便車的人是否想過，你們是在吃人血饅頭？」

這種指責失之於偏頗。須知，在重大歷史轉折時刻，局外人意外地得福或者罹禍，是很平常的事情，不足驚訝。試舉一例：六四後美國駐華使館基於人道理由大幅度放寬簽證尺度，許多六四前已被拒簽者奇跡般地拿到簽證。對於這些「搭便車者」，未聞流血犧牲的北京

我不再訂中國之春

J-1 讀者

市民斥責他們是在吃「人血饅頭」。對比之下，吳方城先生有何感想？

在八九民運期間豎立於天安門廣場的千種萬種標語口號裡，最令人感動的是這一條：「爲了挽救一個萎靡而自私的民族，必須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事實上，正是一大熱血青年的自我犧牲精神，喚起了全民的參予熱情。假如人人患得患失，深恐被「搭便車者」佔了便宜，那麼八九民運根本不會發生。

總而言之，民運人士要有容人雅量和遠大目光，方能擔當其歷史重任。未知吳方城先生以爲然否？▲

吳方城先生的「民主、綠卡、人血饅頭」

使我想起了一個笑話。某人在組織一個會議（或 PARTY 或政治活動 BEG）到了時間，人尚未到齊，他說：「該來的沒來，不該來的都來了」，當即一半人便走掉了，他更是長嘆一聲：「該走的沒走，不該走的却走了」，剩下的又有一半人走掉，「該留的沒留，不該留的却留下了」，所有剩下的人便走光了。

我可以斷定，收訂「中春」的 J-1 中，大多數至少是很同情民運的。那些搭便車的人不會去抽時間讀「中春」，也聽不到吳方城的深刻分析。我是 J-1 學生，很可能明年便不再訂貴刊了。

當初毛澤東向知道「團結中農」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民運中的領導們不知道此法？這篇文章勢必疏離衆多 J-1 學生，使本來對民運的種種做法和前途懷疑的人更加不信任，使那些所謂積極份子感到委屈、不滿，一箭多鵰打擊一大片，蠱也。

L. A. J-1 讀者

吳方城先生：

大作拜讀，不勝欽佩。袁木先生不及您有文采，他應該讓您當秘書。您把三·二萬留學生當收入，共產黨付了你多少錢？請您回答以下問題：

(1) 如果留美學生是吃人血饅頭，您老兄在別人不能出國的時候出國，殺了幾個人？打了多少黑報告？舔了多少次領導肛門？

(2) 您滿篇仁義道德，爲什麼自己不回國嘗嘗迫害味道？或者乾脆回去再幹爲虎作倀的勾當？

(3) 鄙人不知先生在民聯供何職。民聯如容不得三·二萬留學生，稱何民聯？照鄙人看，民聯跟共產黨一個樣，所不同的只是無權罷了。留美學生衷心希望民聯永遠留在美國吃人血饅頭。如果中國落到你們手中，中國人就要被你們這幫子人殺光吃盡。

中國人苦難何時到頭！

一名留學生（恕不留名，對民聯的特務手段早有領教）

從河殤公案看

中國人的民主意識

丹澤

我不喜歡《河殤》。繞開現實問題去責怪祖宗，這是思想的悲哀。

在友人家翻閱香港「百姓」雜誌一九八九年十月十六期，看到蘇曉康「流亡感懷」一篇。「河殤」偏頗的原因「一行黑體字赫然入目，不禁為之一驚。細讀之後，不能不憶起我本人與「河殤」的一段公案。

「河殤」一事與今春學運直接關連並不很多，難為新聞之熱點。但學運之後，大陸政府在批它，港、台及西方在捧它，且它可說是中國理論界十年來一大結晶，對它再作些探討應會有所裨益。

我是在大陸第一個冒天下之大不韙發表文章批評「河殤」的作者。當時「河殤」在中央電視台一經播映，眾口稱譽，我亦細品。看後，我與一位友人談及：我不喜歡「河殤」。他問何故？我說：「這部片子的主要論點是：我們今天受苦，其責任全在祖宗，將來還注定受苦，其責任又在祖宗。這一論點我不能接受。我認為該負責的是我們這些活着的人，與原始村落、黃河、長城之類無干。」他說：這問題提得很尖銳，何不寫篇文章？我便允了。其後，又參加了一個在北師大的討論會。「河殤」總撰稿人王魯湘、謝選駿在場。我在會上作了一個簡短發言，說：中國知識界總是從六千年文化的根子上面去找現實問題的解釋，看似深刻，其實是一種思想的貧乏；從這個高度解釋問題，結果是什麼問題都解釋不了。王魯湘表示他理解我的觀點，並說：「這不僅僅是思想

的貧乏，而且是思想的悲哀。因為我們不得不繞開現實問題，而到祖宗那裡去找原因。」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充分理解王的難處，便不再作一詞。我只是想：那就讓我冒點風險把話說得更清楚吧。於是便發表了那篇題為「激情的陰影」的文章。主旨不外是兩點：第一，着眼於現實，不必多究祖宗。這便是今日蘇君所說：「不要再奢談文化而不敢直面對這個制度了」這層意思。但我與當日蘇君一樣，未嘗敢想「反黨」，只不過是想針砭時弊，協力把國家搞好而已；第二點是勸望中國人勿再自卑、自棄，奮然前行之意。「河殤」作者用意也許頗佳，但效果確實令人懷疑。當今，目不識丁的農民皆知「中國人種不好」，如此心態，何談民主與建國大業？文章發表後，一如所料引起震動，批評「河殤」的文章也接踵而來。而「河殤」的支持者便對我勃然大怒了，發表多篇文章，指責我一是什麼也不懂，二是「煽動」民衆「盲動」，三是受保守派「指使」。這類指責，完全脫離了正常討論的軌道。不禁覺得一即使使文化精英，亦缺乏民主意識，觸到中國知識界思想大潮「文化熱」的總結，光是這一觀點的書在中國當時已有數百、千種之多。對於這樣一個大問題，却不允許國民自由討論，誰掌權就誰說了算，今天捧，明天換了領導人就批。

於是「河殤」便被尊捧為神了。當時是政府捧出來，現在是政府罵出來，而海外媒介也全無自己見解。蘇曉康君一席話，甚有膽魄。但「百姓」雜誌的編輯手記就轉不過彎來；他只是說：「在反省中國傳統文化之餘，我們還應檢討當前的制度」，這份量就輕多了。而十月九日美國的 NEWSWEEK 則還在重複「河殤」老調，認為問題不在制度而在文化。有鑒於此，我認為有必要廓清以下兩個問題。

第一是「河殤」的謬誤。「河殤」是十年來中國知識界「文化熱」思潮的總結，這一思潮源於「文革」之後，中國人精神的全面崩潰。人們十分憤怒與苦悶，要求對這一切災難作出解釋，找出責任者。而官方所能接受的唯一解釋就是「這一切都是中國封建傳統觀念的餘毒。」就官方來說，中國傳統文化本來就在它反對之列，這種解釋十分愜意，且應了當時開放國策的需要，增加點對西人的崇拜亦正中下懷。本來知識份子罵「封建餘毒」時心裡當然明白這是指什麼。但久而久之便忘記了本意，而把反「中國傳統文化」真地當作「頭等大事」來抓了。這時中國傳統文化已成一個符號，即邪惡的象徵了。這就是普通語義學家們所說的「符號自己活了」。有這一步，許多人便來吃這碗飯，揚名立業了。這便更使得作者們忘記了這符號背後的内容。作者都不記得，這論讀者了。於是紛紛然去控「傳統病根」。這首先是徒耗精力，把本來應該用於討論社會政治、經濟問題的時間浪費於空談，以至使中國知識界將這僅有的相對寬鬆的十年空過，而拿不出建設性的思想成果來。因為「文化熱」所說的那些中國人的「劣根性」，無論「劣」否，却決非「根性」。其實我們應該很清楚：在幾十年的反傳統教育下，中國人身上留下的「傳統文化」並不太多人，至少大陸是比台灣少多了。「文化熱」的討論對象本身就往往是虛假的。舉一個例子：就是 NEWSWEEK 上那篇

文章，仍然認定中國之所以落後是因為中國人看不起外國的東西，自認高人一等。這是從「河殤」那裡來的。但我看後不禁啞然失笑：不想列祖列宗確實威德遠被，蔭及萬世，致使今日之夷者，雖曾擊敗中國多次，仍在擔憂中國人看低了他們，如此耿耿於懷。其實我們這班不肖子孫是自認種都不及他們的。除此之外，「文化熱」還妨礙了別人的政治、經濟問題的討論。動輒就來「大一統」、「超穩定」，全然不切合現實問題。過去幾年，官倒等問題即很嚴重，而「文化熱」的文化界怕中國人「不患寡，患不均」的劣根性又出來作怪，對這些問題噤不作聲。直到八八年再也壓不住了，這才見大家紛紛談論「社會分配不公」問題，更重要的一點，是「河殤」之類的觀點沉重打擊了愛國意識：這個世界仍是劃分為民族國家的，中國人作為一個共同體，有特殊的利益需要保護，有特殊的事務需要這一同體的人共同關心。愛國意識，說到底是一種對於共同利益的認識。但在「文化熱」的說教下，中國人的愛國意識日趨破敗。但十億人一齊「投奔自由」去做「世界公民」却又做不成，這樣成巨大的悲哀了。我也懂得愛國主義亦可為專制所用，以壓制個人權利。但在中國這種情況下，沒有愛國主義，何以凝聚中國人為民主與建國而奮鬥呢？既然我們的最好出路是做世界公民，黃色溶入蔚藍色了，我選管你中國屁事？所以「河殤」本身就是一個矛盾，說它喚起了憂患意識，即是愛國，是講不通的。它的憂患意識是告訴你我們中國人幾千年前就種下了完蛋的根基，土地、文化、同胞皆醜陋。如此說來，還奮鬥什麼呢？可以說，你越是相信「河殤」，其實也就越覺得「河殤」多餘：黃土地是灑在那的，種族文化選擇也根本不可能，故此還是丟開手好。但另一方面，中國人的愛國主義情緒又是強烈潛藏心底的。這就可能在一部份大陸人心底喚起對文化精英的厭惡。有個著名的老歷史學家，決非專制信徒，決非「受保

守派指使」，竟也要寫文章批「河殤」，被其子制止，說得很好：「你要批，早批。現在『河殤』的作者也不能回答你了，你再批就不公平了。」反對「河殤」的人當中還有楊振寧和李政道兩位著名學者。從長遠看：當「文化熱」與民運聯繫在一起時，我想民運是減色而不是增色的。香港媒介也好，支聯會也好，再造聲勢並不明智。從「文化熱」已經很可以看出中國文化精英的弱點了：多有撒嬌發牢騷罵祖宗的才氣，却少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為民族持久奮鬥的胸襟。

第二是中國人的民主意識問題。無論是文化精英，香港媒介，身居「自由樂土」的華人，雖然都喊熱愛民主，表現却常令人遺憾。故此中國文化倒也不可不批，只是別老去罵祖宗了：洋人祖宗未必就有民主意識，而他們現今便做得好。因而我們得罵自己不爭氣，且得改過才是。在這裡，你如提一句你不同意「河殤」，大致是立刻會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而立遭滅頂之災的。我真不知道那些其勢洶洶的人讀了蘇曉康君的文章以及王魯湘君關於「河殤」的那個「思想的悲哀」的說法，怎麼去調整自己的思維了。當代中國人的毛病是認為世界上僅兩種思想，「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我的一位朋友曾經說過：現在有些思想並不十分正確，經共產黨一反，便被尊為教條，這孕育了新的危險。這話是十分有見地的：如此下去，中華民族只能是一錯再錯了。而且慣聽慣講一家之言的新聞媒介也並不怎麼注意實事求是的。我順手翻到「百姓」一九八九·九·十六中沙鷗一篇，不禁搖頭。其中一段聲稱江、李二人不顧鄧小平「二年內不再作爭論」對六四事件後的處理意見，仍要趕盡殺絕。其實，鄧是說「對經濟理論問題，二年內不作爭論」，並非指對六四如此處理。這一講話是傳達到升斗小民的。港刊神通廣大，連「三分之一上將反對出兵鎮壓」之事，趙對鄧關於物價

改革的勸諫這些「內幕」都搞得到，對此不會不知。却為了自己的故事順理成章，將如此重要之處隨意改動。再有趙紫陽，香港輿論是樹他，便也不顧事實，一齊說趙紫陽治理經濟功勞巨大，一齊又說現在中國經濟危機重重，民主希望就寄托在中國的經濟崩潰上了。對此論調，只我便是不服。稍具常識的人都知道，經濟成敗決非朝夕之間。如若中國經濟果真危險，那麼作了十年總理與黨的總書記的趙紫陽，豈能脫得關係？沙文大概也意識到這裡矛盾，其解決方案就更妙了：一切功勞是趙的，一切錯誤是鄧的（對照政府講法，功是鄧的，錯是趙的，一笑）。如此作法直把讀者全當阿斗，信譽何在？由於大陸新聞封鎖，大家樂讀港刊信譽故事亦可解頤。但真正信任港刊的則寥寥無幾。記得六四之後，一工廠廠長，傳達中央文件，呆了半響，說：政府的我不敢信，港台西方的我看也不可信，又呆半響，接說：反正誰欺騙人民也不行！此話請海內外報人諸君牢記。六四之後，我來到國外，翻看港刊，皆談中國大陸之事。同胞殷切，幾使我落淚。但一是信口開河之處頗多，二是論調單一，觀點偏頗，少有不同意見發表，三是感情衝動多，理智探討少。六四之後，大陸僅有一點自由討論氣氛已蕩然無存，對於國家大計的探討全賴海外，而海外亦如此淺薄，寧不教人涕下！香港報刊唯是都為民主搖旗吶喊，其手法却使我覺得跡近國內，只顧一時政治需要，不考究事實情理；而其信譽原來以北京市民鮮血換來，若不自珍，信譽會很快丟光。中國的民主事業現在只是一個開端。作為開端，最重要的就是廣開言路，實現真正的多元思想，然後慢慢形成人們共同接受的框架。而要真正實現多元思想，最忌一上來便把某種言論劃綫，歸為「保守派」之類。便是有人願為李鵬辯護，何妨讓他一講。輿論要體現各方面的代表性，民主大業大致也就從這裡開始吧，否則，將誰打倒，皆是無用。▲

民主革命三位傑出的宣傳家

陳雪

辛亥（一九一一年）前後的民主革命理論家和宣傳家，就他們所闡發的革命理論，所提出的政治主張，所代表的革命思潮來說，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派別：一派是以鄒容為代表，以宣傳民主、自由、平等的精神來激勵人們圖志的民主自由派；一派是以陳天華為代表，以宣傳列強瓜分中國的危急形勢為內容，以喚起人們愛國保種意識為目的的救亡圖存；一派是以朱執信為代表，以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並舉為號召的社會主義派。這三派革命理論或思潮，或先或後，並行不悖，交相輝映，構成了絢爛多采的宣傳內容，推動着民主革命的洪流波瀾壯闊地向前發展。本文將分別介紹這三位卓越的宣傳家。



激進的民主

社會主義者朱執信

朱執信與鄒容同生於一八八五年，然而，却較鄒多活了十五年。因此，在陳天華、鄒容這兩個卓越的宣傳家之後，固然胡漢民、汪精

衛也曾是名噪一時的宣傳家，但他們多屬於闡述別人的理論，能夠獨樹一幟，提出獨到的理論見解的，當然首推章太炎，其次就是朱執信了。

朱執信出身於廣州的一個「書香門第」。其父朱啟連，曾當過張之洞的幕僚。因此，自幼他即博覽群書，對政治有濃厚的興趣。那時，正值甲午戰敗、馬關條約簽訂戊戌變法又遭到鎮壓。朱執信既慨嘆於清廷的腐敗，又失望於康、梁等人缺乏深謀遠慮，致失敗救國良機。

在一九〇一年一篇論說南宋史跡的文章中，他曾慨然談論道：「北狩辛勞，已差千載，古來申鑒，豈在一時。」足證少年朱執信已萌生了非翻滿清專制腐敗的政府的大志。而在一九〇二年，他進入廣州的一所新型學校——「教忠學堂」之後，更閱讀了「天演論」、「原富」、「民約論」等西方民主思想的經典著作，思想上更受到了民主主義的啟迪。一九〇四年，朱執信以留學生考試第一名被錄取官費留日，進入東京法政大學研讀經濟學，於是更多地接觸到了西方的革命學說。一九〇五年八月，朱執信參加了同盟會成立大會，並被選為總部評議員。年未滿二十歲的朱執信從此即走上了革命道路，成為孫中山的得力助手。

朱執信的思想特點是，他着重闡發了孫中山的民主主義思想，並是最早介紹馬克思的名字和學說的人。在一九〇六年「民報」第二號上，他發表了「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列傳」一文。在這篇洋洋近兩萬字的文章中，他着重介紹

了馬克思（當時譯為馬樂克）的生平及其階級鬥爭、剩餘價值及實現共產主義的學說，敘述了「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的主要內容，也介紹了拉薩爾等無政府主義派別的思想。他指出，馬克思不同於以前一些用空話來指責資本主義，主張社會主義的人，馬克思能指出資本主義「毒害之所由來」及「去之之道」，並剩餘價值學說來揭開資本家「剝削勞動者以自肥」的秘密。

雖然，與朱執信同時代的梁啟超等人也會在文章中提到過馬克思及其學說，但朱執信的文章不僅止於介紹，而是着重於用馬克思的觀點來觀察，評論當時的社會和革命問題，並提出了解決之道。要點是：

一、社會革命的原因在於社會經濟組織完全引起的貧富懸隔；
二、中國雖貧富懸隔不似歐美之甚，但也應在「未大不平時」即行社會革命，使不平不得起，斯其功易舉也；
三、以中國具體情況來說，政治革命的主體（即動力）是平民；客體（指對象）是君主；社會革命的主體仍是平民，客體是豪介（即指資本家）。主體相同客體不同，但社會革命無妨於政治革命，因此可以舉其功於一役。

朱執信的以上分析是有矛盾的。因為，當時政治革命的目的既是推翻君主專制制度，實現民主共和，它的客觀效果必然是為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開闢道路。但是，他却要在資本主義尚未得到發展的情況下防止或堵絕資本主

義的發展，這是主觀隨意的想法，在事實上也是行不通的。但是，這種主觀的空想的社會革命却一直延續至今，未曾收斂。始作俑者，其朱執信乎？

然而，在行動上朱執信仍不愧為民主革命中的激進派。這主要表現在一九〇七年他受孫中山派遣回國領導的幾次實際鬥爭中。在廣州，他以政法學堂教員的身份為掩護，在新軍、會黨和綠林中開展了巨大的宣傳和組織工作，使他們的首領參加同盟會並接受其領導。他出色地完成了偵察廣東水師提督李准的行動路線的任務，為一九〇七年謀炸李准做好了準備工作。他參預了一九一〇年廣州「新軍之役」的領導工作。他更參加了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之役，在進攻總督署的戰鬥中受傷，逃到香港。武昌起義的炮聲響起之後，他在廣州積極響應，親率由南海等地的會黨、綠林組成的「民軍」向廣州進軍。廣州光復後，他擔任了軍政府的總參議工作（實際上是秘書長），還兼任過廣陽綏靖督辦、軍政府核計長、軍法處長等職。他夜以繼日地工作，企圖以自己的表率來建立一個廉明的政府。

一九一三年以討袁為中心的「二次革命」失敗後，朱執信隨孫中山逃亡日本，參加了中華革命黨的組織，並成為「民國」雜誌的主要撰稿人，揭露袁世凱稱帝的罪行，表明了他是一個從不氣餒的革命者。當年八月，他又返抵香港，在那裡領導廣東地區的反袁鬥爭，並親赴南洋一帶捐款，以作反袁軍費。十一月，他親身指揮了南海民軍圍攻佛山的戰鬥。一九一五年冬，他被委派為中華革命軍廣東軍事長官，並發動過進攻惠州、廣州的戰鬥。袁世凱死後，他也曾協助孫中山進行了「護法」鬥爭。在所有這些軍事行動的失敗面前，他仍然以堅毅不拔的革命決心，設法完成任務，不負革命的囑托。而在一九一九年六月至一九二〇年六月的鬪爭間歇時期，他又撰寫了四十多萬字的文章，探索革命所面臨的新問題，駁斥了當時

甚囂塵上的「開明專制論」。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他更發表了「土地國有」為「實行社會主義第一步」等言論，並讚揚布爾什維克精神，讚揚赤衛軍，強調鬥爭沒有「了期」，並接受孫中山的指示，積極準備到蘇聯學習。在一九二〇年九月反對桂系軍閥的戰爭中，他在親赴虎門炮台策動守軍反正，調停駐軍與民軍衝突時被桂系軍閥殺害，在戰鬥中為中國的民主革命獻出了他的生命。

朱執信先生是辛亥革命中文武皆備，不可多得的人材。他為人古樸，詩也寫得瀟灑，而他矢志於革命而不忘於情操的人格，可以如下首七律中得窺其萬一：

為朗如（夫人）題詩：

別日猶看花滿枝，東風三月燕爭飛。
風蕭暮雨春何處，零落寒烟客未歸。
莫道離情傷晚晚，可能真意惜芳菲。
浮花浪蕊年年事，常恐天涯願易違。



革命大文豪陳天華

陳天華於一八七五年出生在湖南省新化縣的一個鄉村塾師家庭。由於家境貧寒，自幼年以少年時期，都以放牛和做小販貼補家用，同時刻苦自學，熟讀詩書，嫻於史籍。尤其是在十九歲時，他目睹甲午戰役清廷腐敗，喪權辱國，舉國洶洶的景象，憤而寫下了「莫謂草廬無後傑，須知山澤起英雄」的詩句，就充分

說明了他自幼即萌生了救國興邦的大志。此後，由於他優異的才華受到了一些人的賞識，遂資助他在縣城的資興書院和長沙的岳麓書院學習。在這裡，他又經受了八國聯軍入侵以後，颯起的割地狂潮所給予他的撕心裂肺的巨痛。於是，他抱着尋求救國真理的目的，考取了官費留日，於一九〇三年三月東渡日本。

在日本的弘文學院，他與黃興同學。在那裡，又發生了一九〇三年四月俄國妄圖永遠侵佔中國東三省所引起的國內外學生的「拒俄運動」。陳天華義憤填膺地參加了這次運動，並書寫了「敬告湖南人」、「復湖南同學諸君書」，發表在上海的「蘇報」上。同年十月，沙俄派兵強占瀋陽，在中國的領土上掀起了沙俄國旗，陳天華聞訊，頓足痛哭，立即咬破手指，寫血書「備述古今亡國慘痛情形」，郵寄湖南各學堂，在湖南各階層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有的上書撫台「請保護疆土，以全民命」。湖南省撫台趙爾巽將血書載於官報，並親臨各學堂宣讀，並下令各府、州、縣開設武備講習所，發給槍支，演習軍事，在全省掀起了空前高漲的愛國拒俄熱潮。

接着，陳天華又以滿腔的愛國熱情，採用人民大眾喜聞樂讀的白話文和彈詞形式，書寫了「猛回頭」和「警世鐘」兩本小冊子。在這兩本書中，他大聲疾呼，提醒國人，清政府早已「名存實亡」，清朝官員只不過是列強的「守土長官」，清廷成了「洋人的朝廷」。他沉痛地指出：

瓜分豆剖逼人來，同旌沉淪劇可哀。
太息神州今去矣，勸君猛省莫徘徊。
他無限深情地希望：

猛睡獅，夢中醒，向天一吼；
白獸驚，龍蛇走，魍魎逃藏。
改條約，復政權，完全獨立；
雪仇恥，驅外族，復我冠裳。
到那時，齊叫道，中華萬歲；
才是我，大國民，氣吐眉揚。

他的這兩本洋溢著愛國激情，飽蘸著亡國血淚而又雅俗共賞的小冊子，很快就經而走，風靡全國，在學生、大兵、工人、農民、市民中廣為流傳。黃興將它們散發在新軍中；陶成章將它們帶回浙江，由群眾到處演唱；以後又傳到了租界。清廷惶恐萬狀；在浙江，甚至將演唱「猛回頭」的龍華會員曹阿狗逮捕處死。但仍禁不住愛國思想的傳播。而陳天華也因之贏得了「革命大文豪」的美譽。

一九〇三年十一月，陳天華由日本回到長沙，參加了湖南省第一個革命組織——華興會的籌建和長沙起義的組織工作。他受黃興委託，到江西運動巡防統領（相當於團長）廖明縉參加革命；又曾到瀏陽與秘密會黨領袖馬福益接頭，授以少將軍銜，發給槍械馬匹。只因事洩，未能舉事，只好與黃興又逃回日本。而在二次赴日後，他遂有幸與孫中山結識，並參加了一九〇五年七月同盟會的建立；為之修改誓詞、起草會章、擬定「革命方略」，並成為同盟會的機關刊物——「民報」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由於同盟會在東京的成立，引起了國內各省及歐洲各國同盟會分會的成立，引起了遍及國內外的反清革命熱潮，於是，在清廷的壓力下，日本政府文部省於一九〇五年十一月頒布了「取締清韓留學生規則」（按：此處「取締」乃管制、約束之意），規定了中國留學生由日本政府指定學校入學，並接受日本政府監督等。十二月四日，留日學生數千人實行總罷課，表示強烈抗議。日本報刊就罷課發表文章，咒罵中國留學生「放縱卑劣」，嘲笑長沙起義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革命黨人是「烏合之眾」。面對這種侮辱，陳天華、宋教仁、秋瑾等多數主張立即回國，自辦教育；汪精衛、胡漢民等少數主張忍氣吞聲、完成學業。在兩種意見莫衷一是的情況下，陳天華憤於留學生在外人欺凌侮辱下仍不能團結一致，便毅然決定用以身殉國的壯烈行動來喚醒國人團結禦侮的愛國精神，於是，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八日凌晨在東京大森海灣投海殉國，時年三十歲。在長達三千餘言的絕命書中，陳天華指出：「鄙人心痛此言（按：指「朝日新聞」詆毀取締風潮為『放縱卑劣』）欲我同胞時時勿忘此語，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堅忍奉公，力學愛國。恐同胞之不見聽或忘之，故以身投東海，為諸君之紀念。」並表示：「鄙人以救國為前提，苟可以達救國之目的者，其行事不必與鄙人合也。」

辛亥革命前出版的各種宣傳革命的書刊。



①陳天華著“警世鐘”封面
 ②秦力山、段元丞等編“國民報”封面（1902年在日本東京出版）。
 ③章太炎著“天討”封面，1905年重刊本。
 ④李天編的民報臨時增刊的小冊子“天討”（1905年出版）。

青年時期所寫的「莫謂草廬無俊傑，須知山澤起英雄」的豪言壯語，至今猶鐫刻在湖南新化縣的路亭之上，鼓舞著人們去進行前赴後繼的鬪爭。

在陳天華這一壯烈行動的感召下，留日學生義憤填膺反取締鬪爭再掀高潮，國際輿論也給予同情和支持，日本政府被迫取消「取締規則」，並承認了留日學生的十多項要求，這一鬪爭終於取得了勝利。而陳天華的靈柩，在一九〇六年夏運返長沙安葬在岳麓山上時，更造成了萬人送葬，連綿十餘里的悲壯場面。而他

革命的馬前卒鄒容



鄒容於一八八五年出生於四川巴縣的一個富商家庭。然而，與其他一些同時代的革命黨人一樣，他自少年時期開始讀書以來，即鄙薄科舉，曾感慨系之地說：「衰世功名，得之又有何用。」相反地，對於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中英勇捐軀的烈士譚嗣同却異常景仰。他冒著生命危險將譚嗣同遺像高懸於座旁，題詩目勉曰：

赫赫譚君故，湖湘士氣衰。
 惟冀後來者，繼起志勿灰。
 這首詩，在文字技巧上雖不算成熟，但却已表現了十四歲的少年鄒容即已充滿了再造時勢的豪壯情懷，唱出了那個時代的最強音。

一九〇一年，鄒容本已在成都考取了官費留日，但由於四川總督奎俊說他「聰穎而不端謹」，在臨出國前取消了他的資格。而他毫不氣餒，到上海進了江南製造局附設的廣方言館補習日語，準備自費留日。在這裡，他留心時事，看到了清廷的專制腐敗，使祖國的大好河山任人蹂躪，不禁寫詩述懷：

落落何人報大仇，沉沉往事淚長流。
 淒涼讀盡支那史，幾個男兒非馬牛！
 一九〇二年春夏之交，鄒容東渡日本，進入神田區同文書院補習日語。在那裡，他受到

熱氣騰騰的革命氣氛的感染，結識了一些革命青年，閱讀了盧騷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法精理」及「法國革命史」、「美國獨立檄文」等書，使他的民主革命思想受到了極大的啟迪。因此，在這一時期的留學生集會上，他常常成爲民主政治的鼓吹者和專制政府的抨擊者，並開始着手寫作他的鼓動民主革命的通俗作品——「革命軍」。在這期間，他也曾與四個留學生一起，對清政府派出的留學生監督姚文甫，利用其與另一學監錢某之妾有私情而聲名狼藉的機會，闖進姚的住所，對其痛毆和剪辮，以示懲戒，使清廷爲之震驚，同僚爲之震懾。

在一九〇三年四月的拒俄運動中，鄭容回到了上海。他以滿懷的革命激情完成了「革命軍」的創作，並由柳亞子等革命黨人集資，在五月由大同書局予以出版。

在這本被稱爲「社會雷霆之聲」的著作中，鄭容首先以滿腔的熱情謳歌了「革命」。他說，革命是「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目的」，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偉大行動」。它有奇妙的作用，可「使中國大陸成乾淨土，黃帝子孫皆華盛頓」，他一再稱頌說：「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其次，他以較多的篇幅謳歌了天賦人權和平等、自由、鞭撻了長時期的封建專制主義將人性扭曲成奴性。他說：

「目格致學（按：此處指物理學）日明，而天子神授爲皇帝之邪說可滅；目世界文明日開，而專制政權一人奄有天下之制可倒；目人智日聰明，而人人皆得有天賦之權利可享。」

他指出，「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爲此，他譏諷奴性很重的人，說：

「奴才奴！奴才奴！勿管內政與外交。大家鼓裡且睡覺，古人有句常言道，臣當忠，子當孝，大家切勿胡亂鬧。」

他對於未來的民主中國，有着美好的憧憬。他無比熱情地說：

「建中央政府，選總統、議員。凡爲國人，男女一律平等；各人不可奪之權利，皆由天授。立憲法，悉照美國憲法，悉準美國辦理。」

「爾之獨立旗已高標於雲霄；爾之自由鐘已哄哄於禹域；爾之獨立廳已雄鎮於中央；爾之紀念碑已高聳於高崗；爾之自由神已左手指天，右手指地，爲爾出現。

嗟乎，天清地白，霹靂一聲，驚數千年之睡獅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獨立！」

「革命軍」一書，由章太炎作序，首先在上海的「蘇報」刊出，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恰似犀利的號角，和劃過長空的春雷，起了震聾發聵的作用。清政府至爲驚惶，首先於一九〇三年六月，將作序並寫「與康有爲論革命書」的作者章太炎逮捕；鄭容以與戰友共生死的态度，挺身而出，自動投案，被判「無期徒刑」；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以後又改判兩年徒刑。

在獄中，年方十八歲的鄭容與年已三十六歲的章太炎結爲忘年生死交；他們進獄絕食，與監虐的獄吏開展針鋒相對的鬭爭；他們以詩文相唱和，以革命氣節相砥礪。章太炎的獄中名作已如前述，鄭容的和詩錄之於後，曰：

我兄章枚叔，憂國心如焚。
世世無知己，吾生苦不文。
一朝淪地獄，何日掃妖氛。
昨夜夢和爾，同興革命軍。

由於獄吏對囚犯極其嚴酷，提籃橋監獄在一九〇五年這一年中，五百囚犯被瘐死一百六十人。鄭容也未逃出這一悲慘的命運，在抱病四十天後的一個深夜，他目未瞑而氣已絕，以年滿二十的青春年華死於上海租界地的監獄。

死時口吐鮮血，離刑滿出獄只有七十天。有人懷疑是遭人毒死。

年輕的鄭容雖然死了，但人們在高壓下仍爲他開追悼會，以「國殤」之禮待他。他的遺體雖被獄方棄置牆外，但革命黨人劉季平（又名劉三）却不畏強暴，將遺體安葬於劉的家鄉——上海縣華徑鄉黃葉樓旁。而他的「雷霆之聲」——「革命軍」一書，更在全國各地翻印二十多次，出版百萬冊以上，成爲當時發行榜上的第一名；上海的學生們在被窩裡，在燭光下傳抄着這本書，湖北的新軍們，在簡陋的營房裡偷看着這本書，舊金山洪門會的華僑們也在翻印着這本書。最重要的是，這本書裡的閃光的言詞和思想，給一大片一大片的人指明了道路，認清了方向，帶來了希望。孫中山在後來的「革命原起」一書中追述說：「蘇報一案，章太炎、鄭容以個人和清朝政府對訟」，「於是民氣爲之大壯」。又說：「革命軍一書，其開導華僑風氣，爲力甚大。」

「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鄭容在「革命軍：目序」中的這兩句話果然在六年後成爲現實：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成功，一九一二年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爲表彰鄭容的革命功勳，孫中山明令追贈鄭容爲「大將軍」，並爲他舉行了盛大的追悼會；而在他的墓旁，不再圍繞着荒烟蔓草，而是巍峨的石碑，燦爛的墓表。

革命軍馬前卒，成了榮耀的大將軍，這就是歷史爲鄭容作出的公正結論。▲

更正

本刊第八十期在「下一個整肅目標：國安部」一文曾提到龍雲之子龍某某被美國聯邦調查局扣壓一事，現查純屬誤傳，在此予以更正。本刊未經核實刊出此文，是工作失誤，對此我們向涉及對象表示歉意。



中國民聯聯絡站遍佈全球

中國民聯總部：

P.O.BOX 15273
WASHINGTON, D.C. 20003-0273
U.S.A.

港澳聯絡站

香港 九龍 廣東道 501號
2樓4室

日本聯絡站

日本東京都小金井市郵便局
46號信箱

印度聯絡站

TIBETAN CHILDREN'S VILLAGE
DISTRICT KANGRA,
HIMACHAL PRADESH, INDIA

南韓聯絡站

서울 特別市 江東區 蟬室洞
BOX 153, SEOUL,
SOUTH KOREA

蘇聯聯絡站

СССР МОСКВА 117463
У Л ПЯЦТОВСКО О
Д.3. К.350 USSR

匈牙利聯絡站

H-1360 BUDAPEST, Pf.6
HUNGARY

羅馬尼亞聯絡站

STR. ALEEA MACARALEI
NO.5 D26 ET1 APT.21
BUCHAREST, ROMANIA

波蘭聯絡站

UL. WATY PLASTOWSKIE 24
80-855 GDANSK, POLAND

南斯拉夫聯絡站

11000 београд
македонска 29/IV
BELGRADE, YUGOSLAVIA

土耳其聯絡站

HALASKARGAZI CAD.
183 PANGALTI-ISTANTUL
TURKEY

法國聯絡站

3 ALLE G LEBLANC
9300 AUBERVILLIERS
PARIS FRANCE

西德聯絡站

PARISER STR 52
5300 BONN 1
WEST GERMANY

英國聯絡站

P.O.BOX 58
MANCHESTER M14 6XL
UNITED KINGDOM

澳大利亞墨爾本聯絡站

G.P.O.BOX 4881 VV
MELBOUNE VIC 3001
AUSTRALIA

澳大利亞悉尼聯絡站

P.O.BOX K710,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澳大利亞堪培拉聯絡站

G.P.O.BOX 2851
CAMBERRA ACT 2601
AUSTRALIA

澳大利亞伯斯聯絡站

P.O.BOX 636
CIAREMONT WA 6010
AUSTRALIA

澳大利亞肯斯聯絡站

G.P.O.BOX 5616
CAIRNS, QLD 4870
AUSTRALIA

南美洲聯絡站

P.O.BOX 10A
ALBORADA GUAYAQUÍE
ECUADOR

加拿大溫哥華聯絡站

P.O.BOX 94052
RICHMOND BC
CANADA V6Y 2X2

加拿大多倫多聯絡站

55 McCaul St. BOX 182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T 2W7

加拿大阿爾伯特聯絡站

P.O.BOX 2487
DRUMHELLER AB
CANADA T0J 0Y0

美國舊金山聯絡站

P.O.BOX 146446
S.F., CA 94114-6446

美國洛杉磯聯絡站

P.O.BOX 565
MONTEREY PARK
CA 91754

美國華盛頓聯絡站

P.O.BOX 4558
ARLINGTON, VA 22204

美國休斯頓聯絡站

P.O.BOX 740787
HOUSTON, TX 77274-0787

美國芝加哥聯絡站

2411 CONCORD DR.
WOODBIDGE, IL 60517

美國西雅圖聯絡站

P.O.BOX 95802
SEATTLE, WA 98145-2802

美國麻塞諸塞州聯絡站

47 CENTRAL ST. APT.5
WALTHAM, MA 02154

美國肯塔基州聯絡站

3385 OTTEE CREEK DR.
LEXINGTON, KY 40502

美國印第安那州聯絡站

P.O.BOX 2796
W.LAFAYETTE, IN 47906

美國新澤西州聯絡站

1404 RASPBERRY CT.
EDISON, NJ 08817

美國北卡州聯絡站

115 WOODBURN RD.
RALEIGH, NC 27605

美國俄亥俄州聯絡站

P.O.BOX 10747
COLUMBUS, OH 43201

美國田納西州聯絡站

P.O.BOX 576
TULLAHOMA, TN 37388

美國愛荷華州聯絡站

P.O.BOX 3561
MOSCOW, ID 83843-0477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聯絡站

P.O.BOX 1934
KENNER, LA 70063

美國夏威夷州聯絡站

P.O.BOX 8718
HONOLULU, HI 96815

美國喬治亞州聯絡站

P.O.BOX 80969
ATLANTA, GA 30366-0989

美國佛羅里達州聯絡站

14592 SW 110 TERR
MIAMI FL 33186

美國密西根州聯絡站

P.O.BOX 6347
E.LANSING, MI 48826

美國密西根阿那伯聯絡站

1659 MCINTYRE
ANN ARBOR, MI 48015

美國科羅拉多州聯絡站

690 CORORADO BLVD.
DENVER, CO 80206

美國奧洛岡州聯絡站

2030 W.16TH WAY
EUGENE, OR 97402

美國阿拉巴馬州聯絡站

5213 GREENWOOD LANE
MOBILE, AL 36608

美國內布拉斯加州聯絡站

P.O.BOX 80755
LINCOLN, NE 68501

美國猶他州聯絡站

P.O.BOX 282
SLC, UT 84110-0282

美國康乃迪克州聯絡站

P. O. BOX 161
STORRS, CT 06268

美國新墨西哥州聯絡站

P.O.BOX 21832
ALBUQUERQUE, NM 87154

美國蒙大拿州聯絡站

P.O.BOX 5065
BOZEMAN, MT 59717-50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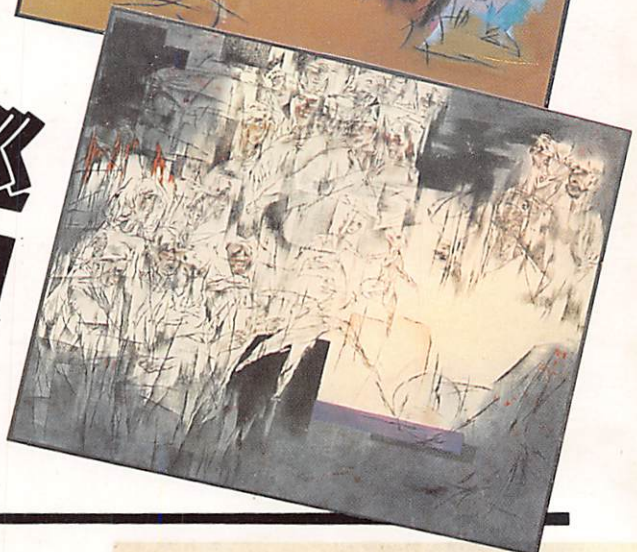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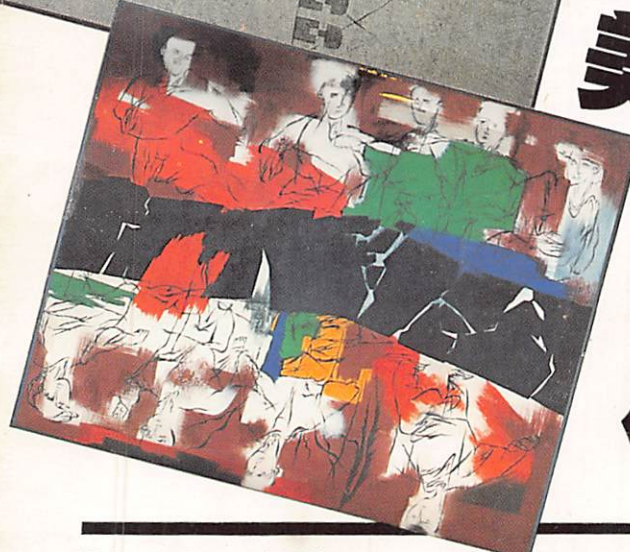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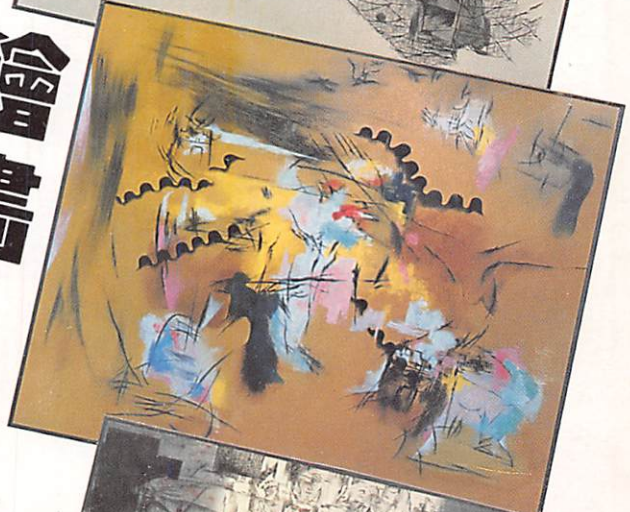
美國賓西法尼亞州聯絡站

P.O.BOX 19116
PITTSBURGH, PA 15213

六四紀念

繪畫

北美巡迴展



發行：中國之春出版社

美國：P.O. BOX 701400 FLUSHING, NY 11370-9998

香港：香港，九龍，廣東道501號2樓4室 TEL: 7826772

日本：東京都小金井郵便局46號信箱 TEL: 3-8496348

澳洲：P.O. BOX 3272, ASHFIELD, NSW 2131 AUSTRALIA

G.P.O. BOX 4881 VV MELBOVRNE VIC 3001 AUSTRALIA

歐洲：PARISER STR.52 5300 BONN 1, W.GERMANY TEL: 228-679902

東歐：1072 BUDAPEST, MAJAKOVSKIJ U41 BUDAPEST, HUNGARY

加拿大：P.O. BOX 94052 RICHMOND BC CANADA V6Y 2X2

零售價：(美) 2.50美元；(加) 3.00 加元；(港) 12.00 港幣。

* SECOND CLASS *
* POSTAGE PAID *
* FLUSHING N.Y. *
* ISSN 0735-8237 *

ADDRESS: CHINA SPRING 74-14 WOODSIDE AVE. ELMHURST, NY 11373 U.S.A.

TEL: 718-429-6777